

(美)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 著

张锐译

胡正荣校

新左派运动 的媒介镜像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伯克利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用细致的研究和极具穿透力的思考，解读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生运动和大众媒介之间的恩怨情仇



华夏出版社

《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吸引人的故事。

在吉特林对于媒体报道和学生运动丰富的叙述中，

他的朴素的描写，

他的对于人性的思考方式，

为我们在大众传播时代观察民主的意义以及媒介与民主不断扭曲的关系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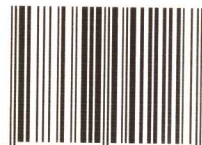
了一个独特的视野。

对于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历史上那段重要的时期，本书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T H E W H O L E W O R L D I S W A T C H I N G
m a s s m e d i a i n t h e m a k i n g & u n m a k i n g o f t h e n e w l e f

责任编辑：朱悦 书籍装帧：房海莹

ISBN 978-7-5080-4111-7



9 787508 041117 >

ISBN 978-5080-4111-7

定价：33.00 元

(美)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 著

张 锐 译

胡正荣 校

新左派运动 的媒介镜像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美)吉特林著;胡正荣,张锐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080-4111-7

I. 新… II. ①吉… ②胡… ③张… III. 传播媒介—研究—美国—现代 IV. G21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8715 号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BY TODD GITLIN
© 1980 by The 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5-3379

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

[美]吉特林 著

张锐 译

胡正荣 审校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人卫印刷厂

版 次:2007年1月北京第1版
200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开

印 张:16.25

字 数:291千字

定 价:33.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伯克利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用细致的研究和极具穿透力的思考，解读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生运动和大众媒介之间的恩怨情仇。

《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学生运动的报道如何抑扬褒贬；运动中公众人物的声誉如何与日俱增，又如何慢慢消散；暴力如何不断升级；媒体的选择如何影响60年代这场学生运动和社会政治变迁。

作者托德·吉特林曾经参与了当时的报道，他不但目睹了媒体是如何歪曲报道的，而且还看到了学生运动自身复杂的结局。

策划和海外联系人：潘忠党

主 编：黄 旦

副主编：陆 晔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石义彬 孙五三 陈力丹 吴予敏 陆 晔

何道宽 胡正荣 展 江 龚文庠 黄 旦 程曼丽

致 谢

在一个社会中，我们感到著书立说总是会得到许多的恩惠，得到许多帮助，是一种于历史环境之中的进展。本书中的观点虽然源于作者本人，但无论是言及结论的推断还是对现象的批评，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许多人关于文化和政治的著作和言论。

我要特别感谢接受我采访的前“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和一些反战工作者，他们分别是迈克·戴维斯、R. G. 戴维斯、道格拉斯·多德、尼克·埃格尔森、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理查德·弗莱克斯、海伦·赫伯、戴维德·霍克、格伦·赫希奇、迈克·克莱尔、迈克·勒恩、肯·麦克埃得尼、詹姆士·罗素、玛丽娅·维拉以及苏珊·韦伯。

同时我还要感谢向我提供许多宝贵资料的媒体工作人员：《纽约时报》的劳伦斯·本斯基、弗莱德·波利奇、柯克帕特里克·塞尔和丹尼尔·斯沃茨；《旧金山纪事报》的亚当·霍斯查尔德；美国广播公司和KQED公共电视台的凯洛琳·克蕾温；还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现任和前任的记者、制片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分别是罗斯·本斯利、朗·伯恩、布莱尔·克拉克、路易斯·克温、斯坦霍普·古尔德、玛丽·霍兰、亚历山大·肯德里克、斯蒂芬·莱特希尔、迈克·诺兰、森塞·萨默尔和丹尼尔·斯霍。他们在记录历史时，即便是面对许多困难和窘境也显得十分雍容闲雅，就像许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的工作人员有时候倾向于在报道的最后不署上自己的名字一样。

在我的思想和描写中，还有许多令人愉快的事情，感谢托马斯·布鲁克斯、克尼·布朗、保罗·克温、里切·克温、琼·克鲁茨、汤姆·恩格尔哈德特、南希·盖瑞特、蒂默·海特、卡罗·海奇、劳伦娜·凯恩、莱奥·劳温、特里·伦斯弗德、戴维德·马特查、马克·奥塞尔、弗朗斯·弗克斯、我的母亲杜瑞·瑞尼克，还有帕梅拉·罗比、尼尔·塞梅斯、芭芭拉·斯帕克、戴维德·威尔曼和保罗·威利斯。同时还要感谢一些对书稿进行了阅读和评注的人，他们是保罗·

布思、格瑞·卡尔弗特、大卫·戴林、罗伯特·格特里伯和丹尼尔·海琳，其中丹尼尔·海琳还为我提供了她在万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和国家档案馆收集的电视新闻资料。罗伯特·伍斯诺对整部书稿做出了具有真知灼见的评注。罗伯特·罗斯对于本书第三部分的修改给予了重要的帮助，书中的注释也记录了其他许多人的智力劳动。无须多言，任何人都不应该为本书中我自己的个人之见受到批评和指责。

格伦·赫希奇为我提供了许多线索，做了许多文献的研究，并且还打印了部分前期手稿。伊瑞斯·罗森伯格在纽约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做了许多后续工作。玛琳·伯森是我的研究助手，记录了许多关于反对核武器和核运动的文章，并且对其做了精辟的分析。帕梅拉·埃利斯和玛格丽特·欧克利打印了早期文章的定稿。欧内斯特·卡伦贝奇编辑也提供了许多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也要一并表示感谢。

拉瑞斯基金会和国家发展委员会资助了我在纽约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报道的研究，并且为我提供了许多对最终的著作有所帮助的材料。在种族与社会关系学院的研究经历使我有时间完成我的博士论文，本书也是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的。真诚地感谢玛丽·安娜和特伊·杜斯特，还要谢谢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委员会为本书提供的内容修改以及补充的研究费用。我的学位论文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在我的写作进展举步维艰时总是给我以鼓励，我要向埃利·霍斯查尔德、保罗·罗金致以最深的谢意。尤其是威廉·克恩霍斯，没有他对我不断的鼓励，这本书是无法完成的。

在几次修改了书稿之后，这本书的作者也和其他人一样，或多或少地将此视为一部平淡之作。从修订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总是想拥有理想的读者和批评，他们细心敏感并且能够抓住原作的意图，或许比作者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他们博学聪颖，能够提出震撼性的有力论断；他们希望语言能够清晰明朗。在本书最后一次修改中，我得到了克莱尔·斯派克这位读者非常宝贵的帮助，她逐字逐句地阅读了原稿，在许多地方提出了富有见地的意见，并且我们一起工作时通过长时间的交谈来不断地沟通，她的洞察力自始至终都得到了体现。我非常激动，也非常感谢她的慷慨和给予。

序言

我怀着一种复杂心情完成了这本书，这种心情实在不可言宣。想象一下，当你感到别人眼中的你和真实的你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或者别人认为这样的事情你却认为是那样的时候，这将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对于公众来说，这种不可名状的感觉已经成为他们对于媒介形象的一种普遍体验。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许多人都逐渐认识到，大众媒体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尽管并不十分清楚这种力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力量。单就媒体的作用而言，部分是显而易见的。报纸刊登的报道谴责肆无忌惮的警察对民众非暴力行为的猛烈摧残，同时还利用骇人听闻的图片向人们传达更多的信息。有时，媒体的作用也并非那样明显。乍看来，电视在某种程度上似乎真的对越战产生了影响，纽约电视评论家迈克·阿伦（Michael Arlen）将越战期间的报道形容为一场“直播间里的战斗”。那么，在这场战争中，无论电视是否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是否真的扮演了某种角色？战争最初的迅速蔓延，以及随后的衰退是否都受到了这种影响呢？1960年，在电视媒介光辉的照耀下，肯尼迪击败了对手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尽管在这之前，人们对电视的作用仍颇有微词。八年之后，又是在这种疑问下，尼克松靠着在电视上推销自己的广告击败了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见约·麦克吉尼斯（Joe McGinniss）一本销量不错的书——《总统的推销》（The Selling of the President）〕。

在随后的几年里，无论是挺战分子、反战分子，还是各种各样的政治党派，都逐渐意识到，大众媒体的光环将社会事件染上了不同的色彩；媒体围绕在它们的周围，不管这意味着什么，但绝不可忽视。1968年8月，数以千计的警察、军队以及国民警卫队的人员严阵以待，而游行示威者则冲着摄像机的镜头大声喊道“全世界都在看！”，仿佛是在混乱中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右翼势力认为电视淡化了暴力行径，而好战分子则指责电视怀有敌意，并开始将记者拒之门外。媒体的报道是否真的有所夸大，或者保护了某一方的利益呢，亦或是其他？无论如

何，新闻业的基本规则——尤其是声情并茂的电视媒介——用从业人员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并非是单纯反应现实的一面镜子”。至少它是建构现实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进入了我们的思考——我们是谁，我们又在做着什么。早些时候我就曾发现，大多数的运动实际上并不具有多少新闻价值；或者，即便真的进入了媒体的视野，也是牵强附会，甚至沦为笑料。1968年到1969的冬天，我开始强烈地意识到，媒体的报道不但会扭曲真相，而且还会无中生有，捏造事实。

在学生开展反战运动期间，我曾为旧金山附近的一些“地下报纸”当过自由撰稿人。当时，我从一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德才兼备的记者口中得知，总部设在纽约的电视网曾经为了修改一篇报道的政治言辞，而责令让该篇报道翻工。尽管对于新闻报道来说，这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而且并不能完全代表媒介具体的运作，但总让我感到有丝异样。为什么媒体要以如此方式来进行表达呢？为什么媒体的报道会干预这件事而不是其他别的事情呢？要想回答这些问题，仅仅用“媒介是权力机构”，或者“这就是权力机构的运作”等等子曰诗云是远远不够的。我也涉猎过一些有关文化研究和媒介理论方面的著作，但对于我所思考的问题，帮助却微乎其微。而一些已经出版的相关著作，也无法让我理想地把握电视媒体对于越战的报道。对诸如新左派运动这样的政治运动，一些学者的看法也是影影绰绰——运动的内部生活、革命意识，更不用说无意识的层面以及媒体是如何具体报道的了。

70年代中期，我决定将这些问题拿到毕业论文中来讨论。而且我认为，此时是我人生的一个关键时期，我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当时还没有真正对于媒介属性问题的研究，尽管美国学者并没有将媒体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给予过多的关注，而且这种关注难免流于肤浅，但这毕竟是一个开始。整体而言，大部分的研究都是立足于大众媒体是如何制造我们对于现实的感知上的。大多数观点认为，大众媒体的影像和叙述并不是完全和现实世界一致的，这并非源于媒体本身所具有的宣传属性，也不是因为同其他行业相比，媒介无法摆脱的虚词诡说。现代大众媒体不断地被加以操纵，用来制造陈词滥调。最为重要的是，媒体机构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记者们并不是自由漂浮的真理追求者，有时也会犯错误，甚至会干出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来。他们编织出对于世界的认识——并非用心险恶，而是和《纽约时报》“刊登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以及CBS新闻的“事情就是这样（the way it is）”截然不同的一种方式，或许是解释性的，或许是公正的，亦或是极具穿透力的。但是，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绝对不是直接来自于上帝。因此，对于宣称“事情就是这样”的新闻机构而言，即便是

被扭曲的问题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前奏。当它们与工作人员产生分歧，或者高层主管人员回应权力机构的管制时，对它们来说，什么才是有用的呢？

震惊不仅仅是一种认知的体验。想象一下，假如许多素昧平生的人对你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他们对你的理解并非真正的你，甚至恰恰相反。不管你走到哪儿，人们总是这样那样地盯着你，而你也无法摆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当你走进酒吧抬起头来，大伙多多少少都会知道一些你的事情，这种身份的扭曲似乎有点种族歧视的味道。更为不幸的是，你被完全地暴露——一个你想象中的你。

“欢迎来到这个世界”，或许你会有如此的想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内心的生活难免会有些暗淡，或许这就是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你确信你的内心世界确实很重要，你将体会到，真实的你和想象中的你二者之间的矛盾就如同一个窃贼一般，偷走了你自己。事实上，这种矛盾在现代生活中早已存在，并非刚刚开始。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George Simmel）强调了主体文化（subjective culture）和客体文化（objective culture）的区别。同样，在“主格的我”（I，我认为是的“我”）和“宾格的我”（Me，别人认为是的“我”）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尽管齐美尔并没有对媒介做出多少分析，但他对当代世界——一个仍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内心感受与外部关系之间的隔阂，是现代社会众所周知的状态。但是，你自己的生活——你所认为的生活，你自己理解的生活——是一种政治上的生活。围绕着你活动所散发出的各种形象，构成了你个人的意义所在，也决定了你何以为你。它们进入了你的感知并得到理解，重写你的行动。其中必定会有什么后果，或许是难以控制的。

当我开始执笔本书时，我仍深陷于一种后六十年代唯理论的偏见，这种偏见始于对堕落思想的厌恶，并且随着溯及以往的乐观主义而不断蔓延。在这种乐观主义视野下，定会有相当多的人对运动倒屣相迎，而且运动会在未来的几年、几十年的时间里创造一个健康的政治气候。我想这只是我的一个愿望，并不仅仅因为它忽视了运动的内在动力。即使是再为苛刻的批评，也不会否认媒体对于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不管是对于民主、战争还是其他事情的态度。现在，我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大多数社会中，大多数人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是流于褊狭的，这并非是危言耸听。我如此认为，并亲身体会到，媒介不仅影响了人们思考的模式，而且还影响了人们对于现实的感受（这是我在2002年完成的一本书中所讨论的问题，这本书是《Media Unlimited: How the Torrent of Images and Sounds Overwhelms Our Lives》）。人们借助于大众媒介来获得情感体验，体验媒介正在讲述的故事，并通过对这种体验来获得对于世界

的认识。这就是当被烧毁的旗帜的影像出现时，为什么会引起我们如此强烈的反应——因为它从我们的思想面前闪过，和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碰撞。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管媒体对于事实有所夸大，还是有所保守，它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之中。在扮演促进政治觉醒的角色上，媒体已不再显得那么重要，而更多地成为能够替代政治觉醒本身的事物。或许这些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今天，我对于本书第三部分提到的“理论”仍然没有多少兴趣（还有其他一些“理论”）。“霸权”，通常被认为是生产者 and 消费者之间的敌对，而我却觉得它是一个描述某种复杂过程令人生厌的概念。不过，这只是它的部分缺陷。它不足以深刻地触及人们现实中的问题，也无法抓住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思议却又是木本水源的东西：媒介影响下的生活本质。直到今天，所有的运动（或许是所有的政治）面临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便是对大众媒介的依赖。

本书同读者见面已经有 20 多年的时间了，在这期间，不可避免地又发生了很多事情。那么，是什么改变了媒体的运作以及它对政治运动的影响呢？或者更重要的是，大众媒介在政治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一些事情是永远也无法改变的。新闻报道对于一些事情不以为然，视为草芥。就像 1999 年底，它们在抗议 WTO 西雅图部长会议中所表现出的那样。而在这之后的一些全球性的领导人和机构参与的事件中，比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件以及八国首脑会议等，有许多星巴克咖啡店的玻璃被众多的“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s）”砸得粉碎，这丝毫没有得到媒体的关注；而数以千计的示威游行者媒体眼中也微不足道，或者就是一场和平的行动。

尽管媒介本身不像 60 年代的时候那么集中，这仍然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媒介的融合、电视多频道的出现以及观众的分众化趋势，并没有改变媒介所有权的日益集中。同时，互联网的出现为开发分散的市场提供了可能，就像在西雅图事件中所表现出的一样，电视节目的适位（niche）已是发展的必然要求。电视新闻对美国人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年轻人更多地将收看晚间的娱乐节目作为他们的信息来源。而且，对于电视观众或者广播听众来说，可以更容易得到各种各样的新闻。整体上的新闻已经缩小成为附属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不重要。

主流媒体不再像以往那样发出如此强烈的声音，但是新闻报道的有些东西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当政治精英们达成一致时（比如 1990 年的沙漠风暴以及 2001 年的反恐行动），媒体便会百依百顺。而当这些政治精英们存在分歧时，媒体又显得阳奉阴违，不时提出尖锐的问题——政府对于媒介的管制，尤其是五角大楼，比起 60 年代来要聪明得多。当媒体发现政府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其自身合

法性的时候，也仅仅是在这个时候，它便会摆出咄咄逼人的攻势，就像1986年在里根中期大选后的“伊朗门”事件以及2001-2002年美国大公司的一系列丑闻事件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媒体仍然会就有关国家重大事件向政府抛出问题，而不是答案。不过，当民主党人士集结于政府的时候，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尽管已是明日黄花的右翼分子一再声称“自由派偏见（liberal bias）”，但是媒体对克林顿和希拉里气势恢弘的口诛笔伐到头来并没有怎么有所作为，反而成了对白宫性丑闻的敲诈和对总统实施弹劾的要求，就像它们在“白水事件（Whitewater）”中遇到的困扰一样。在克林顿入主白宫的八年中，从来没有一个电台的记者像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那样，对克林顿大大小小的事情大张挞伐。也没有像右翼共和党人士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或者默多克的福克斯新闻频道所表现出的那样，不断地和克林顿大唱对台戏。

除了媒介之外，还有许多的因素影响了人们接受既有的社会秩序，社会分析家们不该对此有所遗忘。但是，媒介是否确保了既有秩序的稳固仍值得怀疑。今天，怀疑论（skepticism）和唯智论（knowingness）如此盛行，令人感到惊讶。所有的权威，包括媒介权威，都对媒体在越战、60年代的政治运动和水门事件以及随后推动历史进程的事件中的表现感到震惊，他们还没有改变以前的眼光。无论是教皇还是总统，都没有再赢回他们头上的光环，就连公司的CEO们也难免搁浅。新闻业——或者其主张——也受到了怀疑论的影响，变得畏缩不前。现在普遍认为，新闻并非所谓的“事实就是如此”，而是现实的一种反映，一种没有停止的反映。

最后，我无意说明所有的著作实际上都是不值一读的，姑且让我来说一说一部真正不值一读的作品。一些读者将本书看成是一本批评媒介机器单纯地对运动进行摧残并且维护反对者谎言的著作。我试图避免令这本书成为莫尼教（Manichaean）情节剧之类的作品，而力图展现人类的多种成就，并寻找人们的所思所想。如果我的怨愤满足了的愿望，我希望它们没有掩盖社会分析家们的光辉。在这本书的再度写作过程中，我的一个编辑，名叫内斯特·卡伦巴彻（Ernest Callenbach），曾提醒我从尚·雷诺的“每个人都有他的道理”中得到启发。事实上，在历史的逆流中，几乎很少有什么事情没有其自身存在的原因。尽管我站在运动一边，我不会也不愿宣称新左派是完美无瑕的，或者是善始善终的。对于新左派运动而言，无论如何都无法完全摆脱内部和外部的羁绊。正如我在第四章、第五章以及第六章讨论过的那样，运动对于权威和暴力的矛盾心理、与大众文化的区别、对名誉的热衷以及其自身学生运动的属性，都说明了这一点。另外，政

治力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或许读者会发现，许多主题都围绕着媒介来展开，而且我绕开了主题提到了一些和媒介无关的事情，比如林登·约翰逊灾难沉重的越南政策以及尼克松的诡计。

在随后的一些著作中，我涉及到了更多的问题。坦白地讲，本书绝不是我对于60年代的由衷之言。在这本书出版后几年，我又出版了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对60年代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在我看来，本书对60年代的学生运动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开始，远非终结。媒介和运动共同演绎的历史不失为一个框架，不仅仅本书是60年代的一个框架，正如我想表达的一样，或许读者已经能够领悟其中的含义——这本书不仅回顾了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更对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做了进一步的考量。

导言

本书是一本关于大众媒介和新左派（the New Left）的著作，主要追溯了20世纪60年代大众媒介与新左派运动的历史，考察了二者在历史时空中的复杂关系。同时也讲述了在一个无处不渗透着大众媒介的社会中，公共文化领域控制下的一次重大冲突。

自从半个多世纪前广播媒介问世之后，社会运动也得以自我组织和发展，并在整个社会领域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媒介对于社会经济的关注以及传播事件和报道新闻的时效及功能，使得社会运动在试图改变既有社会秩序，同时日新月异，尽管社会运动、大众媒介以及有关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在寻求现代文化语境的意义时多少显得有些步履蹒跚。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信仰和忠诚深深地植根于传统，只有少数的经验直接来源于社会现实。而现在，整个社会的情形却是屈从于惑众流言、媒体报道、大众潮流以及社会时尚的一种普遍性脆弱：传统价值观守护的匮乏以及对于政治权力的热衷。在一个日益模糊与不确定的世界里，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大众媒介来寻找并试图发现自我。而且，大众媒介本身的传播也背道而驰：说服性的大众媒介不断消解着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籍此来增加人们对它的依赖。同时，大众媒介也将一个机械的公共空间带入了私人领域。在生存世界的裂缝中，为了获取概念、英雄人物的形象、信息、情感诉求、公共价值的认同以及通常的符号，甚至语言，人们发现自己已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大众媒介。在现实生活中，它们无时无刻不在为人们编织着信仰、价值和集体认同——通过其颇具说服性的美德、平易近人的亲和力和位居中心的象征力量。它们对这个世界做出各种解释并宣称事实何以为事实，而当这些宣称受到怀疑和指责时，它们又会用同样的宣称来压制积极的立场。简而言之，大众媒介已经成为支配意识形态的核心体系。

言外之意也就是，大众媒介每天都在用语言图像、娱乐、新闻以及广告来建构概念与想象，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并明确意识形态，不管这种方式是直接的还

是间接的，亦或直陈其意还是借助于晦涩的隐喻。对于意识形态而言，一个重要的职责便是对其反对势力的界定。当然，大多数情况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大众媒介的广泛和集中以及与主流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结合却为反对势力制造了一个新的境遇。有别于19世纪90年代的“民粹主义小农场主运动”（the Populist small farmers' movement）和20世纪初的工人社会主义政党（the worker-based Socialist Party），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世界中。“民粹主义小农场运动”拥有自己1,500份发行量的周报，工人社会主义政党的报纸也有数百万的发行量，而新左派运动面对的则是晚间电视新闻、通讯社报道以及新闻从业者对于“客观（objectivity）”的解释。60年代，统治美国社会的是公司经济，而不像以前那样显得乳臭未干。在弥漫着战争气息的国度里，“天命观”（Manifest Destiny）也逐渐开始变得现实起来。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是世界上首个大学生人数超过农民人数的国家。而激进反对派的社会构成，也相应地由小农场主和移民工人转向了黑人、学生、青年和妇女，改变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性结构，更重要的是其本质特征（texture）。政治运动的整个性质（quality）、过程（procedures）、基调（tones）以及文化承诺（cultural commitments）都发生了变化。面对庞大的文化工业，政治运动必须对其有所考虑——或者行走于其边缘，或者迂回于其缝隙，或者予以反对。如同先驱者的“民粹主义小农场主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政党，“新左派”运动也拥有自己的“地下（underground）”报纸和数以万计的读者。但是，每天晚上却有2,000万的美国观众收看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杰特·亨特利（Chet Huntley）以及大卫·布林克利（David Brinkley）的新闻节目。而消息主要来自于世界两大通讯社的日报，则拥有近6,000万的读者。对于反抗运动而言，在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之外来解释自身和其世界观，并建立能够自我生成文化制度的文化基础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根本不可想象的^①。的确，在一个商业文化位居主导的社会，建构意义的难度可以和借助于劳动力创造价值相提并论。正如“工人（workers）”意义层面上的人们在做什么和怎样做以及产品是如何分配和使用上无法倾听到自己的声音一样，“意义生产者（producers of meaning）”层面上的人们也无法确信大众媒介是如何制造他们的言论和行动的。经过设定后的意义在现实中变得荒诞怪异，并不断远离虚假的制造者甚至将它们视为异己，而蓄意性行为的社会意义也超出了原有的认知，遭到扭曲。

^① 这是Walter Adamson提出的观点，见“Beyond Reform and Revolution: Notes on Political Education in Gramsci, Habermas and Arendt”，*Theory and Society* 6（November 1978）：429-460。

在20世纪后期，为了昭示自我并且表明它们想对公众做些什么或是想支配些什么，政治运动开始依赖于大规模的传播。不过，在该过程中，对于何为“有新闻价值的 (newsworthy)”事件，政治运动只是对照新闻含蓄的定义照本宣科地加以理解，或者模仿新闻工作者的准则来形成对何为“报道 (story)”，何为“事件 (event)”以及何为“反对 (protest)”的认识，对于广大公众和文化制度而言，他们缺少可具选择的信息来源，甚至根本没有。在这种情形下，大众媒介所宣扬的形象逐渐演变成了所谓的“政治运动”。于是，这种形象便对公共政策产生了影响。而当运动遭到反对时，真正遭到反对的大多却是这套大众媒介所宣扬的形象。大众媒介通过消除并努力将这种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来界定运动事件的公共意义。相对于运动的真正面目而言，媒体所传播的形象显得愈加模糊与晦涩，媒介关注的是领导者 (leaders) 和显要的官方“人物 (personalities)”。事实上，他们可以将领导人变成“公众人物 (celebrity)”，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于是，报道的形式便形成了一种系统性框架 (systematic framing)，而这种往往被扩大的系统性框架决定了政治运动的命运。

运动被界定为“真实的拷贝 (good copy)”经常是绚丽多姿的，或者是因为媒体所宣称的公众人物—领导人 (celebrity - leader) 的出现，或者是同新闻从业者视野中的“报道”相互吻合；但这些形象的本质并非运动本身的计划、身份和目的等初衷所在。然而，当它们限定并扭曲了运动本身时，媒体却往往夸大了对于这些运动的话题。正如我在本书第三部分中所讨论的那样，它们在国家和社会中将丑闻散布出来，通过适时对合法权利建构权威来纠正错误。自由的媒介悄然唤起变革的需要，但却蔑视那些要求对现有社会制度进行改革的政治运动。

新闻业的惯例是以新闻组织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兴趣为基础的，往往从对各种社会现实的筛选中得到体现。日复一日，常规的组织程序界定了“报道”，塑造了领导人以及他们所持的观点，并且传达了该如何认识领导人的态度。只有在政治危机或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出现较大变化的时候，政治经济领导才会偶尔直接介入或干涉现行的新闻惯例。但大多数情况下，想当然的“客观性 (objectivity)”和“平衡 (balance)”准则迫使记者们去寻找那些扛着旗帜、看起来粗俗却又吸引人的示威游行，使他们与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事实确凿的官方保持对立。冷静而又谨慎的论调确保了“骚乱 (disturbance)”应当得到官方的合理控制。“骚乱”这样的字眼赞扬了既有的规范；摄像机拍摄的角度和新闻业业界行话（比如“事情就是这样”）确保了新闻主持人的完整和权威，表明了既有秩序存在的必然。言外之意就是，无知愚昧的人被蒙在鼓里；而那些聪明人，比如政

府官员还有记者们，却保持着难以想象的镇定，守在旁边等着看好戏。

然而，这些传统是随着历史产生、发展并改变的。新闻的生产并不是自我封闭的；出于商业因素和职业操守，新闻业不能对于意识形态重大的变化有所忽视。往日没有得到关注或者是作为取笑对象的疯子会成为今天受人尊敬的“积极的消费者”。与此同时，媒介视野中60年代迷惘的形象也无法和70年代懒散、冷漠、自我满足的形象相提并论。1971年，昔日著名的“芝加哥七人团体（Chicago Seven）”中的革命先驱约翰·弗罗尼斯（John Froines）来到了华盛顿声讨政府。可到了1977年，他却高薪供职于华盛顿的政府部门。就在同一年，马克·鲁德（Mark Rudd）从“气象员地下组织”（Weather Underground）中崭露头角。在对马克·鲁德的父亲进行报道时，就30岁这个年龄对于革命事业是否已经略显年迈的问题，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深有同感地露出了微笑——这些都是当时冷静、理智的时代中广泛宣传的形象。同时，公共事业进度改革运动、南部的一体化运动、全面就业运动、反对军备运动、反核武器运动等并非由“公认的领导者（recognized leaders）”（被媒体选出来作为公众人物）发动的运动超越了现行模式（“新左派死了”，“美国正转向右派”）——通常它们是要被忽视或遭到诋毁的——直到这种现行模式发生改变（如它们在三哩岛 Three Mile Island 事件中所表现的那样）。1978年5月，在科罗拉多的洛基弗拉茨工厂（Rocky Flats）发起了一系列的示威，示威主要反对一家为美国氢弹生产钚触发器的工厂。随后，一位反对核武器的人士获准释放。他打电话给《纽约时报》华盛顿总部的一个编辑，询问该报是否报道过在示威中部分工人遭到拘捕的事情。该编辑对此予以否认，而且补充说：“美国厌倦了抗议，美国厌倦了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就这样，蒙蔽大众终于无法避免；编辑或执行审查人员将他们的篡改合理化，并谦逊诡秘地将其奉献给愚昧而又趋于同质的受众，这正如心地善良的牧羊人认为新闻评审合情合理一样。内容越是接近国家政治精英们的核心利益，这种挑战就越有可能会遭到管制，也就越不容易公之于众。国家核武器项目的核心问题是安全问题；因此关于核武器会带来威胁的报道要想通过审查自然是难上加难——这种难度远非我们可以想象，而是难于登天，正如三哩岛事件后的相关新闻报道。但是，如果问题在精英层中发生了争论，新闻准则更为惯用的手法是更多地处理来自社会上的反对意见，进而控制事件及其影响，并按自己的意图进行传播，尽其所能将其纳入社会的主导结构中，将其余的部分推向社会生活的边缘。

因此，经过加工处理过的信息变得愈加复杂。我们以其中的一个新闻题材为例：1976年5月8日，在CBS的《晚间新闻》节目中，丹·拉瑟（Dan Rather）

报道说，联邦调查局在 30 年代以及随后的二战和冷战时期使用过窃听器。他还说这些活动“在 60 年代的国内动乱时期”达到了极至。通过这篇报道，我们可以看出广播新闻报道中的矛盾所在以及反对力量将它们暴露出来的局限性。首先，拉瑟传达了美国一度神圣的部门几十年来一直在触犯法律的信息。第二，以一种微妙而又简洁的方式，以专家政治主义者那种软硬兼施、值得信赖并使水门事件的证据仿佛确凿的口吻——对这种违法行为感到悲哀——支持那些将此公之于众并建议停止这种行为的政府机构，同时强调媒体实际上是与这种自我修正的体制站在一起的。第三，将事件界定为“国内动乱 (civil disturbance)”，将当时政府外的政治对立势力排除在外。60 年代，如果黑人和学生的反抗运动自称“呼吁和平与正义的运动 (movements for peace and justice)”，那它们则被认为是令人厌恶、不值一提的事情。通过他的言论，拉瑟最大可能地引导观众从事实根源发现政府这种行为的原因所在。单就这一新闻报道而言，拉瑟并未对事件进行蓄意的探究 (我这么认为)，他只是 (a) 确定政府部门滥用职权；(b) 呼吁对现有机构进行立法改革；(c) 解释来自政府之外的非法但却存在或者是激进的反对意见。这条新闻捅了大漏子，传达了一个未曾公之于众的道德规范；它建议不要与潮流对着干，不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这个世界将恢复本来的平静。通过这种并非蓄意的方式，媒介将运动区分为合法的主流事件和非法的附属事件 (sideshow)，所以这些区别看起来似乎都是“自然而然 (natural)”的，或者是“通常意义 (common sense)”上的事情^①。

令超越直接经验之上的世界看起来更为自然一些的是媒介框架 (media frame)^②。当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被描述的世界就是现实中的世界，许多事物都是客观存在的。任何时候，世界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即使是在某一特定事物中，也有无限可察的具体细节。媒介框架是选择 (selection)、强调 (emphasis) 和表达 (presentation) 的原则，由很多对存在、发生和发展的事物加以解释的细微理论构成。在日常生活中，正如埃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所详细描述，为了超越、控制、理解并选择恰当的认识和行为^③，我们建构了现

① 对电视新闻用语意义的分析，请详见 Todd Gitlin 的“Spotlights and Shadows: Television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ollege English* 38 (April 1977): 791-796.

② 关于媒介模式，请参阅 Gaye Tuchman, *Making New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8)；以及 Stuart Hall 的“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England, 1973.

③ 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4), pp. 10-11 and *passim*.

实。媒介框架，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言说和超越认知的，为新闻记者和日益依赖于新闻报道的我们建构了世界。媒介框架是认知、解释和表达的连贯模式，是筛选、强调和排除新闻报道的过程，同时也是事件操纵者组织言论的过程，不管这种言论是动态的还是视觉的。媒介框架保证记者们能快速、常规地处理大量的信息：对信息进行识别，纳入认知类别，然后进行包装，更有效地呈献给大众。因此，单从组织的角度来考虑，媒介框架是无法回避的，它能使新闻业有组织地管理它们的生产。对于新闻业的任何分析方法——实际上，对任何大众传播内容的生产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里的媒介框架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框架而非其他？对于不同时刻、不同地点和不同的媒介，处理该事件和其他事件的框架应当遵循何种模式？新闻管理机构是如何对此加以管制的？

有鉴于此，媒介框架对于广阔的现实世界究竟有什么影响呢？

当然，在更为宽广的政治现实中，大众媒介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仅仅只是因为广播的出现才成为人们探讨的话题。一个半世纪以前，在巴黎，当商业印刷刚刚起步时，一个名叫巴尔扎克初涉此行业的人被其商业力量所深深地吸引。他完成了一部生动的半自传体小说——《幻灭》（*Lost Illusions*），其中描写了浮花浪蕊般的新闻记者轻浮没落的职业生涯。巴尔扎克说到，印刷业使作家们日趋堕落，他们只会无休止地追求商业利润。1839年，在小说《一个著名的外省人在巴黎》（*A Provincial Great Man in Paris*）中晚宴的一段对话，巴尔扎克提及了大众媒介对于政治影响的话题；它保持高度警惕，害怕反动活动，对启蒙民主派充满希望：

菲诺（Finot）说：“印刷业的力量和影响已穷途末路。新闻业已开始萌芽，破土而出，并将不断发展壮大。十年后，任何事情都将受到宣传的影响。思想将会照耀一切。”

“也将会破坏一切。”布隆德特（Blondet）补充到。

“真是一语中的。”克劳德·维尼翁（Claude Vignon）接着说。

路易斯迪乌（Lousteau）说：“它将成就英雄人物。”

“它会消解民主。”外交家说。

“如果大众媒介并没有存在，”布隆德特说，“我们不会失去什么；但只要它存在，我们就得依此而生。”

“你会毁在大众媒介手里，”外交家说道：“难道你看不到大众的巨大力量吗？假如你开启了民众，那么个人的影响将有损无益；如果理性的力量在大众底层中

也得到传播，你将会看到革命，成为第一个受害者。”^①

巴尔扎克十分敏感，既希望又害怕新的社会紧张局势；在一个崭新的社会领域，他在建构一种新的制度。当然，从那以后，收音机和现在的电视机已成为居家的必需品。在很大程度上，广播也成为大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了。但对研究者而言，在探讨大众媒介在报道总统候选人所获选票的情况或相关评论时，调查显示，自从广播成为美国人民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以来，政治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媒介不断设置政治对话的议程，虽然它们与自治相差甚远，但它们并不是被动地反映政府、政党、集团或“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②大众媒介交流的集约化和商业化，使它们成为社会文化主流的工具，这一点就连巴尔扎克本人都没有想到。无处不在的大众媒介通过特定方式，将媒介作为一个完整体系（a whole system）从实证论者的社会分析视野中挪开。我们应该如何衡量这股社会力量的影响呢？在社会生活中它无处不在，对于社会生活的构成具有巨大的影响。根据以往的假定，至少大众媒介是在人们的推测、态度和情绪，即意识形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社会力量。它们有时制造甚至夸大了公众对于“现实环境”的合法界定。大众媒介通过对信息的筛选和删除、强调以及运用语调等所有的处理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作用和影响。

这种意识力量是以既定的秩序为中心的。在第三部分中，我将更加详细地对此进行阐述。这里我想说明的是，这种秩序的主导结构是私人控制的垄断公司经济及其密切相连的官僚主义、官僚政治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混合体。虽然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令人生畏，但是它们并不能保证社会的持续发展，在反对这种制度下深刻持久的矛盾产生的激进影响时，不能确保其统治机构的绝对安全。用现行社会学理论的话来讲，为什么会诉诸法律的手段来使人们与主流制度实现协调的发展呢？的确，送货上门。但为什么公民愿意让自己的身份

① Honoré de Balzac, *Lost Illusions*, G. Burnham Ives 译。(Philadelphia: George Barrie, 1898), Vol. 2, p. 112.

② 不断有证据表明，在处理政治议题时，对于公众意见，媒体通常会予以决定，而不是听从。参见 Maxwell E. McCombs and Donald L. Shaw, "The Agenda - 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 (1972): 176 - 187; Jack M. McLeod, Lee B. Becker, and James E. Byrnes, "Another Look at the Agenda - Setting Function of the Pre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 (April 1974): 131 - 166; Lee B. Becker, Maxwell E. McCombs, and Jack M. McLeo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Cognitions," in Steven H. Chaffee, e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75), pp. 21 - 63, especially pp. 38 - 53; and Jay G. Blumler and Denis McQuail, *Television in Politics: Its Uses and Influence* (London: Faber, 1968).

表现得像顾客？为什么宁愿在每况愈下的环境中劳动呢？毫无疑问，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但无论如何，我们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总会追溯到意识形态领域，即最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领域。社会是一台机器或一个事物；它是人类的共存体，人们各司其职（包括维护或改变社会结构），他们是感性的、会推理的、遵守社会道德的活生生地体验世界的人，而并非由社会简单“创造”的。世界上模式化的经验总是发生在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事物中。任何社会意识形态理论总要回答两个相关的问题：意识如何产生；为什么在不同的时代它会被不同程度地接受或摒弃。

在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著作中，霸权（hegemony）是专门针对统治阶级借助意识形态，通过塑造普遍意见来行使统治权的一个概念^①。最近，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升华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超结构二元分类（superstructure dichotomy）（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上升为”意识形态的“超结构”）。威廉姆斯认为，霸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高级水平”，而且是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现实实践和期望的统一体。^②这种主要经济结构，或“生产关系”，限制了意识形态和普遍的理解作为建构世界意义的方式——并非机械地“决定”。例如，资本主义政府虽然不能直接为有关社会主义的新闻报道制定精准的框架，但它却可以限制有关社会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最为合理模式的报道。人们无需为了理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持久性而全盘接受葛兰西的分析理论，探讨霸权的重要性是将上述的劝诫与即将论述的怨怼统一起来。特别是不必认同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前提——“任何”意义上（甚至“绝对”）的“生产力”的“物质基础”都先于文化的发展，^③但我仍赞同葛兰西的核心概念；那些支配统治机构的人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被统治者之上，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确保了他们的权力，即便不能完全控制意识领域，也能十分明显地影响人们对于社会的思考。这里我所阐述的霸权是积极的，霸权通过社会活动和制度程序构成的复杂网络发挥着作用。在统治者的实施与被统治者的协作下，霸权得以生成。

①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Quintin Hoare, Geoffrey Nowell Smith 译。(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71)。

② Raymond Williams,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New Left Review*, No. 82 (1973), pp. 3-16. See also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especially pp. 108-114.

③ 为了更好地解释文化有助于一个既定社会建立“物质基础”的方式，请见 Marshall Sahlins, *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art 2.

霸权意识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中——自然而然地创造了一个活生生的、充满爱意、可感知甚至有点叛逆的世界。根据“通常意义”，人们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内，它与人们的这种“通常意义”相互融合，共同交织在一起。与此同时，人们只是部分、不均衡地接受霸权这种说法；他们通过争论、有时甚至是斗争来改变霸权这一意识形态。事实上，霸权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上层建筑的愿望和策略，成为社会统治集团的不同政党联盟；这些愿望和策略又会根据时代的潮流有所调整。在国家公有资本主义社会（同样也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学校和大众媒介被认为是阐明和传达国家意识形态的机构。同时，媒介间接地——至少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会考虑一定的时代潮流和压力，象征性地采取抵制态度，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重新包装并加以传播。也就是说，权力之外的群体——激进的学生、农场工人、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或因交不起财产税而挣扎呻吟的雇佣者们会对权力和对现实的界定提出抗议，叛乱的社会运动所采取的一个策略就是制造“新闻事件”。

媒介不断制造并传播着社会形象。然而，社会现实是异常复杂、极易变化、自我矛盾的，被统治者每天都在忍受着痛苦的煎熬，于是运动也便层出不穷。他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渴望公正，运动激起他们的欲望，使资源产生流动。他们渴望革新，努力寻找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空间。这些具有选择性的想法尚不具对抗——直到他们对现行制度的主要机构和既有秩序，即作为整体上的集团经济、军事化的政体和权威的社会关系产生质疑。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表明了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包含着两种自相矛盾的价值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等级观念，公民权和财产权，真理与权利的神秘化和僭越。^①那么，这种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渗透到新闻报道并被不断地吸收和消除矛盾的呢？更为固定的模式是如何限制对反对活动的集中报道的呢？在很大程度上，起作用的是新闻记者的媒介惯例。

这种惯例早在新闻记者儿提时代就已经存在，直至他们经过学习培训，成长为新闻工作者，并不断得到奖励和提升；他们明确地形成了这种对于新闻界定的方式——事件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任何时刻必须确保新闻的“客观性”。当记者们从编辑和条文中领悟了新闻价值的含义时，或者接受了官方的分析模式甚至采取相反的态度时，他们能按照惯例自动地对新闻内容加以编辑。当记者们决定报

① 摘自拙著“Prime Time Ideology: The Hegemonic Process in Television Entertainment,” *Social Problems* 26 (February 1979): 264-265.

道什么或者如何予以报道时，他们很少对意识形态的假设深思熟虑，也很少会考虑报道将会产生何种政治影响。^①受制于这种单纯的工作，记者们更倾向于为现实中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提供服务。

但是，对于分裂性运动或者危机时刻而言，新闻惯例有时未必会迎合霸权的口味。惯例制造的新闻不再与主导地位意识形态以及精英们自称的重要利益相一致，或者精英们本身对于新闻报道的意见就四分五裂、矛盾重重，为新闻的内容吵个不停（这种极端的情况，比如1973年的智利，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被推向与之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并且很快趋于崩溃；主导模式戏剧性地发生改变，转向了右翼势力）。在这种危机时刻，政治经济精英们（包括媒介组织的所有者和决策者）更有可能直接对媒介惯例进行干预，试图对新闻业加以管制。换句话说，一定程度上，文化机构名义上保持着一种与上层政治、经济精英阶层脱离关系的标准和程序。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紧密相联和真正的独立，有助于作为整体的制度秩序和作为部分的新闻业合法化。然而，精英们却不愿让这种独立伸展得“太远”。只要它与精英们的利益相关，不触及主导地位价值观或激进的批评以及社会不安定因素，它就得迎合精英们的口味（是精英们制订规则，并且决定什么才算走得“太远”）。当精英们在重要决策上有所分歧时，当核心价值观遭到激烈批评时，如60年代，新闻业便会遭到争论。反对派急于诉诸社会和政治的转变能够铲除资本主义的矛盾所在，包括其原有的媒介制度。于是，整个社会范围内的斗争虽然悄无声息地进行，没有任何危害，但却转入了文化制度。然而意识形态的驯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与警方的秘密活动一起^②——缓解并孤立着意识形态对于这种体系的威胁。

当然，检验这种争论的方法要看是否具有确凿的证据以及是否囊括了历史事实。在谈论主流媒介的特殊事件以及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运动的过程中，本书大部分内容对这种证据进行了探求，我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强调了媒体报道的本质。主流媒体对学生的激进行为做出了何种反应？哪些事件和夸张的行为具有新闻价值？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这种报道的主题是什么？以什么样的口吻报道的？如何随着时

① 正如Gaye Tuchman写到的那样：“新闻既建立又重构了组织结构。”（*Making News*, p. 210）其他的著作可以参考Leon V. Sigal的*Reporters and Officials: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of Newsmaking*（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73）以及Bernard Roshco的*Newsmaking*（Chicago: Chicago Press, 1975）；更多详情可以参阅Herbert Gans的*Deciding What's News*（New York: Pantheon, 1979）。

② 大众媒介与警方政策的直接关系很少有所涉及。参考Chip Berlet, “COINTELPRO: What the (De)leted Was It? Media Op,” *The Public Eye* 1 (April 1978): 28-38.

间的推移而变化? 这些改变在何种程度上是由运动的实际政策和行为的变化决定的呢? (尽管方法论上存在着难度, 却旨在发现并描述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

首先, 我将重点放在对运动的新闻报道上, 然后透过现象抓住媒介中心的——通常是不可言说的——关于政治世界及其某一特定反对派的言论。^① 因为在新闻“影响”观众之前, 媒体从业者必须将新闻传播出去, 使之进入人们的大脑, 然后信息才能被人们处理接受。最近, 围绕“电视的影响”所产生的讨论就是节取了信息的某一特定部分(如暴力)作为内容, 然后用大量的方法来进行包装。媒介通过进入人们思维中的形象来影响、重塑他们的活动。因此大众传播专业的学生在提出媒介的作用这一问题之前, 必须注意媒介信息的象征性内容。在文章的第一部分, 我主要论述了媒介如何对待运动之类的问题, 主要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 -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与之相比, 还有其他的反战组织——1965年该组织首次公开亮相。我以时间先后顺序展开文中的论述, 以期引起读者对于新闻模式的规则和变化的注意。

但是, 运动远非引起媒体关注的被动角色。对于媒介的影响, 相关的研究大多采用了巴甫洛夫心理学中的刺激——反应论(stimulus - response psychology)和与之相对的多元化学说。虽然有时我会采用一因一果这种方法, 但我并非在论述被支配对象的相互影响(仿佛运动和媒介像是桌面上的台球一样碰来碰去); 而是在一个充满矛盾和自我矛盾的历史进程中, 阐述“积极”的运动和“积极”的

① 对运动和媒体的报道进行过系统分析的有: James D. Halloran, Philip Elliott, Graham Murdock, *Demonstr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0), which closely follows British newspaper and television coverage of the giant October 1968 anti-Vietnam War demonstration in London. 相关著作还有 Stanley Cohen 的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London: MacGibbon and Kee, 1972), 是研究 60 年代早期的媒体如何宣传年轻摇滚音乐团体的。由 Stanley Cohen 和 Jock Young 等人合写的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A Reader* (London: Constable, 1973; and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73) 也提供了对于媒体报道框架的文本分析。另外, Charles Winick 等人的 *Deviance and Mass Media*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78) 也有类似研究。对于新闻媒体关于政治事件的报道模式, 在 Harvey Molotch 和 Marilyn Lester 的 “News as Purposive Behavior: On the Strategic Use of Routine Events, Scandals, and Rumo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 (1974): 101-112 有所阐述。另外 Stuart Hall 的几部著作也可以关注一下, 分别是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The Unity of Public Affairs Television,”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9 (Spring 1976): 51-93; “Reading Television (London: Methuen, 1978)” . 在 John Fiske 和 John Hartley 的 *Reading Television* (London: Macmillan) 中可以找到对于电视节目更为系统的分析。至于电视媒介对于新左派运动的报道框架, 我在 “Fourteen Notes on Television and the Movement,” *Leviathan* 1 (July - August 1969): 3-9 中有所论述。另外, 还可以浏览一下 George Abbott White 和 Charles Newman 等人的 “Sixteen Notes on Television and the Movement” 以及 “Spotlights and Shadows” .

媒介是有意或无意地相互作用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媒介如何对新左派运动进行报道的。从1965年起，新左派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它逐步认识到，在制订行动方针、选举领导人、回应其他领导人以及声明立场时，有必要考虑媒体的作用。运动是如何一步步地和媒介相互共生，又是如何解决或消除彼此之间紧张局势的呢？新左派运动又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领导人的换届应对媒体不同的报道呢？

第三个问题是媒体对运动的报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新左派运动的结构、领导方式、政治政策、策略和技巧，对新左派运动的历史、组织结构以及报道的口吻。我将在第二部分中针对1965年—1970年间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对后两个问题予以阐述。

在这些特殊事件的背后，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媒体会做出如此选择？在报道运动时，新闻惯例、组织、安排和新闻媒介特定的（变化着的）组织利益、社会中广泛的（也是变化着的）政治经济结构、意识形态的周边环境以及需求和影响有何重要性？对其他社会事件的报道，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其后续事件的本来面目？这些问题又重新归结于结构性的问题：在整个主流社会制度中，文化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结构处于何种地位。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政治运动会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呢？其中，媒体对于政治方向的改变起到什么作用呢？阶级成分、意识形态、组织结构、政府压制、政治事件和蓄意的选择又有着怎样的重要性呢？所有这些构成了新左派运动，它们互相影响、相互作用。我所重点强调的，并非是要建议进行一种全新的单一因素（single-factor）的政治分析；而是为了说清楚历史整体的特点，进而对某一特征加以深入研究。最后我想问一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与媒体之间的经历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其他时期的运动呢？这些问题将在第三部分进行探讨。

本书是关于新闻的本质、来源及其影响的研究，同时这也是对历史上新左派运动进行反思的一个切入。我力图以一种崭新的方式来看待一度被蒙上神秘面纱的60年代，那段历史已经被人们淡忘或者是曲解了。对于新保守主义者和顽固守旧的尼克松右派来说，新左派运动是反文化运动中灾难性的高潮。对于新兴的流行作家来说，它又是一个天真烂漫、充满着青春狂热的年代，是一种时尚，却最终只是昙花一现。对于现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它是在真正的革命道路得以顺畅以及20世纪的曙光照亮之前，一场需要被净化掉“道德主义”、“理想主义”和“改革主义”面貌的资产阶级冒险活动。而对那些参与者及其年轻的志

同道合者来说，那是一次虽败犹荣的改革运动，也许隐约觉得是一种有趣而又危险的骚乱。对于更年轻的一代来说，除了一种笼罩着声名狼藉、流言蜚语的神秘色彩，制造混乱之后又随之消失的媒体形象外，没有任何痕迹。我不是在写研究报告、传记或者政治纪事表，而是希望将新左派运动作为一种运动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即一个连贯的过程。其中在特定情况下，组织和个体做出了选择并发挥了作用。我把这段历史作为活生生的历史事件来叙述；与此同时，从这一事件中提取出这段十年特定时期的特殊事件的分析类型。

我不可能面面俱到地描述运动的每一个细节。由于我将着眼点立足于运动与规模庞大的商业媒介之间的碰撞，所以我根本没有讨论运动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也未提及运动对于自身的宣传，当时有上百种的胶印“地下报纸”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不断涌现。我也没有讨论服务于运动的其他文化和传播机构的作用：其内部的报纸和杂志、政治周刊〔如《卫报》（The Guardian）〕、月刊〔如《堡垒》（Ramparts）、《解放新闻》（Liberation News Service）〕或新闻节目的制作和发行册。我也没有详细论述运动的意识形态、政治决策和环境以及新左派中的大部分白人、青年人之外政治发展的不可预测性。我并非在暗示运动的内在实质完全就像媒介所宣称的那样，或者是人们部分与完全地依赖于它们来获取信息。我只是在提供一种重新审视新左派运动的视角和经历；我将其放在其他事件中考虑，给予它在60年代应有的位置。

固然，在研究运动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时，我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于每一个领域。关于我的选题、具体的程序和步骤，读者要想获得更多的信息，可以参阅一下附录部分。简言之，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为媒介关注焦点的五年中，我掌握了大部分的详细资料，也补充了同一历史时期其他有关新左派运动的一些情况。在那一段历史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该组织是白人新左派运动的主要全国性组织；它也是60年代中期，我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经历，这不得不使我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运动与媒介的关系、媒介报道的实质及其对运动的影响。我参加过示威活动，并且参与了组织的活动，然后也听从于电视、报纸和新闻杂志的指使。分离的痛苦、得不到承认的震惊，引发了我对媒体报道模式的思考。我为这场运动付出过，也亲眼目睹它被诠释成为和我想象中面目全非的事物。与矛盾同在成为我们这代人典型的一种经历；毕竟我们长大了，能够分清应该相信报纸中的哪些话，与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一样相信“事情就是这样”。这种仍在延续的分离状态为我提供了研究的课题；但并没有给我答案。

至于媒介，我也是被迫做出决定。正如通常的社会调查一样，理论与现实中的突发事件相互交织，构成了我的研究领域和我的“数据库”。由于种种原因，我将注意力集中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以及《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报道上。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在拥有权势的中上层人群中，它们具有一定的影响。而对于运动本身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它们又是主流媒介中做得最好的。相对而言，内容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由于我对这些新闻报道的评论主要是建立在这些特定的新闻机构之上，所以我所采用的事例和得出的结论难免会存在着种种问题，附录部分同样也是如此。

这里再说明一点。虽然研究的是新闻报道，但我有时也会将目光暂时转移到电视纪录片和电影上。新闻是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新闻的研究最终将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各种文化产物及其意识形态的领域中展开。电视娱乐节目也属于意识形态，对于规范和形成60年代的文化趋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也确实值得人们去关注。^① 同样，其他的文化形式，包括流行歌曲、大众科幻小说（类型化小说和杂志故事）、笑话和流行影片（它们不一定受到称赞，但影评人总是对此充满期待），还有诸如鲍勃·迪伦（Bob Dylan）和琼·巴埃兹（Joan Baez）这样的流行歌星，以及圣弗朗西斯科乐队和嬉皮士都备受人们关注，他们在新左派运动和反文化运动中处在一个不确定的游移位置。让我们还大众文化本来面目吧：我们依此而生。

① 考虑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在电视娱乐节目上花费的大量时间，社会意义的关注往往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失衡：许多研究都是立足于新闻的生产和意义，可能政治层面上更多一些，而对于日常事件的关注却有所不足。关于电视娱乐节目及其发展和演变，可以参考 Erik Barnouw 的 *The Image Empi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Tube of Plen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以及 *The Spons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另外，还有在上一个注释中提到的 Fiske 和 Hartley 的 *Reading Television* 以及 Hall 的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Rose K. Goldsen 的 *The Show and Tell Machine* (New York: Dial Press, 1977) 也提出了许多分析性的问题。至于电视媒介具体的节目形态，可以参阅 Danny Czitrom 的 “Bilko: A Sitcom for All Season” *Cultural Correspondence* 4 (Spring 1977): 16-19; Todd Giltlin 的 “The Television Professional,” *Social Policy*, November-December 1977, pp. 94-99; Pete Knutson, “Dragnet: The Perfect Crime?” *Liberation* 18 (May 1974): 28-31; Michael R. Real, *Mass-Mediated Culture*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77), pp. 118-139; 以及 Bob Schneider 的 “Spelling’s Salvation Armies,” *Cultural Correspondence*, No. 4 (Spring 1977): 27-36. 对肥皂剧的研究有 Dennis Porter 的 “Soap Time: Thoughts on a Commodity Art Form,” *College English* 38 (April 1977): 782-788. 涉及电视制作的有 Muriel G. Cantor 的 “The Hollywood TV Produc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Les Brown, *Television: The Business Behind the Box*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1); Gaye Tuchman, “Assembling a Network Talk-Show”, 以及 Tuchman 的 *The TV Establishment*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74), pp. 119-135.

CONTENTS | 目录

- 致谢 / 1
序言 / 3
导言 / 9

I 一次运动的媒介形象

1. 前 言 / 2
2. 1965 年春媒体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的报道 / 12
3. 1965 年秋，媒体聚焦下的 SDS / 47

II 媒体对运动的建构和消解

4. 1965 年的组织危机 / 88
5. 领导人的确认和公众人物的打造 / 104
6. 浮华的报道与越战 / 132
7. 温和派浮出水面：改革的时代 / 151
8. 缩减时间与淡化语境 / 173
9. 传播与遏制 / 180

III 霸权、危机和反对派

10. 媒介惯例与政治危机 / 186
11. 七十年代向八十年代的过渡 / 213
附录：关于材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221

I Media

一次运动的媒介形象

1. 前 言 / 2
2. 1965 年春媒体对 SDS 的报道 / 12
3. 1965 年秋，媒体聚焦下的 SDS / 47

前言

1965年初，“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美国校园里只有不到1,500名固定成员和几十个流动支部。一年之内，该组织的成员人数增加了三倍，流动支部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在该组织的发展历史上，这种情形颇为明显。“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从来而且以后也没有如此日新月异。不过，数量上的不断增加只意味着一种变化。“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为一个大众的学生组织，并成为为一个公共政治现象。在热血沸腾的新左派运动中，该组织发展成为学生群体的中心。

1965年不仅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也是整个学生运动最为关键的一年，其中既包括现实领域，也包括宣传领域。它第一次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反战游行示威活动，然后又计划领导反战运动。不过，领导反战运动的计划最终却没能得到实现。在政治上，它有别于其前辈社会一民主组织，取消了社会一民主组织拒绝对共产主义者入会的戒律。在组织原则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将代际斗争作为一种新生意识形态，以期取代创建者的位置。

1965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还引起了全国性媒体的关注。当SDS成为一种或多或少的国家名称和国家政治力量时，公众逐渐对其身份和性质有所了解。1965年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为全国的头条新闻，遭到参议院和美国总检察长的攻击。随后，该组织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以前它吸收精英分子入会，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现在它却得到了公众的关注，既吸收精英分子，又接纳被媒体制造出声誉的其他人。而其宣传性质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变化，但它仍然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且需要考虑一个不容改变的事实——运动的时间跨度。在随后的九年中，学生运动潮涨潮落——或许引用这样的话更为形象——在国际大众媒体的眼球下，其行为方式部分受到大众媒体运作的影响。“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在一个社会的世界中开展它的运动，这个世界可以认识它、迎合它或者厌恶它，通过媒体报道的形象，通过媒体对事件和花言巧语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这场运动本身也有赖于媒体的报道来实现对于自身的认识。那么对

于1965年而言，媒体的聚光灯时刻都是亮着的。当不同的滤镜放到聚光灯上时，颜色却发生了变化。运动常常试图将自己的滤镜放到聚光灯上，或者用自己的替代原来的，但聚光灯总是亮着的。

由于1965年是媒体开始报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全国新左派运动的一年，所以我较为详细地研究了那一年媒体的报道。我阅读了《纽约时报》上关于该组织和反战运动的新闻，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现存的节目档案中可以找到的每一条相关信息。我用历史的方法对此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因为那是一个历史的线性过程，绝无仅有。它并非人们想象之中的那么简单——若非将其置于分析之下，或许它会显得匿影藏形——是一种对固定不变的媒介制度、运动结构或二者互相作用可以预见的反映。运动和媒介相互作用，它们发现了相互承认和影响的条件；它们发展了相互作用的原则。这种原则塑造了在随后的十年中运动一媒介的发展方式，为其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并排除了其他的可能。随着运动的深入，媒体开始对其进行报道，媒体的认知结构和解释也不再一成不变。因此，分析工作必须要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需要强调的是，媒体对于政治运动的报道和政治运动对于媒体的接近是具有一定的境遇的，处于一定的历史语境之中。运动和媒体并不是互为产物，而是互相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提及的另外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并非是它们自身所制造的。在随后的描述中，我将试图在更为广阔背景下加以解释。不过首先请允许我以全国政治形势的重要性作为开始。不要忘记我在第一部分中阐述的时期是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政府执政时期。就在这个时候，越战不断升级，同时国内也开始实施大社会计划（the Great Society Program）。在第二部分我讨论了宣传对于政治运动的影响，同样不能脱离约翰逊和尼克松（Nixon）政府，不能脱离国内进行着的战争和国内自由改革遭到阻挠的历史背景。

本书第一章回顾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早期历史，总结了各种媒体报道框架的本质——选题、删除、重点强调和评价的核心原则——意即1965年主流媒体报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所采用的主要方式。第二章主要分析了1965年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专门的报道，尤其是对其间两次大规模活动的报道。第一次是3月份为反对追回曼哈顿银行为南非提供的贷款（Chase Manhattan Bank loans to South Africa）进行的静坐活动；第二次是4月份的全国反战游行活动。第三章继续叙述同年秋季的活动，并将分析的范围稍稍拓展了一些。焦点不再局限于媒体对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报道，同时还有该组织为了重塑形象而进行的斗争。同年秋，媒体帮助

右翼势力和约翰逊政府加强了针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攻势。尽管当时该组织还羽翼未丰，不过还是进行了反击，运动的形象第一次成为论争的对象。第三章则讨论了第一阶段论争的情况。

尤其在第二章，我提供了很多较为丰富的细节，大部分都可以在附录部分的研究方法中找到。其中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记录历史有其自身的价值和倾向性。早期的新左派运动已逐渐被人们遗忘；人们普遍认为反战运动开始于60年代末，反对美国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示威活动开始于70年代中期。在很多领域，不仅是媒体，还有学术界，“新左派运动”已经成为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广泛运动或者种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同义词。早期的新左派运动已经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或者经过突发事件的冲击后演变成了破坏性的列宁主义组织。与此同时，同早期新左派运动的起源和目标一起被人们淡忘的还有对于该运动的认可。我曾经参加过本文所涉及的一系列事件；我读过那个年代的报纸，看过一些电视节目，但作为一个研究者，当我看到那些旧的剪报和录像剪辑时，有时我会对《纽约时报》或CBS对于当时“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报道感到震惊。固然，这些报道的精确性和流露出的敏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更多的却是对新左派运动的诋毁。同现存的文献相比，假如我对1965年媒体报道的感觉与之有所抵触，那么读者们也会同样重温旧日，寻求事实的真相。

针对媒介形象的斗争

1965年，运动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出于政治运动和媒体自身不同原因，政治运动和媒体相互需要。媒体寻求事件，尤其是具有戏剧性的事件；而政治运动为了吸收新成员、获得支持或者发挥政治影响，需要进行宣传。双方是互惠互利的；一方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另一方。正如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所概括的：“在任何一个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阶级、种族和宗教团体的现代社会中，不同的政治集团为了控制社会资源而相互斗争；当然也存在着决定或影响社会的价值观、信仰、象征和信息的权力之争。”^①更多意义上，运动组织与记者和媒介制度之间的斗争，是一种经常不断的斗争，当然也有政府对于媒体的干涉和限制，现在亦是如此。这种相互作用不仅

^① Herbert Gans,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America: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收集在 Denis McQuail 等人编著的 *Soci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2), p. 373.

在历史上出现过，而且它也正在成为历史。政治运动和媒介有时是休戚与共，有时却是肝胆楚越。我们能够对此梳理清楚，虽然是循环往复、时断时续。一开始，媒体并不怎么重视运动，继而开始关注运动，接着与之合作，最后以固定的模式来对运动加以表现，这些模式的性质和倾向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阶段，媒体以不同的方式来反映运动。与此同时，政治运动中的各种要素也会对媒体的报道产生影响。运动的成员、媒介制度和政府内部的相互斗争——为报道的内容、为界定运动及其周围政治现实的本质而明争暗斗——共同构成了这一相关特定的具体“时刻（moment）”。

在1965年关键的一年中，媒体—政治运动的关系几经变化。对于每一个具体阶段而言，核心的问题是究竟谁占了上风，原因又是什么；每个变动是如何被另一方接受和抵触的；每一方的内部矛盾是如何发展的；为什么该阶段会结束。为了弄清其中的历史原因，我先对媒体—政治运动发展的早期历史加以纲要性的总结：

I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开始于1960年，到1965年冬天才慢慢发展起来。当时，“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并未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也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寻求与主流媒体的合作。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并非一个政治组织开展活动的风格和方式。正如该组织第一任主席、全国总书记艾伦·赫伯尔（Alan Haber）在提到1960—1962年那段时期时所言：“当时媒体对我们这个组织的报道并不多，我也没有在意，我们的任务只是举行示威游行，而不是去注意别人是如何评价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并非建立在媒体报道基础上的。”^①而对于媒体来说，他们对这个温顺弱小的组织一点也没有兴趣。1963年10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拥有19个支部（不过其中只有6个名符其实）和610名会员；第二年6月份则发展到了29个支部，会员超过千人。到了1965年6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增加到80个支部，人数超过2,000人；1965年年底则拥有了124个支部和4,300名会员^②。

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发展的早期阶段，组织者走进校园宣传其价值观、政治立场和纲领。1962年，该组织将《休伦宣言》（the Port Huron Statement）作为它们的章程。《休伦宣言》从人类的推理能力到民主参与的必要性这一角度

① 1976年12月9日对 Alan Haber 的采访。

② 这些数字来源于 Kirkpatrick Sale 的 SD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pp. 119, 122, 193, 246.

得出结论：“人们应当参与到那些可以影响他们生活的社会决策的制定中去。”这种分析的基础是集体自由主义（corporate liberalism）的失败、老左派运动（Old Left）和新政（the New Deal）的破产、福利制度的不尽完善以及冷战带来的灾难性破坏；它提倡为争取公民权利而斗争，宣告冷战的崩溃；它声明需要发动“地方暴动（local insurgency）”，并表示学生应在激进活动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他们油印并散发了许多自己的刊物，试图将自由派和地方积极分子的注意力转向对于世界更为激进和连贯的认识。理查德·弗莱克斯（Richard Flacks）是该组织的一位领导人，他回忆，“当时有一种普遍的设想，既然我们不是权力机构的一部分，那么媒体也就不会关注我们”。渐渐地，它们愈加清晰地发出学生激进主义的呼声。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口号，比如“分享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和“问题是相关的（the issues are interrelated）”等等，这些都是和他们的力量以及部分领导人的出现有联系的，这是一个“个体的网络（network of individuals）”。正如弗莱克斯所回忆的“我们并无意表现出大众组织的姿态”：

相反，在增加人们对于该组织的了解时，有一种进步感油然而生。当然，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校园中的活动，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断成为自由主义组织。我们为争取和平和公民权利进行活动，并得到他们的回应，影响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

为了将这些观点传播到每个分散的左派和左派—自由主义的组织中，“‘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所做的只是将其思想写在他们自己的刊物上”，而不是大众媒介上。假如事实多少真的如此，“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对于现有媒体普遍的态度难免会心存轻蔑和怀疑。在他们的目光里，公众人物也是不值得信任的。“我们不属于他们的世界，”弗莱克斯说，“为什么会有那么一些媒体对我们感兴趣呢？^①”

换一个角度来说，媒体当时并未给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足够的重视，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也并不懂得如何在镜头面前表现自己，更不会扮演煽动的角色或采取任何华丽的行动。总之，它缺乏记者们眼中所谓的新闻价值。

II 1965年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起的“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Berkeley Free Speech Movement）之后，媒体开始注意到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

① 1977年1月9日对Richard Flacks的采访。

织”。一些记者抢先对此进行了报道，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也予以积极的配合。那年冬天，《纽约时报》一位颇具同情心的记者弗莱德·波利奇（Fred Powledge）对该组织的政治立场和方法进行了报道。同时，波利奇本人也对该组织表现出了极其尊敬的态度，并积极地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政策和立场进行了宣传，并声称一场“新学生左派运动（new student left）”正在到来。弗莱德的文章刊登在1965年3月15日的《纽约时报》上，它认为学生激进主义运动反映了大众的真实愿望。1964至1965年，由于该组织的领导人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大规模的学生组织和对于公众的宣传上，因此，活动本身的组织日趋遭到冷落。在国务卿C. 克拉克·基辛格（C. Clark Kissinger）的领导下，全国办公室（the National Office）开始放松对于媒介机构的管制，特别是在2月份对北越（North Vietnam）的轰炸之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中坚分子首次产生了发动大规模学生运动的想法。^①但是，该组织仍然没有认识到媒体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任何政治运动仅靠自身的宣传是远远不够的，大多都是仓促而就。全国办公室不定期地出版油印周刊《公报》（Bulletin），并将双周刊《世界大事纪要》（World List）寄到许多地方和全国的积极分子手中。同时还与各支部和会员互通电话并进行信件交流，“校园宣传者（campus travelers）”和演讲者也会不定期走进校园。直到1966年1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才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周报。

Ⅲ1965年4月17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华盛顿举行了反战示威活动——一次“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特别活动。这次活动成为当时的爆炸性新闻，于是记者们纷纷开始报道这次活动并调查该组织的领导者是谁。那年春天，关于新左派运动的报道刊登在《新闻周刊》（Newsweek）《时代》（Time）《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 S. News & World Report）等刊物上。一些发行量很大的周刊，如《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以及《国家》（the Nation），《新共和周刊》（the New Republic）《报道者》（the Reporter）等自由周刊以及电视媒体也开始出现了相关的报道，这使得运动的影响不断扩大。

然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究竟属于何种运动？观察者也一改他们的角度。媒体的夸大早就存在选择性：它总是强调某一个话题，而对于其他话题却只字不提。同时，持反对意见的报道也开始出现并不断被重复。媒体早期的报道

^① 同上；还有1977年2月15日对Mike Davis的电话采访。

方式主要有以下一些：

- 平庸化 (trivialization)，简要地介绍参加运动者的语言、衣着、年龄、行为以及目的；
- 两极化 (polarization)，强调反游行派的观点，将反对极右和新纳粹势力的反战运动看成“极端主义”，以寻求平衡；
- 强调内部斗争；
- 边缘化 (marginalization)，将示威者描述成不正常或是不具代表性的群体；
- 通过缩小数字予以蔑视；
- 弱化运动的影响。

同年秋天，随着反战运动更多军事策略的转向，在前述的既有方式上又形成了新的主题：

- 依赖政府官员和其他权威人士的言论；
- 强调共产主义者的存在；
- 强调高举越共 (Viet Cong) 的旗帜；
- 强调示威活动中的暴力行为；
- 将事件冠以引号，如“和平游行”，使之合法化；
- 关注右翼势力对运动的反对立场，尤其站在政府和其他政治机构的角度。

在以上所列的全部内容中，部分可以看作是处理新闻报道的惯用手法。新闻关注的是事件，而不是其内在的条件；关注的是人，而非群体；关注的是矛盾，而非和谐共处；关注的是“推动事件发展”的事实，而不是对其加以解释的内容。一些类似的处理，通常是在报道一些反常的人或物的准则中延续下来的。典型的新闻事件是犯罪事件，按照常规，反动活动都会毋庸置疑地被看成犯罪活动。一些处理则要遵循新闻报道的组织和技术特点——在意识形态中保持着一种非中立的姿态。编辑们为记者分配任务，去报道被官方规定好的新闻。同时，这些报道也吸收了官方对于形势的界定。^①而且，编辑和记者还会在更为广阔的世

^① 见 Leon V. Sigal 的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of Newsmaking*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73), p.47 and chap. 6; Harvey Molotch 和 Marilyn Lester 的 “Accidental News: The Great Oil Spill as Local Occurrence and National Ev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 (September 1965): 235 - 260; 以及 Herbert Gans,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Pantheon, 1979), chap. 4.

界适应并重新制造盛行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有这些实践都要在共同的组织政策内进行，也就是说，在权力机构和决策的内部结构之中进行。当考虑到所有的这些因素时，部分事实便会无法完全解释清楚；而有一些则必须理解成为政治事务的产物，是编辑的判断和政治精英干涉的结果。在一种既有的特定模式框架下，被传播的可能性会依据事件本身的不同而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得出一般结论之前，应当尽可能地对事物进行细致分析的缘故。

当我们深入研究这些报道时，《时代》杂志和 CBS 都有例外出现。不仅是在规范的边缘，而且媒体组织内部也会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时刻为如何报道政府产生冲突。整体而言，媒体整体报道的影响是模糊不清、相互矛盾的；并非一种持久不变的声音。但是，日益被传达的却是极端主义的猖狂，还有新左派运动对公共利益是危险的。

简而言之，媒体并不是像镜子那样被动地反映着客观世界。报道的事实就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万缕千丝，相互联系。同时媒体的反映也是积极的，就像游乐场里的哈哈镜一样。

IV 媒体积极作用于运动，矛盾双方在共生之中一起发展。在这场政治运动的内部，同时还展开了一场如何更好地处理新形势的争论。运动内部的一些群体处于守势，而另一些人则咄咄逼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忽视媒体的存在，或者按照运动的意愿为己所用。

起初，对于媒体的关注，一些运动组织者并没有太多的回应，只是漫不经心地予以应对。他们更倾向于直接的交流；在他们看来，媒体在将新闻和形象传递给独立的大众中扮演着间接的角色。他们不会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在媒体上出现，而是宁愿采取一种保持运动自身的独特交流渠道。但到了 1965 年秋天，媒体的关注和右翼势力的攻击大大震惊了他们。他们临时采用的策略看上去有点像柔道 (judo)：利用对手自身的体重打败对手。他们利用从媒体那里获得的意外关注，来扩大反战思想的传播。于是，运动开始站在麦克风前讲话了。

同时，其他一些反战组织也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件来吸引媒体的注意。为了唤醒公众的良知，三个持有征兵卡的和平主义者，甘愿自焚而死，只有类似的事件才能得到全国的关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的一些人提出了吸引注意的方法——后来被称为“媒介事件 (media events)”，他们希望战争问题能成为国家政治的焦点，但来自政府和政治右翼势力的激烈压制几乎终止了他们这种愿望。

V 聚光灯继续散发着光芒，媒体的报道进入到了运动的内部。实际上，媒体

的报道有助于吸引新成员加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并获得人们的支持，人们也希望能够发现和电视上看到或在报纸上读到的一样的东西。大批新加入的成员在很多地方都和第一代成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们并没有受到过很好的教育，而且与主流制度格格不入，也更为激进。在政治方面，他们更关注反战运动，对早期“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政治观点却不太感兴趣。他们只是部分地被吸收到这一组织；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组织领导者和老一辈的组织创立者，凌驾于脆弱的制度之上。这种脆弱的制度日渐成为一个渺小的组织，一个被称作是在强烈的政治和个人社区中聚集了所谓“元老派”（Old Guard）精英的网络。在这样一种组织结构中，SDS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联系被脆弱地折断了。

1965年4月，反战游行唤醒了新一代，他们纷纷要求加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并于1966年6月前后开始在组织的领导集体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他们便是有名的“草原力量（the Prairie Power）”，强调——并且有些时候比较夸张——他们并非来自东北部，也不是什么精英阶层。的确，和创立者相比，这代人在许多方面是迥然不同的；这种差别不只是单单为了引起媒体的注意或试图占有其报道的内容。其中的一点就是“元老派”的中坚分子都曾受过高等教育，有些人甚至就读于相当知名的大学。与之相比，大多数新一代领导人都还是州立大学的在校生。新生代中有许多来自保守地区的成员，主要是得克萨斯州（Texas）和大草原（the Great Plains）这些地方。不过他们很快就变得激进起来，因为反对右翼当局势力温和的对抗方式——留长发、说脏话或诸如此类的事——也遭到压制。如果一个人由于一丁点儿的事遭到惩罚，哪怕只是朝违法者、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迈出了一小步，也会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处罚。因此，作为文化上的反叛，他们跨越了标志“元老派”这一代形成的自觉阶段：对现存自由主义制度、自由的承诺和期望的彻底失望。在风格上，他们同样表现出对于主流文化的不满——邋遢、吸毒、没有文化，没有工作，甚至东北部“草原力量”的成员也是如此。

媒体的报道不仅引发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的决裂，而且还对此大肆宣扬；其间，他们夸大了意义所在——无论是对外部世界还是对组织内部。正像该组织的委员秘书1965年12月写的那样：“支部、地方办公室和成员们在看完报纸之后，才知道组织的工作实质。”^① 媒体树立的形象（从图片上的感觉而言）改变了内部争论的话题，为组织的当前形势做了界定。事实上，这一切都不

^① C. Clark Kissinger 引自 Sale 的 SDS, p. 255.

是在真空中发生的。战争的剧烈升级促使许多人，既包括“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也包括该组织之外的人染上了更多的好战欲望，并脱离了美国主导地位的价值观，自由派的沉默孤立了激进的年轻人，将他们推向左派。一股更大的文化力量促使反文化的背叛潮流诞生。但媒体闪电般的扩展，通过夸大并加速所有的这些过程，阻止了该组织对内部成员的吸收。“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曾经探索过，但终究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所以，早已存在于组织内部的脆弱更是在其增长速度最快、最具活力的时候瓦解了这场政治运动。作为一个大众性组织，它的开始也预示着它的消亡。

2 | 1965年春媒体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的报道

发现 SDS

1965年,《纽约时报》对于新左派的报道模式不断发生着变化。起初,《纽约时报》曾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活动和目标摆出尊敬的姿态;然而后来,《纽约时报》却逐渐地将这场运动视为一场浅薄的政治运动并开始加以诋毁。到了秋天,对于这场运动的批评已经成为当时报道的主流;“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被视为极端、异常和危险的政治组织。从尊重到敌视的演变过程,呈现出来的虽然不是一种直线的转变,却不乏对各个方面有针对性的抨击。至于当时CBS的新闻报道,虽然现存的资料残缺不全(见附录),但从现有的新闻节目片段来看,报道的内容包含了不同的主题,从尊重到模棱两可,再到最后反对。

1965年2月,当《纽约时报》首次报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时,该组织大约已经成立了五年^①。1960年,作为一个激进派和左倾自由派学生小的网状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北方大学校园不断组织活动,以支持南方的民权运动。1962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发表了《休伦宣言》,其中包括该组织的宗旨和政纲。该宣言得到了遍布全国的大学校园中积极分子的广泛支持——但遭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社会民主团体前身——争取工业民主学生团(the Student 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的反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召开会议,对民权和贫穷问题进行了讨论。

1965年夏天,“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组建了大约八到十个小团体,到北方城市的贫民区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在全国学生协会夏季会议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帮助组织成立了左倾自由派的核心小组(连同争取民主行为的美国

^① 见 Kirkpatrick Sale 的 SD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pp. 15 - 172.

校园)，在全国开展活动支持“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并为此进行巡回演讲。这段时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将总部设在了曼哈顿。

1965年1月2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向媒体表示，它支持4月17日在华盛顿的游行示威活动，以反对美国干涉越南内战，但《纽约时报》却并未对此进行报道。

1965年2月7日，约翰逊政府开始有计划地轰炸北越，全国各地的学生立即表示反对，并展开了示威游行活动。由于需要集中有关活动的信息，并借机提高“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声望以成为学生反战活动的协调者，“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秘书长C. 克拉克·基辛格（不是国务卿基辛格）2月11日发表了一篇很长的宣言，陈述了学生们的抗议活动，同时还不断重复，4月17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将在华盛顿发动游行以结束越南战争。在寄给“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核心成员的工作日程表中，基辛格解释道：

我们行动的第一阶段，是试图突破国家对各地正在进行的学生抗议示威运动的全面封锁。为了使信息顺畅，“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向各组织、通讯社和各大学的校报发出了几百篇新闻稿^①。

或许是为了响应这一公众活动，1965年2月18日，《纽约时报》提到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至少根据报纸的索引^②——第一次对SDS的关注。在第2版上，刊登了记者马丁·阿诺德（Martin Arnold）题为“14人在反战运动中被捕（14 Arrested Here in Vietnam Move）”的报道。同时，该报道的第10段还提到了在联合国美国代表处示威活动的细节部署，其中写道：

今天，“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第五大街119号的海外出版社俱乐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24岁的秘书长基辛格说：“毋庸置疑，干涉越南的主要国外力量是美国。”

同时，基辛格还提到，来自40所大学为数1500人的队伍，将于4月17日进军华盛顿，以“力求结束越南战争”。

在副标题“高校的反应”之后，该篇报道继续写道：“美国的对越政策看起

① SDS的工作通讯，Vol. 2, No. 3 1/2, February 13, 1965.

② 索引并非准确无误的。例如，1965年3月15日的游行，当时是Fred Powledge作的报道，却没有被引用。但是，Kirkpatrick Sale在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详细论述中，认为1965年《纽约时报》并未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进行报道。另外可以参见Sale的“Myths as Eternal Truths,” June 1973, p. 3.

来好像引起了许多大学生的关注……” 然后是关于不同学校的学生们情绪的报道，如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城市大学、巴那达（Barnard）大学、福德哈德（Fordham）大学以及耶鲁大学（Yale）。这篇报道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态度是完全中立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报道 SDS 时包含了有关逮捕的内容之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被视作一种反战组织。尽管这种形象难免有所出入，但 1965 年，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继续向前推进，成为处理各种事务的组织，其中包括大学的改革、民权问题、社会组织以及反战和采取对外政策。同年春天，“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在纽约的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组织静坐，抗议银行给南非政府发放周转性贷款，以帮助它从 1960 年沙佩维尔大屠杀（the Sharpeville Massacre）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银行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它试图寻找法令来阻止学生的静坐，并试图阻止声称“大通曼哈顿，种族隔离帮凶”的传单（一位纽约的法官批准了禁止用静坐的方式干预大通财产权的法令，但对大通的其他请求不予考虑）。在一月号和二月号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公报（定期发给“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上发表的文章中，不仅刊登了有关向华盛顿进军和在大通静坐的讨论，而且还有关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分支、社区组织活动和会议的报道；另外还列出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校园 70 部出版物的目录，这些出版物涉及到各个方面，如民权、社会组织、经济、和平以及外交政策和政治。

不过在马丁的文章中，他并未指出美国新闻界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新闻报道本身需要的是所谓的事件，这样才有所意义。事件建构出意义，然后记者和编辑才有可能把大量的相关信息组成文章。

既然如此，示威活动（或者说是事件）就设置了一个领域（即学生的反战问题），这个领域被用作帮助“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学生反战情绪得以高涨的原因。当这种构想被选取之后，记者一般不会用其他更为烦琐的资料去加以驳斥或使之复杂化。延伸新闻报道就意味着艰辛、非同寻常的工作，超越通常的新闻惯例，不仅要从新闻现场、新闻发布会获取信息，还要借助于其他的途径，而最后的截稿期限也为记者在现有素材下保持新闻的朴实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一般而言，一个事件会引出一篇相关报道，由此设置的领域也只有一个。许多运动力图表明普遍的政治对立立场，而意识形态无意识的重要影响将使这种努力付诸东流。这种影响应当关注事件本身，无论多么不情愿，这种制度都能针对不满做出改进，而无需改变基本的社会关系。因此，媒体支持主流制度

对于普遍合法性的宣称，并帮助它分裂反对派。

只有篇幅较长、更具深度、并且超出了新闻价值“主题”的报道，才能从技术的角度避免单一主题和事件支离破碎或发生改变，它们把社会变化、“趋势 (trend)”、“现象 (phenomenon)” 纳入议程并提升到某种重要的程度。1965年3月15日，《纽约时报》在第1版的第1栏上刊登了弗莱德·波利奇的报道，标题是：“新学生左派的革新运动：大学校园中出现新的知识界积极分子。”文章长达39行，前4行在第1版，其余部分转到了第26版。从版面上来看，后半部分报道的标题则是“新学生左派：热衷的积极分子通过运动谋求变革”。开头是：

在最近周末的一个晚上，芝加哥大学的部分学生在一个公寓中举行聚会。喝酒、跳舞、篮球、政治或者性，都没有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

相反，他们坐在地上，小伙子们穿着没有打领带的运动衫，女孩子们穿着裙子和黑色的袜子。他们谈论着诸如“社会组织”、“无能为力”和“分享民主制”之类的话题。

这篇报道还援引了五个人的话（其中四位来自“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另一位则参加了北方学生运动）来表达他们对于激进的行为、策略和政治信仰的看法。这些人被认为是“自称新学生左派的一部分”以及“一群组织松散的新兴知识分子”“他们想让社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文章继续提及了一系列的活动：对学术的抵抗、学校的联合抵制、争取民权的示威和静坐、社会组织、反对征兵和战争以及要求裁军的示威活动。文章通过简短的几句话阐明了“新学生左派”的信仰：

有些人把他们的运动当作“革命”，并且希望人们称他们为激进分子。可是大多数人喜欢被叫做“组织者”，另外一些人认为，他们“既不是积极的民主人士，也不是积极的社会主义者”。少数人则喜欢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另外，文章还作了更为详细的描述：

虽然有些人表现出这样一种立场，即反对将苏联作为他们建立社会模式的效仿对象，但大多数人认为，像怀疑其他形式的政治控制一样，他们同样怀疑共产主义。

文章引用了《休伦宣言》中一段关于新左派政治目标的话：“我们试图建立一种广泛的民主……”

最重要的是，波利奇正是从激进的学生那里得到这些信息的，并且流露出一

种尊敬与同情。文章还引述了运动而非对立者钟爱的口号以及激进派对于信仰的阐述；在结尾部分，作者仍然站在学生的角度，尽管还是继续寻求平衡，例如：

他们很清楚，与全国所有的大学相比，他们的人数并没有多少。现在，也和以前一样，大多数人感兴趣的主要还是婚姻、家庭、工作这些常人难以摆脱的问题。

“他们很清楚”表明这些激进分子是有自知之明的，是现实的。“与全国大学生相比，他们人数很少”，如果没有这些表达，很难暗示这些激进分子是异常或者是无足轻重的。波利奇的这种表达方式体现了对于新左派地位的尊敬。

最后，波利奇的文章没有为寻找平衡而将目光放眼于学生运动之外的世界。同时，也没有报道关于学校官方、城市行政机构、职员和反对派学生或者青少年专家的态度。传统的新闻报道相当关心每天的公告和政府官员、社会领导以及学校官方的活动，这篇文章也不例外，它严肃对待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表层价值（face value）。换言之，它对此赋予合法性并给予意义。“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重印了这篇文章并用来吸收新成员，这丝毫也不足为怪。

这篇特殊的全面评述（或许用术语“评论”更合适）是如何得到《纽约时报》采用的呢^①？弗莱德·波利奇经常通过有效的疏通来争取到采访任务。作为一个报道民权运动的南方白人，1964—1965年的冬天，波利奇纳闷“那些去了密西西比的人究竟怎么了”，他了解“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以及密西西比的老战士们扮演的角色。《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克利夫顿·丹尼尔（Clifton Daniel）、主编特纳·卡特里奇（Turner Catledge）和编辑克劳德·西顿（Claude Sitton）也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支持这个想法。和《纽约时报》其他接到采访任务的记者一样，波利奇也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决定去什么地方或者去采访哪些人^②。波利奇认为编辑的兴趣主要取决于他们自身和孩提时代的经历：

《纽约时报》的编辑是社会中的上层白人，他们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四处叫嚷着，声称要改变整个世界，这给《纽约时报》带来的麻烦，远远要超过那些南方无知的黑人们采取的行动（如暗杀）。这就像漫画中的中产阶级白人，自己的孩子浪漫时节和心爱的人私奔了，父母却

① 以下的叙述，包括所有的引用，都来自1977年7月1日 Powledge 寄给我的信，另外还有1977年10月2日的电话采访。从1963年8月到1965年12月底，Powledge 一直在《纽约时报》工作。

② Sigal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73], p. 16) 断定，对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而言，一旦确定了任务，“记者便掌握了采集信息的个人主动权”。

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反思：“我们到底哪儿做错了呢？”

波利奇认为自己是编辑部中一个不太正常的人：“我感觉到自己是编辑部中一个古怪的人，至少在《纽约时报》开始聘用一些黑人工作人员前是这样；我像南方的犹太人一样，感到自己是一个局外人。”因为他对种族问题进行过报道，并且刚开始报道关于贫穷的战争，“我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专家，只有我才知道人们到底想要什么（尽管我从不这样认为）”。

经过了几个月的采访，波利奇完成了一篇报道；由于篇幅的原因，原作不得不进行部分的删改，而且只有例行的校对和编辑。波利奇指出，不管编辑们对此有多少兴趣，哪怕只是稍微的一点，《纽约时报》也会把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投入到一篇类似的新闻报道上，并把它在显著位置刊登出来。波利奇解释说：“他们刊登了我的文章，这足以令人感到十分荣幸。”但是在随后的九个月中，波利奇虽然供职于《纽约时报》，报社却没有继续指派他去做有关激进运动的报道，而是由其他人代替。波利奇回忆说，这些记者要回来证实他们报道的准确性。其中一位叫做霍默·比加特（Homer Bigart）的记者——他被波利奇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记者”——他的采访结果与波利奇的基本一致。比加特向编辑问道：“为什么让我去呢？”波利奇认为，

他们希望有人能够发现，这并非一场朴实而又优秀的美国运动。当我在伯克利发现贝蒂纳、阿普特克和其他几个人（共产党人）时，我想他们只是整个报道中较为次要的因素，在漫长的过程中，真正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其他年轻人的所作所为。

波利奇现在认为，《纽约时报》后来关于“红色威胁（Red menace）”的调查主要是受到了编辑社会地位的影响，其中并不存在着一个所谓的蓄意阴谋——“没有人会像记者这样去费力地寻找阴谋”。

我认为这是一种心态，是由编辑或出版商的身份和地位决定的；你知道你可以把孩子送去上大学，或者你知道自己可以享受一份津贴，也可以和百货商店老板共进午餐，而且你知道他们不是敌人。

这些规则是通过补充新成员、评价、升职和一些日常的控制技巧来传达给记者的，一个真正的“纽约时报人”（过去大多数是男性）必须严格予以遵守。“如果你在《纽约时报》工作，你一定要绝对忠诚，全力以赴；这里几乎像一个军营”。

波利奇的观点不仅仅是一个最基本的观点。特纳·卡特里奇曾经在《纽约时报》担任了十七年的总编，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强有力的领导”是基于“一系列命令”之上的，他要求部下要有“才能”，并且“忠诚——不是对我，而是对我所管理的部门和《纽约时报》”。卡特里奇曾于1965年负责管理出版工作，他想任用那些“独立、有创造力、有教养的人，……而不是被训斥和恫吓的人。我要他们按照我的想法做事，让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自己想做的事”。^①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界定组织霸权的艺术呢？

然而反过来看，发行人阿瑟·海斯·苏兹贝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曾推荐过卡特里奇，他习惯借助于各种大小事件的备忘录使主编“了解他的好恶”。^②如果苏兹贝格的备忘录中有批评某一个记者工作的内容，并且卡特里奇认为这一点是正确的，他就会作为自己的评述交给该记者。因为在允许的情况下，我想让我们的记者和编辑进行自己自由的工作，而无须担心发行人是否在不时地窥探。事实上，他就是这样。他经常阅读报纸并且对此颇具自己独到的见解——如果《纽约时报》有些无聊，那么他也感到自己有些无聊。^③

卡特里奇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组织者，并且十分清楚自己的位置，苏兹贝格“对重大问题有良好的判断力”，卡特里奇写道，“因为他使我想起了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④

然而，与此同时，一个《纽约时报》的发行人仍然有必要尊重新闻界的原则，至少不能公开违背它们，记者和编辑们必须被允许——事实上是鼓励——解释并报道新闻，尽管不在他们本身的意识形态范围之内。他们在新闻编辑部的日常谈话、对头版新闻的报道、与提供消息者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浏览每天的报纸——这是在诠释传统并解释他们对新闻的不同理解。^⑤发行人的“个人感受”确实为记者发挥创造能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且许多记者表示，他们在完成新闻报道时可以不受上级的干涉。现在已经规定，不再专门制定官僚主义条文对他们的写作加以规定。^⑥

① Turner Catledge, *My Life and The Tim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p. 188

② 同上，第189页。

③ 同上，第190页。

④ 同上，第189页。

⑤ 见 Sigal,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p. 39

⑥ Warren Breed,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Social Forces* 33 (May 1955): 326-335. Sigal的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和 Robert Darnton的 "Writing News and Telling Stories," *Daedalus* 104 (Spring 1975) 是有关《纽约时报》的新闻采访和写作过程最好的著作。

特纳·卡特里奇开始认真严肃，他写道：

苏兹贝格不愿做一个专制跋扈的发行人，或者去喝斥胆小的职员。他的作风比较保守，比较谨慎，并且我认为也颇有成效。他喜欢和他一样相貌平平的职员，并且他尝试通过语言和行动为报纸定制基调。^①

定制基调，这正是弗雷德·波利奇所谈论的。他的新闻报道就探究了这种已定基调的界限。关于显著与否的模式、角度和设想，都一直悄无声息地渗透在《纽约时报》的官僚政治中；这在新闻编辑部中也有所体现。

当这种传播在“聪明人”之间进行时，波利奇说，“他们一向不需要太多的语言”。

行动的建构 I：大通曼哈顿示威活动

3月19日，星期五下午。在经过了几个月的准备之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组织了数百人在位于华尔街的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世界总部举行示威活动，警方逮捕了队伍中静坐的51个人。大通曼哈顿银行是美国十大银行之一，它在1960年向南非发放了大笔周转性信用贷款——就在南非警察向国内手无寸铁的游行开火并打死69人、打伤178人之前——这一切影响了南非的国际形象。

整个1965年冬天，“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设在纽约的总部积极吸纳新成员，并提高在大学生校园中的声望。这样，“总部一直寻找提高其知名度的途径”（引用一个成员的话）。^②虽然知名度并不是首要的目标，但关于大通曼哈顿的行动计划却不乏此意。他们采取的策略具有双重意义：（1）把社团的反种族隔离活动——更广泛地说是反对种族歧视——放在美国左派的日程中，另外还包括争取民权的活动和教会活动；（2）向公众揭露关于洛克菲勒银行的自由形象被玷污的真相。而实现这两个目标需要借助于日常的宣传工具，直接的行动替代不了媒体的新闻报道，因为只有通过大众传媒才能引起公众的注意，更不用说产生影响了。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获得媒体的关注方面仍是新手。工作人员不仅缺乏经验，而且很少与记者直接联系。尤其是在轰炸北越开始后，总部把精力放在了宣传4月份的反战进军活动上。不过，戴维斯和基辛格倒是提前发放

① Catledge, *My Life and The Times*, p. 189.

② 1977年2月15日对Mike Davis的电话采访。Davis于1964年10月至1965年6月期间在全国办公室工作，他是大通曼哈顿计划的发起人。我从他的回忆录中了解到了有关该计划的详细情况，同时Sale关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论述也很有帮助。

了一些媒体的联络方式，是由“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制作的。在示威活动的前几天，媒体报道了在曼哈顿的社区教堂召开的示威动员大会，当时有数百人怀着满腔热情积极参与。最重要的是，秘书长基辛格和其他骨干成员非常希望示威能以此种规模引起媒体的注意。毕竟，能有多少游行示威能在世界金融中心狭窄的街道上举行呢？至少1965年是这样。

3月20日，《纽约时报》在周六出版的报纸上报道了星期五的示威活动，文章一共有十五栏，标题是“49人在抗议贷款事件中被捕”。西奥多·琼斯（Theodore Jones）的文章更是直言不讳，而且还效仿了波利奇毕恭毕敬的基调，只是论述略显欠缺，结构也不够有条理。它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非常重视，其中有三段是关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主席保罗·波特（Paul Potter）和一位银行官员会谈的描述；后面四段引用了银行对其借贷政策的自由保护。这篇文章的开头是在前面的标题中提到的：“49人被捕”，琼斯只在第二段提到了“400人”的警戒线。文章没有提到银行禁止示威或禁止散发徽章、传单和调查表的内容，也未提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关于在沙佩维尔大屠杀后，美国银行对维沃尔德（Verwoerd）政权所起重要作用的调查。其中，最有新闻价值的还算是有关冲突和逮捕案件的部分。

在新闻记者看来，逮捕就意味着抗议。1965-1966年，一位记者曾为《旧金山纪事》（San Francisco Chronicle）做过有关伯克利的新闻报道。据他所言，除非确实有人被捕，否则有关加利福尼亚大学学生活动的报道将被严禁刊登。^①我并不是说《纽约时报》的编辑直接采取了这样一种强制性政策。但读过《纽约时报》有关争取民权和反战运动的报道，读者会惊奇地发现，大量报道的开头都是有关逮捕的事情，就连标题和导语也不例外。编辑把逮捕作为重大事件发生的征兆——这些事件都是“非同寻常的”，即便是在国内长期的反抗运动中，逮捕行为的本身也许会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推移变得极其平常。虽然对于逮捕事件，记者只会作一些惯例性的报道，但它们还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因为只有几个人被捕，所以他们总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事情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日子里，也总会有人遭到逮捕，至少从数量而言，参与的人数并非含糊不清。而且，这些都在新闻的时效之内。重要的是，他们有些不同寻常：人们似乎是自愿被捕的。

把逮捕作为报道的“把手”，作为新闻价值的跳板，这种做法沿袭了以往犯

① 1976年12月22日对Adam Hoichschild的采访。

罪事件的新闻报道以及警事记者在抢头条新闻时所遵循的原则。通常，报社会指派警事记者做一些有关学生运动的报道。事实上，大多数《纽约时报》的记者在警方的警戒线上认识了许多同行，^①他们依靠警察可以挖掘出事实的“真相”，实际上也就是搜集一些和新闻相关的素材。警察可以十分从容地处理有关逮捕的报道，这会帮助记者应付复杂的事情并面对最后截稿期限的压力，从而减轻他们的负担。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媒体把有关逮捕事件的报道放在了对某一运动报道的中心位置。但是这种搜集新闻的常规操作，使媒体将制造新闻的权力交给了警方，然后再转交给那些懂得如何利用巧妙的逮捕事件来扭转局面的好事者。被捕行为可以使普通人成为新闻的制造者；事实上，它们是证明社会问题的方式之一。被捕，换言之，也为那些持有不同政见的弱小群体提供了一次机会。即使那些蓄意依靠被捕以引起公众注意的人也不会轻易被捕，除非警方决定必须要逮捕他们（被动语态表明这些积极分子处于被动地位：他们必须被捕）。当警方获得了制造新闻的权力时，媒体会尽力强化社会中现有的控制手段。当然，政府对于新闻管制的实际决定，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这对具有依赖性的非暴力示威来说是种冒险。^②

当时，CBS并没有报道在大通曼哈顿举行的示威活动；据我所知，他们甚至没有拍到任何东西。^③静坐——本身只是整个示威活动的一部分——发生在下午，其实它本可以不被作为一条星期五晚上的新闻报道，因为整理和编辑的时间多少会减少人们对随后事情的注意，（除了暗杀，绑架等）“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并没有计划通过静坐来引起公众的注意，否则他们在早晨就作好准备了。电视网则认为，静坐选择的时间不够恰当，因此不能说明CBS没有看到先前由500人或1000人组成的警戒线。而对于电视和报纸来说，一个气派的警戒线并没有多少新闻价值，除非它逮捕了很多人（因此，几周后，4月16日，六个在国务院静坐的反战示威者被捕——这是所有的示威者——他们都出现在了CBS的晚间新闻上，尽管只有35秒钟）。也有可能，《纽约时报》的摄影工作人员和记者——只有少数——那天在别的地方忙碌着。这也就是说，CBS不认为在大通曼哈顿的示威可以称之为“新闻”。

① Darnton, "Writing News and Telling Stories."

② 有关大通曼哈顿的报道也是具有框架性的，甚至有些误导。左边是Cleveland题为“36 SEIZED IN OHIO RACIAL DISPUTE”的报道。下面是一小篇报道：“Broadcaster Says Klan Is Forcing Him Off Air.”《纽约时报》已经开始把有关民权的报道作为所有报道的一部分。

③ 至少在CBS新闻档案中没有发现有关的资料，并且没有任何的档案卡片或记录摘要。

不妨让我们作一个假设，假如 CBS 真的拍到了比如警戒线之类的东西，可是由于并没有逮捕事件发生，编辑可能会决定把一篇报道与另外一些报道放在一起，体现一个共同的主题，以作为补偿。然后再重复相同的过程，最后组成一篇有关示威的报道。当他们重新调整事件的架构时，事件本身的重要性也发生了改变。因此独立的新闻报道将被视为是“进展中报道的一部分（part of a developing story）”。例如，4月16日关于静坐的报道被安排在了两篇报道的中间，这两篇报道一篇是关于南韩的学生暴乱，另一篇则是关于菲律宾反对美国运动的。因此，静坐行动就成为了与以亚洲为中心的全世界学生动乱主题相一致的事件。对于3月19日晚间新闻的制片人来说，他并不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确实是这样，他们已经拍到了在大通曼哈顿的示威活动——如此的报道就不会被编织出来。此外，虽然早间时段的新闻通常是前一天新闻的重播，CBS 以前没有——并且现在也没有——在星期六播放早间新闻。虽然一篇硬新闻被认为是只有24小时甚至更短的时效，但一度被忽略的有关大通曼哈顿的报道仍被一直忽略。没有哪家媒体会因为作出及时报道而承认无能。电视新闻则认为自己是视觉媒介的典范，具有更快的时效性，这可以为它进行连续不间断的播出扫清道路，更容易地做出决定。

换一个角度来说，由于电视播出新闻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相对而言，传达的内容也是有限的。CBS 的记者和管理人员都有同感：可以播放多少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事件本身。他们提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美国的电视新闻一般不会超过22分钟（30分钟除去广告时间），而报纸却可以增加版面。事实的确如此，不过任何限定的时间也多少都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它可以压缩成几分钟或者几个画面，可以根据主持人的语速、节目制作人员选用的画面和其他操作性的程序来进行调整。^① 摄制人员、记者、播出时间——所有这些局限，像我在第8章中讲的那样，他们对此都非常清楚，但是他们却说不清楚应当省略哪些。

另外，大通曼哈顿的报道是非常重要的，但却不幸成为 CBS 新闻报道可怜的

① 这一点在 Public Broadcast Laboratory 的一个名为“Journalism -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的纪录片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PBL 研究了五家媒体机构对1968年1月 Jeanette Rankin Brigade 妇女反战游行的报道，这五家媒体机构分别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NBC 和 PBL 自己。David Brinkley 谴责电视新闻的报道过于肤浅和简短。PBL 认为，在 Brinkley 新闻节目 52 秒的时间内，可以充分地传达有关示威活动的报道——这并不是否认时间的长度会影响报道。而且，这也不能解释某一特定报道模式和内容的肤浅是因为时间不够而造成的。

替补。这样说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但这是遵守官僚组织的做法以及意识形态对于新闻的假想。新闻必须是及时、清楚、吸引人的、可预知的以及在文化上相似的。一个事件和新闻的特征符合得越多，获得报道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当第一个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试图把华尔街的贷款与南非的种族隔离联系起来的时候（这没有引起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大多数记者的注意），大通曼哈顿活动也被非同一般地予以描述。《纽约时报》将它写成一篇有关民权的报道，而 CBS 对此却不屑一顾——这是基于报道的不同反应。或者像约翰·高尔顿（John Galtung）和玛丽·霍姆伯·鲁格（Mary Holmboe Ruge）说的那样，“‘新闻’实际上是‘旧的东西’，因为它与人们期待发生的事情一样”。^①

行动的建构 II：华盛顿反战游行

4月17日，星期六，在华盛顿举行了反战游行活动。当天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三篇简短的报道，其中提到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报道称：“来自全国的一万多名学生将于明天进军首都，抗议政府关于越南问题的政策。”最有趣的是，《纽约时报》对一群和平人士发表的评论文章进行了模糊而又拘谨的处理：

昨天，社会党人领导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连同其他十位人士发表声明，支持越南获得和平。

同时，他们还说道，他们同情学生向华盛顿进军，尽管他们不同意“某些分子”在抗议中的立场。

这就是该篇报道的全部，其中并没有再提到“立场”和“分子”等令人不快的字眼。^②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实现一种形式上的均衡，淡化对游行的质疑。托马斯的声明只是部分地引用，这就使得其影响大打折扣。很明显，《纽约时报》

① Johan Galtung 和 Mari Holmboe Ruge 的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New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1 (1965): 64-90 收集在 Jeremy Tunstall 等人编著的 *Media Sociology: A Reader*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0), pp. 259-298. 为了解释某一特定的事件是如何成为新闻的，我从 Galtung 和 Ruge 那里引用了一个类似结构主义的模式，并且在前面的一段我也曾引用过。1978 年秋天，Nicole Biggart 邀请我出席一个大学讨论会，探讨了 Galtung-Ruge 新闻价值的标准是否忽略了历史根源等问题。

② 比较而言，在游行前夕，《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警告运动是“一个疯狂的、片面的反美事件”，并“试图支持共产主义”（Sale, SDS, p. 179）对于宣言的签署人 Robert Gilmore 来说，似乎《华盛顿邮报》比《纽约时报》的吸引力更大。

不愿意为了示威事件而大发感慨。

但更为微妙的是,《纽约时报》关于示威游行的报道,既包含了严肃的一面,又包含了肤浅的一面。文章把进军描写得非常无聊,它为相同意义的反战和极右势力寻求到平衡,并且它开始把学生运动视为异想天开的行动。^①

4月18日,《纽约时报》周日版在右侧的专栏中刊登了题为“约翰逊拒绝终止轰炸,再次请求会谈(Johnson Refuses to Halt Bombing; Again Asks Talks)”的文章。在从第5栏到第7栏的褶皱下,有一个不显眼的标题:15,000名白宫纠察队员公开谴责越南战争。紧接着该篇刊登的是一张巨幅图片,图片的上半部分是白宫,下半部分则是相当数量的纠察队员。美联社(United Press)的传真照片所配的文字是:“学生聚集在白宫外反对越南政策,另一些人则在拉斐特广场的人行道上遥相呼应。”

通常情况下,编辑会从他们自己拍摄的照片或通讯社提供的照片中做出选择,他们选择这张十分特别的照片。实际上,从当天美联社发给《纽约时报》以及其他订户的照片来看,《纽约时报》具有非常大的选择余地。我从美联社的档案中找到了4月17日的其他5张照片,其中两张是一大批反战人士举着牌子,上面的标语清晰可见;还有一张拍摄的是在华盛顿纪念馆召开反战大会的一些人;剩下的两张则可以清楚地看到,反战人士大大超过了纠察队员。事实上,这5张照片都是可以刊登的,举着牌子的照片设计得颇为精致,色调对比鲜明,而且比例也十分协调。

《纽约时报》所选取的照片,表现出反战示威与右翼力量大体上势均力敌,并且让人形成这样的印象——从长度上来看,照片中截取的两条警戒线的部分差不多。事实上,就文章本身来看,反战示威队伍是由美国的法西斯分子和特拉华河流域的反共居民组成的,其中包括一百多名纠察员。因此,照片中可以看到的几乎全是右翼纠察员和部分反战纠察员。从当时《纽约时报》的报道来看,虽然

① CBS播出了华盛顿办事处 Bruce Morton 的两篇报道:一篇是4月17日周六新闻的第三条报道;另一篇是有关周末留在华盛顿的示威者的,这一篇是在4月19日星期一早上播出的。在CBS新闻节目资料和CBS的广播档案中,都没有找到前一篇的报道。第二篇长约1分钟24秒,其中并没有提到4月17日的示威。它把星期天小规模的活动看成是自我封闭的事件,其中许多学生不顾恶劣天气,希望能见到总统。Morton说:“没有人认为4月的雨天是个好天气。”在结尾处,他又说道:“选择这种方式来度假实在有点困难,这些学生似乎要坚持到底。”该示威活动被认为是不可能、鲁莽的和充满幻想的。某种程度而言,它对鲁莽的示威者表示尊敬;但同时又将示威活动非政治化。

示威游行的人数大大超过对方，但反战示威者还是在照片上获得了同样的空间。^①这种平衡一直是电视新闻有关左派的主要素材。赫伯特·甘斯说：“对于反战示威，我们拍摄越共支持者和法西斯分子，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十分有趣，另外有关他们的新闻也非常好卖。你总是会寻找那些极端的東西；在南方也如此，我们也会拍黑人斗士和三K党。”^②

这篇文章没有署名，这就表明作者可能是一名普通的记者。文章开头是：

今天风和日丽，15,000多名学生和其他一些人聚集在白宫，要求美国停止在越南的战争。有三、四个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大标语。他们有序地并肩而行。人行道上挤满了学生。而白宫的主人们现在还在得克萨斯的农场里。

因此，在媒体有关“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反战运动的报道中出现了如此一个主题：荒唐可笑的游行。^③

文章继续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描述成“左倾而非共产主义的”。在第3页，文章提到一些合作组织的名称，下面是这样写的：

许多游行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参加过“和平运动”，而且有些人甚至对怎样才能结束越战模糊不清。

这是引述了五个普通游行以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发言人保罗·布思（Paul Booth）的话。下文的副标题是“考试结束后的假期（Holiday From

① 在 Stanley Cohen 和 Jock Young 等人编著的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73) 一书中，Stuart Hall 的“Determinations of News Photographs”已经提到了新闻图片的重要性。其中 (p. 188) 写道：“新闻图片采用独特的方式将自己表现出‘自然’的一面。它们通过展现对‘现实世界’原原本本的视觉反映，压制自身存在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属性，新闻图片证明了表现事件的真实性。一张图片包含着这样一种信息：‘该事件确实发生过，这张照片就是它的证据’。人物图片——甚至只有‘护照’那样的大小——也说明了这种提供根据和以此为证的事实：‘这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那个人，的确有这个人。’于是，图片表现为‘事实’原原本本的纪录，并为自己辩护。新闻图片在一种隐蔽的标记下运作，‘的确发生过，你自己看吧！’当然，选择某个事件的这一时刻而不是另外一个时刻，选择这一个人物而不是另一个人物，选择这一个视角而不是另一个视角，选择拍摄的事件来表现一系列完整的事件和意义，是一个高级的意识形态过程。但是，通过对事件的原本再现，好像它真的发生过一样，新闻图片压制了选择/解释/意识形态上的功能。它们在预先指定的中性结构中寻求一种保证，这一结构是毫无疑问、无需解释的：即‘现实世界’。在这种层面上，新闻图片不仅证明了报纸作为一种精神媒介的可信性，而且承诺并确保了其客观性（即它们使意识形态功能中性化）。”

关于新闻图片含义的其他论述，参见 Roland Barthes 的“Photography and Electoral Appeals”，该文收集在 *Image - Music - Tex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7) 中。

② Herbert Gans,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Pantheon, 1979), p. 176.

③ 更多的例子参见第三章 CBS 关于 11 月反战示威的报道。

Exams)”，它将示威者描写成“留着络腮胡子，穿着蓝色仔裤和学究式的花呢衣服，衣领是牧师服装的样式”；同时还报道了右翼反纠察员被捕的情况；结尾两段提到了在华盛顿纪念馆召开的大会。其中一段还涉及到了参议员欧内斯特·格里宁 (Ernest Gruening) 的演讲 (引用了半句话)，强烈呼吁停止轰炸北越。第二段提到了其他两个演讲者：记者斯通 (I. F. Stone) 和耶鲁大学的教授斯图登·里德 (Staughton Lynd)， “拒绝缴纳美国联邦政府的税费，以此来反对战争”。接着又补充了一段，是从伊萨卡岛 (Ithaca) 发出的，副标题是“梅尔克的康奈尔游行 (Cornell Marchers in Melec)”。详细地说，这则新闻主要报道了反对示威者是如何阻拦华盛顿周围反战游行者的汽车的，文章中关于向华盛顿进军的内容占了大约 17.5 英寸的篇幅，康奈尔游行者的内容则占了 9.75 英寸。

媒体是移动的聚光灯，而不是被动地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选择是他们活动的工具。一篇新闻报道采用某一形式，但对内容有所抛弃或不予重视，这是不足为取的。一篇报道就是一个选择，是一种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就是展示观点的方式。《纽约时报》重新设置——并继续重新设置——一个霸权的模式：这并不是说直接拒绝接受可选择的或不一致的信息。像雷蒙德·威廉姆斯主张的一样，霸权“不只是作为一种支配形式被动存在，它不断更新、创造、防御和修正。它还不断被并非完全是自身的压力所抵制、限制、改变和挑战……它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惟一的……任何霸权过程必须特别警惕，并对怀疑或威胁其统治的抉择和异议做出回应。”^① 这种霸权模式建立了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会引起人们对现有权力和知识体系的充分和完善程度提出质疑。事实上，正如建立在声称为大众利益提供周到服务 (“民族利益” “美国人的梦想”) 基础上的霸权力量，新闻霸权的合法性是因为它确保新闻具有客观性，但它不能确保在那些承认其合法性的公众眼里绝对完美无瑕。《纽约时报》服务于政界和商界的精英，同时它还具有警示和监督的功能。它不能忽略那些具有争议的事情，至少不能长期如此。^② 它所报道的世界是动荡不安的，其中许多动荡因素是对统治阶层的挑战。有时，它也会暗示这些因素可能不会得到比较容易的控制，甚至他们的价值体系和真相并不是想象中最好的。因此《纽约时报》将缺乏一致的信息圈定在一个框架中，这使它的影响大大降低；同时，它会大量删减那些支持对立事物的信息。同其他新闻机

①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12 - 113.

② 关于大众媒介的监测功能，可以参见 Charles Wright 的 *Mass Communications*, 2nd Ed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5) pp. 8 ff.

构一样,《纽约时报》也拥有对报道的处理权。1965年4月17日,《纽约时报》在自己的惯例下传递了前后不符的信息。获取新闻的主要来源——至少未刊登的美联社照片,是在某个框架内制造了一系列的信息。

对于华盛顿的游行示威活动,还可以作些什么样的报道呢?解决问题的其中一种方法便是观察其他媒体是如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处理的。^①《全国卫报》是一份左翼的周报,它的新闻报道比较长,这有助于人们对现实的了解。另一种方法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声明和宣传,他们的材料可以帮助我们注意《纽约时报》已经报道的发展态势,而不是其他一些未被报道的情形。因此《卫报》的新闻报道不仅可以用来参照被《纽约时报》忽略的报道(毕竟《卫报》是一份周报,不像《纽约时报》在周六报道中技术角度上的苛评),而且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竞争者的可能性认知。《卫报》的报道是不乏意识形态的,《纽约时报》也不例外。

1965年4月24日,《卫报》刊登了两篇关于进军华盛顿的报道,一篇是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的综合性报道(43 $\frac{1}{4}$ 英寸栏目长度),另一篇是威廉·普赖斯(William Price)的深度报道(22英寸栏目长度)。报纸刊登了两篇大会演讲的节选,主要是斯图登·里德的。通过对《卫报》(增刊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材料)和《纽约时报》的比较,我认为《纽约时报》忽略了以下几个主题:

1.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发表的倡议书内容,这份只有一页纸的文件包含了对越南战争实质性的初步分析。

自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去年12月份决定组织进军活动后,大学校园里散发了大量的传单。它对战争本质的观点即便不是十分全面,也可以提供一种选择的角度(美国对此进行了大肆干涉),不光只是对“战争”的“谴责”。《纽约时报》却未对该倡议书进行报道,原因何在?一般来说,有关非正统政治的报道沿袭了往日犯罪新闻报道的常规。传统上,报刊将暴动和抗议等而视之——这十分有趣,因为这其中存在着疑问。关于人们兴趣的报道在赞成个人独特的原因时往往会反对集体的动机。当记者(还有编辑)向示威者提出“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的问题时,他们试图寻找不寻常的原因,而不是政治推理(示威者

^① 该方法源自 James D. Halloran, Philip Elliott 和 Graham Murdock 的 *Demonstr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0)。

可能拥护这种动机的霸权主义，并且提供给记者他们想要的答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倡议书并没有蓄意地隐瞒，只是记者没有提到政治立场——甚至在大选期间采取的拥护既有权力机构的立场，也很少在媒体中论述。记者通常对此相当蔑视，只是当作花言巧语罢了。有时运动的立场是浮夸的，他们刻意追求运动的模式，而且还会考虑媒体会如何加以报道。他们说，我们认为世界是这样的，不是你们所看到的那样，也不是总统描述的那样，所有的一切让我们采取了行动。但大多数记者的描述，来自于政府的不同派系，他对于政策不同解读的合法性，使人们对记者拥有足够的消息来源表示怀疑。它使记者每一天的生活变得都不相同——除非正常的消息来源、政府以及半官方机构自行分开。这样，局外人的表述才能作为具有报道意义的事实。然而，在1965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政治分析被排除在外，这倒不是因为它过于激进，况且它的评论也是合乎情理，它将战争称作是“国内的”，而不是“帝国主义的”。1965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反战行动可以说是不成熟的。”

2. 队伍的标语与口号。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决定将统一的标语印在牌子上，并且让参加人员拿着，在上面标明他们来自什么大学和什么地方。那些标语清晰可见：“我们拒绝参与越南战争”“谈判吧”“从越南撤军”“无条件谈判——赞成；屠杀越南儿童——反对”“让美国撤回来”“停止迫害”“战争是针对贫穷，而非针对人民”“立即结束对越战争”“民主而非战争”“停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密西西比强烈要求自由”“我们的愿望是全人类自由”。《纽约时报》对此只字未提，虽然在美联社发给各报社的图片中有两张可以隐隐看到几条标语，但这些却没有登上《纽约时报》。

这些口号表明了对于战争的各种批评态度，它们体现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务实精神。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目的宣言却从《纽约时报》的霸权视野中消失，这是为什么呢？任何技术角度的原因都不能对此予以解释。因此，除去技术的因素外，我们必须寻找其他意识层面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引用了这些口号，就意味着允许“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表达它们的立场，这会从隐含的霸权模式意义转向理解的层面。

3. 不同种族史无前例的合作。

对参与学生运动的人和对周围事务相当敏感的观察者来说，大量的黑人参加了维和的示威活动，这是值得人们注意的。《卫报》声称，游行队伍中大约有10%是黑人。记者威廉·普赖斯也写道：“最重要的联合是南方年轻、活跃的自

由工作者和北方维和的学生……”大会主要的演讲之一是由“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鲍勃·帕里斯(Bob Parris)所做的。他说,发动越南战争的人就如同在密西西比煽动种族暴乱一样。《卫报》的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写道,帕里斯“试图描述越南和民权运动的关系”。两年后,小马丁·路德·金在一个反战论坛上发表了第一篇公众演讲。一位重要的民权领导者开始建立他的声望。由三名“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干事组成的演唱组合——自由之声(Freedom Voice),为大会作了演出。

如果新闻包括“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记者和编辑之前又不了解这些情况,或者用以前的观点看待特定的事情,那么,黑人运动和白人运动的联合就是新闻。还有证据表明,后来政治精英感到了两种运动日渐联合的威胁。例如,空军副司令汤森·胡佛斯(Townsend Hoopes)在回忆录中提到,1967年,政治首脑们“首要”担心的是暴乱、抗议和反战与种族斗争的结合、“战争”使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并使美国人民脱离政府,甚至会造成本世纪美国政治上最为严重的动荡。^①1968年,政治顾问督促约翰逊总统节约开支。因此,或许他们已经适应了接受这种“重大结合”的新闻,并且他们对消息的兴趣似乎不能解释为什么《纽约时报》忽略了1965年4月份关于种族间问题的报道。恰恰相反,如果国家精英对于新闻的任何解释感兴趣,我们希望《纽约时报》能给予足够的关注。

似乎最合理的解释是,1965年4月,《纽约时报》没有把连续的整个运动作为“一篇新闻”,“新闻”是停留在一个单一事件上的一系列孤立的事实。很可能是《纽约时报》未署名的记者对激进运动了解得不够深入,没有注意到白宫前种族联合的特别意义所在。种族间的问题或它的缺席,并非一个显著的事实。运动中进军的组织未受到严格控制,正如它通常会被忽略一样,无意之中被置于记者的参阅内容之外了。

4. 不过,关于进军内容的其他方面,《纽约时报》做得很突出。

就像我已经提到的一样,《纽约时报》晚些时候的一篇报道的导语是:“今天风和日丽,15,000多名学生和其他一些人聚集在白宫,要求美国停止在越南的战争。”其中暗隐了学生是在缺乏长辈的监督下参与行动。换句话说,报道沿袭了以往的模式。在头一版中,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文章是这样开头的:“15,000

^① Townsend Hoopes, *The Limits of Intervention* (New York: David McKay, 1969), p. 57 (emphasis added). 在 Chester Cooper 的 *The Lost Crusade: America in Vietnam* (New York: Dodd, Mead, 1970), p. 263 中也有对内幕的叙述。

多名学生和他们的长辈……”（《纽约时报》的编辑肯定对这条导语进行了修改——但改动不大；其他内容都没有变动）。^①

与此相比，《卫报》则估计到，“大约四分之一的参与者不是学生”；其记者普赖斯写道：

示威的参与者代表了各种力量，大多数是年轻人。其中包括衣阿华的农民、学校的学生、不同阶层的工作者、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革命者以及来自南方的自由工作者、“老左派”和试图寻求牢固基础但又感到压抑的新左派。^②

5. 波特的演讲。

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骨干和大多数群众来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主席保罗·波特的演讲标志着大会的结束，因为这是第一篇对战争公开表明激进立场的演说。这篇演说坚持认为，因为战争是由美国的整个社会制度引起的，因此美国的社会制度必须得到根治：

我们必须界定这种制度，对此加以描述、分析、理解和改变。因为只有改变并控制这种制度，我们才有希望阻止那些人今天在越南发起战争，明天又在越南策划谋杀……

对于许多听众来说，这篇演讲对反战运动起到了指导和激励作用：一种理解战争和反对运动的方法。《纽约时报》没有提到这些，甚至没有提到它们已经知道的事情。

为什么《纽约时报》会这样操作呢？技术上还有思想认识上的因素在中间发挥着作用。这种忽略部分可以追溯到《纽约时报》的操作流程，尤其是周六版的最后截稿期限显得有些过早。柯克帕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 Sale）指出：

部分问题，仍旧存在于向华盛顿的进军当中。这些进军活动大都是在星期六，而报社最后的截稿期限是在星期天的早上，因此记者很少会耐心地等待下午发生的事情，或者跑去参加下午召开的演讲。有鉴于此，尽管保罗·波特和卡尔·奥格尔斯比的演讲大为鼓舞人心，但却几乎从未被报道过。^③

① 4月19日，《纽约时报》将估计降低到“10,000多人”。官方的统计数字是25,000人。

② 《纽约先驱论坛报》将示威看作是自1963年8月以来“争取民权的最大集会”。同时，该报还说到，“一些人[示威者]留着胡须，戴着墨镜，穿着粗花呢衣服。”（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戴墨镜很正常，人们会这样想。）在《华盛顿星报》“游行者的七张特写图片”上，是三个满脸胡须的人，其带有“色彩的”报道突出了“长头发和礼帽套装”，并认为游行至国会大厦的示威者是“一群安静的绵羊。”

③ Sale, “Myths as Eternal Truths,” p. 3.

直到开会前，波特还在修改他的演讲稿，所以对于记者来说，事先是无法得到他们采访所需的相关材料的（比如星期六的大会，多数记者都想在星期五就拿到有关材料），而缺乏经验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并没有过多注意这些细节。“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不够精明，或者是不够务实，这时候本可以利用媒体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记者采访时间过于短暂以及事先相关材料的缺乏，让记者们无法十分理想地报道波特的演讲。其他演讲者也被提及，只是作为附带。另外，能够解释《纽约时报》对此有所忽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波特作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主席，名气不是很大，很可能《纽约时报》不太了解波特本人，就像一个没有经过证明的运动一样。不出名的人很少会被记者碰到。在《纽约时报》的眼中，这多少有点金钱的味道，有付出才有回报。

其实，《纽约时报》最后是可以为波特的演讲做一个后续报道的，其他先前被忽略的进军游行活动也是如此。沃德·贾斯特（Ward Just）完成了一篇跟踪报道，是关于1965年11月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lesby）在反战示威中作的演讲，题目是“学生激进派挑战自由派”。该文在11月大会的两星期之后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但是，这种反映非同寻常。一般而言，新闻报道的原则是保证内容的质量，除非确实允许例外存在。

6. 策略争论。

在华盛顿纪念馆大会集合后，大多数的示威者涌向了国会大厦。据《卫报》报道：

国会大厦赫然耸立，歌颂和平与自由的颂歌——至少在前几排——变成了愤怒的声音。“滚，滚出去”……当颂歌消逝时，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首——“结束战争”。

根据计划（还有法律），游行不得进入国会大厦前500英尺的距离。在格兰特塑像的前面，一位代表由此进入了国会大厦并递交了请愿书。当前排的游行队伍到达塑像时，数百人高呼“冲过去，让我们冲过去”。400名学生穿过了为阻挡游行队伍而设置的路障。

“让我们冲过去”，他们隔着走道喊，试图煽动其他人，其中几个人继续穿过水泥路障朝国会大厦走去，并且与多名警察发生了冲突。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几名女生开始曾试图阻止前排的其他人越过屏障，并且轻松地控制住了局面……

最后，大约300多名学生坐在国会大厦前。半小时后，一位警察队长接受了请愿书，学生们解散了。

该行动表明，在反战运动中，核心的争执发生在两类人之间：一类是希望行

动更富战斗性的人，另一类则是想扩大运动政治基础、吸收中间派的人。《纽约时报》过早的截稿期限没能在4月18日的报纸上详细报道该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对昨天发生的事情怀有偏见。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该事件中，《纽约时报》本来是有可能报道这次运动重大的分歧，但它却没有把握住机会。或许是由于对于事情处理的手法不尽相同。既然是这样，新闻报道的传统超越了报纸对于左派分歧的政治兴趣。

简而言之，《纽约时报》的文章对进军的规模和意义并不赞同，相反，却通过学生们所表现出的一些幼稚行为，来对他们加以界定（“一些成年人”，“他们的一些长辈”，“胡须和蓝色牛仔”）。甚至通过刊登通讯社提供的将左派比拟成右派的照片，使组织分化成表面上等同的右翼，这是一种沿袭了以往的操作模式。同时，报道还忽视了不同种族之间的问题以及运动中内部分歧的政治意义。

这就是《纽约时报》处理游行示威活动的一贯做法吗？关于4月17日游行的报道是如何遵循通常的新闻实践的（犯罪新闻的模式，截稿期限的重要性等）？在意识形态方面处理的改进又是如何的呢？幸好，《卫报》把《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和《纽约时报》在三星期前，即3月26日从顺化到蒙哥马利争取民权的游行示威的报道进行了比较，《卫报》称之为“蒙哥马利游行的全景参照”。有关顺化的报道是，“尊敬的小马丁·路德·金领导着25,000名黑人和白人今天站在了国会大厦阴影前，反对亚拉巴马种族歧视”。“阴影”暗示了有些事情会威胁到亚拉巴马的统治，因此对于民权的挑战必须认真严肃地对待，尽管这表面看来是引人注目的勇敢者的行为。让我们比较一下：“今天风和日丽，15,000多名学生和其他一些人包围了白宫，要求美国停止在越南的战争。”4月17日，有暗示表明，这些学生并不是成年人，这或许也是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第3句中）“白宫的主人们现在还在得克萨斯的农场里”的真实而又充分的理由。“风和日丽”是一种准确的描述——同时也是含蓄的，是对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宜人天气的称赞。这个短语传递了一种白宫并不怎么令人畏惧的感情，似乎在说，“今天天气这么好，谁愿意发火呢？”或者是“这么好的天气，游行多么无聊啊！”难怪只有少数成年人（较年长的陪伴？）同年青人一起跑去聚集在白宫。

我不知道《纽约时报》的记者使用这些带有恩赐味道的言辞是否要表达这些意思，但是意图并非争论的重点。问题在于意义，通过与蒙哥马利的导语相比，该导语所要传达的意思已经十分清楚。华盛顿的导语设定了这样一种基调——对示威不加重视，并对此进行贬低和蔑视。像《卫报》一样，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合乎情理的，而反对越南战争对《纽约时报》来说是不合理的，就像民权是合理的

一样。另外，我们将如何理解约翰逊政府的政策正是区分合理运动与不合理运动的标准呢？^①显然，《纽约时报》对示威活动的处理方式与约翰逊政府是“志同道合”的。简言之，我们应当考虑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

认识 SDS

游行结束三周后，CBS 于 5 月 6 日在晚间新闻播出了一篇有关“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评论”——一篇较长的评论性报道，并非拘泥于某一个特殊事件，大约有 3 分钟的时间。该报道是资深记者亚历山大·肯德里克（Alexander Kendrick）播报的。肯德里克回忆说，一般当他接到新任务时，

我会做一些采访，然后想好几个问题并做详细的记录和叙述，对稿件进行很好的把握。之后，编辑和其他人员对稿件进行处理，这都在我所控制的范围之内……但随后编辑们的工作我就没有办法了。但是对于不在纽约办公室工作的记者来说，很少在没有经过协商的情况下对一篇稿件进行编辑，有时候还要同他们商讨，至少要形成默契。从技术角度而言，任何稿件经过编辑和摄制人员之后，它就归哥伦比亚公司所有，并且可以被自由处理。就像我说的那样，为了防止异议的出现，大家必须在一起商量（尤其是关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文章）。当然制片人不会对内容感到紧张，事实上，可能正是他首先想到了这篇文章。^②

① 4 月 19 日《纽约时报》第 6 版的后续报道延续了这种贬低和反对。围绕着“PICKTING KEPT UP AT THE WHITE HOUSE”同一个标题有三篇报道。两篇是美联社电讯，一篇是《纽约时报》华盛顿电讯，作者没有署名。华盛顿电讯的导语为：“一大批反对政府的学生——昨天 10,000 多名参加游行的学生中剩下的人——今天继续在白宫前集结。”具体的数字已经有所减少，成了“more than 10,000”。这些人是“leftovers”，而不是“放弃他们的学业留在华盛顿的学生。”这条长度约为 21/4 吋的消息的第三段这样写到：“Woywod 先生（一名学生）说，学生们并不想招惹麻烦，只是希望明天能向白宫官员递交一份请愿书。”这似乎清晰地暗示了记者对 Woywod 提出的一个问题：“你们真的想制造麻烦吗？”并由此构成了该事件。

第二篇是来自美联社的报道，注明了发稿地点 Texas：“今天下午，在未能如期地向约翰逊总统递交反对美国在越行动的情愿书后，示威活动取消了复活节守夜活动。该请愿书由一名助理接受。”美联社在此承接了《纽约时报》的主题，即总统不会让政治侵扰扰乱他的假期，从而使示威者枉费心机，说明这些数目不详的示威者是“失败者”。文章的第二段和最后一段将他们描写成“sunburned and weary”。

《纽约时报》最后报道了两名 Queens College 的学生在请愿中收集到了 2,000 个签名。有趣的是，美联社著名的保守主义在实践中丧失殆尽，这与《纽约时报》的“客观性”主题本质上是相同的。关于美联社，参见 David Manning White 的“The ‘Gatekeeper’: A Case Study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27 (Fall 1950): 383-390.

② 该引述和下一段的第一个引述来自 1977 年 1 月 3 日 Kendrick 写给我的信。他补充道：“我的报道是基于新闻价值的本身，而不是我对新闻的个人意见。”

和《纽约时报》的弗雷德·波利奇一样，肯德里克也很同情新左派。他写道：

在国外生活了20年后，回到祖国，对英国、法国、比利时和其他国家日趋没落的殖民政策进行了仔细考察，发现越南是美国道义和政治上的大灾难。

通常来说，肯德里克“倾向于阅读有关左派的文章”；例如，他读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休伦宣言》。1954年到1965年间，他任CBS的伦敦办事处负责人，曾报道了解除核武器的斗争，并且评论道，“当像迈克尔·弗特（左派的劳工派下院议员）这样的人从奥尔德·玛斯顿游行到伦敦（反对英国的核武器）”，“你会十分严肃地加以对待”。^①第一次追溯美国的数十年历史时，肯德里克和政策制定者保持着非同一般的距离，并且流露出卓越的才华和经验。作为“默罗男孩（Murrow Boys）”中的一员（他在默罗的领导下服务于CBS新闻部，是第一代广播新闻记者和电视新闻记者），肯德里克最初是报纸的驻外记者，当时人们的工作积极性都很高；后来，他又参与制定了电视新闻界的条例。和大多数电视记者不同的是，他经常自己编排广播节目。简言之，肯德里克是一个专家。从这一点来讲，记者对新闻的敏感性和新闻意识，同从事相关工作的新闻制片人是一致的，他们都倾向于将新闻放在一个大的政治模式之中。

一篇评论，或者报道，或者正如在CBS中称谓的“事业”那样，自然比以事件为中心的日常新闻更为丰富，也不会受到截稿时间的限制。评论可以解释得很仔细，时间期限的压力较小，形式也更为灵活多样。制作评论的组织制度可以同硬新闻隔开：负责新闻评论的人也对CBS晚间新闻的制片人负责，当时是拉斯·本斯里（Russ Bensley），而硬新闻都有各自的总制片人。事实上，正如肯德里克所言，编辑、合作制片人、执行制片人、主持人克朗凯特，甚至（虽然很少）更高的管理部门，都能在不同时期加以干涉并确定最终播出的新闻。不过，一旦主题确定了，制片人和记者就必须开始一起工作，——当然，以媒介组织认可的方式。^②

5月6日，关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节目一开始便是肯德里克的一个镜头，他站在一座学校大楼的前面，对着镜头，似乎以命令的口吻问道：“这

① 1976年11月17日对 Alexander Kendrick 的采访。

② 关于网络新闻的一般性著作，可以见 Edward Epstein 的 *News from Nowhe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和 Gaye Tuchman 的 *Making New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8)，以及 Gans 的 *Deciding What's News*。

些老实巴交的学生到底怎么了？大学生们躁动不安——或者至少看起来是这样。”肯德里克继续陈说，电视画面展现的是学生团体示威、开会、歌唱的场景——所有的一切都是热情洋溢的，所有的画面都是没有暴力场景的剪辑。肯德里克称这种现象是“新学生左派，它的口号是，我们抗议一切没有理由的事情”。（事实上，这有点半玩笑性质的——当然只是一半——克利夫兰团体组织关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经济调查和行动规划的口号）“一些是新左派，”肯德里克接着说，“有一些与老左派有关，包括共产党，大多数还没有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其中一个便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接着，画面转向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主席保罗·波特。波特谈到了大通曼哈顿示威和进军华盛顿活动，以及他们想要实现的目的。肯德里克问：“你说你在政治上不附属于任何人，难道你真的没有任何政治界限吗？”波特在华盛顿的演讲，很好地体现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精神状态：对严厉的恐惧、探索、试验、冒险精神——所有这些激怒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组织内外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者。

摄像机展现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办公室的职员在油印小册子和墙上的张贴物：“选民登记（Register to Vote）”和“自由言论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画外音是肯德里克的声音：“在纽约总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填写并散发有关民权、自由言论、大学改革、贫穷、征兵和核战争的小册子。”在总结时，肯德里克又一次出现在电视上：

他们自己的组织成员得到的报酬并不多——仅仅是生活津贴。即便是吸收小部分的成员，也超出了学生左派的承受能力。其目标更多地是来自内心，而不是来自任何既定的法定程序，但是它愈发加重了美国年轻人的疑虑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还有他们的欲望。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重新对自身进行客观评价的影响下，许多其他的组织也开始重新评价自我。——亚历山大·肯德里克，CBS，塔夫茨（Tufts）大学。

这次小规模运动的主题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肯德里克这一代人来说，对缺乏纲领的左派的理解也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最为重要的是，肯德里克在知识方面（出版物）、道德方面（较低的报酬）和意义方面（作为“重新评价”的发起人）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做出了贡献。作为知识分子，肯德里克知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运动顶点的重要性。和波利奇在《纽约时报》的文

章一样，肯德里克的报道打破了传统硬新闻的模式。^① 但是据我所知，这只是其中一种。自相矛盾的是，与新闻评论一致的新闻自由可以适用于新闻组织，以减少硬新闻确保真实易懂的责任。如果解释（“报道的‘原因’”）是“深刻的”，那么硬新闻报道（“报道的‘内容’”）就不会因其浅薄而受到指责。同样，当电视网的报道被指责流于肤浅时，它的辩护者通常会以时间紧迫为由，并且将批评归结于“深度”应当是纪录片和新闻杂志履行的责任。

说到纪录片，我们有必要暂停一下，聊聊这方面和新左派运动有关的惟一作品，这便是阿瑟·巴伦（Arthur Barron）的《伯克利的叛乱》（《The Berkeley Rebels》）。CBS 的高层将节目的制作任务交给巴伦，他对此详细的描述使我们大体地了解到，媒体高层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操纵新闻报道的以及当高层的政治兴趣压制了制片人工作自主权时的情形。^②

巴伦是社会学博士，在他 1965 年来到 CBS 之前，就已经为其拍摄了 6 部纪录片。CBS 想拍摄一部纪录片，打算反映成长于“伯克利动乱”（the trouble at Berkeley）时期的年轻人。于是，巴伦来到了伯克利，然后打算将镜头对准四个人：一个政治叛乱者，一个对大学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的毕业生，以及“一对与父母不和、并已同居的未婚情侣，这代表了对价值观一种新的追求。”^③ 巴伦进一步提出，他的作品“唤醒了大量的学生”。但是，CBS 却认为该纪录片并非“真实的（factual）”或者“客观的报道（objective reporting）”。后来，巴伦又拍摄了一部，其中运用了大量纪实电影的手法和舞台效果。

CBS 的新闻总监弗莱德·弗莱德利和新闻纪录片的副总监告诉巴伦，应当修改节目中的部分内容。于是，巴伦对其中的部分内容做了调整，并得到上司的肯定。但是，在播出的三个星期前，CBS 的主席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和总监弗兰克·斯坦顿（Frank Stanton）不顾弗莱德利的反对，要求对该纪录片重新进行改动。其中包括有关乔伊大学的学生举行的一次狂欢晚会的片段。该内容体

① 关于 CBS 的报道模式，参见前面的注释 21，以及第三章中 1965 年 11 月 Bruce Morton 对 SANE March 的报道。注意《纽约时报》后来有关妇女自由运动的报道，较之以往显得比较完整和固定，也颇具同情。（参见 Gaye Tuchman, “Ridicule, Advocacy, and Professionalism: Newspaper Reporting about a social Movement,” 该文曾于 1976 年 8 月递交给了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会议。）区别自然在于，《纽约时报》有关妇女运动的报道是连贯和规律的，而电视表现的只是一个镜头。

② 以下的叙述来自 Alan Rosenthal 对 Arthur Barron 的采访，刊登在 Rosenthal 的 *The New Documentary in Action: A Casebook in Film Mak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especially pp. 139-148. 非常感谢 Wisconsin 大学的 Lawrence Lichty 教授提醒我对此予以关注。

③ 同上，141 页。

现了对反叛不满的娇纵，执行总编则称之为“对孩子的诽谤”；他们还删掉了在一所大学的报告厅如何使用电视设备的片段（“过于偏激”）。为了寻求平衡，他们让巴伦“飞抵伯克利，去采访一些专家教授，让他们对叛乱进行分析并说些类似这样的话：‘孩子们不够成熟且缺乏耐性，所有的这些都过去’。他们还强迫巴伦插入两三分钟“克拉克·克尔（大学校长）在伯克利希腊剧院所作的演讲”。而更为强硬的行径是，佩利和斯坦顿要求他为 CBS 的记者哈里·里森纳写一个欺骗性的开场白和结尾，每一个画面都要有里森纳的画外音，该作品变成了一个没有叙述性评价的自由政治讨论。而新左派运动也成为了“在那时争论很激烈，却很少能得出结论”的一场运动。^①《伯克利的叛乱》就这样播出了。

CBS 最初就知道，巴伦的观点是异端的，因为他违背了通常的平衡和客观性。起先，纪录片还被鼓励大胆地突破常规，那么为什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会在最后时刻进行干涉呢？后来巴伦表示：

后来我被通知（巴伦没有说是谁），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长克拉克·克尔给弗兰克·斯坦顿写了一封信，说他实际上并没有看过该部作品，因为这很危险而且很不公平；它歪曲了事实并且谎话连篇；而且节目中有各种色情场面——简言之，整个片子将是场灾难，而且对大学和 CBS 来说都会带来麻烦。据我所知，斯坦顿并没有采访克尔，因此也没有得到专业的佐证，他只是无中生有。因此，我被通知要进行一些改动。我无法具体地告诉你都有哪些内容，因为实在是太多了。^②

电视网的高层要求对此进行干涉，巴伦的报道证明了大学精英日益显著的影响，它还揭露了所谓的媒介精英积极传播并施加他们的世界观并强化他们的准则，甚至——如果需要——违反正常的新闻惯例。这种干涉，如果像巴伦所说的那样发生，是个早期的征兆。巴伦打破了原有的惯例，这是不同寻常的。由于 60 年代后期，美国政治的升温以及精英们对于战争和美国命运的政治一致性出现了分歧，更多的记者更为经常地——不规则地、部分地、不一致地、但认真地——与霸权思想决裂。一般的新闻惯例不能完成它们的任务，包括巩固社会稳定、平息反对派、通过微妙的介入提出建议，这种模式是社会制度体系理所当然高于——并且控制——除了命运的一切。后来，具有选择性的新闻模式得以明确，目

① 同上，147 页。

② 同上，146 页。

的是为了明确、弄懂——并归化——逐渐扩大的反对派运动。一个承诺起诉分裂战争的政府，必须镇压运动和其缺乏热情的宣扬者（这两者是很难区分的）。当时，尼克松政府开始采取强硬政策，媒体的精英们被迫周旋于两种不同的情形并做出选择：一种便是新闻报道告诉他们什么是真实的，另外就是总统先生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的。

不过对于1965年而言，为确保新左派运动的报道和精英政治的假设相一致，常规的新闻处理过程有时候仍然显得不够，而且几乎是经常显得不够。在主要报道模式强化之前，弗雷德·波利奇的论述是过去式的。现在，新左派运动经常被报道为浅薄和异常的；渐渐地，它又被视为是危险的。

在6月13日和14日的《纽约时报》上，我们可以从纳塔利·贾菲（Natalie Jaffe）两篇有关“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会议的报道中看到霸权的模式。^①第一篇是关于该组织内部活动的报道——实际上，这也是第一次指出该组织存在着内部活动。星期天版第77版的标题则是：“学生社会努力实现目标：发现会议比运动引起的麻烦更大”。报道的开头是：

卡瓦丁（Kewadin），密歇根（Michigan），6月12日——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组织年会的第三天，该组织的行政秘书郑重地向大会提交了300多名代表的名单。

“有多少人觉得饮食有问题？”他问道。一片附和声。

“有多少人认为食物供给不足？”附和的声音更高了。

“有多少人愿意出钱来改善？”一阵强烈的讥笑声。

“既然如此，当你发牢骚时，请结合问题本身考虑考虑。”发言人克拉克·基辛格总结道。

一位穿着蓝色牛仔和长统靴的学生抱怨道：“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整个上午都在讨论如何创造和实行分享民主。”

这次交流是在密歇根北部一个绿草如茵的山坡上进行的，它阐明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一个主要问题，该组织在新学生左派运动中占据着领导地位。

在这篇报道的开头几段中，框架就已经非常明确：该组织似乎已竭尽全力，

^① 实际上还有一篇未署名的文章，不过比较简短，并没有过多地加以分析。该文章是第28版有关Carl Oglesby当选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主席的报道。

一致的反映是嘲笑，引用的话也是可笑的，甚至句法也显得有些混乱（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没有人曾谈起过“那个分享民主”）。报道的其他部分仍采用了这种方式，其中点缀着一些“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纲领中可笑的细节，传达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给人不确定的荒谬形象。例如：

站在木房子外面的草坪上，也就是梅普赫斯特营地，面对从餐厅传来的要求提供更多早餐的抗议声，基辛格先生大声喊道：“或许当所有的力量凝聚到一起时，这将真正成为左派运动的开始”。

他看着一排排简陋的小屋，里面仍然有许多人蜷缩在睡袋里。

诸如此类。对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缺乏完善的活动，贾菲的鄙视更加膨胀——如此歪曲事实的方式似乎不像想象中那样危险，或许显得有些无意义和荒谬。例如：

和争取民权以及要求进行大学改革的团体不同，社会选择它的原因不是为了得到结果而是强化它所认为国家原则的基本错误。在其全国办公室，还不断出台了众多的文件来对这些错误进行分析。

很难想象这“一系列”的文件是否能够包含有价值或者具有实质性的东西，这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不同于肯德里克的文学产品形象。

贾菲的评论文章没有刊登在星期天的新闻版上，其影响力也大打折扣。但是，她的报道刊登在了第二天的第16版上，标题是：“学生团体谋求抗议越南政策。”现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逐渐由可笑和自负的形象变成好战和威胁的形象。

整篇报道建立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秘书长克拉克·基辛格一个提议的基础之上，即该组织鼓励反战战士在思想上开点小差，并且鼓动政府借1917年间谍活动法案（the Espionage Act of 1917）压制“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基辛格考虑了一个纽伦堡型（Nuremberg-type）的合法捍卫手段，一次政治尝试。他已为促成这一计划努力了几个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内部人士对此已有所了解，但热情并不高，就像“敢死队计划（the Kamikaze Plan）”一样。计划的成功要靠宣传。理论上，公众将政府推到一个角落中并强迫它执行。“敢死队计划”得以提上议事日程，因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领导人不知道其他人是如何看待华盛顿游行的，哪一部分在反战运动中起了作用。没有特别的反对意见出现。总体上来说大会有些混乱，而且令人感到迷惑。因此，贾菲感觉，应当了解敢死队计划。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这是一个确切的计划。但对于基辛格华

丽的演说，她混淆了提议的政治方面，并且有效地夸大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对它的承诺。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她代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政治立场的惟一意图：

这些问题，包括阻止越南人民行使自决权，不应当以华盛顿对共产主义的好恶为评判。

但是，对事实更多的歪曲肯定与基辛格所制定的计划有关。标题——“学生团体计划更大的反抗”——听起来似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已决定对“敢死队计划”表示支持（事实上，它从未这样做），第二段更为确切地暗示了一些意义暧昧的事情：

该组织全国大会的300名代表在梅普赫斯特营地表示，他们愿意对拥有2000名成员的组织进行资助以支持抗议，不过他们推迟了是否进军前线的决定。

这一页下面的部分，倒数第二段，是大会关于该提议的实际决定：

既然该运动需要社会各界的力量，它首先关注的是内部事务和团体组织，关于学生参与的最终决议应取决于全体成员的投票。

这种掩盖的事实——它使人们对以前的解释产生了怀疑——出现在结尾段落中：

为期5天的会议今天结束。社会各界的看法似乎仍表现为两种：立足于本地事务以及放眼于全国。

“……似乎仍然势均力敌”。无论是现在还是之前的部分，都没有对这种情形的描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的团体组织者和大学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大会比较生动的东西之一，并且贾菲只在过去提到过它。从表面判断，这种“势均力敌”应该大大降低了基辛格“敢死队计划”的重要性。贾菲并没有试图消除这种差异，不过最后一句话中她表明：她保留了“敢死队计划”，作为报道决定性的框架。

整个的基调是好战的，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政治理解而言，从其分裂和踌躇满志以及实际的组织生活而言，这是一种独立的策略。这种模式，既表现为一种拒绝，同时又表现为一种选择，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报道是如何被理解的。只有仔细阅读，才能理解最后部分的言外之意。对于细微和准确的报道来说，文章的核心部分总会体现得较为复杂，以补偿整体结构的遗漏。把有意义

的部分放在结尾，另一方面，就是承认这种模式不能容纳所有可行的证据——同时又予以保留。

《纽约时报》报道的模式是不断变化的，从波利奇严肃而又毕恭毕敬的报道到4月份的反、中立、贬低和两极分化，其中可见一斑。在关于6月份大会的报道中，“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被称为危险、极端的政治力量，这些转变只能部分地归因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政策的实质性转变。但当我们仔细观察时，我们会看到，在报道的后几段有一种内在、文本的统一：贬低和威胁看似不同的参考模式，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在选择对重要见解的其他表达方式——“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异常的。中立和威胁的主题被一个秘密的逻辑连结在一起：它们是为了回避新左派而提出来的，而且还体现了政治挑战实质性的联合方式。^①当持有异议的人“抱怨”并同时策划许多非法行为时，他们本身却成为争端。以这种方式看待反对派，令人尊敬、令人尊敬、和令人尊敬的观点——记者、编辑、和令人尊敬的读者——避免不得不严肃对待任何有关自由社会的反对观点，这种观点犹如汽油一样浇在少数革命者身上。

但是，如果贬低和威胁是一致且功能上相关的模式，为什么《纽约时报》会不断地在二者之间来回转换呢？为什么会从中立和贬低演变成威胁呢？这里，对两种模式的解释却意外地遇到了自身的局限。对文化作品的文本分析必须跳出新闻的狭隘范畴，进入更大的政治范畴和历史范畴，全国最有影响力和最有声望的报纸报道反对运动——无论这种方式是什么——终究还是一个政治事件：编辑的政治设想和策略、新闻产品的传统新闻价值和技术因素的结合以及记者独特的报道方式，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一篇完整的报道。

对上层政治领导人和媒体的高层人员以及决策人员的兴趣，似乎表现得比较明显：他们具有共同的教育水平、社会联系以及与下属交往的经验，还有共同的世界观——一句话，一个共同的阶层地位。对于直接影响和协调的可能途径，有人提出质疑。当拒绝承认它们时，政府又是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把暗示传递给媒体的呢？如果政治干预确实塑造了新闻，它们很可能被隐藏起来。因此，对于这种干涉，确切而又可靠证据的缺乏——无论是在回忆录中还是在采访中——都不能作为反驳这种假设的确凿证据。没有调查能够完全让人知道，1965年春

① 关于异端的同一分裂形象，参见 Frank Pearce 的 “How to Be Immoral and Ill, Pathetic and Dangerous, All at the Same Time: Mass Media and the Homosexual”，收集在 Cohen 和 Young 等人编著的 *Manufacture of News*, pp. 284 - 301.

天,《纽约时报》的编辑和记者到底在想什么,或者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没有发现有关约翰逊政府和《纽约时报》更多的通联,或者编辑有意无意地将他们的报道与约翰逊政府的意图保持一致的证据。

事实上,在我对1965年事件的调查中,我认为《纽约时报》报道的观点并不具有政治上的关联性。立足于《纽约时报》的独立声望,我确实怀疑记者和编辑曾被一些类似于当时政治政策的粗鲁事情所左右。确实,《纽约时报》在某些重要时刻容许自己被干预,比如它曾推出了一个有关中情局支持1961年4月入侵古巴猪湾(Bays of Pigs)的报道。然后1966年,《纽约时报》安排编辑克利夫顿·丹尼尔为《纽约时报》的审查制度做公开的自我批评。1961年的尴尬过后,《纽约时报》大概更能坚决地应对白宫的压力。肯尼迪总统曾私下告诉特纳·卡特利奇:“要是你们刊登更多可操作性的内容,我们或许不至于犯这么大的错误。”(当卡特利奇指出《民报》以前的报道时,肯尼迪说:“只有当它刊登在《纽约时报》上时,才是真正的报道”)。^①1963年,大卫·海伯斯坦姆(David Halberstam)从越南发回报道,并且建议苏兹贝格把海伯斯坦姆调到其他地方;但是苏兹贝格立场坚定。^②当《纽约时报》如此关注自己的形象和独立地位时,而且当它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取决于其声望时,为什么还要刻意在政治上做文章呢?

但是仔细考察《纽约时报》1965年以来有关运动的报道模式,不禁让我对其范式转换的根源感到疑惑——这些转换最终无法通过对新闻实践的调整来改变。固然,我所记录的变化或许能够归因于报道风格的难以预测和多变,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这种可能性还是不能被忽略的,即“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纽约时报》报道中的形象从(a)严肃运动(波利奇,3月),到(b)中立的、徒劳的怪异行为(4月),再到(c)荒谬和威胁的混合,(贾菲,6月),最后到(d)毋庸置疑的威胁(10月),是《纽约时报》记者们对编辑职业、非正式、“自由的”的回应,同时也是约翰逊政府对越战争不断升级的反映,以及他们对无法预料的激进运动表现出的部分政治反应。

在1965年最初的4个月中,约翰逊政府对北越和南越持续的空战实行纵容政策,并且派出200,000人的陆军在南越登陆。现在我们知道,约翰逊总统采取了一些举措,以控制媒体对战争的报道;在后面的第三部分,我对此也进行了讨论和解释。约翰逊政府对阻止刚刚崭露头角的反战运动颇感兴趣,并且按照自己的

① Catledge, *My Life and The Times*, p. 264.

② David Halberstam, *The Making of a Quagmi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5), p. 268.

意图操纵媒体的报道，实现为自己服务的目的。约翰逊，同后来的尼克松一样，他们都十分清楚，任何有关战争的报道都已经超越了官方的模式，即使这些报道没有直接与官方模式发生抵触，它们也有可能煽动某一环节使战争的努力前功尽弃——那就是美国的民意。^①至少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任何对政府观点不加鉴别的报道，对政府发动战争来说都是危险的。为了使大量的美国远征军队和新的空战看起来更加“可靠”，约翰逊和尼克松都需要驯服和听话的民众，或者至少是让他们感到迷惑，从而不知不觉地接受。那么，反战运动的存在，便相当于对战争努力的政治破坏。1968年3月31日，当约翰逊放弃总统连任时，他承认自己从来没有错误地低估对手的潜力。

我们没有证据表明，约翰逊政府试图直接控制有关反战运动的新闻报道。但是反战运动的形象主要取决于战争的形象。关于如何处理运动的信息可以悄悄地、默默地、小心地传递，以作为对战争消息处理的推理。这里没有什么阴谋。在CBS的新闻报道中，例如，一个高级制片人向我解释说，反战运动和学生的激进主义通常被看作越南战争报道的一部分，或许白宫政府可能丝毫没有试图影响对于运动的处理。^②即使存在着这种企图，但也没有成功。我们确切知道的是，政府的确采取了某种策略来影响关于战争报道的观点。我们也知道，关于迷惑公众的西贡军事政策并非是由下级虚构的，而是由中央制定的。有一篇纪录证据的文章，其中一段是这样的：1965年4月6日，总统的特别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在回忆录中写道，在4月1日，约翰逊总统同意派遣18,000至20,000人的军队开赴越南。更重要的是，约翰逊总统同意，用邦迪的话来说就是，“部署在越南的海军可以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他们的使命不再是“静止防御（static defense）”而是“地面战争（ground combat）”。约翰逊为在越南的军事反攻行动做了第一次官方的、全面的障碍清除，同时邦迪写道：

① 在《The Time of Illusion》（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6）一书中，Jonathan Schell提出了管理形象的论述，尽管多少显得有些夸张。（Woodrow Wilson很少注意对战争日程，以及政府对美国在一战中的干涉行为进行的掩盖），Schell的观点还是和我比较一致的。例如：“当一个政府发现捍卫民族形象的全民行动时，就像美国在信用教义下的行为，随后任何内部异议都将被视为破坏国家安全……如果越南战争是国家形象的一方面，那么国内政治过程则是国家形象的本质……与利用公众的抗议相比，反对与公众相关的战争好在哪儿呢？反战运动总是由于它的‘戏剧性’而受到指责。事实上，正是它的戏剧性体现了其特殊的精神风貌。战争被当作戏剧——为各种观众制造的作品——而且反战运动是重复的戏剧，还是非常有效的……现在的事实是，国内的示威游行冲击了战争的目标基础。对于整个政策的基础可信度来说，堪称有力的一击。”

② 1976年11月16日对Russ Bensley的采访。他告诉我，为什么他会认为1976年的学生运动被低估了：因为它缺乏战争的把手（handle）。

总统希望……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不成熟的宣传。应当切合实际地尽快采取行动，但采取的方式应尽量避免政策上的突变……总统的愿望是，这些运动和变化应逐渐地并整体地与现有政策保持一致。^①

只有在约翰逊的战争计划中，才会出现对于海军“逐渐地”和“与现有政策保持一致”的命令的变化。但是高级政府官员们认同并坚持这种思路，并且大多数记者也是同样的反应。通常，官方不仅只有一种引导记者的办法。很明显，他们可以垄断信息，至少在较长的时间内。他们可以轻易地借助于“背景（background）”的介绍，保证记者不会泄露官方话语的出处。“背景”策略是宣传政府观点的绝妙手段——包括谎言、令人半信半疑的事实和策略性的省略——不必对公众考虑多少。不喜欢追根溯源的记者很容易依赖政府的观点，而喜欢收集信息的记者则会支吾、敷衍，并且回避。CBS的涉外记者马文·卡尔布（Marvin Kalb）回忆说，政府花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试图找到白宫、国务院以及国防部各自的发言人”，以表达他们对于麦克乔治·邦迪回忆录的态度。^②

大量证据表明，约翰逊政府总是对有关战争的性质和目的等问题向记者撒谎。^③ 更不容易被理解，或者与反战运动报道关系更为密切的是，政府的承诺总是表现为故意低估敌人的力量和行动。1965年，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曾担任约翰·麦克诺顿（John McNaughton）的特别助理以及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的高级助理。他回忆道，“边缘旅馆”（Brink Hotel）是美军在西贡的一个军营，1964年圣诞节那天被越共国际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NFL）放火烧毁。^④ 于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大使马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主张对北越进行报复性轰炸。但是，约翰逊总统还没有打算将战争升级。1965年2月，越共国家解放阵线（NFL）对波来古基地（Pleiku Base）又进行了小规模进攻。约翰逊政府采取了措施（当时媒体并没有对此加以反驳）来减少有关“边缘旅馆”遭到破坏的报道。根据埃尔斯伯格的观点，对于这个令人迷惑不解的做法，媒体的解释是，政府害怕引起潜藏在右翼势

① Memo NSAM328, Document 254 in The Pentagon Papers, Gravel Edition, Vol. 3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pp. 702 - 703.

② CBS 新闻特别报道的副本，“The Pentagon Papers: What They Mean” (broadcast Tuesday, July 13, 1971, 10:00 - 11:00 P. M.), p. 17. (c) 1971 CB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③ 参见 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William McGaffin and Erwin Knoll, Anything But the Truth (New York: Putnam's, 1968); and Ben H. Bagdikian, The Effete Conspi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④ 1977年3月2日对 Daniel Ellsberg 的采访。

力中麦卡锡主义分子的舆论。官方有关战事的“乐观”是对付公众的一种方式：如果通道的尽头仍有依稀的光线，政府绝不会因为未采取更极端的军事措施而遭到攻击——而在约翰逊政府看来，这些军事措施则是危险、没有必要的以及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减少越共国家解放阵线对美国军队的威胁，是马基雅维里式策略（Machiavellian strategy）的一部分。^①

更有趣的是，《纽约时报》的编辑们为避免过分同情地报道反战运动和过分批评地报道战争而寻找理由。据一位1966年至1968年供职于《纽约时报》记者说，编辑们拼命地避免留给右翼势力任何借口，以让它们指控报纸同情共产主义。^② 50年代，麦卡锡主义在《纽约时报》的吹捧下显得更了不起了。卡特利奇回忆道，1955年，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James Eastland）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就美国媒体中的共产主义举行了听证会。伊斯特兰召集了38个证人，其中25人来自《纽约时报》。在所有的人当中，有16个站在媒体一边；6个人承认曾是共产党员。卡特利奇的听证会表明，苏兹贝格“对共产主义的个人憎恶”同“对《纽约时报》雇员保护和呵护的感情”相抵触。《纽约时报》调查了所有遭到点名的前共产党员——《纽约时报》所谓的一次内部调查。用卡特利奇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有义务为报社的管理提供一份他们政治历史的详细记录。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确保管理部门和同事对他们的信任和信心。”在审问了所有的指控之后，《纽约时报》解雇了3个人，其中包括2个编辑和1个书评助理编辑——理由是“合作不善”。^③

十年之后，红色恐慌逐渐消退了；但是《纽约时报》的编辑对过分批评政府政策感到恐惧。那么，记者们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恐惧呢？像新闻的客观性和新闻价值一样，编辑的恐惧（用卡特利奇的话）“定下了一种基调（set a tone）”。而且，正如弗雷德·波利奇说的那样，被带上左翼标签的恐惧不必“用这么多话”来表达。

政府和《纽约时报》，换言之，担心反战运动会引起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应；担心事后会因“失去越南”而受到指责。几年之后，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

① 关于该问题更多的争论，参见 Ellsberg 的 *Papers on the Wa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2)，尤其是“The Quagmire Myth and the Stalemate Machine。”

② 1977年2月14日对 Lawrence M. Bensky 的采访。还可参考 Godfrey Hodgson, *America in Our Time*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76), pp. 374-375: 当 Edward Epstein 在那儿采访时，大多数制片人和 CBS 的新闻记者“都经历了麦卡锡时代，害怕暂时平静的右翼会对大多数沉睡的美国人感到愤怒。”

③ Catledge, *My Life and The Times*, pp. 225-236.

(Spiro Agnew) 使白宫陷入这样一个反对媒体“无能的谄媚者 (effete snobs)”的运动；尼克松下台后，媒体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的恐惧或许是服务于自身的，他们也非常现实。谁清楚 1965 年编辑报道的任务以及报道姿态是如何结合的呢？虽然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有关战争的新闻报道的确受到了操纵，但是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白宫蓄意并试图直接影响《纽约时报》对反战运动的处理。不过，看起来似乎更像是新左派运动首先奇怪地吸引了《纽约时报》。弗雷德·波利奇的处理方式填补了霸权政策形成前的空白。起初，报纸一直在尊重与贬低之间犹豫，后来“危险的”运动之类的主题在记者脑中“即刻 (spontaneously)”产生——在冷战意识的考验中，在编辑思路悄悄传递给编辑人员的过程中，在依赖于官方新闻来源的过程中。1965 年春，所有的这一切都随着约翰逊政府有关战争的政策戏剧性的转变而逐渐成形。对于新左派的霸权，《纽约时报》理解的转变仍然是相当模糊的。但毋庸置疑的是，(1)《纽约时报》报道的模式是不断地发生改变的；(2) 这种改变是与政府的政策一致的；(3) 这种改变和新左派确有关联，但又不能用新左派短时期内的变化来加以解释。

最后，这种模式的改变，仍然与社会中的一些现实相符合，不过并不是十分准确，只是作为被反映物的镜像，而且存在着对真相的扭曲。运动变得更为激进更为不满，并且越来越具有战斗性，它不断扩展。因此，记者把搜索到的所有无关痛痒的事情纷纷看作是激进和反帝国主义的标志，这种运动开始隐约呈现出一种狭隘而又短暂的现象。更确切地说，它是对主流制度所维护的核心原则的重大挑战。政府和《纽约时报》都怀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广泛地、深深地植根于对事情正确处理方式的设想之中，并且决定了对于运动的报道。他们害怕类似的大众运动，因为大众运动很难控制，并且会颠覆他们的权力和特权。特别是新左派，它打破了体面和专业的角色；威胁到统治者的特权，以及他们对于意识形态任何的辩解和论述；还对统治者鼓吹的有序和关爱的社会提出质疑。后来媒体才明白，统治者想拉拢运动的中间势力，为了防止罪恶、无止境的社会动乱出现（见第七章），反战运动开始摒弃美国体制的统治原则，并且试图和各个阶层结成联盟。



1965 年秋，媒体聚焦下的 SDS

半黑暗中的 SDS

1965 年，从夏季一直到冬季，反战运动发展到了全国范围，同时也表现得更为激进与多样化。八月份，一群组织松散的民权与和平积极分子组织了无代理人集会（Assembly of unrepresented People），在国会前举行了旨在呼唤和平的示威游行，他们表示：如果国会无法结束战争，那么游行队伍将冲进议院，将 4 月 17 日游行没有完成的军事行动进行到底。随后，反战运动中出现了两大焦点：其一是 10 月 15 日和 16 日举行的第一次关于国际抗议日（International Days of pretest）的全国统一行动；另外一个则是在这之后，11 月 27 日由安全核政策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a Sane Nuclear, SANE）组织的华盛顿游行。

对于这些事件，“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仅仅是间接地参与其中。尽管正在开始为国际抗议日而努力工作的新越南日委员会（Vietnam Day Committee，成立于伯克利）对其抱有很大希望，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并未在六月份召开的卡瓦登（Kewadin）会议上形成任何反战组织程序。在卡瓦登，无论当时的形势是如何紧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领导层都极不情愿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变成一个主旨单一的组织。越南日委会与学生们关注的问题和兴致丝毫没有相同之处，而且对一场狭隘的反战运动的现实前景丧失了信心。潜意识中，它惧怕“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战时将自己推向和平运动领导者的位置会危及到其安全。因此，尽管新当选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主席卡尔·奥格斯比（Carl Oglesby）和其他“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积极分子参加了无代理人集会的活动，但是并没有得到认可，甚至遭到拒绝。“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外的玩世不恭者对此加以嘲弄，并含糊地称其为无代理人国会，更加突出了该集会以武力推翻政府的意图。最后，关于内部冲突的所有问题，都被媒体报道的

大量图片所掩盖。其中有一张是关于组织者斯托顿·林德、戴夫·德林杰 (Dave Dellinger) 和鲍勃·帕里斯的, 他们的身上被一名右翼破坏分子泼上了红色颜料, 仿佛是一副宣扬英雄主义战场形象的彩色图画。^①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领导新生反战运动表现出的无能, 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真空, 马上被新成立的“结束越战国家协调委员会”(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to End the War in Vietnam, NCCEWV) 所填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许多分会都制定了各自的地方反战计划, 并与 NCCEWV 挂钩, 其国家协调办公室设在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但是在 10 月份的国际抗议日期间, 热衷于披露和调查的媒体却把一个前后不一、充满困惑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推向了众人关注的中心; 顿时,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因其行动与政治现实的巨大反差而声名在外。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本身瞬间的上升作为宣传对象来研究, 并通过考察“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媒体聚焦下所采用的工作技巧, 有助于理解媒体对一场反对派运动, 辩证地说, 对运动反应的本质及局限。因为这一系列的事件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推上了一个新的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地位。这样的危急时刻和直接压力通常建立并预示着政治场势的转变、新的关系模式、新的认知结构以及立足于政治世界新的机遇的出现, 因此特别值得关注。在这场运动与媒体共同的表演中, 它们为公众创造了新的机会——所有这一切的结局都将随着这种表演和政治形势而发生改变。

整个夏天, 正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处于蛰伏状态的时候, 战争规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反战运动也相应的增加了强度。AUP 就是标志之一; 与此同时, 在伯克利和奥克兰, 越南日委员会 (Vietnam Day Committee, VDC) 试图阻挡运送参战军队的火车, 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现在更倾向于将军事力量的增加与政治极端主义联系起来。当然, 这一日益增加的军事力量并不是《纽约时报》所杜撰的, 但它却强调这种力量是从逐步升级的战争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这样, 10 月 4 日,^② 一则题为“更多的学生开始反对越南政策”的新闻报道, 结果却成了对伯克利警察局局长讲话的一次

① 关于 the Assembly of Unrepresented People, 参看 Kirkpatrick Sale 的 SD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pp. 219-221 以及刊登在 Liberation 第 10 期 (1965 年六至七月) 上的辩论, 特别是 Staughton Lynd 的 “Coalition Politics or Nonviolent Revolution”。

② 实际上, 这是一条《纽约时报》通讯社的新闻。从 9 月 17 日直到 10 月 10 日, 《纽约时报》的工人举行了罢工, 并且报纸一度也暂时停止了出版; 但是, 通讯社仍在工作, 为报业辛迪加、国际版和《纽约日报》纽约电台提供新闻。

陈述。这次讲话是伯克利警察局局长在国际警察局长协会召开的迈阿密海滨会议上发表的，其中把“去年的学生动乱”描述为“革命运动”，并且警告说“致力于发扬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个人”可能正在利用“青年的焦躁与不安”。在报道中，“动乱”一词并没有因为使用了引号而得以中性化，它是以一种客观描述的方式加以呈现出来的。

该报道表明了《纽约时报》处理反战报道的又一个新要素，即对政府官员及其他权威人士声明的依赖。^①通常，新闻要平衡正反两面的观点以实现其客观性，《纽约时报》几乎没有去关注反战或新左派的呼声，即便报道主题就是新左派运动本身的时候。在十月份的头两个星期——也就是说，包括国际抗议日前夕——《纽约时报》刊登了七篇涉及到学生反战运动的报道，其中有四篇完整地报道了来自权威人士相互对立的评述。这些权威人士包括：两名大学校长（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克尔和耶鲁大学的布鲁斯特）、上文提到的警察局局长以及美国的司法部部长，这样产生的效果便是学生在制造运动而权威人士在思索。

第五篇报道是“伯克利大学全体人员抗议美国对越政策（Berkeley Faculty Group Protests U. S. Policy in Vietnam）”，这篇报道的开篇就提到了“一个自称为大学教师和平委员会的群体”（Faculty Peace Committee）（我将在下文解释是如何使用引号来使左派变得非法的）。第六篇报道是关于一次小规模反战运动的天折，标题是“一个越南抗议胎死腹中（A Vietnam Protest Dies in Planning Stage）”。该报道将一名反战组织者对失败惭愧的供认，同一名支持战争的学生的胜利宣言进行了对比，实现了形式上的平衡。

在这两周期间，对于国际抗议日活动，媒体并没有事先从组织者或发起者的角度进行预先的报道。

事实上，仅有一篇报道提到了这些计划。该报道刊登在了10月11日《纽约时报》的第7版上，是海湾地区首席通讯记者华莱士·特纳（Wallace Turner）写

① 通常而言，报纸对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的依赖是有据可依的。Leon V. Sigal 在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of Newsmaking*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73), p. 124 中提出，在 1949-1969 年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所有的报道，46.5% 来自于美政府官员或机构。仅在《纽约时报》上刊登的正式报道，就有 42.3% 来自于美政府官员或机构，而且《纽约时报》对政府信息的利用率从 1949 年的 38.8% 上升到了 1969 年的 47.9% (p. 128)。1969 年，在对圣巴拉石油泄露事件做了调查之后，Harvey Molotch 和 Marilyn Lester 发现：“联邦行政部门，包括它的下属及指定机构，明显拥有对报纸的接近权。”（“Accidental News: The Great Oil Spill as Local Occurrence and National Ev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eptember 1975]: 244）

的，其中不乏大肆的贬低和诽谤。特纳提到了日益迫近的“和平游行示威”，这是仅有的一个用引号表明其客观性的词组。他费尽心思的保证越南日委员会中的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是“以前的学生（former students）”——这对于伯克利行政官员来讲意义重大，但对学生或是国家政治却没有什么意思。他声称“伯克利的学生看上去兴趣十足却并不怎么投入”——在周五盛大的游行之后，再也没有听到过此类声明。关于新近成立的大学教师和平委员会，他这样写道：“有关人士认为，它为大学教师提供了一个令人仰慕并可以加入的组织。”其中，没有提及这些“有关人士”的姓名（引用不知名姓的“人士”或“专家”的言论，是记者引用自己的观点或是其他记者、官员观点的惯用手法）。在贬低了大学教师和平委员会之后，特纳又解释说，基于夏秋之际进行的“积极分子谈判”，越南日委员会讨得了个“坏名声”，这两个组织都很直接地拒绝采访。这篇文章剩下的部分，继续就这两个组织之间可疑的边缘性进行了阐述。“没人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藉此指责大学行政人员的问题”，新的校园政治行为规则是自由放任的（言外之意，只有最不正常的人才会抱怨）。最后，他用数字表示了抗议：“越南日委员会的出席率令董事会大失所望：

上周，大学教师和平委员会吸收了一年中规模最多的人群，高峰期大约为600人。伯克利大学总入学人数约为27,000人，因此这600人仅代表了学生群体的不到3%的数量，前提是假如这600人都是学生的话。可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学生。

特纳没有继续将集会的规模与任何其他政治集会加以比较，在这个单一的图景中，政治比例或过程是毫无意义的。特纳引用游行组织者的话，只是为了提示“示威游行极有可能在三个铁幕国家举行”，并且在第七段中提到了其他几个期望发生示威游行的美国城市。

就这样，《纽约时报》令它的读者对10月15日和16日的示威游行做好了准备。

在整个9月份期间，美国有线电视网仅仅播出了一条关于反战活动的报道——9月22日关于反征兵示威游行的报道，该报道不到两分钟。但是，聚光灯又一次点亮了，预示着新的示威浪潮即将到来。在10月份的第二个星期，CBS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对反征兵运动的报道上。在随后的一周内，司法部部长卡曾巴赫（Katzenbach）和约翰逊总统要求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展开调查，《纽约时报》也连续六天在头版刊登了有关反战示威游行和官方态度的

报道。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了头版新闻，要领会其中所蕴含的讽刺意味，我们须稍加回顾，了解其中的一些细节，首先应当了解一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那几周中的活动，然后再看一下媒体形象和政府操纵的具体顺序。

正如我所说过的，由于缺乏一个连贯的反战纲领——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纲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步履蹒跚地步入了秋季。显然，该组织并不想领导反战运动，并不想使多元主题的普遍性被反战的具体性所代替。克拉克·基辛格“敢死队计划”假想的风险和困难，只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逃避职责的另一面：“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正以没有任何纲领为由而逃避责任，在4月17日仓促的游行之后，没有人知道该做些什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失败正是领导群体丧失凝聚力和自信心的后果，第一代精英已经陷入困境。那些致力于以大学为基地进行组织活动的骨干，不愿或没有能力制订一个新的反战纲领，他们对开展有效反战活动的可能性感到绝望，并且倾向于把反战事宜留给那些经验不足或者孤立的组织者去处理。（在贝克特的小说中，卡尔·奥格斯比选取了一段引言，一个人在临终之时仍急切寻找治病的良方，以此作为外交政策专题讨论会的题词，我对此十分赞同。）这些精英中的其他人——包括许多最有经验和技巧的组织者——都致力于在下层阶级中就国内事务组织工作。到卡瓦登会议召开之时，能量都被投入到了对个人事件的报道上，这即是“元老派（Old Guard）”无常易变的起因和结果。对新加入的年青成员所产生的分裂和迷惑，以及将他们引入正轨和约束机制的匮乏，使得最初的精英们开始让位了，甚至连他们的规章制度也开始有所瓦解。经过地方官员的准许，安·阿伯（Ann Arbor）的国家经济调查和行动规划项目的职员决定放弃他们的工作，转而加入芝加哥参与（Chicago Join）计划。安·阿伯的和平调查与教育规划办公室，虽然曾在发起调查及筹划曼哈顿游行和华盛顿进军中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也难逃被关闭的厄运，只留下空宅一座。

为了履行对学生组织的义务，原来的一些精英（“安·阿伯”或是被人们称作元老派的）决定推选——亦或是贡献出——他们中的一员保罗·布思（Paul Booth），担任下一年的总书记。当时，在大会前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极不情愿的布思搜集了一些东西来反对针对自己的“提名”，他试图把自己与地方主义者的观点结合起来：

我认为，我们想要把我这样的国民变得区域化和地方化，并把新一代地方

——区域化的人变成国家性的人民。我想要被地方化。所以，帕顿，布雷彻（分别来自德克萨斯和俄勒冈的大学组织者）将是合适的人选。那种认为我联系广泛的观点只是自我失败综合症的一部分，——中产阶级的人们通常都是如此。还是来点新鲜血液吧！^①

整个会议充满了地方主义和反权威主义（anti-authoritarian）精神。会上还提出了一条既严肃又颇受欢迎的建议——撤消主席和副主席职务。^② 元老派和草原力量（Prairie Power）都对即将成立的团体领导权提出了质疑。

结果之一就是：由于缺少一个能胜任的领导层，全国办公室（National Office）步履维艰地渡过了整个夏天。代理总书记几乎没有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工作的经验，更不用说如何来管理了。^③ 这个反官僚主义的行政系统无法提出一个明确的纲领并展开宣传，仅仅能够做到处理该组织最基本的事务——保持联系并散发成员卡。虽然一些经验不足的工作人员的确发出过一则包含反战工作计划的通讯，其中包括由作者和迈克·洛克（Mike Locker）提出的一项关于反征兵运动的建议，但这丝毫没有引起该涣散组织的关注，也没能得到它的支持。正是在这样一个杂乱无章、停滞萧条的组织结构中，保罗·布思被劝说搬入了芝加哥，成为了新一任的总书记。之后，在九月份，全国办公室似乎才开始以连贯的方式运作。现在，它必须该做点什么了。

九月份召开的国家议会（National Council）会议授权全国办公室于十一月份召开会员大会，以讨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政治策略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反共产主义政策、全国联盟对“地方暴动”、展望民主社会等类似的问题。在一些元老派的要求下，组织将重新启用第一政策。或许谈论政治目标将恢复常规政治文化，而这种文化早在元老派从学生组织中溜走以及草原力量渗透进“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时瓦解了。然而，国家议会提出的反战运动的建议缺乏条理与逻辑。^④ 由于无法构建自己的纲领，会议最终认可了即将到来的10月15日和16日的国际抗议日活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最终还决定要“深化/激化（deepening/radicalizing）校园选民”，它敦促地方分会在地方上自由开展反对

① 1965年5月29日 Paul Booth 写给 Todd Gitlin 的信。

② 该建议于10月份提交成员大会进行复决投票。当 Evans 和 Novak, Katzenbach 以及 Stennis 发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秘密计划时，“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正在投票选举，决定是否要减少一部分形式上的领导和公共代表。这次投票最终以失败告终。

③ 详见 Sale 的 SDS pp. 217 - 222.

④ 同上，pp. 226 - 227

征兵工作，并且指导全国办公室制定一个征兵建议纲领（同样是自由的）来“动员已达参军年龄者反对战争”——该纲领将在生效之前，递交给会员大会进行投票选举。十月初，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指示的响应下，全国办公室提出了要求会员遵守的一套合法的反征兵纲领，包括：（1）大规模建立忠实反对者的档案；（2）组织反对义务兵役体系（Selective Service System）关于把男性学生划分等级，以确定征兵优先权的新体系（几乎获得了所有大学的一致认同）；（3）与新兵和后备军官训练队（ROTC）官员展开辩论，并举行示威游行；（4）揭发地方征兵委员会中阶级局限的成分及不公正行为。^① 指示中的复决投票即将就绪。在10月15日和16日之前的几天里，布思对分会领导者没有什么可交待的，除了以下这条常规性的通告之外：

据我们了解，大约有四十个分会为10月15日-16日的示威做出了具体计划。看起来，这将会是一个重大事件，可以把反战运动重新带入公众关注的中心。^②

简而言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正在半黑暗中艰难探索，并没有期望得到任何关注。

聚光灯的开启

然而，聚光灯还是又一次开启了，预示着10月15日和16日将出现大批的示威者。尽管《纽约时报》多半忽略了即将举行的示威游行，但其他媒体和机构对此却颇感兴趣。

10月11日星期一和10月12日星期二，CBS晚间新闻播出了两条关于反战活动的专题报道。素材是由现场的斯坦诺普·古尔德（Stanhope Gould）提供的，他年纪不大，留着长发，性格急躁，创作力强，曾于1964年在克朗凯特的节目工作过。对古尔德而言，一旦遇到一个最新的消息，他就能马上辨认出来。对他来说，这时候的新闻判断是显而易见的：“此时，对征兵的政治抵抗趋于明朗。”按照惯例，古尔德得到了上司——负责所有专题报道的制片人拉斯·本斯利（Russ Bensley）的许可，这则反征兵报道将成为“令人瞩目的新闻”。古尔德回忆说，他总是建议“发表引人注目的新闻，”而不会关心像“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

① 同上，pp. 227 - 228

② SDS Work List Mailing, No. 22, October 12, 1965.

是一个激进组织这种无聊的话题。比如，假如“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在大学校园里，就有人会立刻反应说，“什么，那群傻瓜在大学校园里？”^① 古尔德想激起公众的愤怒，他认为凡是对公众的冷漠形成冲击的东西，都会引起“合乎情理 (reasoned)”的愤怒。古尔德认为，这样夸张华丽的选择并不会同 CBS 的新闻产生矛盾，因为根本没有人对此进行过讨论，更不用说提出挑战了。“一条戏剧性的新闻就是激动人心的新闻，你想知道弗莱德·弗莱德利（当时 CBS 的总裁）称为‘腹中之火’的感人事情吗？你知道人们并不像读报或看电影那样专心致志地看电视吗？我们担心观众会转移注意力，CBS 的每一个人都在寻找那种激动人心的新闻。”^② 从这一点来看，反对征兵的新闻将会是一条好新闻，仅仅因为它与观众的初衷大相径庭。

本斯利刚刚批准报道反征兵活动，纽约新闻办事处马上就指定了资深通讯记者亚历山大·肯德里克 (Alexander Kendrick) 从事这项工作。像往常一样，问题的选取、采访的开展、报道的写作都是由记者完成的。当然，也会有来自工作群体上上下下的建议：CBS 的记者和制片人都坚持认为新闻的生产过程——策划、拍摄、编辑——从头到尾都需要合作。然而，我的观察证明：该过程存在着太多的集体主义，足以压制任何想要在这种有序的决策制定‘结构中’，为某一个体的特殊贡献寻找位置的尝试。”^③ 但是，正如五月份肯德里克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报道中所写的一样，这或许与“当我采访那些烧毁征兵卡的人时，我对他们怀有同情”不无关系。肯德里克认为，他的同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他所问的问题异常尖锐；并且他的提问是有序的，而非不连贯的，由一个突然转入另一个。^④

① 1976 年 11 月 13 日对 Stanhope Gould 的采访。

② 1977 年 4 月 5 日对 Stanhope Gould 的电话采访。

③ 在对 Edward J. Epstein 的 *News from Nowhere* (Stanhope Gould, "The Trials of Network News," *More 3* [May 1973]: 8-11) 进行评论时，Gould 本人认为编辑的过程是具有流动性的。当然，专题报道由于不会受到最后截稿时间的限制，要比一则硬新闻更容易受到蓄意支配的影响。实际上，1972 年 Gould 曾对水门事件做过专题报道，不过由于该报道的第一部分激怒了政府，因此 CBS 直接删掉了该报道的第二部分。不久以后，Gould 离开了 CBS，开始管理 NBC 调查小组，后来又成为 ABC 的新闻制片人。（关于水门事件，请参阅 Daniel Gates 的 *Air Time: The Inside Story of CBS New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8], pp. 303-306; 以及 David Halberstam 的 *The Powers That B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pp. 652-663.）

④ 1977 年 1 月 3 日 Alexander Kendrick 致作者的信。

10月11日和12日专题报道的节目并没被保存下来供人们研究,^①不过,古尔德仍然记得一个有关哥伦比亚大学反抗者的片段。他认为这将会吸引一大批的中产阶级观众,他们倾向于把逃避兵役与下等社会的人们联系起来。有这么一组连续镜头,展示了一名征兵顾问正在教奥尔特内特大学(Alternate University)的学生们如何就同性恋问题展开调查,并删去调查结果。这则新闻是在菲尔·奥克斯(Phil Ochs)的欢闹说教的歌曲“逃避兵役拉格调(Draft Dodger Rag)”中开始并结束的。

为了象征性的选择,古尔德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展开了斗争。实际上,他已抢先发表了关于反战运动的报道,并将其界定为CBS新闻报道的合法主题;并且像任何身处权利走廊之外、抢先发表新闻的优秀记者一样,他已经对原始资料提供者和他们的新闻敏感形成了一定的紧张感。古尔德回忆说,“为了实现较强的冲击力,我倾向于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描绘成一种完全统一的组织”,明确地致力于组织抵抗征兵运动。他承认,他对展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细微之处并不怎么感兴趣。细微与精致并不适合电视媒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无论有没有“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都会有相当数量的年轻人不愿意参军。^②他与布思形成了冲突,布思想要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政治策略加以详尽阐述;古尔德却认为,“你可以只通过一个象征性的观点来获取人们的关注”。^③在这场较量中,布思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复杂性的忠诚,根本无法与CBS的运作匹配。而且,这还被当作重要的新闻播出。第一条新闻在克朗凯特的节目上播出了长达六分钟的时间,第二条也超过了五分钟。按照电视新闻的标准,这已经算是鸿篇巨制了。

对于这则报道而言,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斯坦诺普·古尔德和亚历山大·肯德里克的个人作品,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组织程序预料之中的事情呢?古尔德认为,更像是他自己,而不是其他制片人完成了这一新闻,是他开辟了报道运动的

① 在CBS的新闻节目档案中,没有资料的记录或者是录音文件。显然,没有一个人认为它们具有保存价值。即便是能够保存下来,也会被掩埋在资料堆里,要想对其进行研究,就必须购买节目的拷贝。因此,虽然反征兵运动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但关于它的报道仅存在于人们的记忆和政治影响中。但就我对Gould和Kendrick以及Bensley的风格和工作的感觉,我十分相信自己能够重新再现当时的报道和具体的过程。虽然我证实了我的结论,但它们仍然是结论。至于CBS的文档资料,请详见附录部分。

② 1977年4月5日对Stanhope Gould的电话采访;及1979年4月16日Gould在加州大学(California University)的演讲。

③ 1976年11月13日对Stanhope Gould的采访。

“道路”。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芝加哥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办公室“蹲点”，把自己融入到这个运动的世界中去，去寻找新闻题材（后来，正是在那里，他听说了反对征兵者正在向加拿大寻求避难所，率先发表了关于这些新流亡者的新闻报道。几年当中，他总共完成了七至九篇反征兵运动的报道）。他与保罗·布思关系密切，并且他对这场运动的观点“被事件本身所影响”，“我富有同情心，我还没有老到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实际上，古尔德仍记得，那则新闻刚刚播出，在编辑部里，“我就被指责为反征兵运动的‘蓝繁缕（Scarlet Pimpernel）’”（蓝繁缕是一种略带蓝紫色的花，形状颇似樱花。蓝繁缕因为非常的娇弱，所以娇弱这两个字就成了它的花语。这里是指古尔德对运动抱有的同情态度——译者注）。CBS一位头衔较低的新闻工作人员回忆，那时，古尔德“被认为是一个‘左派分子’和‘制造麻烦的人’”。1972年，总统竞选期间，蒂莫西·克罗斯（Timothy Crouse）称他为“挑衅的嬉皮派（defiantly hip）”。^①至于对肯德里克所持的个人同情，我们也早已有所了解。

因此，连同他的新闻敏感，古尔德的个人爱好帮助他提出了报道征兵题材的建议。他是如何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建议者的位置上的呢？当我们了解了CBS的常规组织程序和法规以后，这个关于他在其运作中的地位之谜也就迎刃而解了。正如副主席阿格纽后来所竭力宣扬的那样，并非CBS总经理弗莱德·弗莱德利（以及随后的里查德·萨伦特）或是主席威廉·佩利皆为“喋喋不休的怀疑者”的缘故，而是古尔德的同情心与优秀的电视新闻报道的界定所吻合。上文提到的那位工作人员指出，古尔德“不仅拥有政治头脑，而且有能力（比如说，称职）、忠实可靠”。^②只要他坚持新闻价值的常规设想，只要他视组织的需要为自己的需要，他的杰出创造力就无法充分展现。无论是不是挑衅的“嬉皮派”，CBS都将反征兵题材的报道作为重要新闻，他们为古尔德创造了这样的机会。但是，一旦这个组织决定要做这个新闻的时候，古尔德的个人兴趣和同情心就在最终的拍摄过程中变得无足轻重了。用古尔德的话来说就是：“一旦提供了参数（parameters）和约束，制作出的一切都是意料之中。你将会制作出一条同质性的（homogenized）新闻。”^③

① Timothy Crouse, *The Boys on the Bu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p. 172. 关于Gould的更多情况，见Gates的*Air Time*, pp. 188-189.

② 1976年11月28日对Michael Nolan的采访。

③ 在新闻报道中，关于个人观点不相关性的简要讨论，请参阅Edward J. Epstein的*Between Fact and Fic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5), pp. 199-201.

古尔德对新闻的判断力是无可挑剔的，这则“令人瞩目的新闻”吸引了并首先吸引了右派的注意。

10月14日，星期四，主要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华盛顿邮报》撰稿的报业辛迪加专栏作家罗兰·埃文斯（Rowland Evans）和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谴责“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的“逃避兵役”运动。他们是如何杜撰出这条骇人听闻的报道的呢？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八月份的越南时事通讯中，埃文斯和诺瓦克选取了一些带有危机性质的建议，以此证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存在着一个“蓄意的、非法的万能计划”来破坏战争的努力，^①而这些计划早在九月份就已经被国家议会明确否决了。按照惯例，埃文斯和诺瓦克没有通过要求“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就他们的报道做出证实或否定的回答，或者要求做出任何评价来保证他们揭发的力度。全国办公室应该已经告诉过他们，“万能计划”并不存在。或许非常遗憾，准确地说，“万能计划”在任何事件中都不存在。

埃文斯和诺瓦克又在习惯性地发起一场声势更大的右翼运动。前一天，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议员托马斯·多德（Thomas Dodd）发表了关于反战运动的报道，他断言：

对反战运动的控制权已经很显然地从温和派转到了共产主义分子和极端分子手中，他们公开对越共表示同情并公然反对美国。……定于10月15日和16日的全国反战运动更加说明了这一点。^②

现在，大多数新闻媒体开始进一步夸大来自右派的攻击了。在去年春天，报道就提及运动的威胁，现在则成为媒体重要的报道主题。

这就是戏剧性报道的要素。记住，新闻报道的传统叙事结构强调戏剧冲突（情节剧更是如此）。在反战左派的动员与支持战争的右派反击之间，媒体对冲突的一贯兴趣寻找到一个“新闻线索（news peg）”一个“把手（handle）”。政治上的分化分别为左派的古尔德和右派的诺瓦克提供了很好的素材。背道而驰的两个极端建立起了一种平衡，新闻工作者通常将其与“真实的拷贝（good story）”相提并论。

CBS反对征兵的新闻开始并不怎么受欢迎，对平面媒体报道的工作者来说，

① Sale, SDS, p. 229. Evand 和 Novak 两个人，肯定有一个知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工作日程，要么是能够自由出入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全国办公室。不难想像，这是中情局或者参议员 Dodd 告诉他们的。

② 同上，p. 228.

电视网的新闻报道并不显得十分急迫，它们更多的是在一天中的晚些时候，通过电视来唤起那些赶在晚上截稿时间之前完成第二天报纸的记者们的兴趣。^① 但就在埃文斯和诺瓦克专栏文章被刊登的那一天，一名《芝加哥太阳时报》的记者阿特·派塔克（Art Petacque）邀请保罗·布思到报社办公室并对其进行了采访，大概是为了回应多德的猛烈抨击（尽管布思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为了反驳埃文斯和诺瓦克关于一个反征兵“万能计划”的言论，保罗·布思为派塔克提供了一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全民投票提案原稿的复印件。第二天，10月15日，星期五，派塔克的报道占据了报纸的头版，标题是粗体字的“美国——大规模的反征兵攻势”。布思后来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工作的日程表上说，这条报道“在口吻和细节上都是准确的，只是稍微淡化了纲领的战争背景”。^② 在未获得“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官方批准的情况下，这篇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准纲领的详尽报道就通过合众社传发了出来。

对媒体关注的充分利用

布思及国家行政委员会（元老派在领导）现在决定：强有力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在接下来繁忙的日子里，在抗议日活动和政府的公开谴责下，他们在芝加哥和华盛顿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散发了印有修订之后的反征兵纲领的新闻稿，并向一大批记者发表了讲话。“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最初并未打算寻求公众的关注，然而，既然已经得到了意料之外的东西，“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负责人决定对其进行充分利用。关于当时普遍流行的意见，布思写道：“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就是我们必须不断地发表反战言论，尽可能充分利用现在拥有的公众对于我们的关注。”^③ 此外，有一篇文章也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策略做了更为详尽的说明，这篇文章是由国家行政委员会成员里查德·罗斯坦（Richard Rothstein）和杰夫·希罗（Jeff Shero）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10月份的简报撰写的。罗斯坦，纽约人，元老派成员；希罗，一个与草原力量有着联系的得克萨斯人。以往，对于全国办公室应该做多少，以及其组织应当多么严密等问题，他们经常持有不同意见；但是现在，由于媒体的关注，他们有机会在一起合作：

① 1977年9月15日 Paul Booth 致作者的信；Sale, SDS, p. 230.

② SDS Work List Mailing, No. 23, October 22, 1965.

③ 同上。

首先，我们这些全国办公室成员认为，公众的关注是反战获得的最好机遇。我们看到，在揭丑丑闻的掩盖下，反战传单被直接印在了报纸的头版，发行量达数以百万。用油印机花数十年时间影响到的人，甚至无法同报纸在五天内影响到的人相比。

甚至连对我们的攻击，都是一个对反战声明做出回应的机会。重要的是，永远都不要让批评家们讨论我们对于诸如共产主义分子应该怎样、越南对游行的反应、烧毁征兵卡是否明智等问题的意见。问题是战争，我们不容许任何人忘记这一点。今天，当布思在华盛顿被问到有关烧毁征兵卡的问题时，他在国家电台回答说，与烧毁越南的村庄相比，这个问题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卡曾巴赫攻击“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时（见下文），我们在芝加哥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来“回约约翰逊”。大批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来到现场。我们说，LBJ不会妨碍我们的反战纲领，然后用了一个小时来讨论战争问题：民族自治、右翼独裁者、政府谎言等等。简而言之，任何一次对手对我们的攻击，都可以在对一开始的攻击做出回应的巧妙掩护下，被我们当作一次展开战争攻击的机会……

在高度兴奋中，他们又提及宣传过程中所蕴含的讽刺：

所有的报道似乎都在暗示：在过去几天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队伍不断奇迹般地壮大。我们在大学校园的知名度，似乎已吸引了大批学生加入其中。我们的哈佛大学组织者汇报说：在第一次报道的那天，他带着30份登记卡走入了哈佛校园，半小时后就不得不回来取更多的登记卡，他并不是在撒谎。我们又加入了50名新成员。

鉴于这一点，我们认为，这时候应当被看作一个吸收新成员的重要时期……^①

事实正是如此，一千名成员加入了全国办公室，使得全国成员人数扩展至4,000人以上：一些工作人员估计，在那几周当中，分会成员的人数增长了一倍，超过了10,000人。^②全国办公室工作人员认为，这种意外获得的公众注意只会带来好处。就像一位前办公室人员告诉我的那样：“当然，这种宣传是怀有敌意的，但它就像P. T. 巴纳姆（P. T. Barnum）的那句名言一样——‘我不在乎他们怎样谈论我，只要他们别把名字搞错就可以’……有人说你糟糕就意味着会

^① SDS Bulletin, Vol. 4, 1965年10月，封面内页，原文中有所强调。（这一期邮寄得非常匆忙，为了给Rothstein-Shero的备忘录让出地方，不得不删掉了其他一些内容，甚至连期刊号都没有。）

^② Sale, SDS, pp. 231-232

有其他人说‘如果他们说你糟糕，那你一定非常优秀’”。^①

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边缘群体被排除在紧急关头、备受瞩目的决议之外，他们感到不安，甚至愤怒。因为公众的力量正极力歪曲组织的薄弱之处。如果说对媒体的接近是力量的源泉，那么它也是引起战争的根源。既然大众传媒所塑造的形象已无可奈何地成为了一种政治策略，那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又是哪些人想要控制它呢？结果又将是如何呢？在第四章中，我们将看到这种冲突是怎样摧毁了一个毫无准备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并带来了怎样严重的后果。

媒体，右派和政府

对于那些在这场左派的内部斗争中奋战的人们来说，利害关系通常是全局性的。他们为了获得对一个知名对象，一个有着巨大价值、易于管理的组织的控制权而战，该组织似乎令世界上其他一切的组织都黯然失色。这些奋战者目光短浅，时常忘记他们的行为所蕴含的政府含义——他们之间的党派纷争对政治敌人政策的影响。媒体也像运动派别那样偏狭，但有其独特的原因——他们对客观性的空想、对自治的信仰以及对自己的报道所产生后果的不确定性，使他们无法认识到他们行动的含意。意识形态和专业规范防止了这两个群体被他们自己行为的政治后果所迷惑、僵化或击败；他们的工作惯例允许他们有条不紊地计划行动步骤和处理信息。这样，1965年秋天，迫于形势，运动和媒体的相互作用使国家压制的力量活跃了起来。

政治上的右派首先被“抓住了”注意力。密西西比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参议院军队服役委员会的关键人物，很快利用了CBS对反征兵运动轰炸性的报道。10月16日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则美联社的电讯，标题是“斯坦尼斯攻击反征兵运动为‘阴谋活动’：参议员表示，尝试阻碍就是违反联邦法案，”其内容如下：

华盛顿，10月15日（联合通讯社）——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今天号召政府把反征兵运动“连根拔起并碾成碎片”。

这位密西西比参议员对参议院说，这场鼓励并指导青年逃避兵役的“没有根据、不光彩的运动”，相当于一场“非法的阴谋活动”。CBS对“学生争取民主社

^① 1977年1月19日对James Russell的采访。

会组织”破坏义务兵役制活动的报道相当于“对联邦法律的触犯，应当受到罚款或监禁的处罚”。

该参议员是参议院战备状态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说他确信 CBS 播出的节目，是诚心诚意地想要唤起公众对他称之为“那些对义务、荣誉或他们祖国没有丝毫敬意的人们可悲的、可耻的活动的注意”。

但他又说道，这种“全国范围播出的电视纪录片，大大地鼓舞和刺激了他们在这场没有根据、不光彩的运动继续下去”。^①

参议员斯坦尼斯说：“形势紧迫，立即行动起来，在这场运动还没来得及蔓延之前，把它连根拔起并碾成碎片。”

他说 CBS 播出了对一些有关大学教育的直接采访，其中包括告诉美国的青年人如何逃避兵役的。

这些纪录片，说明了运动领导者试图通过组织上的努力来宣扬这样一种哲学，即“每一个美国人都无权拒绝参加任何一个他不赞成的战争或军事行动”。

这位参议员后来对一名记者说，他没有让他的小组委员会展开调查，因为“更大程度而言，这是司法部的事情……”

这篇文章刊登后的第二天，记者一直在询问司法部部长卡曾巴赫，应当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阴谋活动”采取何种措施（见下文）。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部分媒体由于种种原因对抵抗征兵运动的题材进行了发掘，并将其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联系在一起；现在这种表面上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有关征兵的各种事件变成了经过证实的“报道”；一个由错误假设和散乱事实组成的间接组织结构。右派政客将这则也许不容更改的新闻为己所用，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把政府推向了斗志昂扬的攻势，并使运动匆忙之中陷入了守势。在此期间，媒体还继续揭发运动丑闻，好像丑闻就是这场运动而不是战争。现在，这则“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征兵的报道已经跟 10 月 15 日和 16 日的游行示威的报道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组织框架。

《纽约时报》从 10 月 16 日到 21 日所有的头版新闻，以及 CBS 10 月 18 日星期一几乎所有的晚间新闻节目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其中有些报道是严肃而且直接的，但更多的还是沿袭了春季使用的那种非难式框架（deprecatory framing）。在报

^① 制片人 Stanhope Gould 承认，参议员 Stennis 确实准确地掌握了常规报道与言过其实之间的联系（电话采访，1977 年 4 月 5 日）

道示威游行时,《纽约时报》和 CBS^① 都强调了暴力、示威游行和政府声明。例如,在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那则关于10月16日国际抗议日的新闻综述中,《纽约时报》将所有四十二段文字中的三分之一都用在了对反示威游行和政府声明的报道上。相反,在第二页美联社对参议员斯坦尼斯抨击言论的报道中,就没有来自“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声明与之形成平衡。在播出那些事先录制完成的政治新闻时,存在着这样一种惯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不是一个被证实了的“另类观点(other opinion)”。那一周,在《纽约时报》对反战运动的报道中,有四分之一甚至接近一半的版面都用于了对反示威游行的报道,那些为追求戏剧性效果而选择的图片也体现出同样的倾向。10月17日刊登在头版的一张图片,展示了警察正在追捕一个袭击反战示威者的反纠察员的场面;从另外一张图片还可以看出,警察正在制止奥克利的一支反示威游行队伍——地狱天使(Hell's Angel)。虽然如此,据纽约示威游行报道中警察的统计,当时有10,000名反战示威者,而支持战争的人仅仅只有1,000人。^②

然而,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则新闻报道,还要数10月18日《纽约时报》的第1版对司法部长记者招待会的报道,其中夸大了卡曾巴赫个人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抨击。在此之前,《纽约时报》一直把这次运动当作边缘性报道予以架构。现在,《时报》戏剧性的大力报道影响了它对政府的评述。既然这样,《时报》对运动—政府关系的观察似乎并未受到政府政策的严格管制,相反,媒体的独立行动或许有助于改变政府的活动路线,至少在短期内如此。《时报》开始转向对政府权力的报道了。^③

主题：卡曾巴赫记者招待会

回忆已经消逝了,关于司法部部长卡曾巴赫记者招待会上刚发生的一切,难

① Alas 又一次抱怨糟糕的档案资料:我不得不从为数不多的 CBS 新闻中做出推断。

② 标题和导语中报道的10,000人——是警方的估计。在同一版上,记者还报道了其他一些(不确定的)的估计,“高达20,000人”。第二天,10月18日,Douglas Robinson的另外一篇报道传达了示威领导者的决心,实际上,示威者已经将近20,000人,并且许多人并不是激进分子。有些反战组织者还前往《纽约时报》的总部,抗议 Robinson 的报道。但是这条事后报道的“软新闻”,到第七版就结束了。

③ 权力机构很少有人对新闻报道的具体政治功能给予关注。在“the agenda - setting function of the press”一文中,Maxwell E. McCombs 和 Donald L. Shaw 论述了媒体给公众带来的迷惑,而不是对政治精英产生作用。(“The Agenda - Setting Function of the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 [Summer 1972]: 176 - 187)。

以再度找到证据。在判断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时，当事件惟一明确的线索就是媒体本身时，人们不得不依赖于对内部结构的详细观察，这种结构以其独特的方式揭示了惯例。既然我们已经对这种从事件中提炼新闻的惯例有所了解，我们就能从这些发表的新闻予以“追溯（read back）”，并且推断出这一事件的某些特征。

《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了卡曾巴赫记者招待会，标题为“美国调查反征兵组织：卡曾巴赫表示共产党参与了青年运动”。这个标题明确界定了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的渗透活动。这则由芝加哥通讯员奥斯丁·韦尔温（Austin Wehrwein）撰写的报道开篇是这样的：

芝加哥，10月17日——司法部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司法部已经着手对隐藏在反征兵运动后的势力展开全国性的调查。

在此，卡曾巴赫先生只是为了发表其观点，他说道：

“这次运动中有一些共产党参加，”他还说，“我们有理由进行检举。”

卡曾巴赫主要被问到有关“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问题，该组织属于“新左派”并且总部设在芝加哥。但他表示，这仅仅是司法部正在调查的“众多组织之一”。

韦尔温接着引述了保罗·布思在卡曾巴赫记者招待会之前接受采访时的否认：“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有权享受原则性的公民自由权。这听上去是在引诱共产党（或许布思早已预先知道了卡曾巴赫的言论），真正的问题是越南战争。这是一个烟幕，我们正努力穿越这层烟雾。我们的纲领是合法的。”为了维持新闻的均衡而接受采访的布思，正试图驳斥卡曾巴赫的框架。

但是，韦尔温的新闻报道击败了布思的柔道式策略，逃避兵役和共产主义这些主题成为了报道的主要内容。这样，为了强调“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不合法，韦尔温继续否认该组织就是周末在很多城市举行示威游行的煽动者。但是布思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50个校园章程已经筹备了示威游行。同时，韦尔温还不想让一个“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官员重新界定这一形势。于是，他继续将报道放在布思身上：

布思表示，该组织与总部设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的结束越战国家委员会存在联系，该委员会声称是示威运动的发起者。

只有当一个人承认有过失时，才会“宣称是煽动者”（instigator的词根的意思是“刺激”“诱导”；拉丁语instigare来源于希腊语“连续地敲打”）。报道白宫宣称是政策或战争“煽动者”的新闻十分少见，也很少有报道宣称，军队是自己

组织军事演习的“煽动者”。然而，由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与“煽动者”的宣称者“有联系”，也承担了犯罪的罪名。

韦尔温本可以通过解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分会的自治，以及国家协调委员会仅仅是因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拒绝领导反战运动才宣告成立来解开自己设下的疑团——谁应对这些示威游行负责，以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向“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追加一种行为不道德的氛围——通过播出早先由埃文斯和诺瓦克所做、后来又其他媒体重播的那则报道。文章继续写道：

布思先生声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把示威游行放在了“非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同时否认该组织与在加利福尼亚和伯克利散发的一张油印传单有任何关系。该传单的标题是“打击与战胜征兵的方法与手段简报”。

最后，就布思否认与之有联系的那张传单，韦尔温做了详细描述。在编辑添加的“鼓励行贿”的副标题下，韦尔温继续写道：

伯克利文件除了建议坚持忠实反对者的立场外，对如下内容也不予反对：伪装同性恋，在接受义务服务时服用麻醉剂或者贿赂医生获得残疾证明。布思先生声称，该组织只对忠实的声明感兴趣并对其加以鼓励，他还说自己就是一名忠实的反对者。

在引用布思对五花八门不道德行为的否定、从而实现了形式的平衡之后，韦尔温又返回来报道卡曾巴赫记者招待会。注意——对形式平衡的遵守，并不妨碍记者将报道向一个或另外一个政党倾斜。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对客观性惯例加以变通。韦尔温说：“在记者招待会上，卡曾巴赫先生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司法部确实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与伯克利‘打击征兵’文件联系在一起。但是，他没有对这一点加以说明……”等等。

卡曾巴赫在指控“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背叛问题上犹豫不决，韦尔温继续说，这位司法部长声称：毕竟言论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只有在下一页的最后四段中，韦尔温才详细描述了卡曾巴赫对共产党问题的回应：

被问及共产党的影响时，他说在这样的组织中，“你有可能发现一些共产党的参与”。而具体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时，他说已经知道了一些该组织中，或者宣称与该组织有联系的共产党的身份。

至于该组织的领导是否共产党人员时，他回答：“总的来说，不是。”

卡曾巴赫先生说，他认为危险在于示威游行有可能在国外遭到误解，特别是中国和越南，他说：“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约翰逊总统的越南政策。”

这篇新闻到此结束。

关于共产党问题的起源，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卡曾巴赫说共产党参与了青年运动，该标题的作用与卡曾巴赫实际论述的要旨大相径庭。标题将共产党问题提升到了主要位置，而这在韦尔温对卡曾巴赫本人的转述中都没有得到体现。也就是说，对共产党问题地位的提升是《纽约时报》编辑的决定。

其次，或许是新闻记者而不是卡曾巴赫首先提出共产党的问题。^①我们并不知道是哪些记者，也不知道韦尔温忽视了多少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其他问题。或许选择这些问题的是来自于《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他们带有明确的政治兴趣。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精心捍卫新闻客观性的报纸，如《纽约时报》（还有《华盛顿邮报》和当时发行的《纽约先驱论坛报》），正从右派的立场来架构征兵报道。

这种框架是如何得以广泛盛行的呢？新闻报道通过连锁反应，从一家媒体传播到另一家媒体，从一个新闻编辑部到另一个新闻编辑部。报道同一事件的记者们发现，彼此之间可以很轻松地借鉴对方的新闻角度和其他一些问题。借鉴来的东西有助于他们在最后的截稿时间之前处理完大量的信息。特别是当记者们身处一个陌生的社会领域，并且该领域又有足够多的记者形成一个社会组织的时候，他们极有可能变成一个“密封（hermetic）”的组织，仅仅在记者的圈子里，而不是向外界寻找事件。在这种纯封闭的状态下，在西贡或一次总统竞选中进行报道的记者，极易创作出蒂莫西·克劳斯形象地称之为“包装新闻（pack journalism）”的作品。^②首先，对于手头要处理的问题，记者们很少是专家。在电视网中，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地区可能需要只有三四名记者组成的办事处负责。有可能一个记者刚接到分派的任务或制片人的通知，就要马上飞往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地方进行采访报道，第二天一大早又要飞回来赶制一期必须在晚上播出的节目（另

① 从总统往下的政府官员，偶尔也会向善意的记者故意透露一些不可靠的消息（参看 Sigal,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p. 110）。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其中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② Timothy Crouse, *The Boys on the Bus*, passim.

外，记者们还有可能飞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那里的人们说着根本听不懂的话）。^① 即使对于一些规模较大、威信较高的报纸而言，截稿时间、预算限制和“新闻”质量的不确定性等因素，把记者推向了如此一种境地——信息丰富但理解匮乏。于是，记者们就会在竞争中自动地从同行，或者是受人尊敬的同事那里获得启示。

至于编辑，他们也以集体的方式发挥作用——至少是在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上，他们为通讯社和报纸赢得了极大的声誉。《纽约时报》能够得到如此众多记者和编辑的欣赏和尊重，以至于成了能够证明一则报道——甚至其框架，是否有意义的批评性媒体。同样，通讯社也可以为其做出评判，通过编辑分配给记者任务来完成这些工作。但是，对于《华盛顿邮报》或报业辛迪加专栏作家埃文斯和诺瓦克以及电视网的记者和编辑而言，他们可以通过报道来证明和界定一篇新闻的价值所在，他们寻找自己的报道角度（通常是地方性的）和后续追踪。如果他们缺少这一事件的解释，编辑就有可能对此进行询问：“我们为什么不在某某上来点东西呢？”如果《纽约时报》对某某进行了报道，但又与通讯社的报道大相径庭时，编辑就有可能仔细考虑是否采用这篇稿件。与此同时，一篇广为人知、声望颇高的报道（如韦尔温那一篇）又能引起反应——特别是政府的反应，从而将这则新闻继续下去。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这条新闻就形成了一个力场，将其他记者吸引进来。许多事件相结合就形成了一个已知量，一个关系重大的事物——“某某新闻”或简单的“某某”（“越南”“学生暴动”“民权”“新左派”“狂热的信徒”）——因为一个新闻的合法提供者已将其证明为有价值的报道了。

因此，报道在媒体组织与组织之间水平地传播，在组织内部则是垂直传播。记者们在新闻编辑部，或者是在一个固定的采访区域内，报道一则突发性事件的过程中会相互交换意见。编辑们研究竞争对手，电视网工作人员观看其他电视台的节目——这种模仿机制就是如此简单，直接而又平常，每日如此。^② 当批评性

① 在1976年11月份CBS的新闻报道中，我看到一个关于Leonid Brezhnev到达贝尔格莱德会见Tito总统的报道。记者们从巴黎赶到现场，并在机场进行了报道，就像以往总统到达机场时的场景一样，这些报道没有说明任何问题。退休记者Alexander Kendrick坚持认为，卫星通讯技术的出现带来了这种外事报道的常规化：由于广播电视网现在可以进行同步报道，因此除了那些令人兴奋的事情以外，丧失了对更加深入（而且更加昂贵）的现场报道的兴趣（采访，1976年11月17日）。我想说的是，技术的进步迎合了新闻媒体将信息集中打包的需要。技术发展了，升级了，于是不可避免的出现这种情况。

② 尽管地方台经常播出电视网的新闻，但电视网之间还是会经常互相交换节目。至少，在1976年11月，CBS新闻工作人员没有很好地关注其他电视网的新闻节目；无论如何，当他们看到一条NBC的报道时再有所考虑，已为时过晚——虽然对第二天的任务来说似乎还可以接受。

的关注大量聚集时，就“不容忽视”了。如果这则新闻具有明确的新闻来源——特别是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话，新闻机构就特别有可能重新对其进行证明。那么，这些新闻来源就有机会表演他们所有的可用来吸引注意力的节目——记者招待会，来满足那些为新闻搜集者对“新的进展”的渴求，以便让报道成为“正在发展中的报道”，并得以继续。一旦该报道被广泛传播，它已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兴趣——直到这时，编辑们才决定这是一条“旧新闻”，我们已经对“某某”作了足够的报道。

这种逻辑是循环论证的，尽管它的出发点是编辑出于能够影响最大多数人，并使他们产生兴趣的动机。当然，“效果”和“兴趣”有可能发生冲突，甚至有可能任何情形下都是如此。连与之相关的读者数量也会受到这种多变的市场因素的影响——当一家报纸出于广告考虑，将注意力从贫民区的工人阶层读者转向更有格调、对广告客户更具吸引力的郊区居民身上的时候。但是新闻价值的标准，如“影响”“兴趣”“读者数量”，甚至是人咬狗的新闻都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模糊：它们使新闻组织的灵活性和稳定性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它们仍给予媒体搜集大量信息的自由，因而在保证精英报纸监控新信息的同时也允许边缘群体进入公众世界。最终，一篇报道成了一条连续性的全国报道，仅仅因为它是被制造成这个样子的。

然而，新闻的本质并非不言而喻的。不管该新闻被确定为越南战争、反征兵运动，还是卡曾巴赫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攻击，我们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述。并且，正如存在着朝向同一性而存在的结构性压力一样，在新闻业中也存在着一种追求某种多样性的压力。一方面，市场的力量可能影响对不同报道不同框架的选择：迎合出入于剧院、品尝着精致食品的年青读者的报纸，与那些针对上了年纪、相对固定的工人阶级的报纸会选择不同的题材（并会用不同的手法处理相同题材）。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记者和编辑也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一个题材。^①而且，个别记者（如弗洛德·波利奇）偶尔会形成强烈而又前后矛盾的观点。但是在1965年秋天，如果记者们与中间路线的政府在对待反战运动的

① 我之所以使用“generation”这个词，并不仅仅指年代上，而且还包含在社会上拥有相同经历的年龄群体，用 Karl Mannheim 的话来讲，“在社会进程的历史范畴中处于同一位置”，把他们限制在“一个潜在的具体范围内，使之倾向于某一特有的思维和体验方式，以及一个特有的相关历史活动类型”。参阅 Mannheim 的“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aul Keckskemet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 290 - 291, 以及 Maurice Zeitlin 在 *Revolutionary Politics and the Cuban Working Clas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上的论述。

观点上出现分歧的话，那么它们似乎转向了右派一边。记者们仍然在这样的前提下展开调查：在二战中反对征兵是无法容忍的。鉴于所有这些常规程序和前提假设，《纽约时报》似乎在刺激政府对反战运动做出谴责上，起了推动的作用。

10月19日，星期二的《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是这样的：

约翰逊公开谴责抗议征兵活动——敦促展开调查。他担心敌人会怀疑国家决心而战斗得更加激烈，从而延长战争。国会对此也持批评态度，而曼斯菲尔德游行者毫无责任感，破坏了实现越南和平的努力。

这份来自华盛顿的电讯不仅引述了约翰逊的抨击言论和他对征兵运动展开调查的号召，而且还引用了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德克森，基克尔（“肮脏无耻、卑鄙恶毒”这样的字眼）、拉塞尔、索顿斯托尔和劳希论点一致的演说。然而，这份电讯中却没有来自左派为实现平衡而带来的陈述。

奥斯丁·韦尔温从芝加哥发回了一条“征兵团体筹划新运动”的报道。这次，韦尔温利用已发表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纲领——或者引用他的话，“万能计划”，又一次暗指对这场阴谋活动的“煽动”，并且把这份“万能计划”置入了一个现实环境中。他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办公室做了精确的描述：“位于黑人贫民区63号大街上的一间杂乱无章、阴冷潮湿的办公室，光线昏暗，装修简陋……”实际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办公室的寒酸正在成为媒体报道框架的核心部分。这样的描述并不是凭空杜撰的，保罗·布思也曾回忆说，“那是一间令人作呕的办公室”。^①但是问题本身又是模糊的，读者该去怎样理解呢？破旧与贫穷可能暗指了一个破烂不堪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一个居住在租来的旅馆套房和学生会议室中的下层社会群体，一个无法在宜人的环境中制造新闻的下流社会群体。或者在另一种不同的语境下，它同样也可以暗指一个衣冠不整、自我牺牲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抛弃了安逸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去从事有意义工作的年青人。如果品味得更加深入，这两种形象都有可能出现。但是韦尔温继续营造这样一种文本——把这间办公室描述为一种第一眼看上去惹人怜悯、再看却阴险邪恶的东西：

墙壁上装饰着左翼的海报以及一些现代派绘画作品，其中有一幅是毕加索的作品，上面画着共产主义的锤子和镰刀图案，还有意大利共产党的签名。

^① 1977年9月16日 Paul Booth 致作者的信。1976年，当我采访 Stanhope Gould 的时候，他也主动提起，当火车从窗外呼啸而过的时候，这座房子竟会产生震动，以至于谈话不得不中断。

真的有那么一张海报吗？是的，还有一些其他东西，韦尔温没有详细地描述。接着，韦尔温又开始精心描写并报道卡曾巴赫记者招待会时的反共框架。如果他明确意大利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存在的巨大政策差异，他就有可能得出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政纲做出更准确的建议。事实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领导者对苏联并没有任何同情。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来说，悬挂毕加索的海报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与世界共产主义内部涌现出的异议保持团结一致。但是，韦尔温没有理解，至少是没有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角度报道海报的象征性意义。在韦尔温和多数《纽约时报》的读者共同遵循的支配性原则中，共产主义被视为一种没有区别的威胁，而且韦尔温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吸收进了糟糕的组织。^①

接着，韦尔温又回到了自己视为重大问题的“煽动问题”上：

该群体的纲领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之上：学生的游行示威还远远不够。该组织于本周支援了一连串的抗议活动，却拒绝承认是活动的发起者。

这“一连串”的抗议活动带来的不愉快的含蓄，又因为暗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逃避所应负的“煽动”责任而雪上加霜。这份“万能计划”就是由这样一个群体炮制出来的——在一间杂乱无章、阴冷潮湿、光线昏暗的办公室里，在锤子和镰刀标志下，一个刚刚支援了“一连串”抗议活动却又推脱责任的群体，他们没有明确的纲领（除了“学生的游行示威还远不够充分”这一理论外）。一个早已被鼓动起来、反对共产主义、穿着制服的读者，又能对这样一个群体和这样一个“万能计划”做怎样的理解呢？

韦尔温的架构并非独一无二的。里查德·弗莱克斯在那些日子曾访问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办公室，并且听到过其他类似于“你是否不再殴打你的妻子”之类的问题（含有预设前提的问题）。^② 布思（第二天，10月20日）继续试图重新将中心问题界定为战争的错误——“反战运动正日益扩大，人们认为这场战争是即将结束的——用破产这一词或许更合适，22岁的布思先生说”，仅仅使这样的言论被重新界定并加以弱化。韦尔温接着又说：

布思先生，在征集会员中本应首当其冲去服兵役，却宣称是华盛顿第二征兵委员会的忠实反对者，并要求延缓服役。面对被判监禁的可能，仍然显得泰然

^① 比较 CBS 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早期充满敬意的处理方式，第二章。

^② 1977年1月9日对 Richard Flacks 的采访。

自若。

副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W. Ball）曾将10月15日和16日的抗议活动描述为“打击征兵”示威游行，这篇文章也对此做了重复。

“建设，而不是毁灭”

布思的努力毁誉参半，他仍然没有摆脱试图改变新闻报道措辞的固执。随后在同一个杂乱的一周，为了掌握主动权，他和奥格斯比飞往华盛顿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后来众所周知的“建设，而不是毁灭”的观点就是在头一天晚上，由布思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阿瑟·沃斯科（Arthur Waskow）和保罗·考恩（Paul Cowan）的帮助下草拟出来的。布思租下了国家新闻俱乐部的整个大舞厅，舞厅里挤满了人。布思的声明明显带有向政府挑衅的明确意味，同时也是对逃避兵役指控的辩护。内容大体如下：

如果效忠于民主被免服兵役代替，让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吧。我预言，几乎我们这一代每一个人都会选择建设而不是毁灭，教育而不是折磨，帮助而不是杀戮……我们并不害怕拿我们的生命去冒险——我们一直都在密西西比和阿尔巴马拿着生命冒险，我们当中的一些人那儿献出了生命，但我们不会去轰炸另一个国家——去轰炸他们的人民，妇女和儿童。^①

布思的柔道式策略成功地影响了媒体和政府官员，就“建设，而不是毁灭”问题在向“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做了辩解的几个月之后，布思写道：

声明的内容在某些情况下得到理解——电视台和众多报社采用了冗长的引述，拿我们想要在越南做的事和政府强迫我们做的加以比较，《芝加哥论坛报》甚至还刊登了题为“奥格斯比反对约翰逊总统”的报道。^②

CBS晚间新闻对布思的声明做了大约几十秒钟的报道。显然，《纽约时报》对此并没有多少兴趣：第二天政府上了头版（“支持越南的力量在美国开始壮大”），而下一版才是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策略的报道，题目是“请求减免兵役”，这明显表明了《纽约时报》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姿态。但是总体来说，当布思在写道“布丁好不好吃，吃了才知道”和“我认为这次声明

① 全文可以参见 Sale 的 SDS, pp. 233 - 234.

② Paul Booth, “National Secretary’s Report”, 油印, 1965年11月。

的整体效果非常好”的时候，他应当是正确的。这个声明带有强烈的修辞效果，并在校园中广泛流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新兵的征召，特别是从布思的战略观点来看——在当时形势下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策略：

在华盛顿的大学教师、自由律师和其他许多人当中，该声明援助了我们的盟友，并且使卡曾巴赫陷入窘境（司法部现在说，它没有对我们展开调查）。

尽管如此，边远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群体还是对声明和其产生方式感到非常愤慨。甚至有个别更加激进的分会抗议说：对于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从反征兵运动中分离出来的热忱来说，该声明是“放纵的”，数百名成员也抱怨道，“建设，而不是毁灭”非但没有抨击征兵运动有失公正和民主，反而提议扩大征兵并使之合法化。人们持有这样的看法：布思全然篡夺了发表任何政策和声明的权力。圣弗兰西斯科的新地区办公室发来了一封史无前例的电报：

西区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对最近关于征兵和“建设，而不是毁灭”的声明非常失望，认为一系列的决议极不民主：

1. 小范围的投票和微弱的多数通过并不等于民主授权；
2. 宗旨与声明错误地暗示，征兵纲领要寄发给所有“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并暗示不存在地区自治；
3. 全国办公室没有制定国家政策的权利；
4. “建设，而不是毁灭”的声明未经讨论就强加于我们；
5. 声明的语气是可悲的，对逃避征兵者等问题的叙述，读起来更像是向卡曾巴赫认罪。布思超越了正当的职权范围，国家机构的角色需要重新审理。

以上声明在 50 人出席的会议上获得了一致通过，代表来自以下地点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地区办公室：伯克利、戴维斯、洛杉矶、里德、萨拉门托、旧金山、圣约瑟和斯坦福。“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肯·麦克尔唐尼（Ken McEldowney）。^①

格雷格·卡尔弗特（Greg Calvert）——1966 年会议上草原力量的主要领导人，后来接任布思成为国家秘书长。他写道：“建设，而不是毁灭”是“迄今为止出卖这场激进运动所设计出的、有利于官员增选的最伟大的公式。”^②

① SDS Work List Mailing, No. 28, November 30, 1965.

② New Left Notes, 1967 年 2 月 13 日, p. 2. 该引言及前面提到的其他一些事情, 都来自 Sale 的 SDS, pp. 234 - 235.

布思后来声明，“建设，而不是毁灭”只是当时采取的一种策略，虽然这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基本的政治观点相一致。他是在政治斗争的压力下提出这一策略的，而且他坚持认为他没有宣布任何实际的纲领，那封准许约翰逊为了“效忠于民主”而免服兵役的电报只是为引入注意摆出的姿态，并无发起甚至是提倡发起一场全民义务服役运动的意图。^①布思说，当你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你要按照观众能够理解的规则去表演。1965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做出的姿态十分有限。

显然，组织内部确实存在着政治争端，但布思比他的批评者们对当前政治形式的结构、时机的把握和发展势头更为敏感。当时，他正在努力地学习媒体是如何运作的，它们注意到了什么，忽略了什么。对记者来说，主题是逃避兵役，而不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对于战争的观点。在他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所作的报告中，布思承认“建设，而不是毁灭”偏离了为越战设置的政策，“因为这个政策已大部分丧失了对新闻报道的影响”，“征兵的舞台是新闻媒体和公众最感兴趣的，特别是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这个问题更是不容忽视……”^②也就是说，是媒体的选择结构，而不仅仅是布思本人的政治倾向，促使他提出了“自由放任（liberal run）”的策略。如果“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想要摆脱困境，它将不得不从媒体为它们制造的困境中摆脱出来。

那么，什么是可行的抉择呢？当时没有一个人提出来。十二年后，在对左派政治和媒体有了更多的经历和思索之后，布思认为当初应把“自由放任”的政策与“对抗”策略结合起来：

假如我要求与卡曾巴赫召开或取消会议，那么这将成为头条新闻，反战与征兵问题就会变得次要。我们本应当游行到司法部，在那里静坐，或者做些其他别的什么事情。选择“自由放任”的策略，部分原因是由于我（还有沃斯科）缺乏勇气。“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左翼为由于恐惧而退出的事感到羞愧，这真的很重要，因为他们的政策百分之八十是作出的道德姿态，只有百分之二十是实质性的内容。^③

一个有创意的设想：“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可以在风格上满足战斗精神的同时，重新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不过布思1965年的时候却没有想到这一点。

① Booth, “National Secretary’s Report” .

② 同上。

③ Booth 致作者的信，1977年9月16日。

与此同时，批评家们也没有提出任何其他可行的办法来对付公众的注意。布思所说的“缺乏勇气”部分是媒体惯例打击的结果。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布思认识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无法选择是否要得到公众的关注，它惟一的选择便是如何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而他的批评者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无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拒绝就哪一问题做出评论，这种报道都会被视作一种特殊的评论：逃避。因此，布思仍在继续努力宣传“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正在想的和正在做的，而媒体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报道却在“危险(dangerous)”和“无能(ineffectual)”两种形象之间游移。任何时候，“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都是偏离正轨的另类。恶魔也好，不切实际也罢，在观众眼中，“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只是一粒沙尘。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最终就臭名昭著的反征兵纲领进行了投票，相关的新闻报道可以说是典型的虎头蛇尾。当埃文斯和诺瓦克首次曝光这个临时性纲领时，有关的报道就上了头版头条。但是，后续的报道却遭到了一贯的忽视，为数不多的反映也几乎总是以版面底部几则微不足道的消息形式出现。当一条新闻还掺着新鲜和虚假味道的时候，其新闻价值要比陈旧和真实的时候来得多得多。11月中旬，参加投票的那一小部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投了反对票。保罗·布思在工作日程报告中，对媒体的反应作了如此描述：

昨晚，媒体得到了征兵纲领投票选举失败的风声，美联社打来了电话。我做出了一系列现场行政性的决定……我们一直有这样一种想法：我们应与新闻界保持良好的关系，成员的要求也应相当明晰……我们并未打算隐瞒这次投票，但他们还是闯了进来。不过当美联社打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得知投票失败的时候，我马上决定“故意泄露消息”，而不是“不做任何评价”。我们已经三个星期拒绝就有关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了。^①

当然，布思处于守势，因为他被指责在“建设，而不是毁灭”期间，垄断并误用了与媒体的联系。但是，布思和他的左翼反对者都相当天真。从布思到西海岸持有不同政见的每一个“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都曾设想：只要对媒体说出了实话，就可以打发记者，就能赢得这种争取媒体的斗争。甚至直到现在，布思还在继续向记者们解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是民主的，它尊

^① SDS Work List Mailing, No. 27, November 17, 1965.

重分会的自治权，这次投票是一个策略而不是政策问题，并且“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仍然在“寻找一种方式宣布：我们不仅不愿到越南去打仗，而且还打算在国内实施社会变革的计划，我们随时准备为这次变革贡献我们‘年轻的力量’”。^①

布思学会了小心谨慎地对待“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程序上的细微差别，不过媒体却对细节性的问题不感兴趣。大部分时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似乎正在改变主张，公开承认正在“放弃”的纲领（一个它从未认可的纲领）实际上是不合法的。大概按照这种逻辑，政府公然抨击“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公正的，媒体对其进行的揭发大概也是正确的。在这种左右为难的困境中，很难理解“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怎样挽回尊严的。布思确实通过以下建议鼓舞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中坚分子：

如果你们行动迅速的话，就可以消除来自地方的负面报道。首先，如果报道听上去好像我们正从火线上撤退的话，你们就要对战争政策发起猛烈的攻击，并将其与11月27日游行中汽车上的布告或其他运动中的证据联系起来。如果你们在为征兵工作，而又不想遭到媒体的暗算的话，就重申你们的纲领，强调地方自治。如果他们将新闻写成复决投票的成员已经压制了你们的地方纲领的话，告诉记者（如果他们往这儿打电话的话），就说你们可以问问布思：人们支持你们对地方纲领的连续报道。

布思谨慎的柔道式策略确实影响了《纽约时报》11月19日的报道——“反征兵纲领受挫（Antidraft Program Dropped）”。该报道表明，这次复决投票是策略性的而不是政策性的。《纽约时报》还逐条列举了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流传的部分反战运动的替代计划。不过，这部分内容是作为另外一篇更为重要报道的附录形式刊登在第5版上。至于其他的报道，就像布思在11月17日所写的，“看上去，媒体只是选择了它想报道的部分，而忽略了其他内容”。

发展中的主题 I：运动出现分歧

整个秋天，在反战运动的动员和政府的反动员过程中，媒体不再把反战学生描述为“留着胡子，身穿蓝色牛仔和常春藤粗花呢、在‘春天温暖的阳光下’蹦蹦跳跳进去享受‘考试结束后的假期’的大学生了”，反战运动正在明显地壮大，

^① 同上。

对战争的敌对也明显变得更加猛烈。队伍的壮大及好战精神并不是那么微不足道以及容易被忽略的。

因此，支配性的框架主题开始发生了转变，部分是基于现实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主流媒体已经找到了他们自己处理战争问题的方式。1965年秋天，自由的国家媒体将相当大的空间用在了对运动内部冲突——戏中有戏的报道上。右翼报纸如《纽约每日新闻》和《芝加哥论坛报》毫无保留地用最共产主义的元素将反战运动归为一丘之貉，而《纽约时报》和CBS的报道则倾向于首先区分抗议的合法形式和非法形式，然后再加以说明：后者正对前者进行渗透和污染。这种方法既维护了一个理性审慎的反战抗议者的形象，又对其有所怀疑。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具有双重标准的公式。

虽然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双重标准，但运动内部的冲突并不是媒体凭空杜撰的，绝非如此。尽管媒体不是反映现实的镜子，可它们也不是一副想像中的抽象作品。它们更像是一面哈哈镜，变窄加宽，延长和缩短，扭曲和忽略早已存在的事物。媒体通过看起来可信的事实，为公众呈现出一个既定的真实世界，来对事件做出解释；实际上，完全虚假的报道几乎是不存在的。毫无疑问，反战运动中存在分歧。而且，在1965年秋天时，这种情形可能比春天的时候还要严重：进步劳工运动（后来的进步劳工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的马列主义组织核心，组织了它们自己的5月2日运动，对越南国家解放阵线表示支持；随后开始向“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靠拢。同时，自由主义者也有所缓和的改变。由于更多的运动不断涌现，不同小派别之间的相互争论也随之愈演愈烈。但这也是事实：遵循他们自己的支配准则，媒体呈现出了内部的差别，并引起人们对争执的关注。这些问题具有合法的新闻价值，但记者们却没有对支持战争的群体或政府内部的相应冲突加以报道。事实上，在关于战争政策的冲突问题上，政府一直在欺骗媒体。比如，由于自身原因，1965年4月，美国驻西贡大使马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和空军队伍反对将舰队任务转为进攻；据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所说，在此期间，“关于内部存在的一些争议，我们（政府官员）一直有所隐瞒”。^①而且，媒体多半只是肤浅地表现了政府的团结一致，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经过周密策划伪装出来的。由于对调查未加防范，反战运动在媒体的报道面前显得更加脆弱。

^① 1977年3月2日和1979年3月17日对Daniel Ellsberg的采访。当Ellsberg这种熟知内幕的人站出来时，内部争斗的秘密也就随之公开了。

例如，在《纽约时报》10月23日的第2版，除了广告以外，全部版面都用在了一篇对M. S. 汉德勒（M. S. Handler）的报道上。这则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参加反战运动，却否认该运动发起者的身份”的报道表述了“支离破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寻求新生”——斯巴达克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进步劳工党以及共产党，都宣传他们对“所谓的新左派”影响甚微。两天后，一篇不是十分起眼的报道——“新组织在亚洲展开抗议”刊登了有关三十个大学参加的研讨会的内容，发言者包括诺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约翰·K. 费尔班克（John K. Fairbank），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和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第6版上约翰·西布利（John Sibley）的文章称，这一“新运动”的领导者承诺“通过教育而非暴力抵抗，来进行示威”。文中还引用了神学院约翰·C. 贝内特（John C. Bennett）的话：罢工纠察员和烧毁征兵卡者（注意，在今天就有一个）可能已到了使自己目标落空的地步，他们正使反战态度变得更加强硬。”^①

一个简单的副标题，与西布利在处理运动内部分化时相对微妙的语气形成了呼应。这则新闻的标题是小号字体的“西格在莫斯科遭到批评”：

莫斯科，10月24日——美国民歌歌手皮特·西格今天在一间聚集了莫斯科大学学生的礼堂里演唱了一首反对越战的民歌。

“我只是想把正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唱的歌曲呈现给这里的学生”，西格先生后来说，“或许演唱这首歌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即将在苏联结束为期三个星期个人巡回音乐会的西格先生，可能会由于他的行为遭到批评，不过他对此并未予以理会……

这样的“建议”可能——和往常一样——来自于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美国记者。随后刊登的西格的照片更加强化该问题的贴切性，这张照片的文字说明是：“在莫斯科演出的民歌歌手皮特·西格，昨天在莫斯科大学演唱了反对越南南部战争的歌曲。”由于这张照片被放在了“新组织在亚洲展开抗议活动”的标题旁边，关于西格的这条新闻必然会说明温和派正与何种非法反战活动划清界限。

与此同时，在10月24日星期天新闻版的背面，刊登了伊迪斯·埃文斯·阿斯伯里（Edith Evans Asbury）的一篇长篇报道，标题是：“戴维·米勒与天主教工人反战主义研究。”阿斯伯里的这篇报道，在描写人类利益和富有同情心的细

^① 11月4日，刊登在第三版上的一条题为“END-WAR GROUP IN N. Y. DISBANDS”的报道又一次提起了运动的内部冲突，重新描述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战术上的分歧。

节方面可谓精雕细琢。实际上，反战主义左派的表现通常是富有同情心的。那年秋天早些时候，《纽约时报》在一篇同情理解而又语调悲伤的文章中，反思了教友会（Quaker）的诺曼·莫里森（Norman Morrison）在五角大楼的自杀事件，试图通过个人经历来解释“他这样做的原因”。几天后，罗杰·拉波特（Roger Laporte）的自杀也以同样的方式报道，以便让人们理解他的个人动机和内心世界，他的自杀被报道成一个虽不荒诞但却异常的个人行为。在政治传记或是在阿斯伯里的特写中，这些报道被放在个人传记的语境中来理解，而没有将其描述为精神错乱的症状。其结果就是，这些反战主义者的行为立刻被诠释成了值得称赞和无与伦比的，因为这些传记报道习惯性地将对反战主义活动从它们的政治环境——越南战争中分离了出来。有时，他们直接将反战主义者与激进分子对立起来，正如11月10日汤姆·巴克利对罗杰·拉波特自杀事件的报道：清晨五点钟，这位金黄头发、身材消瘦、看上去丝毫不像“反越战者”或和平示威者的年轻人自焚了（巴克利没有考虑长头发这一模式化形象的来源）。简而言之，《纽约时报》对新左派、自由派以及反战主义者极为不同的报道，树立了一个混乱、矛盾和紊乱的反战左派形象。

不过，其中有一个例外：自由撰稿人托马斯·R·布鲁克斯（Thomas R. Brooks）的一篇文章刊登在了11月7日的《纽约时报》上，暗示了在反战和更加普遍的激进主义共同精神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内部差别是策略性和政策性的。四月份时，布鲁克斯就曾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关于毛泽东党派的新闻，随后编辑哈维·夏皮罗（Harvey Shapiro）要求他写一篇关于大学校园激进主义的文章。^① 另一名杂志编辑塞尔（后来成为第一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编年史的作者）要求这则关于10月中旬征兵危机的新闻集中报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塞尔知道布鲁克斯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前身——争取工业民主学生团（the 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的委员会成员之一，因此他猜测布鲁克斯会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消息比较灵通（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两个组织之间关系极为紧张）。^② 不管怎样，布鲁克斯在10月20日正式接受了这一任务，恰好在动员反对征兵使“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登上了头版报道之后。和往常一样，从日报上获得新闻观点的杂志编辑，想要尽快弄清“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背景，夏皮罗要求在八天之内定稿。然而，布鲁克斯为了

① Thomas R. Brooks 致作者的信，1979年3月26日。

② 1979年3月17日，对 Kirkpatrick Sale 的电话采访。

编辑的要求在最后加了几行，11月7日的这条新闻基本上还是他的原稿。^①

表面看来，布鲁克斯似乎理解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政治价值，并对其进行了清晰的表述。在他整理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重要人物的简历中，这些重要人物被细致地描述为植根于美国主流生活中彻头彻尾的美国人，以及有能力的美国人——有技能、体面和明智的人。然而，总编却选取了如此一张照片作为封面——一名全国办公室工作人员站在一张反战海报旁，海报上是一名被燃烧弹烧死的越南儿童。有那么多工作人员的照片可以选择，其中还包括一些井然有序、十分光鲜体面的照片，可为什么这些总编却偏偏会用这么一张照片呢？还有其他五名工作人员的照片被刊登在了第二页，作为对文章正文的解释和说明。在办公室人员中，印刷工人唐·约斯特（Don Yost）的长头发并不是最具代表性的。的确，在刊登的其他照片中，没有关于反战海报的，并且也不可能再看到其余未曾刊登的照片；或许它们当中没有一张是《时报杂志》总编喜欢的反战海报。而且，草原力量中的许多人都神气地蓄着长发，也正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开展着活动——如果不是在全国办公室的话。一位前《时报》周日版的编辑，主要任务便是负责《时报杂志》封面的选取，他没有回忆起这种特别的用意；但他还记得：在那一周挑选封面时，他只是尽力地为杂志寻找可以“吸引读者目光”的图片。^②另一位前《时报杂志》编辑也认为，这张照片“被选中是因为它更加醒目”。不用说，一则关于大通曼哈顿银行、能源部、市政厅或州立法机关的新闻是不会将特写留给一个办公室印刷工人的，即使他就站在记者照相机底下。不管怎样，这种反常的结构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名前成员回忆道，那张封面照片“确实使组织中的许多人相当兴奋”，因为他头发实在太长了。克拉克·基辛格对此一点也不赞赏，这不是他们当时想要树立的形象。^③《纽约时报》曾得到过一篇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表示尊敬的稿件，不过上面却画着一个人留着长头发的卡片。

虽然被蒙上了一层异常的色彩，一篇对运动表示尊敬的报道对《纽约时报》

① 1979年2月26日Brooks给作者的信。Brooks向我提供的Shapiro的电报表明：在任务分配中，运动的内部冲突处于次要位置：“就‘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作为和平运动的学生群体，请写一篇3,500字的报道。要在整个运动的背景中，用叙述和对话来描述怎样、以及为什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承担了这项工作，要刻画领导及普通成员的特征，还有‘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学生中工作的生动场景，以及学生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说教的反应。10月28日将稿件交至此处。”换句话说，Brooks的细致彻底和公正合理，正是编辑的要求。

② 1979年4月21日，Daniel Schwartz的电话采访。

③ 1977年1月19日，对James Russell的电话采访。

来说还是非同寻常的。很明显，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问题上不存在着思想意识形态层面明确的界限。虽然组织上独立的《时报杂志》周日版要从日报中选取主题，但却比日报有着更多的活动余地。正如在战争问题上存在着内部冲突一样，在反战运动中也存在着内部冲突；而这正是编辑们想要的。用周日版编辑施瓦茨（Schwartz）的话来说就是，“我不愿得到一种同质的产品。”^① 随后几年中，文章的结构变得更加多样化。但是编辑们总是担心一篇文章会对左派的某一观点太过同情，反战立场会因此变得模糊而成为对越南共产党的支持。因而，维持新闻客观公正的方法之一，就是强调左派内部存在的杂乱和争议。

发展中的主题Ⅱ：运动遭遇困境

当《纽约时报》报道支持战争的力量时，并没有传达对于混乱和分歧的观点。事实上，《纽约时报》就根本没有对它进行彻底的调查，也没有仔细研究其内部运作，而是理所当然的将它看成了普通力量。

而且，当强调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分歧时，《纽约时报》通常会不动声色、理所当然的偏向后者。文章一再对右派引发的暴行视而不见，或者是隐藏其根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纽约时报》有时夸大反战事件中左右派之间的暴力行为，并会组织一系列论据来建构反战事件“导致”了暴力的争论（之后又把暴力事件归因于反战事件，而不是袭击者身上）。而在其他情况下，稍微的轻描淡写就能传达这样一种感觉——引发暴乱的责任应由左、右派共同承担。例如，10月28日的一条新闻，标题是：“曼哈顿大学集会后，学生就西贡问题发生了冲突。”导语是这样写的，“支持对越政策的学生与反战学生昨天发生了短暂的冲突……”。可以说，导语是不偏不倚的，然而直到下一版的第12段才出现了对这场战争的起源的如实报道：“运动即将结束时，有些学生转向了反战群体，并叫喊着烧掉那些标语。”这场冲突是由右派引发的，但是标题和导语却将责任部分地推给了学生。

10月30日《纽约时报》第二版上，又出现了支持战争另外一种形式的倾向——由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写的战争动员的通告：“预计今天将有50,000人在此游行，支持越南政策。”如果我们把这条报道与《纽约时报》对10月15日反战动员的报道相比较，可以看到三个比较明显的区别：

^① 电话采访，1979年4月21日。

1、对10月15日和16日举行的全国统一游行示威,《纽约时报》没有提供预先的通知。事实上,它在10月13日刊登了一篇“一项越南抗议胎死腹中”的报道,记述了一个单一、地方性的无关紧要的计划。在第一次游行示威的那一天,《纽约时报》报道了越南日委员会(“越战敌人公然反抗奥克兰”)和一次右翼学生政府官员组织的会议,反对温和的反战国家学生联合会。也就是说,作为一条全国性的新闻,10月15日的游行看起来好像是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相反,10月30日支持战争的报道却占用了第2版上五个专栏的位置。或许这种差别部分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支持战争的示威游行是来自纽约的报道,因此可能更适用于刊登在大城市的编辑们所极力争取的位置上;^①但是,通过《纽约时报》为自己的地盘保留空间的方式,又可以解释多少矛盾呢?后来,11月27日一篇关于华盛顿反战游行更深一步的报道,在第12版上占了一个专栏的版面。

2、10月30日的报道列出了对示威者的建议,并通知支持战争的群体在早晨的集合地点。而类似的消息却从来没有提供给反战示威者(这后来证明是比较灵活的——至少当较合法的反战群体顽强并巧妙地进行游说的时候。11月27日的那篇报道确实向反战集会提供了时间、地点等方面的信息)。

3、该事件并没有因为引号的使用而遭到疏远、变性或忽视。反战示威被称作“和平运动”,而10月30日的这条新闻则认为,这次支持战争的事件是一次示威或游行,没有使用引号来突出是需要解释的。示威和游行是一种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传统事件,不带有引号所暗示的麻烦和认知上的新奇感。在直截了当地报道了这次著名事件——支持战争游行之后,罗宾逊又转向对反战活动进行报道,并且在“守夜(silent vigil)”一词上加了引号,以使自己免受其害。^②

发展中的主题Ⅲ：合法运动与非法运动

在1965年剩下的时间里,《纽约时报》继续宣扬运动中的极端主义。对暴力和亲共产主义的强调向来是同一结构的不同方面,这个结构就是把策略的极端主

① Leon Sigal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p. 31) 指出,在1970年,“无论全球事件和新闻动态怎样变换,《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新闻都表现出如此倾向:来自国内、国际和大都市的新闻报道数量较为均衡。”正如 Sigal 指出的:假如发生变化的只是具有新闻价值报道的本质,那么可能性只能用来解释这三者之间一时的平衡,但却很难解释长时期均等的分配。这种解释一定与报纸的组织策略有关。

② 参阅 Gaye Tuchman 在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8), pp. 95-97 中对“the judicious use of quotation marks”的讨论。

义与纲领的极端主义结合起来。即使没有暴力事件发生，它的威胁和暗示也能成为新闻素材。让我们来看一个无关痛痒的例子：11月20日，一条来自华莱士·特纳的报道，“奥克兰示威者极力要求使用纠察指示棍（Picket Sign Poles）作为保护。”副标题是这样的：“越战评论家对今天抗议传单上的建议提出了批评。”导语是：“今天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个名叫斯巴达克同盟的左翼活跃组织散发传单，极力要求使用纠察指示棍，以便在‘明天反越战示威中出现袭击的情况下’进行自我防御。”早些时候，华莱士·特纳曾煞费苦心地在一篇报道中发现并贬低一个反战群体的规模，但这一次他却根本没有提及斯巴达克同盟的规模问题（事实上和往常一样，它的规模并不是很大）。在越南日委员会第二次进军奥克兰的前一天晚上，该报道用了一张共产主义历史学家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的照片作为插图——当时他刚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作演讲，抨击麦卡伦法案。“当时”一词，是特纳关于政府对示威所做准备的报道，同阿普特克这张照片之间存在的惟一点联系。尽管用特纳自己的话来讲，阿普特克的讲话忽略了反越战示威游行；但他还是对其进行了引用，好像阿普特克在校园中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反战运动的重要事实。

到11月份，围绕在安全核政策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a Sane Nuclear, SANE）周围的反战温和派已经采取了措施与左派划清界限。在组织11月27日华盛顿示威游行时，他们就努力克制，而不是号召美国部队从越南撤军，同时禁止在游行队伍中出现支持撤军的标志。SANE的执行秘书桑德·戈特利布（Sanford Gottlieb），诺曼·托马斯，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博士和小马丁·路德·金夫人事前会见了国家安全理事会的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的助手切斯特·库珀（Chester Cooper）。库珀劝说他们给胡志明发电报，告诉他不要把他们的示威游行看作是一种支持，并且向他示意：他们既反对北部越南人民共和国，也反对美国的对越政策。^① SANE的领导们如此周密审慎地在政府和媒体面前呈现出一副理性、理智和温和的面孔（同时，在活跃的反战分会的压力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对这次示威表示认可，并为其主席卡尔·奥格斯比的发言争取了一席之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发出了自己的号召）。但是此刻，媒体却利用运动内部的冲突来使整个游行失去声誉。不管桑德福·戈特利布、诺曼·托马斯和其他 SANE 领导如何努力地组织他们计划周密的示威游行，

^① Chester Cooper, *The Lost Crusade: America in Vietnam* (New York: Dodd, Mead, 1970), pp. 289 - 290.

它们都是不堪一击的。

的确，这种中立的形象似乎在新闻报道中十分盛行。对于周六的示威报道，《纽约时报》甚至没有提到集会发言人之一——事实上，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发言人奥格斯比。他标志着这场运动意识形态的一次重要转变——即后来将战争视为集体自由主义产物的激进论断（在四月份，惟一能解释《纽约时报》报道上存在着失误的原因，就是最后的截稿期限显得早了些）。正如 SANE 组织者期望，并为之努力工作的那样。《纽约时报》强调了这次示威中语气温和、值得敬重和“端庄有礼的”人群。可就在两天以前，《纽约时报》还夸大了一些不怎么高雅端庄的事。

11月26日，星期五。刊登在第4版上的游行前的报道，使用了一个横跨六栏的标题：“示威人群到达，越共旗帜华盛顿热卖。”标题正下方是合众社拍摄的一张照片，上面是西贡士兵手持着民族解放阵线旗帜，文字说明是：“这是一面越共旗帜，拍摄于美军位于岷港的空军基地。”该篇报道的作者是弗雷德·格雷厄姆（Fred Graham），^①对这些由一个“美国援助越南南部民族解放阵线委员会操作”的小亭子里分发出来的旗帜作了报道：这些旗帜正卖给来参加结束越南战争国家协调委员会会议的代表。格雷厄姆继续写道：游行队伍的组织和协调人员计划把越共旗帜撤掉，同时还决定，“如果遭到拒绝，除了允许他们游行以外，我们别无选择。”格雷厄姆没有报道美国援助越南南部民族解放阵线委员会的规模。对于这篇文章的读者来说，可能没有任何途径了解到这是一个规模极小的委员会，其来自纽约市的领导者沃尔特·蒂格（Walter Teague），成功地欺骗了媒体许多年。那些曾极力报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这样那样游行示威规模的记者，从未对美国援助越南南部民族解放阵线委员会的规模做过任何报道。相反，马克斯·弗兰克尔对这场示威的报道，却将民族解放阵线旗帜的重要性减小到了最低程度：“人群中有那么一小撮斗志昂扬的青年，他们当中有些人手持越共旗帜。”但是，正如沃尔特·蒂格希望的那样，“越共旗帜”的形象成功地破坏了示威组织者的计划：仅用了少许精力，他就破译了新闻报道的密码，并将其变为一种有利条件。尽管弗兰克尔赋予这场示威高尚可敬的荣耀，他在头版报道还是使用了一个普通的标题，副标题则是“亚洲共产主义确信美国公众舆论将迫使战争结束”。这篇报道这样写道：

^① 1972年，Graham去了CBS。

美国反战示威者受到了越南共产党和中国的称赞，因为他们加入了斗争，反对被称作约翰逊政府帝国主义的政策。

从各方面来说，通过夸大少数的民族解放阵线旗帜及“越南共产党和中国”的反映，《纽约时报》抨击了同一反战运动的“负责”群体。在11月27日社论中，对该群体进行称赞的同时又带有少许指责。

今天，在华盛顿要求实现越南和平示威游行的组织者，显然试图将这次示威变成他们一种信仰的合理表达，他们相信要想通过协商来结束越南冲突，必须付出更为集中的努力。然而不幸的是，虽然这次示威将真正促使对于该问题合理的讨论，但却面临新加入的极端主义分子破坏的危险。这些极端分子坚持要求手持越共旗帜进行游行。否则，他们将竭尽所能去激怒百万美国人民。

通过选取一张仅仅可以被称作骇人听闻的照片，《纽约时报》已经激怒了几百万的美国人民。媒体对冲突和夸张的重视，正与《纽约时报》对温和中立的政治趣味进行的较量。由于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纽约时报》又鼓励了它谴责的同一批“极端分子。”

同时，CBS的报道又制造了另外一种诋毁。^① 示威的前几天，华盛顿通讯记者布鲁斯·莫顿（Bruce Morton）播报了一则相对较长的（将近3分钟）的“时事新闻”，并预先设定了主题。该报道以莫顿站在白宫栅栏前的场景开始，没有示威者在此集合举行示威游行。莫顿说，栅栏是“刚刚被加固”的，示威将要求停火、以及其他通向谈判协商的程序。这条报道暗示：这次示威将会是一场和平行动，但对栅栏的加固却又表明，暴力行为不是没有可能发生的。

莫顿的开场是一个单独的画面——事实上，是他报道的第一个“段落”。现在，摄像机展示了美国纳粹分子手持“让可恶的支持者滚回家去”和“粉碎共产主义”的标语进行的示威；莫顿已经解释过，是去年四月那次2,000人的游行示威引发了如此的反对示威游行：“如果他们再次出现，没有人会对此感到惊讶。”伯克利美国军团驻地说，他们正雇用一架飞机用烟雾在天空中写下“羞耻（Shame）”一词。早前曾发生过一次反示威游行：西那库斯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一次3,000人签名的支持战争请愿（并上交了请愿的录像带）。展示即

^① 在CBS的新闻节目档案中，关于1月27日示威游行仅存的资料就是Burge Morton叙述的这一条“situationer”。CBS新闻的其他报道或许录在了录像带上（如果真的保存了下来，对研究者来说也十分昂贵）。或者，即便是录在了胶片上，也早已丢失。因此，我不能确定Morton的新闻就是典型的。但是，它是CBS对这次示威所做的仅仅两三条报道的其中之一。

将举行的示威游行的开篇“段落”，持续了21秒种。第二段的对应“段落”是关于反示威游行的，一共有23秒的时间，这样就实现了形式上的平衡。

现在，莫顿转向了报道的核心。“从各方面来讲，示威游行的活动太频繁了。”1965年11月26日，他解释说“不可能再有示威活动会产生什么作用了”。无论如何，总统都会到得克萨斯的。既然莫顿把作用当作了主要问题——其报道的指导性问题，他就可以提出反面评论以反驳他的无效言论，而无须修改他的新闻结构。于是，莫顿继续说：“示威协调人桑福德·戈特利布持有不同的意见：‘总统是一个政治人物，这是最为普通不过的了。’”戈特利布则在电视上辩论说：总统对压力做出了反应，或许他的反应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戈特利布继续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进行示威。莫顿问了戈特利布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这样的危险——公众对一系列关于越南的示威游行已经感到厌烦？”他通过一个问题来引出主题，因此戈特利布不得不将11月份的示威与其他示威活动区别开来。戈特利布本可以通过强调上一次华盛顿大型反战示威已经过去了七个月，或者通过强调政治差别来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示威。他选择了后一种方式，其他示威游行仅表示抗议；戈特利布说：“我们的示威则提出了具体建议：停止轰炸，改善谈判气氛。”莫顿已经建构了形势，因此无论戈特利布意欲何为，他们能采取的最强有力的行动就是播出并夸大左派内部冲突。

在创建了一个有效制约戈特利布的操作框架后，莫顿现在又对政府作了报道，以在形式上实现白宫栅栏的回归——战争制造者和反战者之间的分界线，莫顿对政府立场进行了传达：“国务卿拉斯克为示威者提出异议的权利进行了辩护，但他也提出警告说，他们有可能使共产主义者产生误解。”莫顿通过引用北京《人民日报》一篇鼓舞反战“群众”的文章，证实了拉斯克的言论。

换句话说，提出示威或许是危险的言论明显是多余的，无论如何在中国的宣传中有所暗示。而且，在引用了一个发言人采访中的一句关于示威观点的话（用这种方式来强调运动内部冲突）之后，莫顿用他无效性的主题作了概述：“大多数人怀疑美国对外政策会发生转变。”他继续说，示威可能仅仅能够在带来交通阻塞方面有所成效。虽然如此，莫顿总结道：“警察们还是盼望着忙碌而又和往常一样的一天。”

对策略大肆宣扬却把目的隐藏起来，莫顿要求旁观者将示威者看作是偏离了目标的策略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需要从合法性及潜力范围内来考察：它没有存在的理由，仅有表面现象。将该问题作了这样的定义后，莫顿又通过预示它的无能，贬低了示威游行的策略。但在这个认知框架内，仅可能存在不同形式的贬

抑。如果有潜力，那么示威就是危险的，正如栅栏、拉斯克和中国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无能，这场运动将是无聊的或是一次日常的、可笑的制造交通阻塞的行动。但在任何一种情形下都不过是一件令人伤脑筋的事。无论如何，在支持战争或立场不确定的观众眼里，这场示威都是毫无前途的。

莫顿的报道是传统性的。画面并不是目的，策略或许才是蕴含其中的意义所在；至少——它们留下了像栅栏和交通阻塞这样明显的标志。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事件通常被常规性的理解为策略，并且对运动内部分歧的重视也是这种常规的副产品。像亚历山大·肯德里克这样更有经验和思想的电视记者有可能通过一个专题来谈论政治目标，但是多数“硬新闻”记者却会对这一需要慎重对待的领域敬而远之。对策略的集中报道，既能确保记者们“直接走中间道路”，同时又把争论的包袱甩给游行示威者。从两个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日常报道的惯例是意识形态上的：(1)通过图片，他们展示了观众所偏爱的视觉道具和行动；^①(2)借助于形式上的均衡，他们使新闻组织避免了因表现出偏向而有可能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这些惯例同时具有维持并传播战时政府世界观的双重作用。

在媒体的架构力量面前，SANE比“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要坚强得多。SANE的成员和领导更加年长，组织也更加坚实，并且更适应示威游行的方式和媒体的运作。而且，SANE的组织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其领导和成员也十分稳定。桑福德·戈特利布和诺曼·托马斯每个人都有连续与记者及任何一个和平运动里面的人打交道的长期经验，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对谁说些什么或者不该说些什么。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其他新左派反战集团相比，SANE拥有一个明确清晰的自我形象，这种形象不是从关于它的身份及前途的争论中分离出来的。更加重要的是，SANE的政策令媒体精英们感到更加满意。

以上这些事实衡量了媒体报道过程的最低影响力，尽管SANE占有如此多的优势，它在媒体的扭曲面前还是十分脆弱的，并不比“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强多少。关于SANE的这篇报道的主要轮廓，早在示威进行之前就已被制定好了。政府对战争的支持基本上仍处在较高位置上，未受到任何挑战。媒体精英们早已适应了战争政策的主要方针。并且新闻业的惯例准则（报道事件而不是状况，报

① 理解的普遍方式具有文化上的独特性，并且这种独特性正开始为人们所理解。John Adair 和 Sol Worth 指出，例如，Navajo 和电影制片人采取的方式就与好莱坞的不同（区别之一：Navajo 人倾向于表现人们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路，而不是像美国人那样，将行走过程去掉，只保留开头和结尾，因为大多数美国观众觉得行走的过程十分无聊）参阅 *Through Navajo Ey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1)。

道冲突而不是一致，报道“推动故事发展”的事实而不是对这一事实的解释）与媒体的政治倾向也趋于一致：对战争的默许及对群众运动的怀疑。因此，附加在SANE之上的框架仅仅是附加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身上的另一面。SANE面对了媒体较小的压力，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来说，在媒体报道巨大的压力下，又该是何等地脆弱。^①

① Carol S. Wolman 向我指出了这一点。

II Media

媒体对运动的建构和消解

4. 1965 年的组织危机 / 88
5. 领导人的确认和公众人物的打造 / 104
6. 浮华的报道与越战 / 132
7. 温和派浮出水面:改革的时代 / 151
8. 缩减时间与淡化语境 / 173
9. 传播与遏制 / 180

1965 年的组织危机

媒体报道的意图是一回事，而实际的结果却是另外一回事。1965 年 10 月，媒体动员了镇压人民的右派和操纵权力的行政机关，诱使该组织出现两极分化。从那以后，媒体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另一部分新左派，以及他们的内部生活与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毫无疑问，1965 年间和 1965 年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发生的重大变化与媒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新一届成员的加入，新一代领导人随之产生，“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结构逐渐变得松散。所有的这些进程日积月累，最后促成了组织的危机，紧接着是尝试性地让解，但随之化解以失败告终。随后，组织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在区分媒体对整个公开的大众文化的影响、整个媒介环境中主流媒体的影响，以及媒体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所卷入的整个复杂社会过程中的影响时，出现了分析上的困难。如果说媒体深深地被牵扯到这场运动的历史中，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甚至显得有些松散。事实上，在其中的过程中包涵了大量的可能性——当然也有疑惑。

谈及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媒体的作用仅仅是与此有关。媒体报道中有暗示的结果；在打开一扇门的同时，又关上了另一扇。但媒体对于新左派运动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一问题不可能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我们不能通过维持其他事情，或者实验性地改变《纽约时报》或 CBS 的新闻报道来重演六十年代。在第二部分，引起我兴趣的东西更加微妙，令人无法捉摸。这就是为什么我用“意义 (significance)”“结果 (consequences)”而没有使用“影响 (effects)”一词的原因，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会相当自由地去观察运动——媒体的相互作用。我还要重申，我不是要证明，整个大众媒介系统要为这场运动的瓦解负责。这场运动发生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它形成在一个不乏局限性的职业管理阶层的基础之上，它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十分孤立，它有承担起组织全社会根本性变革的巨大庞杂的政治宏愿。它的阶级局限性、它的缺陷和误解以及美国的力量，所有这些重重地压

在它的身上，把它抛回到自身的矛盾中；所有这些都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加以论述。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场运动为它所宣称的和所需的公开性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进入到了一个与媒体不平等的竞争之中：虽然它也影响了媒体的报道，但这场运动还是十分脆弱，更容易受到攻击，媒体具有更多的决定权。但是，这场运动决不是无力的，不是从来就没有选择权，对整体上的运动—媒介体系也不是完全没有作用。

正如马克思所言，媒介塑造了运动，但并不是按照媒介自身的方式。第二部分将说明媒体对新左派的影响主要依赖于政治环境、媒介体制和运动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性质等因素。在进行必要的论证和展开叙述之前，为方便起见，我先在文章开头部分概括地提出我的观点。媒体通过下面几种方式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反战活动进行压制：^①

(1) 制造成员人数激增的现象，因此在领导人和普通成员中出现了隔代和地理上的松散（第四章）；

(2) 肯定领导人，并把领导人塑造成公众人物（第五章）；

(3) 鼓吹不切实际的言谈和武力（第六章）；

(4) 提倡适度的变化（第七章）；

(5) 缩短运动经验的时间期限（第八章）；

(6) 同时容纳并扩大运动的报道（第九章）。

1965年，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首次面对公众时，媒体的报道夸大了它的形象，一批新成员大量涌向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该组织中，新一代成员形成了自己的身份，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领导层，取代了元老派的位置。在断断续续的危机中，“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迅速地发生了转变。可是，这个转变的政治结果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容易受到这股新浪潮的波及？

成员激增和“草原力量”

我已经引用了这组数字，毫无疑问，1965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已被

^① 口气带有一定的谨慎，既是陈腐也是必要的。我建立分类，并加以逐个讨论，只是为了便于分析，而分析需要顺序。历史是持续、多线性、无边界和混乱的，分析性的分类是相互排斥的。一种用来领会和洞察某种现象的直接分类，不应被曲解成单一的因素。另外，我在第五章和第九章讨论过，媒体报道的持续影响已经在1965年有所表现，所以无法调整按时间顺序进行的划分。

新成员控制。他们分成了两派。一个形成于四月游行后，直至初夏，此时《新闻周刊》(Newsweek)《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新共和报》(New Republic)《国民报》(Nation)和《记者报》(Reporter)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也更加关注；第二次浪潮则是在秋季，尤其是在10月征兵危机新成员加入后。

很显然，春季人员的集中是游行本身（包括为游行开展的组织工作）和宣传的结果。克拉克·基辛格长时间来一直催促“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校园里组建新支部。基于这种原因，1964年12月，4月17日游行示威的计划才得以诞生。虽然一小部分成员对于“建立一个不现实的庞大组织”的目标感到局促不安，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不情愿始终保持沉默，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元老派成员以及经济调查和行动规划小组中与他们有牵连的人，不愿看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把目光转向大学，但他们失败了。基辛格的想法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应当通过组织民族反战行动，以招募新的校园支持者；然而却没有人想到要来依靠媒体的宣传。当然，示威游行之后，媒体的宣传出乎意料地扩大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影响，并在世界范围内向“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无法触及或不为人知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传播这个新组织的消息。但这次行动首先是作为政治行为和纳新机会被提出的，而不是后来所谓的一次媒介事件。

除了参加者，对每个人而言，游行和宣传的气氛都是一种单一的事件，而事件的结局则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4月17日之后被新成员吞没。首先，是那些非常着迷于反战运动的人。海伦·加威(Helen Garvy)，1964至1965年间任国家秘书助理，当他回忆起自己曾花费大量的时间与新支部领导人和成员进行电话联系时，表示试图“向所有因为这次游行而加入该组织的人传达，‘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不仅是一次游行”。^①媒体的报道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看作一个反战组织，别无其他，尤其是对于无法得到关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其他消息的外界而言，“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作为纯粹反战的形象，在众人中口口相传。夏天，在数千封寄往全国办公室的信件中，许多人都表达了这样的心声：“我看到了你们的文章，能不能再寄给我更多的宣传材料”；还有，“我从朋友那儿听说到你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我很想参与”。^②游行活动、人际

① 1977年3月25日对Helen Garvy的采访。

② Kirkpatrick Sale, SD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p. 216.

宣传——大量的意义和吸引（还有排斥）相互交叉、缠绕、扩大，并不时地纠正彼此。

许多这些新成员来自内地，他们改变了组织的重心。他们是来自南部和大草原的新成员，用一个来自俄克拉马州成员的话就是，他们“天性上更加激进，他们的激进几乎来自恐怖行为，这种行为是反社会的根源。”^① 他们比东部人更为异化，甚至那些来自东北部的追随者，尤其是来自纽约市的人，接受作为美国式和平主义标志徽章的草原身份（1967年初，“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休伦宣言》中，提出新左派是“新工人阶级”的先锋）。这些“草原力量”的人留着长发，看起来比元老派那一代人更加放荡不羁，少了几分庄重和涵养。较之元老派，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称做无政府主义者；当他们在1966年会议上形成自己的政治立场时，无政府主义被叫做学生工联主义。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他们代表学校组织并反对集权的全国办公室。事实上，当时大多数的元老派已经离开了学校。1967年初，得克萨斯支部在校园组织了名叫“温和星期四（Gentle Thursday）”的活动。他们可能不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第一批吸食大麻的成员，然而他们的周围环境使他们很可能会成为第一批（在俄克拉何马州大学）因此而被捕的人。^② 在北部和东部可能不易察觉的反叛姿态，在首都以外的地方却呈现出愤怒的含义。由于来自家长、当局和同僚敌对的推波助澜，这些姿态和探究代表了一个站在反叛立场更为明显的亚文化。

但是，恰恰因为元老派没能够融合新的成员，“草原力量”才得以巩固。正如鲍勃·罗斯（Bob Ross）曾讲过的，1960年以来，元老派通过吸收新成员逐渐扩大，它把新成员一个个地领入到了充满个人热情和体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思想政治风格的圈子中。但是，如今元老派却在经济调查和行动规划的过程中分散了，在校园和城市的贫民窟中出现了分化，变得靠不住——并且被新成员冲垮。新成员中有许多人容易发生转变，而且他们分布得太广，以至于无法被吸

^① 1977年1月19日，James Russell的采访。关于“new breed”，见1965年会议，Sale, SDS, pp. 204 - 207.

^② 1966年，俄克拉何马州殴打事件发生后，国民组织中有些人认为吸毒者应当受到指责。而且，一个更大的组织（或许其成员都是教徒）认为，法律上吸食大麻是值得为其辩护的，但仍是一种政治转移和策略愚弄，国家组织将不再予以承认。参看NICNAC（National Interim Committee/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会议记录。1966年1月18日，援引一份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美联社急件，1月10日刊登于《纽约时报》。

收到友谊的阵营之中。^①“草原力量”的成员跟更为理性的元老派，他们主要来自西部和中西部地区，其中包括许多犹太人（虽然是少数派）——没办法相处融洽，而且他们更多的很可能是中产或中上层阶级出身。一些元老派不欢迎这些“新鲜血液”，部分是由于该组织被认为是代表着更深、“更美国”的根源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优势会让元老派从繁重的领导责任中退出。^②其他一些人，阿兰·哈伯（Alan Haber）便是其中一位，则意识到了新成员的加入带来的压力，“人们加入进来却与组织的网络脱离联系。直到那时，相当多的人被吸引进来（直接地）……现在，人们开始加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因为它像旅游者协会一样，是个应来的地儿。而我们没有准备吸纳那些一时冲动的人。（媒体更喜欢用的词是“活力”）……如今我们一下子背上了负担。^③”不过哈伯很快又补充道：这种负担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只要“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反对战争，大规模的游行和宣传势在必行。

元老派的不安十分明显。1965年末，观察敏锐的罗布·伯雷兹（Robb Burlage）在一封信中，清楚地记下了领导人的这种不安。伯雷兹是元老派的一位早期成员，得克萨斯人，具有草原人的精神；作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的一位边缘人士，他的位置更适于观察新的局势：

令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每个人对突然成为国家力量的一部分感到非常紧张、不安，我们怀疑支持者的真诚。一方面，我们坚持走“封锁”的道路，而另一方面我们继续走着NAC的道路（参考国家行政委员会和国家结构）。虽然在方向上有好的建议，但是对于人员的激增以及不断扩大的运动家庭，尤其感到不安……^④

事实证明，元老派可能陷入困境；只要它没有产生一个令人信服的组织议程，它将仍然不得不放弃它的权力。

① Ross的三个假设尤其恰当：①如果新成员不被融合到先前存在的主要组织中，而是留在组织内，他们更有可能成为组织转变的因素；②新成员形成自己组织的主要联系网络，并且意识到新成员的共性，他们将形成新一代的运动人员。③一个组织的纳新速度越快，它就越依赖于富有经验的人的派系来保持有序的决策。Robert J. Ross, "Primary Groups in Social Movements: A Memoir and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Voluntary Action Research* 6 (1977年6月至10月): 139-152.

② 这种混合的情感在Paul Booth的信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引自前面的第三章。

③ 1976年12月9日，对Alan Haber的采访。

④ Robb Burlage致作者的信，1965年12月9日。

谁将站在话筒前？元老派的瓦解冰消

元老派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组织结构一起出现又一起削弱。随着成员人数激增和对外部形象的关注，旧的组织结构开始瓦解。长期以来，全国办公室一直任用成员秘书来负责与各支部保持联系，包括回复日常的信件。如果每天只有二十几封信，信件联络尚能正常运转。但是，在二十个活跃的支部，仅仅一个校园邮递员是无法一天处理几百封信件的，更何况还有沿着海岸线的几百个支部、十几个不直接隶属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社会项目和坐落于洛杉矶、波士顿和纽约的地区办公室。面对外界——迫于媒体的要求和战争的紧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日益感到无力处理自己的内部民主生活。

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元老派在组织中牢固统一的地位逐渐衰弱，“草原力量”随后开始掌权。即使在新一代取得胜利之前，部分元老派就已经发展出了与全国办公室对立的利益。先是 ERAP 组织者出于种种现实目的，脱离了校园和国家组织。然后，又有一些人到了洛杉矶，并在西海岸建立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第一个前哨。值得一提的是，建于 1965 年 7 月的洛杉矶地区办公室（the San Francisco Regional Office, , RO）由于缺乏正式接触，很可能对以媒体为中心的活动感到不满。肯·麦克埃得尼（Ken McEldowney），第一位迁往西部海岸的元老派成员，也是洛杉矶地区办公室的发起人之一，回忆起他对“组织完整”的关心时说道：

事实上，整个秋天，没有来自全国办公室的一点消息。什么都没有发生。实际上，我们只为自己每个月的新闻简报忙碌着，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和意图。^①

突然，一个新成立的办公室，不但对国家政策一无所知，而且在远离组织中心的地区缺乏深厚的根基，却被要求来代表由于媒体而声名鹊起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谁将对这个地区性的组织加以界定呢？“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国家范围内传播的形象与洛杉矶地区办公室的计划发生了抵触：“我们正竭尽所能”，麦克埃得尼回忆说，“不仅仅是一个反战组织”，“我们正努力与农场工人和校园展开合作”。^② 对于麦克埃得尼和其他人来说，这并不仅仅是全国的报道框架问题，还是一个报道的渗透性问题。

① 1976 年 12 月 26 日对 Ken McEldowney 的采访。

② 同上。

麦克埃得尼将抱怨发泄到全国办公室上：如果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基本信息系统其他事情都干不了，至少它能起到传达内部不一致的作用。麦克埃得尼的许多猛烈抨击忠实地指向了工作日程计划，其中不乏针对工作日程计划的信件中无关紧要的消息（不久前，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还是个紧密的联系网络时，就传下来了油印小道消息的传统）。但是，麦克埃得尼主要谈论的是内部联系的中断，以及控制“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形象的权力之争。“在（十月草案）危机期间”，麦克埃得尼写道：“我们惟一稳定的信息来源是报界，所以我们不得不去猜想一条或另一条报道或者一次和另一次行动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①尤其是全国办公室引用布思广泛宣传的“自由”和“保卫”、“建设，而不是毁灭”的声明来回复卡特森伯克和约翰逊的指控后，西部海岸的愤懑情绪开始膨胀起来。我已经（在前面的第三章）引述了从洛杉矶发给布思的抗议电报：派别情绪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膨胀，而现在它的存在有一个牢固的理由。很明显，1964年9月，派别这个词在国家委员会会议上首次使用。在那之后，我在一封信中曾提道：

现在我强烈不安地感到，矛盾使得团结组织受到严厉的批评。这种矛盾虽然难以识别，但却十分强烈。之所以说难以识别，是因为所涉及到的政治情绪和个人偏爱两种因素加起来，似乎不足以解释激烈的言辞和秘密的分裂会议。还有更多基本的错误，这些错误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规模以及原“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感情基础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②

为了安抚已脱离学生运动的元老派，并且将权力顺利过渡到新一届的领导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国家委员会表面上支持成立领导培训机构和已毕业学生组织的提议。但是，该机构和新组织从来没有变成现实，因为元老派对这样的领导层举棋不定，而这种举棋不定妨碍了它通过的举措的实施。

事实上，元老派已步履艰难地走了很长一段的时间，对于现存的组织形式虽感到不安和无法忍受，但却无法与其彻底决裂。不知不觉地，元老派在新的价值观和旧的形式之间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③一方面，它倾向于社团主义价值观和分享民主制，这种民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关系；另一方面，它又有所谓的

① SDS Work List Mailing, No. 27, November 17, 1965.

② 作者致 Robb 和 Dorothy Burlage 的信，1964年9月12日。

③ 参阅 Norm Fruchter, “SDS: In and Out of Context,” Liberation 16 (February 1972): 19-32.

“进取的年轻人”，这些人能言善辩，对社会的标准组织方法和秩序规则很在行。^①“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坦率地承认身处价值观与组织形式之间的矛盾之中，与此同时它一方面坚持旧的形式，另一方面又把旧的形式贬低为“资产阶级的”；因此《“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章程》（《SDS Constitution》）连同精密的规章制度和正式的陈述、表决条款，都成了闹剧。无须承担正式的责任，一些元老派却能够保持一种非正式的影响力；他们应邀作宣传，但是却不必再从事繁杂的委员会工作。行政工作不受重视，地位低下（例如布思的政治孤立）。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整个元老派没有认真对待这次组织危机。的确，它确实没有像团结的精英团体那样发挥作用。无论在中央行政和地方主义之间，还是在校园和组织所依赖的社团之间，都出现了分裂。它无法处理各种新的压力，也不能确立新的形象。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为外部世界的一股政治力量时，各种派别终于得以形成——它们源于地理差异、政治差异，也源于两代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这些所有的分歧堆积到了一起。“草原力量”的压力以及布思与西海岸“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之间的斗争，都暴露并且加深了一个不可逆转的确凿进程：新的政治身份和媒体的报道，正在分解这个旧的原本亲密和谐的团体。

在混乱之中，元老派只收集到了一个重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具体建议：它同意就政治意见举行会议，同意尝试恢复政治舆论。1965年的十二月会议，是元老派重建组织形象的最后一次机会，这次尝试失败了。不过在失败的那一刻，“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清楚地看到了危机的实质。

从团体运动到全面运动

在伊里诺斯州召开的十二月会议，更加清晰地暴露了该组织的缺乏一致；它的失败为新一届领导扫清了道路。元老派组织者的工作报告未列入公告；各章都连篇累牍讨论反战事宜，以至于那年初秋，一位校园巡回组织者提议将会议推迟到第二年春天。但是一些“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领导人的确领会了这种暗示，并且数月来首次把他们的想法写下来。也有一些人隐约地意识到媒体及其报道带来的压力。这些报纸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选择一笔带过，这既反映了组织身份的改变，同时也是表现媒体力量的一种方式。事实证明，仅有敏锐是远远不够的。

① 许多元老派的成员都被卷入校园的政治党派（包括 VOICE，SDS 在 Michigan 大学的支部）、学生政府和国家学生联合会。

保罗·布思发现自己被暴露在媒体中，并且首先感到来自内地的愤懑；现在他看清了现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布思认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的松散归根到底是在目的上存在分歧。怎样与媒体打交道，这个在洛杉矶提出的问题引发了布思更深的思考：“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政治身份究竟是什么呢？布思认为：

对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来说，最为根本的问题是它兼备两种社会功能：它既是美国左翼最为有力，而且是最为需要的表达工具；也是由学生组成的激进组织。^①

布思接着说，越南战争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领上一个由行政机关、越南人民和右翼势力主宰的地盘。布思希望，这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主动地进入政治领域：

政治家和记者们认真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对自己同样严肃。但是，如果把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因素来认真对待，就将意味着不再重演前三次国家委员会会议的历史。在那几次会议上，对于程序的讨论是极其散漫的。

但是由于一如既往的随意，“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向埃文斯和诺瓦克敞开了大门，并由此开始面对随后一连串的报道：

没有人认真考虑我们受到公众什么样的反映。因为这点，讨论活动计划时的方式非常松散，很多粗蛮的提案也都被漫不经心地提到，完全不去想想，来自媒体的人会如何随心所欲地转引这些讨论。

布思继续为“建设，而不是毁灭”辩护。在埃文斯和诺瓦克之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奋力夺取对宣传的控制，但争取到的又是一次失败。

伯克利逃避兵役的传单公开散发、征兵卡被烧毁时，一切都闹翻了天。再也不可能利用公众对征兵计划的兴趣来谈论战争了；局势发生了逆转，并且在约翰逊令卡特森伯克暗示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领导层中有共产党时变得更为严重。我们处在守势，并且当有人问及草案时，我们试图将话题转移到战争上，但却收效甚微。

“建设，而不是毁灭”，他争辩道，是一项针对媒体制定的策略，是为赢回

^① Paul Booth, "National Secretary's Report," 1965年12月.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对自身形象的控制权所设计的策略。他知道，要想直接地干预到时事政治事件中，“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就不得不与媒体打交道；并且媒体会强行加入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中去；因为一个政治性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将不得不遵守媒体的规则，不管其政治见解如何，所以它将去对集权形成压力，可能使其分裂为非集权的、成分复杂的组织。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原本可自由地选择模糊的立场，并自由地运作，因为它是依靠组建者的团结精神、相互关心和高度一致统一起来的，而不是依赖它的外部形象。现在，媒体要强迫它表明立场。各个支部可能会在“巴南效应(Barnum effect)”中感受温暖和舒适——“我不在乎他们说些什么，只要他们别把我的名字搞错就行”——但是全国范围的组织领导将丧失向成员界定组织性质的能力。所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不得不通过授予其决策人更多的权力，来弥补更多的漏洞。既然如此，正如布思所说，如果“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想要活跃在公众目光下并保持民主，它就急需一个机制，以使发言人能够明确地予以解释。正如布思所言，

令人吃惊……这个组织拒绝承认它在美国政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且因此拒绝创建为日常决策负责的机制。

在元老派中，布思决不是意识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正处于关键时刻的惟一个人。对于前国家秘书李·韦伯(Lee Webb)来说，面对外界的新情况，“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无法使新成员融入到深刻的政治反思之中。韦伯感叹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缺乏丰富的内在智性生活”，“与其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把它的成员变得更加激进，还不如说是让他们更为好战”，“我们正在敞开左翼的大门，而关上了右翼的大门”。最后，韦伯不止一次地说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没有一个真正的成年人”，“我们必须扩大组织的成员基础，而不是逐步升级策略和好战情绪”。^①

但是，十二月会议成了元老派的最后欢庆之所。甚至，恰恰因为参与者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重要性的狂热，这次会议看起来软弱无力。谈论漫无边际，毫无定论：显然，大多数新成员对元老派用来探讨世界的术语和直觉判断无动于衷。鲍勃·罗斯(Bob Ross)是元老派的成员，在回忆起自己曾经参加过的一场思想研讨会时他这样描述道：“从自由市场无政府主义到技术治国方案，

^① Lee Webb, "Conference Working Paper, and Suggested Priorities for the N. O.," 1965年12月。

十五位参与者的观点迥然各异。”除了罗斯，没有人读过1963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策略性文件《美国和新时代》(America and the New Era)，也没有人看过怀特·迈尔斯(White Mills)的《致新青年左派的信》(Letter to the New Young Left)，这封信在元老派中广为流传。^① 妇女们召开了史无前例的会议，讨论她们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的位置。而且，为了保证言论自由，会议禁止男士参与其中。这次女权事件预示着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女权运动风起云涌般的高涨，同时也暴露出，元老派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在思想和精神上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部分地建立在妇女服从的基础上。在随后的国家委员会会议上，惟一切实的进展就是决定出版一份组织的周报——《新左派通讯》(New Left Notes)。

到1966年6月的会议召开，“草原力量”的领导人终于走马上任，尼克·埃格森(Nick Egleson)在主席竞选中击败了李·韦伯，韦伯谨慎的联盟主义策略被以青年为中心的“学生工联主义(student syndicalism)”击垮。^② 实际上，正是韦伯将埃格森安排进全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埃格森比原元老派的成员年轻，能够起到沟通两代人的桥梁作用。但是现在能量的中心在以“草原力量”领导人格里格·加弗特(Greg Calvert，来自依阿华州)和卡尔·戴维森(Carl Davidson，来自内布拉斯加州)为核心的全国办公室里。在国家委员会中，几乎所有人都支持“草原力量”。^③

几年后，一位元老派成员对新的领导人进行了肯定的评价：

很显然，引入了新的创新力量。直到他们来了以后，我们才意识到要搞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这些人并没有任何知识分子背景和政治框架。^④

继而，十年之后，对于相互的决裂，两个派别都感到非常后悔。^⑤ 这是一次转变，也是一次分裂。如果当初能够实现联合，两代领导人就可以结合本来并不矛盾的政治知识、对工作重点的理解和经验。事后看来，每一代领导人都有自己

① Ross, "Primary Groups," p. 144.

② 由于“Prairie Power”不像元老派那样公开自己的主张，我很难引用这些见解来说明他们代表什么。关于他们最翔实的可能便是Carl Davidson的小册子，“A Student Syndicalist Movement: University Reform Revisited,” 1966年9月9日刊登于New Left Notes，并于同年秋重印。

③ Ross, "Primary Groups," p. 144, 引自Sale, SDS, pp. 272 and 283-285.

④ 1977年1月9日对Richard Flacks的采访。实际上，1966年“Prairie Power”一些执政的领导人确实来自工人阶级，Old Guard却很少如此。

⑤ 1977年8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密歇根举行聚会，这是当时我在一些访谈和一般性的非正式交谈中收集的。

明确的方式，以很好地适应各自的组织阶段，尤其是要去适应招新模式，无论是单独地还是大规模地招募新人。直接的领导所需的天分与技巧在面对媒体时就无用武之地了。但在 SDS 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这一舞台如今是为公众人物而搭建的。

媒体早期报道的政治影响以及 SDS 脆弱的根源

对于现实的和潜在的朋友和敌人以及新成员和盟友，他们看待运动的方式是受到了早期媒体报道怎样的影响呢？由于可以参考的资料较少，我们只能对此做些推断。没有系统的观察记录，也没有系统的观众评价调查以及社会领域对前后调查和实验的追述。由于一般性的社会心理文献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所以在新问题和新观点以及模糊或高度情绪化的问题上，大众传播是最为有效的指示器。^① 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美国公众来说，他们并没有关于 1965 年反战运动的经验，而且这次战争是个相对新鲜的事件，由此可以推断出，在界定问题和选择措辞、为运动及其后的反应设置框架方面，早期的媒体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尽管这当然并非发生在意识形态的真空地带。通过选择和强调一些事实，并且通过把它们置于某一框架之中来贬斥反战运动，并使之边缘化，媒体确立了一个迎合行政机构世界观的报道底线。后来发生的事情和媒体的报道改变了原来的说法，但是他们仍然不得不在最早关于新左派和反战运动究竟为何物的定义基础之上修正。在对运动进行报道时，添油加醋地掺杂进不相关的话题（暴力、越共旗帜），同时尽可能少地报道反战的理性论证，通过这些媒体让正在蓬勃兴起的运动和它潜在的自由主义盟友隔绝开来，这样的分析不可谓不合理。^② 同时，积极反战的自由主义者逐渐学会了利用媒体去增强他们折中的立场，他们要求美国停止轰炸北越（但不是南越）和无条件谈判（但不是撤退）。

早期的研究证明，反叛活动的媒体报道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公众身上的。詹姆士·哈罗兰（James D. Halloran）、菲利普·埃略特（Philip Elliott）和格拉汉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总结说：1968 年，在伦敦举行

① Joseph T. Klapper, *The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0), pp. 53 - 60.

② 根据 Daniel Ellsberg 所言，约翰逊政府将早期的反战运动视为不合情理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想法是服务于自我的，因为政府封锁了许多消息，将本应进入政府讨论之中的力量排除在外。但是，对于某一个人来说，或许他会知道媒体是如何描述这场运动的，以及媒体如何见风使舵，帮助政府将这些力量隔绝在外。1977 年 3 月 2 日，对 Daniel Ellsberg 的采访。

的反战游行的新闻报道，以“这次示威是否属于暴力事件”为框架，事先刊登了数周的时间。^①在得知媒体根据自己强加的框架来报道示威游行后，哈罗兰、埃略特和默多克对报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对示威者、警察和未参与运动者等样本组进行了调查，虽然抽样不是随机的，但“却有清楚的迹象表明，这些受众……是从新闻报道所提供的框架来定义并解释这次事件”。^②在对这种观点加以概括时，默多克总结说：

现在不断激增的证据有力地表明，新闻媒体的确把他们用来探讨形势的定义和解释框架提供给许多人。此外，该过程是自我强化的。众所周知，特别的形象和界定可以进行广泛的传播，这使它们更加有可能成为新闻机构的选择对象，以作为展现新形势或不甚明朗形势的框架。反过来，这也可以促使形象得以强化并不断得到传播，成为常见类型储备库中的一部分。

然而，虽然媒体能够有助于塑造公众意识，但却不能决定对公众所产生影响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当然，这是经验研究中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假设，媒体的报道对于人们最深的影 响是不知不觉的，尤其是在报道相对集中一致、并且长时间内重复同一主题时。但是，不断重复报道的线索是如何挖掘的呢？在对 60 年代早期一些英国青年派的绝大多数进行了采访之后，斯坦利·考翰 (Stanley Cohen) 将公众态度与新闻媒体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发现了一种广泛存在的抵制情绪：

就这种比较的绝大多数层面而言，和任何被调查的公众观点的样本相比，大众媒体对运动的反映更为极端和类型化。这不是说大众媒体塑造的形象不被接受，也不是说它在塑造公众形象中不占据主导作用，而是公众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这些形象，他们去调和其更为极端的含义。从这种意义上说，公众更了解种种现象，而非媒体或媒介常引用的那些道学先生们。^③

① James D. Halloran, Philip Elliott 和 Graham Murdock 的 *Demonstr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0) .

② 该引述出自 Graham Murdock 的 *Political Deviance: The Press Presentation of a Militant Mass Demonstration*, 收集在 Stanley Cohen 和 Jock Young 等人编著的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73), p. 172. 未参加者集中观看了电视报道，但 Murdock 没有探讨该背景在认知框架中达到的效果。同时 Murdock 还指出了 Paul Hartmann 和 Charles Husband 所作的研究，该研究认为，白人青少年对非白种人的态度改变并非源于他们对于非白种人的直接经验，而是源于媒体对非白种人的报道。见 Hartmann 和 Husband 的 *The Mass Media and Radical Conflict*, 以及 *Racism and the Mass Media* (London: Davis - Poynter, 1974) .

③ Stanley Cohen,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London: MacGibbon and Kee, 1972), p. 201.

公众可以调和，甚至拒绝媒体报道中极端的力量。但是，对于报道的认同，以及该问题存在于公众直接经验之外的程度，媒体却能对此加以推进，并制约和限制公众的讨论。媒介框架对于问题的诠释和设置，这一权力最重要的功能在于为框架设置者控制公众生活提供了力量。

媒体提出问题，然后公众来讨论和解决。不同的受众可能会有不同的解决办法，但是不管怎样，都无法超出媒体的报道。例如，媒体对1965年和随后关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报道吸引了一批民众（主要是已有反战倾向的学生），同时这又是对更年长和更保守观众的反叛，这是完全可能的。或许这恰巧是一种“巴南效应”：基本无需考虑如何制定媒介框架，光是通过对运动本身的报道，媒体就有可能引起公众的兴趣。1965年，通过发表使人们很难保持中立的刺激性言论，媒体不断诱使大众产生分化，至少这是可以想像的。为了更深入地弄清这种想像，道理上说就要知道人们有的消息灵通有的闭塞，有的受过良好教育有的没有，有的对此颇为关注，有的漠然置之，有的意识形态倾向明显有的淡漠，这各色人等对不断重复的新闻形象有何反应。

最后，我们可以从更为宽广的社会学范围，从60年代更广泛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的角度来把握这场运动与媒体之间的相互影响。1965年，在很大程度上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秩序中，占主导地位的媒体承担着稳定政治的义务。作为新闻传播者，他们工作在约翰逊政府所领导的政治舆论内，一个从未打破的舆论机制。随着后来对学生运动内在的社会与心理特点的日渐强调，学者和媒体都忽视了自由的本意。被社会遗忘的疑惑，还有倒行的自由主义在这段历史时期不断蔓延。一个人很容易忘记，对于战争“相当”的怀疑是多么的微弱；以至于只有两个参议员，俄勒冈州的默斯（Morse）和阿拉斯加的格鲁恩宁（Gruening），反对1964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托金决议》（Tokin Resolution）。甚至，格鲁恩宁为其投票作辩护的议会发言在《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上都至字未提。^①对于新左派无节制的指责，轻易地忽视了这一事实：代际政治需要两代人共同参与。对于这段时期，托马斯·鲍沃斯（Thomas Powers）回忆说：

那些领袖们全都保持沉默或谨言慎行，到处都是这样。教会什么都不说，工会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甚至许多呼吁和平和裁军的主要发言人，也更倾向于谈论

^① James Aronson, *Deadline for the Media*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2), pp. 74-75. 这是我在同《纽约时报》的记者 Mars Frankel 电话交谈之前写下的；Frankel 忘记了 Gruening 后来作为一名参议员和 Fulbright 一起反对这场战争。

未来依稀缥缈的世界和平，而不是当前的战争。政治家和学者花费了三天时间讨论和平，但是他们没有真正地认识在越南发生的战争。^①

如果不是越南两个民主行政机构操纵并贬损反战运动的报道，大量自由的媒介精英将会对这场运动表示同情。政治义务和媒体报道是不能分离的。

这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组织危机一个深刻而并不明显的根源。由于老左派被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和自身意识形态的枯竭与贫乏毁灭，新左派被迫去努力获得新生。同时，既要尝试为激进主义创造新的思想基础，又要在没有任何政治当权者引导的情况下发动反战运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很容易被它自身的任务压垮，尤其面对媒体的游戏规则显得十分脆弱。^②“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既想成为组织得井然有序的共产主义集体运动，又想发起民众政治运动，这必然要求和民众通过中介发生关联。于是1965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没有“家长（parental）”指导的转变之中。^③

政治上的孤立，组织结构、领导人的举棋不定、空想和缺乏经验——所有这些互相交织，共同导致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脆弱。由于资源匮乏，人员短缺，对于记者的计划和标准缺乏判断，SDS从刚开始对如何管理公众关系就没有多少兴趣。虽然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尚处发展初期并不为人所知时，还能运作良好，但对突然跃入人们视野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来说，培养和媒体的关系看起来本不应该是官僚和“商业化”的。找到媒介观察的“视角”，研究媒体的运作和它们的兴趣，实现分工，并且拿出专门与记者打交道的成员——虽然这些行为难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但至少首先是对任务的一个保证。1965年，当决定在一个大的政治范围展开工作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仍希望保留其共产主义出身的随意性。因此，它为布思这样难以驾驭的官僚，传达了矛盾的命令：替我们在政治舞台上表演，但不要追随传统的方向；代表我们，但并非敢于代表。

这个刚刚准备好战斗并且雄心勃勃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现在格外

① Thomas Powers, *The War at Home: Vietnam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1964-68* (New York: Grossman, 1973), p. 50.

② Christopher Lasch 和其他人强调“the missing generation”对左派的重要性。参看 Lasch 的 *The Agony of the American Lef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第五章。

③ Michael Paul Rogin 指出，新左派进入了政权的更迭，并且媒体不知不觉地服务其中。媒体更像是母亲般的哺育，而不是父亲的命令，然而在从私有（家庭社会）到公有范畴（现象的）的转变中，它们更是一个替代品。参见后面的第九章。

容易遇到派系分化的攻击。果不其然，“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走向公众的1965年，是列宁主义开始在组织内有所进展的一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像一块肥沃的土壤若隐若现，尤其对进步劳工党的毛泽东主义来说。元老派已经失去了统治地位，而“草原力量”的转变既不完全，也不稳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身份遭到了玷污。被模糊的新形势所困扰的新成员，能从由派别清晰的线索中找到一丝安慰。在随后的几年中，虚无的暴力引发了真正的暴力，界线产生了对立的界线：最后，“气象员”派（the Weatherman）发动了犯罪和恐怖的自我毁灭的政治，来反对他们看到的正在进行中的革命。1969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的“气象员”派和进步劳工党撕破了这个他们赖以生存的群众性组织。

5 | 领导人的确认和公众人物的打造

公众人物的打造

面对瞬间成名的诱惑，新左派运动失去了对于领导人的控制。公众人物作为运动的政治资源和实现政治目的手段，已经沦落为一种个人资源，可以进行投资、贮藏，可以争夺——甚至被抛弃。对于应该如何领导，领导者们一开始就带有矛盾的心理，因此他们很难对待自己权利的来源以及这种权利所涉及到的义务。运动组织的成员们自然寄希望于领导者，但同时又对这些人心存疑虑。这种矛盾的心理使得领导者的地位难以维系，但又不乏相当的诱惑。文化制度需要公众人物同运动者的愿望和谐一致。

从媒介的角度来看，新闻包括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就像戏剧一样，可以得到承认也可以得到解释；大部分的新闻被认为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东西。一旦个人被认为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他就被赋予了在一定的限制范围内去制造新闻的权力。在对现实的诠释中，组织、机构、运动——实际上，所有更大、更持久存在的社会组织——都沦为了一种个人象征，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新奇：至少从19世纪30年代大众商业媒介开始，个人就已经成为新闻报道的中心。^① 在市场和商业领军的时代里，人类的利益吸引了大批的受众，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广告商身上。如今，随着视觉媒介对人类面孔的再现，收音机对人类声音的讲述，以及电视在戏剧化的环境中对人类历史的不辍探索，新闻更加注重人们的兴趣。对于

^① 参阅 Michael Schudson 的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Basic Book, 1978) 第一章; Helen Macgill Hughes, *News and the Human Interest 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0); Robert E. Park,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Newspap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2 (November 1923): 273-289; 以及 Robert E. Park, "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5 (March 1940): 669-689.

最容易成为日常消费品的戏剧而言，它看起来更像是有关一些公众人物的作品：比如修道士、重要的人物或者明星。这些人身上有着一种我们称之为“魅力”的东西。正如弗兰西斯科·艾尔布罗尼（Francesco Alberoni）所写的，明星是“人们全体推崇而成的”。^①个人越是容易得到公众所承认，他就越容易充斥着一些幼稚感情的残渣。现代人既缺乏传统的根基，又没有对上帝强烈的信仰，他们渴望与一个理想化的长辈进行交流，同时也渴望自己是个理想化的人。但对于一个在形式上信奉平等价值观的社会来说，他也希望能将这种理想化的长辈带回到人类的尺度上去，一种令人惊奇的尺度：介于生命和神灵之间。这些人们渴望的形象，一旦被赋予，就已经被系统地搬上了现代社会的银幕。随着资产阶级和民主价值观的兴起，以及贵族和王朝统治的衰败，政治权力从个人魅力中分离出来。法庭丧失了它对知名事物的垄断权，而明星制度伴随着权力系统也得以出现。严格意义上讲，明星或公众人物恰恰是那些没有占据权力制度位置的公众人物。^②

因此，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文化制度——新闻制度乃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习惯上需要公众人物，同时也能制造出公众人物。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大众消费阶段，这种过程的速度不断加快。新闻价值是使公众人物的名字家喻户晓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有一点，名誉可以被公众人物或媒体成功地利用，从而成为更有名的东西，这就像金钱或者存款的利息一样。新闻价值意味着被人们所公认，这种公认又将会导致诸如电视脱口秀节目的出现，还有聊天专栏、校园旅行、畅销书合同和其他一些东西。怀特·迈尔斯（Wright Mills）指出了公众人物们令人不满的独特品质：

专业公众人物，无论男女，都是社会的明星体制所追捧的结果，这种结果引起了人们对竞争的盲目崇拜。在美国，这种制度可以归纳为这样一点：如果一个人能比其他人为更熟练地将一个小球滚到地面上的小坑内，他就能获得和美国总统接近的机会。收音机上的聊天节目和电视娱乐节目成为对行政官员、内阁成员和高级军人的诱饵。这个人到底擅长些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他能在和其他所有人的竞争中胜出，他就有名了。紧接着，明星体制的第二个特征便开始起作用了。其他领域或者其他位置的所有明星都向着这颗新星靠拢，这颗新星也向他们靠

① Francesco Alberoni 的 “The Powerless Elite: Theory and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Phenomenon of the Stars”，收集在 Denis McQuail 等人编著的 *Soci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2), p. 93.

② 同上, pp. 75 - 76

拢。相应地，成功者或优胜者就是那些能和其他优胜者在公众人物世界里和睦相处的人。^①

公众人物诞生过程的背后不仅仅存在着竞争，也存在着一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对公众人物的拥护者或狂热者来说，取得和明星们一样的成就并非痴心妄想。不管机会多么遥远与渺茫，总能引起人们无尽的遐想和羡慕之情，而不仅仅是嫉妒。^② 公众人物世界也能够在社会原则的某种真空环境下发展，这种环境缺乏一种超越个人成就的纯粹价值观。在一个缺乏感情、极度不平等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纯粹是商业性和相互利用的关系，公众人物的不断出现是存在着一定合理性的，这种公众人物几乎只代表他们自己的名誉。他们和大众的关系并不具有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说的那种超凡魅力，所谓的公众人物们并没有具体化一致的价值观，因此取代领导权的是声望。正如威廉·考恩霍泽（William Kornhauser）所写的那样：权力标准和领导权的衰败给人们带来了忧虑和不安感；整个社会中弥漫着缺乏社会方向的无目的感。这种状态使人们产生了对新权威的要求，也增强了人们对于伪权威的感受。^③ 在媒体制造出来的公众人物和观众的关系中，领导的气质和个人魅力可能被染上一种诸如“明星品质”的神秘色彩。

不管从何起家，公众人物们总能够逐渐具有一种公众人物品质，并使这种品质像权力一样能够利用。受骗人数增加了，可到底是谁在欺骗谁呢？观众可能会抱以一种流行、侵蚀性、玩世不恭的态度，而不会去疯狂、盲目地轻信别人。轻信和玩世不恭或许会奇妙地共存，但在品质高尚、经验丰富、知识渊博和技术的基础上，建立真正权威的可能性却逐渐地遭到损害。相反，无论任何时候，当我们要求得到一种牢固建立在象征符号、而不是对于规范祈求基础上的权威时，我们都能够得到它。^④ 制造名望者在没有检验的情况下就被人们赋予伪领导权，这种做法明显会对真正的权威产生影响。这种过程往往是可笑的，可正如我们将要

① C.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74.

② Alberoni, "Powerless Elite," p. 78

③ William Kornhauser的"Mass Society," 载于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and The Free Press, 1968) 第十期第63页。

④ 同上。"Pseudo-authority" 以及 "pseudo-leadership" 同 Jeremiah F. Wolpert 的 "pseudo-charisma" 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Wolpert 也将这一概念与 Weber 最初的观点区分开来，也就是：“当今时代的伪领导气质违背了其早期的特征，因为它可以利用大众信仰捏造出来。” (Jeremiah F. Wolpert, "Toward a Sociology of Authority," 收编在 Alvin W. Gouldner 等人的 *Studies in Leadership*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6], p. 681)。

看到的，它对反对派的领导来说也是可怕的。六十年代里，一个运动领导人如果是或表面上是一个极端激进的勇士的话，他就能够成为公众人物（在媒体看来这又有什么不同呢？）。一旦成为公众人物，永远都是公众人物。杰瑞·罗宾（Jerry Rubin）发现只要他的名字是杰瑞·罗宾，他就能够一直做个公众人物。^①

领导们是如何借助于新闻媒体变成公众人物的呢？部分是通过媒介制度对戏剧化人物长达几个世纪的寻求，但更重要的是媒体客观性和平衡性特征决定了对“发言人”的寻求——在如今更加进步的时代里，或许也可称为“代言人”。一种新的原理超越了传统上人们对于兴趣的喜好。在这种过程中，充满了夸张的看法，那就是媒体制造了明星，这在媒体和政界是非常正常的。一位 CBS 晚间新闻的高级制片人告诉我，在争取民权时期，我们非常喜欢吐字清晰、由自己指定的发言人。据他所说，“你开始寻找发言人，但是直到最后你才发现他们并不代表任何东西，无非是个圆滑的演说者”，他这样称呼其中的一些人，“他们的诚意是我们给予的。”^② 这是吃过教训的媒介领导人从六十年代吸取的经验。

让我们再来看看白色激进运动中的另外一个例子：1968 年春天，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生暴动期间，媒体偏偏挑选出马克·鲁德（Mark Rudd）作为惟一的公众人物。自从纽约成为世界新闻媒体的中心以来，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运动领导的马克·鲁德就立即而永远地变成了全国公众人物。在暴动之前，鲁德当选为哥伦比亚分会的领导。当时，分会里还有许多其他政党领导人，但是这些领导人却没有一个能成为焦点人物。科克派特里克·塞尔是《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编辑，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充满了同情。他回忆到，在哥伦比亚罢工期间，“关于哥伦比亚学生的报道从外面传了过来”，但杂志社却没有采用这些报道，目的就是单独为鲁德寻找一个版面。塞尔要为整个“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或是哥伦比亚和它的军事团体争取一个版面，但是没有成功。^③

反战研究专家迈克尔·科莱尔（Michael Klare）曾深入到哥伦比亚罢工的一线当中去，他记得哥伦比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包括许多拥有不同技能的天才人员。他们在一起工作，有时也会互相攻击，但媒体只需要一个领导人，于

① “名誉是一种资产。实际上，我可以给任何一个人打电话并和他们联系上。人们总是尊重公众人物——他们自然会对我说的话感兴趣。没有人知道我干了些什么，但他们知道我是公众人物。”（Jerry Rubin, *Growing Up at 37* [New York: M. Evans, 1976], p. 93, 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② 1976 年 11 月 19 日对 Ron Bonn 的采访。

③ 1979 年 3 月 17 日对 Kirkpatrick Sale 的电话采访。

是鲁德便成为人选。从此以后，媒体总是经常和他打交道。据科莱尔的回忆，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有一点老练”，也确实“费了一番功夫去弄清楚”（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没人理会他），但电视报道和其产生的形象却足以能够使马克·鲁德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他的言辞也相应成为评价运动的标准。由于运动本身就容易受到媒体的限制和影响，鲁德的言辞也就成为运动评价自我的标准。^①后来，在1968年，鲁德说道：

就我个人而言，一个很大的失误（还有很多）就是我允许自己由发言人的角色变成象征意义的角色。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媒体需要找出一个人作为整个运动的典型和象征。然而，从整个意识形态上来说，媒体无法认识到罢工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看不到我们已经发展了一些民主的形式，即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决策的制定中去，也看不到罢工是由我们这个社会所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所引起的，而不是由一个组织良好的集会密谋策划的。^②

后来，在写给关心该运动的读者们的报道中，鲁德重复说他成为“领导（leader）/象征（symbol）/明星（star）”是一个“严重的错误（bad error）”。但他坚持说，这仍然“不无裨益（用我的名字去吸引更多的观众，用我的名字去赚钱，等等）”。^③

对于这些“裨益”，鲁德利用了其中的大部分。在1968年到1969年的军事时期，许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分会的领导很想利用他的形象和权力去维护并巩固自己的权力。当鲁德出现在社会组织的斗争场合中时，比如圣弗朗西斯科州立大学的罢工，他推荐自己为发言人，并且作为一种资源和具有吸引力的人，他也得到该组织中众人的欢迎——他们企图在组织内部进步小派别劳工党的压力下保持自己的好战状态。几个月之内，鲁德通过媒体和公众演讲成为了公众人物，并且参与了小派别组织反对进步劳工党。此后，在1969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最后的会议上，鲁德作为“气象员”派候选人角逐国家秘书长的职位。在这个组织一分为二的时候，他在那个派别内得以胜出。在投票之前，他宣

① 1977年1月2日对 Michael Klare 的采访。

② Mark Rudd, "Symbols of the Revolution," pp. 295 - 296, 载于 Jerry L. Avorn 的 *Up Against the Ivy Wall: A History of the Columbia Crisis* (New York: Atheneum, 1968) .

③ Mark Rudd, "Notes on Columbia," *The Movement*, March 1969, p. 10.

称：“运动需要领导人，运动需要标志，我的名字就作为标志而存在。”^①在这点上，鲁德并非“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惟一搞不清楚领导权和象征主义不同之处的行为主义分子。这种迷惑不仅仅存在于左派内部，也同样存在于整个政界并贯穿于媒介趋于饱和的社会之中。

七十年代末，鲁德的名字仍然具有一种象征性的价值。1977年9月，当他出现在一名纽约警察面前的时候，七十多名记者围上来采访，尽管他什么也没说。被媒体挑选出来充当国家激进领导人的马克·鲁德仍然是国家的象征，但他现在却像是个悔恨不已的孩子，“很明显做好了准备，要为机构内部的政治转变而斗争”，《纽约每日新闻》对他是如此评价的。^②马克的父亲说，马克现在已经“老得不能再革命了”，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在引用这句话时情不自禁地笑了，好像他一直就十分清楚这件事一样。1977年，鲁德的真实动机就和1968年的时候一样，基本上是互不相干的，因为他不得不两次扮演同一角色。

任何事件中，如果说媒体制造了运动的领导人，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它忽略了一种更为吸引人的过程，这种过程就是鲁德在为自己辩护时无意提到的，作为中间人的发言人并非是变戏法般凭空出现的。当然，有名的黑人领袖，如斯托科雷·卡尔米歇尔（Stokely Carmichael）和H. 瑞普·布朗（H. Rap Brown），形式上代表黑人社区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与马克·鲁德直接代表大多数哥伦比亚学生的利益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媒体习惯上推崇一些离经叛道的执行者，这些人不代表社会更多的价值观、热情和习俗。这种离经叛道的人拥有他们独特的“新闻价值”——除非他们是法定的权威（当然相反的规则才适用于这种情况），是他们的官方地位才使他们具有新闻价值。反战领导人成为公众人物的一个秘诀在于他们确实具有某种激进的资格。正是他们与运动，而不是与分散政党的关系使得新闻媒体赋予了他们新闻性，这似乎是很有道理的。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的领导米歇尔和布朗，支持黑人权力并组织抵抗运动（“决不，我们不去”）；黑豹党的胡伊·牛顿（Huey Newton）、鲍比·希尔（Bobby Seale）和埃尔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坚持武装自卫；1968年芝加哥游行的组织者汤姆·海登（Tom Hayden）、雷纳·戴维斯（Rennie Davis）和反越战国家军事动员委员会的大卫·戴利格（Dave Dellinger）以及反映另一种风格的嬉皮士杰瑞·罗宾（Jerry

① 引自 The Guardian, 1969年6月28日；Kirkpatrick Sale, SD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p. 577.

② 引自 Kirkpatrick Sale, “Mark Rudd and the Radical Movement,”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eptember 24, 1977.

Rubin) 和艾比·霍夫曼 (Abbie Hoffman)。对于真正的运动和组织者的组织, 这些人的经验都十分丰富。他们宣扬反抗和抵制精神, 这在全国范围内的黑人社区和校园内是非常流行的。如果说他们什么都不是的话, 你事后稍微一想, 便知道这种说法绝对不是正确的。问题在于, 媒体是有选择地推崇他们的, 因此赋予他们的诚意远远超过了运动本身的界限。那些成为公众人物的领导都是非常自信的, 或者说知道该如何装出自信的样子。他们得以成名的另一个秘诀, 就是他们知道媒体会拿什么当新闻, 也知道自己应该说哪些话, 不该说哪些话。在某种意义上讲, 他们已经是领导了, 否则媒体就不会注意到他们, 是媒体将他们变成了公众人物。

从无处不在、引人注目的文化观点来看, 运动要依靠其公众人物。这很自然地会吸引一些喜欢表演的人, 这些人知道如何去炫耀一些象征性的东西, 也知道说一些可以被引用的话。对爱出风头的人来说, 看上他们的形象和角色是最容易的, 然后他们就成为媒体宣扬的公众人物。例如, 一位反对马克·鲁德的人士说: “我不认为马克·鲁德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能成为‘发言人或者什么公众人物, 但他很快就适应了这个角色。他当然会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 但每个人都会很明显地知道扮演新闻发言人的角色, 并且也让自己能够那么做’……据我所知, 他并不反对这种事情。他并没有说, ‘这是一个集体的领导权’, 然后就放弃了这种角色。”^①

但是, 公众人物的现象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 个人本身总是一种十分渺小的力量。总体上说, 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 运动的领导人并不是特别的自恋。据说, 尽管在 1960-1969 年间, 许多国家都召开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会议, 但我在整个调查过程中, 只是拍到了一张关于会议的照片, (这次会议召开于 1967 年之前), 1962 年在休伦会议上, 我一张照片也没有拍到。制造历史的愿望并不能简化为追求个人名誉、个人辉煌和个人表现。正是美国文化中盛行的个人主义, 才强烈要求那种简化。

和领导人参与竞选的愿望相比, 媒体的运作要求公众人物出现的愿望要强烈得多。当一位发言人企图退出公众人物圈的时候, 媒体将会想尽办法来挽留。CBS 一位曾报道了四年海湾地区政治新闻的新闻摄影师, 曾注意到唐·斯叶戈 (Dan Siegal) ——人民公园运动的领导人, 企图拒绝将自己作为公众人物:

^① 1977 年 1 月 2 日对 Michael Klare 的采访。

他确实为此而斗争过……他企图和别人共同掌权，他们企图控制发言人和诸如此类的人。我想他们尽可能地和媒体打交道，他们要求媒体去采访别人以及类似的事情。但是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时，媒体要么就去采访唐·斯叶戈，要么就谁也不去采访，因此他还得继续充当他的角色。我想许多人都碰到过这种情况，要么你允许他们将某些人变成明星，要么你就别对外公开。^①

因为无法完全放弃（见下文），领导—公众人物很少能做出什么事而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个人所做的放弃并不能达到退出的目的，因为媒体总是特别需要明星的出现。

运动推举出了很多领导，媒体总是选出与他们预先设计好的形象最为接近的人作为公众人物。这些形象是一个明确的领导者听上去或看起来共有的一些东西：口齿伶俐，言辞夸张，知道为媒体制造新闻的方法。他们通常都是一些爱炫耀的领导，能够引起媒体的注意。这种人善于利用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比如说有煽动性的标语（斯托科雷·卡尔米歇尔在1966年提出的“黑人权利”，1971年雷纳·戴维斯在反战救难信号行动中提出的“我们要打倒华盛顿”）以及臭名远扬的戏装（1968年杰瑞·罗宾的战争涂料和玩具手枪）。很少有一些持有异议的媒体工作者，能够成功地将一些谦逊的领导人包装成好的典型：比如1965年，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反征兵危机中出现的保罗·布思，^② 1969年秋天在延期偿付运动（*Moratorium campaign*）中的山姆·布朗（*Sam Brow*）（见后面的第七章）。六十年代末期，在中间派和平运动兴起的时候，领导人将有更多的机会作为炫耀形象的替身，从而变得更有新闻价值。

但是，无论运动的领导人是放纵还是稳健，他们都能够被证明是公众人物，尽管他们并不对运动的基础承担责任。他们在一种虚假的空间里浮动，被经过加工过的人格的光环所包围；媒体成了他们的赞助者。汤姆·海登曾有过这种经历，他自我批评式地表达出自己被制造成公众人物不现实的感受，其中还有些个人结论：

运动本身并没有选择我们这些芝加哥的保护人作为它的象征，是媒体和政府这么做的。著名的领导人变成公众人物的整个过程是极为腐朽的。只有那些以自

① 1977年6月16日对 Stephen Lighthill 的采访。

② 见前面的第三章。CBS的新闻制片人 Stanhope Gould 回忆说，他把 Paul Booth 对于一篇报道的意见“卖”给了纽约的上司们，这使他们觉得 Paul Booth 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1976年11月8日对 Stanhope Gould 的采访）

我为中心的男性才能够从运动中或摇滚文化中“脱颖而出”，并且得到媒体的认可，被组织认真对待（一些非凡的女性作为例外证明了这条准则：贝尔纳迪斯纳·多恩和贝尔纳戴特·戴夫琳被看作是革命的对象；贾尼斯·约普琳和格雷斯·斯利克是音乐人士；琼·贝兹和朱迪·考琳被认为是“美丽与纯洁的象征”）。

获得这种权力的第一步就是要成为“个人”。你开始拿到所有的关系和合同，你开始每讲一次话就收取1000美元。你没有真正的朋友，也不属于哪个真正的组织，于是你开始变得依赖于大众媒体，并且和一些类似的明星相处。^①

斯图登·里德写了一篇文章，一步一步叙述了自己成为和平运动领导人的过程。

1965年2月，约翰逊政府开始了对北越的轰炸。一些和我一起在南部民权运动中工作过的耶鲁学生，要求我在一次大学的反对集会上讲话，同时邀请我去主持在纽约卡内基大厅举行的反战集会（毫无疑问，一位反政府的耶鲁大学教授被看成是一种人咬狗的新闻）。于是，1965年4月，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开展反战游行的前夕，该组织的国家级秘书（我们已经认识）打电话给我，让我也去主持那次集会（实际上，这个决定是由该组织领导层集体决定的）。八月份，当人民团体向国会大厦进军的时候，我们中的一些人身上曾被溅上了红色涂料，后来这件事被《生活》杂志大肆宣扬了一番。最后在九月份，马斯特打电话，叫我去参加一个于反战运动会议前夕召开的会议，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参加。我是通过选举来到了和平运动决策层的中心，而不是通过友谊政治活动的选举，也不是通过媒体的物色。1965年12月，当《纽约时报》通知我作为和平运动领导人的时候，整个过程便结束了。^②

杰瑞·罗宾和艾比·霍夫曼是两位最著名的领导人。如果说他们基本上不依附于任何基地组织，而且人们一点也不怀疑他们的明星地位的话，这丝毫不令人感到惊讶。他们利用媒体去建立一种虚无高尚的“组织”，并且又借助于媒体来编织出一套有关组织的理论。

① Tom Hayden, *Trial* (New York: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0), p. 109. 一旦被证明，永远都是事实。在1977年9月12日的People中，人们看到：八月份的SDS集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芝加哥七人中“只有两个人”参加这次聚会。

② Staughton Lynd的“The Prospects of the New Left,” 收集在John H. M. Laslett和Seymour Martin Lipset等人编写的*Failure of a Dream?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m*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74), p. 725.

领导人的举棋不定

运动的领导人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就变成公众人物，除非运动本身的结构允许这样。由大众媒介支配的个人崇拜，增加了运动的脆弱性。因为领导们如果能像发言人一样有名，而不必对运动的基础负责的话，运动永远也不可能为了那些有前途的领导人改善其内部管理，并制定前进路线。在其他一些国家，新左派运动成功推动了学生后激进主义的制度，特别是一些政党为左派领导者建立了一些成熟的角色。然而，美国的新左派却没能持续推进他们的制度和作用；^① 这种失败既是孤立的个人运动出现的条件，也是出现的结果。这种形式对缺乏责任感的领导者的成名是非常有利的。公众人物变成了持续的激进角色的替代品。

运动不能够抵挡公众人物综合症，其原因在于运动的社会身份。新左派精英和普通成员一样，对领导怀着一种矛盾的态度。^② 运动本身组织形式的脆弱——尤其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脆弱——对组织的建立者来说则是一种对立的需要。元老派已经组建了诺姆·弗拉彻（Norm Fruchter）所谓的“模糊的结构（ambiguous structure）”——“一种传统正式的组织结构与可执行的风格并存，这种风格强调意见的一致性与互相尊重。”^③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价值观首先强调个人经验和非正式关系的重要性，然而组织的创建者们却赋予了它们传统的角色和议会式的结构。精英们间接支配着，并且通常是非正式地控制着，拒绝放弃他们所坚持的官方形式，或者是他们对于一些新的价值观和潮流的承诺。

实际上，精英们利用他们的价值观去破坏正式的组织结构。早些年，大多数的元老派选择一起离开大学到组织建立的 ERAP 社区去工作——嘴里喊着“我们不需要领导”——然而他们继续非正式地支配着国家决策层会议。弗拉彻非常正

① Robert Laufer, "Radicals and the Life Cycl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1960's Activists in the Netherlands and America," 该文曾递交了美国社会学学会会议。1975年8月，旧金山。

② Kate Millett 注意到，在女权运动中存在着同样的矛盾现象：“运动自始至终都发出双重信号：你必须完全在我们的小组里说教，在我们的会议上主持——否则你就是别有用心，别人也会讨厌你……同时还要为精英主义拟定一条界限。为什么我们无法坚持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呢——抵制残忍的领导者？当然全世界的人都认为这是不现实的。甚至他们是反对的，但我支持反精英主义。”对 Millett 来说，事情同样如此，能够认识到这种双重束缚总要强于无法从中挣脱。见 Kate Millett, *Flying*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4), pp. 92-93.

③ 下面的内容体现了 Norm Fruchter 三篇重要文章的主题变化，尤其是 SDS: In and Out of Context, *Liberation* 16 (February 1972): 19-32. 引文来自第 27 页。

确地阐明了精英们对领导权抱有矛盾态度的根源和后果。最后我引用了他的话：

从一开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结构的模糊性，就是建立在大多数人对他们的组织责任和矛盾态度的基础之上。人们普遍拒绝接纳全国办公室，尤其是一些行政角色。人们更喜欢把角色解释成：领导各自领域内的领导活动，并且通过参与国家内阁会议对组织的发展施加影响。通常，拒绝担任组织中心重要角色的根源在于：所谓的谦卑行为以及害怕权威角色和等级的永存不朽……但是，这种拒绝通常还建立在这样一种感觉之上：这种角色将会改变政治工作和个人经验之间必要的平衡。凭直觉就可以知道，这种平衡对发展新的生活风格是相当关键的。对组织的成长非常有必要的重要政治工作，不是太严肃了就是太极端了，‘我还要说太枯燥了，太狭窄了，太死板了’——领导接任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并不能在这个层次上加以表达。因此全国办公室和它经常遇到的故障，以玩笑开始，以噩梦结束。领导们既尊重又嘲笑地对待那些尽可能认真担负他们政治责任的少数国家官员和职员，但从不把他们当作楷模。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价值观和其传统组织结构之间的对立，反映了组织领导内部之间长久存在的矛盾。具有天赋，并且充满活力的男人和女人们在南方民权运动骚乱的驱动下，积极投身于政治概念和行动。

如果没有历史分析或历史的自觉意识，对于该组织的领导们来说，一开始甚至都不会充分注意到他们自己的组织形式和关系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无法对他们已经建立的国家结构负责，因为这种结构和他们自己的工作与关系的实际形式并不相符。^①

元老派的成员们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之中：他们占据的位置充满了阶级地位的冲突，他们代表底层，代表精英意味更少的学生，借助的恰恰是作为精英的经验所带来的力量、自信与享有的特权。组织上的脆弱和非官方的精英主义，直接来源于精英的社会身份中早已存在的模糊性。由于没有注意到他们本身与生俱来的社会局限性，精英们把这些扭曲当成是自愿分裂和道德选择的问题（如果有的话）。他们不想面对自己是领导的事实，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作为精英学生所带来的社会制约。（后来，他们和他们在该组织的继承者以及该组织的小撮派系，兵分几路去寻找对付这些制约的方法：有人决定学生必须成为工人；另外一些人认为，该组织需要给工人们带来一些革命意识——传统的列宁主义——还有一些

^① Norm Fruchter SDS; In and Out of Context, Liberation 16 (February 1972), 第28页。

人认为，整个革命的年轻人是真正的革命阶级，见第8章）还有，该组织成员的构成，甚至当地领导人员的构成，都是经常有所改变的。因为到了一定的时间，他们就该开始毕业了，这就更加加剧了领导和成员关系的分裂。毫无疑问，“学生争取民权社会组织”从来就没有建立过持久而又负责任的形式，它的领导权仍然抵御不了来自媒体公众人物的诱惑。

还有更多类似的情况——我开始果断地思考——鉴于来自越南战争的压力。反对战争的要求，将其自身的逻辑强加到运动过程中去，以便得到一些直接和物质的结果。例如，如果不能结束战争的话，就使其势头逐渐减退。为了使行动更加有效，反战领导人每次都对主要的反战行为作了无数的预言和声明，以吸引更多的反战民众，从而为华盛顿制造持续的压力。当约翰逊总统决定不再竞选下一任总统时，当芝加哥游行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时，并且表明民主党不能再像以往那样继续战争交易时，反战领导们可能会快乐地打算着再组织一次戏剧性的群众行动，然后再来一次……这次可能真的会结束战争，可能真的会说服更多的政治组织集团，其中也包括一些外国政策精英。从而让他们相信，将战争继续下去的政治花销高得无法让人忍受。不过，这种快乐的感觉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无论这看上去多么像军事叛乱，每次行动实际上都上升成为了一种请愿的形式，大量的人被要求出现在某个场合去充数。^① 运动中的许多人都几近绝望，他们对事情只认识了一半，并且怀疑他们的请愿被驱使着朝向绝望的方向。在运动中毫无权力的感觉，加快了它的革命转向，并使得其言辞得以膨胀；如果立即退出的要求没什么用的话，为什么不斗争到底并高唱“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家”和“打倒统治阶级”呢？而且，1968年之后，在欺骗性的战争政策暴露之后，尼克松的统治仍然能够站得住脚。如果帝国主义制度并不真的需要消灭越南，正如自由论者所宣称的那样，那为什么不结束战争呢？把游行——无论它多么接近武装斗争——说成是向当局有效的请愿方式，组织者太难启齿而且越来越难这样大言不惭了，甚至理解这一点都越来越困难。领导们现在倾向于要求太多，然而，在将游行和与之同样的要求加以比较之后，许多普通成员和中间阶层的幻想都破灭了。由于战争，领导们愈加依赖媒体；然而，1971年，当诺姆·弗拉彻的争论没有什么结果的时候，他们非常现实的——因此也是悲惨的——依赖性不仅仅破坏了他们作为领导的基础，也破坏了整个运动的信用：

^① Fruchter, "Protest, Power and the People," *Liberation* 15 (February - March - April 1971): 67 - 70.

在过去的六年，我们的组织者们很少（如果有的话）把每次行动都看成是一种不同的请愿形式。相反，他们每次行动时，都提出了一些投机性很大的目标。但是，把广泛地运用冒险当作诱饵，来组织人们参与大众活动，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被结束战争吸引进来的新人，往往会有被人利用和操纵的感觉。一旦幻想破灭，现实重新出现，一种无力、愤世嫉俗、甚至绝望的感觉，就会战胜那种基于虚假的想象产生的自信。一贯沉迷于这种历史性冒险行为的领导者，将会以骗子的身份出现，就无法具体分析这个国家权利和决策制定的现实情况。由于领导倾向于通过媒体向整个国家解释运动，因此一旦领导权遭到破坏，将殃及整个运动。^①

一场学生运动已经担负起了领导反对在越南长期屠杀的重任。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媒体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破灭的幻想，以及运动面向革命时所具有的自我神秘感上。当领导们没有能够带领他们的成员得到预期结果的时候，他们要么会筋疲力尽，要么就会放弃，再就是回头提出更为过分的要求，这种行动将确实使管理遭遇困境，这次我们将要打倒华盛顿。当追随者们看到，他们所从事的冒险活动并没有带来什么实际结果的时候，他们开始厌倦反战活动，并且在面对那些他们认为进行了错误宣扬的领导者的时候，感到非常苦恼。如果说他们大多是从媒体上认识这些领导者的，这并不是什么讽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过程植根于运动的内部结构、运动的价值观以及组织的矛盾之中，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其社会本质和自身存在的局限性，那就是作为一个大的中产阶级学生组织，无法去为自身界定合法的权力。不过，正是这些政治的现实形势，将其脆弱变为缺陷。最后，也正是运动自身积极的反战行为，诱使其进入了一个壮观的领域，在那里，有意义的只是一些具体的数字；正是既定的政治目标促使领导人想成为公众人物，而媒体也出于自身的原因做着相同的事情；也正是战争平衡了其对于分散的权力结构和过程的寻求，使得运动的破坏趋于合理化。

正当运动的价值观和运动构架发生冲突时，分散的运动集体也与国家、大众传递的反战结构，以及包装代表他们的领导发生了冲突。弗拉彻曾和许多相关的团体和领导一起共事过，他是如此评价的：

正如国家组织者指出的那样，对于国家行动而言，政治界定和工作方式被认

^① Fruchter, "Protest, Power and the People," 第69页。

为是非常必要的，而这恰好同逐渐成为运动组织中心的具体政治行为以及非工具性的工作方式背道而驰。再从大众的角度考虑一下国家组织者的角色，需要通过媒体来进行宣传；需要借助一系列的事件和冲突来制造悬念；需要经常地演讲、游说或举行会议来引起公众的注意；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协调关系，并调解各种多样性的问题——所有这些从承诺到组织民众活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需要，必然会将组织者变成媒体的关注对象，并使他们和我们成为社会个人崇拜的牺牲品。^①

但是，对于运动政策而言，制造公众人物的过程却拖延了战争；在一个媒体相对饱和的社会，反对派到媒体中去寻求支持的时候，炫目的东西总是会对这些反对派产生威胁。1966年，在黑人领导（如斯托科雷·卡尔米歇尔）成为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的主席之前，曾深入到当地阿拉巴马·朗德的小城镇。但是，当他们一旦决定要去提升整个国家黑人力量的时候，他们就陷入了同样的漩涡。凯特·米勒特（Kate Millett）曾用一些可怕的事实，详细描述了女明星受到公众关注的烦恼。所有的领导，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发现他们生活在一种被日程表、记者招待会、电视访谈节目等东西充斥的虚幻世界里。在他们作为公众人物的时候，他们自己形成了一种利害关系。如果媒体允许的话，他们在会议上所发表的意见，可能会更多地被人采纳（尽管也可能被拒绝）；他们可能被看作感性的客体，或者更好一点，感性的主体；他们可以感受到魅力和重要性的完美结合。自我陶醉的动机一旦被忽略或抑制，便不可避免地会因为所得的回报而更为泛滥，然而更多合作的冲动却日益枯竭。公众人物们失去了许多他们和成员维持的相互积极关系；这种关系的丧失，迫使他们重新回到了原来那种精彩的世界。但正是那些经常有来有往的关系，使得政治策略得以伴随现实社会的可能而不断产生变化。离开经验社会观察的可能性，公众人物就变成了低劣的策略主义者，沦为耀眼的角色，著名的激进分子变成了激进的公众人物，这是狂欢节中绝对吸引人的东西。

由于媒体总是在寻找一些重要的人物，因此用媒体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些人物应当引人注目并且性格鲜明。当他们变成重要人物以后，媒体会继续对他们进行报道，因为他们非常重要。一些人成为了公众人物，而另一些人却没有成为公众人物。从整体上来说媒体的注意对于整个运动来说是一种资源，但其数量是

^① Fruchter, "Protest, Power and the People," 第70页。

有限的，因此个人总是会被卷入到竞争中去，争夺一些本质上稀缺的东西。由于运动的精英将得到公众的注意并作为一种资源，因此没被选中的领导通常会憎恨被选中的领导。有时，这种憎恨也会渗透到言行中去，但大多数的时候是很难被察觉的，是和运动平等主义的价值观相冲突的。这样的结果会形成对抗、内讧、诽谤、恶意指伤，甚至是歧视。这种潜在的妒忌使其不再受到控制，或者说很少再受到控制。正如理查德·弗莱克斯所言：

媒体选出了领导，而且人们相信他们……而内部的影响在于引起了竞争和嫉妒，这是运动内部最具破坏性的因素之一。每个人暗地里都希望别人会注意自己，而且每个人都看到，受到别人注意的人实际上并不比其他人强多少。某某真是愚蠢，他怎么会成为运动的发言人呢？可恶之极！^①

在知名的领导人企图同时为媒体和选民服务的时候，他们就被挤进了矛盾逻辑的形势之中。不管什么时候，他们都不得不牺牲一方。

在以学生为基础的民权运动里，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也对领导们利用媒体感到紧张，而对其成为焦点人物的不同途径和政治言辞也是如此。当地的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的内部职员，对黑人势力中臭名昭著的人也感到不安。1966年他们推选了斯托科雷·卡尔米歇尔作为主席，1967年又选择了瑞普·布朗。可是，当他们发现这些全国工人领导所说的话并不代表他们的时候，他们感到非常地不舒服。一位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活动领域的前任秘书玛丽亚·瓦莉拉（Maria Varela）回忆说：“实际上，确实存在着一条分界线。来自南方的人说，‘你没必要告诉我们，我知道黑人意味着什么。那不是问题所在……有一些当地的黑人职员……没有说出这个想法，但他们悄悄地拒绝购买这些东西。黑人权力还可以接受，但接下来是什么？’”^②对那些变成类似校园发言人的公众人物领导们，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当地的组织者就已经感到有些憎恨（这些发言人巡回讲话的部分目的是为了挣钱）；一旦焦点改变，这些人变成了国家甚至国际公众人物的时候，这种憎恨变得更加强烈。然而斯托科雷·卡尔米歇尔和行动委员会的关系，早就在媒体对他的形象进行宣传以及“黑人权利”的标语成为国家象征以前就十分紧张了。

组织将批评斯托科雷在校园里说一些这样那样带有煽动性的话，这些话立刻

① 1977年1月9日对 Richard Flacks 的采访。

② 1976年7月1日对 Maria Varela 的采访。

就会被媒体报道。斯托科雷回来说，“我没有说过这些话”，或者“是的，我说过，但是告诉我，我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接着，行政委员会将会继续抱怨他做过的或者没做过的事。我清楚地记得他在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你们告诉我，作为这个组织的行政官员该怎么做，我立刻去做。如果你们不说，那我就去做我认为该做的事。你们知道我不得不去保护一些笨蛋，因此我也会说一些我不得不说的话。”

委员会的成员们什么也没告诉他，因为他们被这种突然成为国家象征的转变吓坏了。他们是干活的职员，他们被组织起来绝对不是为了制定国策。玛丽亚·瓦莉拉也曾经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里工作过，她记得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在1966年遭到颠覆，就如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1965年秋天一样：

我们曾经看到，人们竞相挤进国家公众人物的行列……我们尚未为此做好准备。我们没有一套为国家工作的哲学和策略……我们放弃了它，我们分裂了。我们中的一些人仍然想继续留在里面工作，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四处走走、提高人们的自觉性和影响力更为重要。还有一些人则说，这不会给你带来什么的。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确实是新手。^①

新左派反对旧左派头重脚轻、过分严格的结构，以及它拙劣保守、独断专行的方式。新左派更多地以一种工作的方式来展示自己，还有一种建立在共享价值观和非正式网络基础之上的志愿主义，而不是借助于任何连贯的政治方案或者正式的责任规则。但这种不精确的观念远远不能使领导们对他们的基地负责，相反，却促使他们在这种基地之外建立合法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们，像他们白色激进的对手一样，被卷进了同媒体的象征性关系之中。他们禁不住变成了“真实的拷贝”。正如玛丽亚·瓦莉拉所说的：

你只有这么多的精力，如果你要做许多的校园演讲，同时媒体还打电话找你，还有人想知道你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并且你没有加入一个具有现成原则的组织，那么你就自由点吧。说一些你自己想说的话。^②

1968年之前，发生了一起校园行动。众所周知，是芝加哥游行和警察暴动，还有谋杀马丁·鲁德·金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黑人起义，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公众

① 1976年7月1日对 Maria Varela 的采访。

② 同上。

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白色激进领导人享受着来自这个世界的名望、生活方式和经济收入，与组织机构的联系却变得日益松散。曾在许多城市和地区分发了成千上万份传单的地下新闻组织，加入了主流媒体，它们使已经相当有名的“重量级人物”更加出名。“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很快进入了一种自称是革命党派的战争之中，这些党派在列宁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宣传上都先于对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让位的行为，使得公众人物们更加孤立：在左派组织失去他们的权威时，责任的概念在他们的眼里变得非常抽象。孤立的公众人物被迫在该领域内，寻找并占据个人领地——占据这个领地，并抵制敌对英雄们对运动公然和隐蔽的愤恨。而且，其他公众人物仍然帮助组织“气象员派”。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支持具有基础的进步劳工党取代“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1969年，在“气象员派”脱离出去之后，很多成员陷入了困境。在1970年3月纽约市政厅发生爆炸之后，这种困境变得更加严重。这时候，作为革命组织的网状体系，气象员组织变成了地下性质的组织，而气象员的公众人物们带上了一种恶劣的革命良知，这使得整个运动反对或支持“革命”者的数量不断减少。^①

1968年和1969年，几乎同时出现了一种新的女权主义，部分是为了响应媒体对运动中存在的“男性重量级人物”男子气概的宣传。现在，女权运动详细描述，并集中注意了运动中反精英意识形态的早期思想趋势，并为运动反对媒体选定的明星奠定了新的基础（当然，这些紧张局势并不局限于男性控制的运动里。很快，这在女性运动中也会出现。按照惯例，领导们被当成垃圾是因为成为了焦点人物，并且违反了运动本身模棱两可的准则^②）。在这样一种忧虑、过度兴奋的气氛里，如果没有达到政治地位连贯的程序，没有公共机构领导权的合法形式，运动的公众人物就会一步一步地与大量的选民和同伴们疏远。他们可以试试这么

① 关于 Weathermen “气象员组织”，（后称 Weather Underground）和其他党派的兴起以及 SDS 的瓦解，参见 Sale, SDS, pp. 455 - 650, 以及 Harold Jacobs 等人编著的 Weatherman (Berkeley, Calif.: Ramparts Press, 1970) 里面的文章。

② 关于女权领导的对抗，可见 Millett 的 Flying, 以及 Joreen 的 Trashing: The Dark Side of Sisterhood 第 49 页。这种症状延长了新左派的组织期限。Edie Goldberg 在 Making the Papers: The Access of Resource - Poor Groups to the Metropolitan Press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75] 一书中的第 21 页中提到了在 SDS 元老派建立的波士顿社区组织中心爆发的一次更为缓和的冲突：“The People First (TPF) 的领导已经回避媒体很长时间了。对于领导以及等级组织这样的概念，该组织的成员予以反对。正如一个 TPF 成员所言，担任 TPF 的领导总会招来非议，其他的成员会认为某个人‘开始夺取领导职位了’。而别的组织成员也会对他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困惑中的领导就可以去动员大众，因为在许多年前的校园游行报道中，媒体就已经将他视作领导人了。一旦成为公众人物，永远都是公众人物。

做，间接地利用媒体，有选择性地参加一些活动；还有一些人在媒体企图将他们变成公众人物的时候，还非常固执地站在一些反战、激进的立场上。这是朱利安·邦德（Julian Bond）所采取的策略，不易实行而且也不为常见。当运动在一个党派或另一个党派的革命中间来回转换，并放弃向公众传递信息的时候，这种情况会更加困难。媒体代表一种支持革命的力量——为了采用一种伪造的革命模式——这种力量比任何一种根深蒂固的真正组织都要可靠。一个固执地诉诸军事行动的运动，伴随着一种摇滚、崇拜明星、依赖媒体的年轻人的文化，不带任何批判标准，或一贯地注视着他们的公众人物领导；公众人物和选民谁也无法帮助对方。

公众人物作为资源：高涨

尽管难免脆弱，领导—公众人物还是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他们可以使名望上升，也可以让它消失。奇妙的是，上升和消失表面上看起来是交替更迭的，但在对付媒体和流动成员的丧失同时带来的压力方面，却起着相同的作用；不过，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弥补结构和政治上的弱点，这些弱点使得公众人物综合症居于首要位置。

通过借助于名望的上涨，以及“投资”媒体的认可，可以积累更多的东西，明星们能够继续相信，他们正在将明星的角色转向对政治有利的方面——把媒体作为宣传政治地位和策略的扩音器；同时将他们的名望本身变成了一种职业。艾比·霍夫曼说：“成为公众人物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野心。”^①这也并不是必须的，因为运动领导人是一些特别有野心的人，这当然不是由普遍的社会准则形成的；它更是一种积极的反应，这种反应是由于激进者缺乏一种合理解释、持久的工作身份造成的。斯图登·里德和汤姆·海登（Tom Hayden）描述了这种公众人物轨道的高速性，还有它的魅力和节奏，这点我已经在前面引用的篇章里提过了。杰瑞·罗宾和艾比·霍夫曼是这种选择最为突出的典型，嬉皮士风格的观念证明它是有道理的（关于杰瑞·罗宾，请参考下文）。汤姆·海登和雷纳·戴维斯是更加细心、更会思考的领导，他们也被卷入了公众人物的角色，刚开始是作为1968年芝加哥游行的组织者，后来被政府的决议选举出来，作为1969年控告谋反的被告。后来，汤姆·海登将自己众人皆知的名誉，和简·方达（Jane Fonda）更大的名气变成了参议院首次运动的支点。这是一种新的政治转变：名誉本身是可以

^① Abbie Hoffman [Free], *Revolution for the Hell of It* (New York: Dial Press, 1968), p. 64.

被转移的，罗纳多·里根、杰瑞·罗宾、亨利·基辛格和艾而德·瑞奇·克利弗已经用不同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①

1972年，雷纳·戴维斯向大君领袖救世（Guru Maharaj）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新左派政治多年来“用镜子来组织（organizing with mirrors）”的策略带来的结果，也是它的延续；在需要由名望制订一个真实计划的时候，这种贴切的口号是属于雷纳自己的。1964年早期，雷纳和他个人招募的职员一起，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经济调查和行动规划（ERAP）的赞助下实施了一个计划，包括十二个社区组织。有些计划来源于现存的当地组织中；还有一些是将来的组织者假想的，或者希望实现的计划。经济调查和行动规划将所有这些策略，同一种“为穷人的种族内运动”的策略联系起来。^②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国家内阁发放前进信号的五个月后，雷纳为了追求现实，将生活融入到了ERAP的名望中——这足以以为这些计划招募一百多名夏季志愿者，并使ERAP成为讨论左派的中心。带着对这些广为传播的文字半讽刺和半敬畏的感情，雷纳提及了“用镜子来组织ERAP”——也就是通过招募演说，大量的会议（仅在1964年春天就有三次）、大量的工作文件^③、基地计划书以及大量的口头宣传来组织，这些镜子并非大众媒介意义上的镜子。

但是，最终雷纳还是被卷入了地方主义思潮；安·阿伯（Ann Arbor）的ERAP国家事务所被解散了。于是在1965年5月，他和大多数ERAP的成员搬到了芝加哥，加入了在非商业白人居住区的贫穷城镇连接社区联盟计划（JOIN Community Union）的组织。在这里，他默默地在一个小地方工作，但是他仍过高估计了戏剧性事件的价值，并且会对取得的胜利洋洋得意，就好像存在着一种坚实的社区基础，去巩固这种胜利一样。他也为他的热情付出了代价，受到来自组织者和社区人们强烈的憎恨。^④1966年，在雷纳的领导下，JOIN取得了两次组织罢工

① 自从二战以来，美国的政治和公众人物就融为一体。根据对费城报纸漫谈栏目的调查发现，漫谈栏目所提及的演艺人员的比例由1954-55年的70%下降为1974-75年的50%多一点，然而政客（“政治办公室的掌管人，政治候选人或一些因持有某些政治观点而出名的人”）的数量却由1954-55年和1964-65年的2%上升至1974-75年的10%。（Jack Levin和Allan J. Kimmel，“Gossip Columns: Media Small Talk”，*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7 [Winter 1977]: 169-175.

② 关于ERAP的历史，最好的参考资料是Sale的SDS，pp. 95-150。“interracial movement of the poor”来源于1964年Tom Hayden和Carl Wittman所写的一篇工作报告的题目。

③ 1964年ERAP会议上的几篇文章收录在了Mitchell Cohen和Dennis Hale的*The New Student Left*（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④ 参见“Peacemakers, Goodfellows, and the Police,” pp. 375-397，刊登在Todd Gitlin和Nanci Hollander的*Uptown: Poor Whites in Chicago*（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的胜利，使贫民窟的房东签订了修缮房屋的合同；这至少是三十年代以来，在芝加哥签订的第一份类似的合同。但取得签订的合同是一回事，而将它付诸实施并将其转化为组织优势，却又是另外一回事。房客们暂时地，甚至是不受拘束地待在这个城市里，这是从阿巴拉契亚流放以后属于他们的地方。JOIN 和它脆弱的房客联盟，并不能保证这些短暂的军事胜利和短期的团结一致。雷纳逐渐意识到，在单一城市的单一地区（惟一在文化上有所差异的白人社区）单一政党和组织的政治局限性。两年里，雷纳断断续续地取得了一些非决定性、不为人知的胜利，不过这也没能给他带来足够的动力。于是，1967年雷纳离开了孤立的 JOIN，试图组织一个全市范围的穷人组织联盟（其中 JOIN 将会是惟一贫穷的白人团体），并为组织者制定一个训练班。这些都是大胆创新的尝试，不过这些计划还没宣告实施就已经失败了。

用别的话来说，正是在（也是 ERAP 其他人的）这次顽固而又耐心的组织失败后，雷纳才准备在更大的政治领域内抛头露面地工作。在此之前，他总是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反战活动保持着距离；而现在，当组织反战工作的政治道路遇到阻碍的时候，战争对他来说变得更加真实。1967年9月，作为美国活动分子之一，他和越南革命者一起参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会议。同年秋天，他和汤姆·海登一起为芝加哥民主集会上举行的游行示威制订计划。正是在那个时候，雷纳开始获得了媒体的关注。这个计划要求以宏大的形式鼓吹“用镜子来组织”的口号，从而提前为它制造影响；而雷纳也十分配合地坐在摄像机前。最后，运动中并没有太多的人聚集到芝加哥街头，部分是出于对当地的警察、国民警卫队和流动军队武器装备的恐惧。在芝加哥的示威者大概不超过5,000人，聚集到街头的正是一些执行命令的人；^①世界所瞩目的游行和头等大事的宣传，主要是通过民主党人士戴利（Daley）在表面上做的一些文章。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些小股极端分子势力所组织的。但是，“用镜子来组织”从一开始就是个充满了讽刺的策略。在对“镜子”有意的操纵中膨胀起来的反对派，需要动员右翼势力，目的是分化社会，并且通过说服权威者，使他们相信这场战争正在破坏美国的秩序，从而尽早结束战争，这种策略已经使得约翰逊总统脱离了政权。反战运动可以引发权威的偏执狂，让他们自己绊自己的脚，并且制造混乱，从而破坏战争舆论的一致性。早在1967年5月，就有另外一个组织者称这一策略为“唤醒在权利中沉睡的小狗”。正如本·巴戈迪凯（Ben Bagdikian）

^①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混进去的，参见后面的第6章。

所指出的那样，当政界不稳的时候，媒体就会配合这种政治局面，因为它同时向精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传递新闻。^①

在1965年的时候，雷纳就开玩笑说他已经一百岁了。事件对他来说被缩短了，这甚至发生在他花费了许多年的时间从事诺姆·弗拉彻所描述的工作之前。这种工作就是号召大批的反战示威者再次举行示威活动，然后再来一次——1969年1月到华盛顿去参加反就职演说活动，9月回来参加声势浩大的反战军事动员。紧接着，1970年5月又参加了反对入侵柬埔寨的活动。每次雷纳都会很夸张地声称，下一次游行将会给战争造成重创。这种宣称与动员的循环，正好与新左派参与思想中疯狂的、混乱的宗派主义同时产生。1969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解体之后，还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取代它。雷纳知道，他和当前的运动失去了任何政治上的联系。但是，当这种运动逐渐衰落的时候，警察的监视和折磨却依旧存在；我们还没能解释事件的全部情况。

雷纳用了多年的时间去做了一系列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为穷人组织多种族运动（1964），改革芝加哥组织起义联盟（1967），组织民主代表大会的召开（1968），推翻美国政府（1971）。每一次，他的活动范围都进一步扩大；每一次，都有大桥被炸毁；每一次，冒险都会增加；每一次——从事情的本质上看——他和成员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具操纵性。雷纳的转变不仅仅像他看起来的那样是种背叛；它既是新左派乌托邦主义的延伸，又是一种放弃，这种放弃被认为是为了一种更高的使命。在领导公众人物换届的时候，雷纳仍维持着他得到的公众人物的地位。这次，他将获得一些追随者的支持。换选的领导 and 先前的追随者，没有意识到雷纳的转变是其精神上的一种尝试。他企图巩固自己在日趋瓦解的运动中摇摇欲坠的地位：从一种夸大真实的政治可能性的运动，到一种上帝赋予神秘权力的过程，其中并没有多大的跨度。“镜子”的组织者们落入了一种光可照人的圈套中。

公众人物作为职业：表演

杰瑞·罗宾的事业是另一种过程，另一种更加伟大和典型的美国成功的化身：在媒介制造公众人物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倾向于言辞的夸张。罗宾曾参与过1964年的自由演说运动，并领导过1965年的越南日委员会；每一次他的出现，媒体都会赋予一种微不足道的怪异角色。因此1966年夏天，当

^① Ben H. Bagdikian, *The Information Machines* (New York: Haper and Row, 1971), p. 1.

罗宾被美国人安居活动委员会（HUAC）传唤的时候，他创意十足地设计了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从而允许他对 HUAC 作一些评论，而不必去理会形象传递过程中的干扰。因此，罗宾将自己置身于激进的艺术传统之中。

R. G. 戴维斯（R. G. Davis），还有旧金山巡回演出哑剧的导演，记得在伯克利的地中海咖啡馆里，曾和罗宾一起谈论过关于他对 HUAC 的策略问题。“什么样的形象对他来说才是比较合适的呢？我们谈论了许多诸如如何选择服装这样的问题。我们聊了很多，我建议他应该穿上一身美国革命的服装……在我看来，他们可能并不会报道他说了些什么话，但他们会给他拍照，让媒体去听他演讲是不可能的”。^①

有经验的行为主义者已经意识到，他们无法决定他们所说的哪些话（如果有的话）会得到媒体的报道。二十分钟的采访或演说可能会被全程拍摄下来，但在晚间新闻中可能只会播出 15 秒种。因此戴维斯和罗宾试图改变他们自己的方向：把一些能引起公众注意的东西变成政治上的优势。戴维斯继续说道：

我认为人们一般都会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就算你花很长时间去演说并且回答了问题，他们仍然会歪曲事实真相……我不知道我们是怎样变成这样的，但我牢牢记得：“美国革命是很容易成功的，它将是一篇关于言论自由的伟大宣言。”这里给人一种完整的印象，就是每个人都将被看作是一个真正的矛盾对立体。调查人们所说所想的安居委员会！如果你知道那个方法的话，你将会发现矛盾对立多么明显。我觉得它就像是美国最直接的形象——美元。他认为那是个好主意，他说他将会那么做。

罗宾在 HUAC 面前的确穿上了美国革命的服装，他的形象也得以广泛传播。罗宾这种令人嘲笑的行为，使人们开始怀疑校园里的委员会。^② 1965 年，越南日游行最知名的地方在于，罗宾的露面不仅仅在运动内部，而且在运动之外也给他带来了莫大的知名度，这就使得他以一种显著象征者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事业。由于媒体对领导人领导身份的认同和确定，加上罗宾对媒体的利用，以及运动组织本身存在的弱点，因此他能够连续几年成为一个组织的传播者，独立于任何大

① 1976 年 10 月 3 日对 R. G. Davis 的采访。

② 如果资产阶级失去魄力和权力的话，一个人可以成功地令他们感到震惊。HUAC 早已丧失了它的斗争性，1964 年为争取和平的妇女罢工运动中的 Dagmar Wilson 已经证实了这一点。1966 年，同对民权解放的批评一样，HUAC 过时、褊狭的反共产主义很容易遭到人们的嘲笑。因而 Rubin 戏剧性的做法更加强了这种既有的方式。

型的组织之外，并代表青年人的利益为运动发言，也为任何一种他认为可以代表的团体发言。

这使得罗宾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而不是一个领导人。1967年，罗宾离开伯克利去组织五角大楼的游行之后，他失去了组织的基础。许多和他拥有同等地位的人厌恶他的自我吹嘘，还有许多人憎恨他成为焦点人物的篡夺者；这种憎恨可能使他变得更加浮夸和不负责任。毫无疑问，他自己想成为焦点人物的愿望是多种政治和个人意图的产物，这种愿望正好迎合了媒体对于引人注目的怪异性格的需要。不过，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个性的问题，还涉及到运动脆弱性的结构问题。迈克尔·P·勒拿（Michael P. Lerner）曾在伯克利反战运动中和罗宾合作过，他回忆说整个运动中充斥着一种感情，那就是“罗宾的自我主义是如此地令人不悦，以至于大家都想消灭它”。^①勒拿说，这种反对论不仅解释了杰瑞离开伯克利的原因，而且还解释了杰瑞为什么会转向他并不真正相信的政治中立。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机会主义的原因。根据勒拿的叙述，1967年，在杰瑞帮助建立“国际青年党”的几个个月前，“杰瑞还不像个嬉皮士”。

刚开始，他反对这种熟悉的现象是出于好奇，凭着兴趣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也许是由于他太想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让自己的形象出现在电视上，……为了能够得到可以给他带来更多空间的政治，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进行活动……从而得到某种个人承认，并成为他想要成为的人。

由于他们被愤恨的成员剥夺了合理利用媒体作为政治延伸的机会，而又仍须承担着自己的义务，因此罗宾和其他有着相似境遇的领导们开始孤立起来，正如勒拿所说的，“当他们自己的靠山抛弃了他们的时候，他们被迫寻找媒体作为投身之地”。

但是，媒体的持续表演需要一种公认的角色，一种具体化的身份，像新闻播音员或喜剧演员等。勒拿的理论得到了迈克尔·罗斯曼（Michael Rossman）所提出观点的支持：罗宾的表演是为了媒介消费而产生的一种嬉皮士风格，和政治活动家的风格带有某种意志的融合。在1968年3月给罗宾的一封信里，罗斯曼——作为一名反对领导人，偏袒这种可能成为嬉皮士的速记风格和设计——他说：“多年前，我问我的一个学生是如何看待里洛和他组织的精神的，他说，‘里

^① 1976年12月7日对Michael P. Lerner的采访。

洛是一个倒酸东西的哈佛教授’，不要被人当作一个倒酸东西的政客，杰瑞。”^①

罗宾需要一个追随他的政治组织，而不是和他面对面地组织。他的追随者们被严格地组织起来，就像大众媒体的受众一样：分裂、广泛而又短暂，并且他们在政治上也是十分活跃，除了成为叛乱的中心象征而被动员起来的时候。60年代末，所有的运动公众人物中，罗宾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典型人物，从一个临时形式组织的领导到另一个，从1966年4月的柏克莱市长门第，到1967年10月的五角大楼游行和1968年8月的芝加哥游行。到那时，他和其余的少数嬉皮士几乎自动地成为了新闻人物。他意识到，只要扮演杰瑞·罗宾，就能够制造新闻。他和艾比·霍夫曼、鲍尔·克拉斯纳，有时也和其他人一起召开记者招待会，并且以一种坚固的名望不断扩大国际青年党的范围和重要性。正如迈克尔·罗斯曼在信中所写的：“在我们组织神学的发展中，你进入了一种领导的异端学说；嬉皮是这种学说决定的一种官僚作风。”^② 尽管由那些媒体号召的选民，没能到芝加哥参加1968年的示威活动，但罗宾的公众人物地位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因为芝加哥政府、警察和国家的约束组织认为，他的名誉真像媒体所宣传的那样，因此也就予以了承认。1968年秋天，当他再次出现在摄像机前的时候，罗宾穿着上面画有印度战争的服装、带着嬉皮士的念珠、穿着越南式的凉鞋，拿着玩具手枪——这是对新老派后期产生困惑的生动象征，也是被压迫人民反文化的一种生动象征。地下报纸脱离了日复一日的政治生活，并且随着革命的发展而日益荒芜。后来，它加入了全国性媒体，从而更加扩大了这种混杂（mishmash）。^③

对于1969—1970年的芝加哥阴谋审判，罗宾将其解释为对他叛乱和寻欢作乐的一种报应。这种审判几乎天天为他提供表演的舞台。制作人斯坦霍普·古尔德（Stanhope Gould）曾审查了CBS关于审判的许多报道，他记得在罗宾和艾比·霍夫曼进行谈话会晤的时候，他们身旁总是跟着一群摄像人员。我问戈尔德：为什么是罗宾和霍夫曼而不是雷纳·戴维斯、汤姆·海登或戴夫·德林吉尔呢？戈尔德回答说：“因为他们是芝加哥七人（Chicago Seven）中最出名的人物。”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戈尔德早些时候，也就是1969年1月反对尼克松就职演说（in-hoguration）活动之前，雷纳被HUAC传唤的时候，曾经编辑过关于雷纳·戴维斯的一篇文章。用戈尔德的话来说，这五六分钟的内容充满了许多附庸风雅的东西，

① Michael Rossman, "Letter to Jerry Rubin," 见 *The Wedding within the War* (Garden City, N. Y.: Anchor Books, 1971), p. 270.

② 同上, p. 267.

③ 参见 Fruchter, "Movement Propaganda," pp. 4-17.

它主要打算描述雷纳·戴维斯——杜鲁门总统内阁里一位经济顾问的儿子——是怎样变成一个激进领导者的；然后，戈尔德有意省略了一位 HUAC 型的发言人。因为这一部分有失均衡，戈尔德的监督人瑞斯·本斯利（Russ Bensley），也就是 CBS 的最高新闻制片人，将这一部分删掉了。在戈尔德为克朗凯特工作的十年里，这是他为数不多完成却未被发表的文章之一；他违背了一条外部的界限，这个界限直到事情结束后才被清楚地描绘出来。但是，排除对雷纳·戴维斯政治演变调查的标准，允许人们对更为精彩、更典型、也更容易被免职的运动公众人物进行报道。^① 嬉皮士们大胆的挑战，被当作一种娱乐方式而存在。

罗宾的表演并非缺乏方法和策略；更精确地说，这些表演是被一种精确的革命理论证明过的。罗宾相信他的自吹自擂和伴随而来的反射事件，激起了人们的反抗意识和革命行动。他关于大众组织的认识反映了媒介本身的理论。大众媒介企图将受众变成理想消费者的复制品；杰瑞·罗宾相信，他能够将一部分青年观众变成他自己的复制品，并且鼓励他们重新去做一些能够被媒体解释为革命行动的事情。切·格瓦拉（Che Guevara）在整个第三世界号召“两个，三个，……更多越南人”；1968 年春天，汤姆·海登也曾号召“两个，三个，……更多哥伦比亚人”。如果有“两个，三个，更多哥伦比亚人”，为什么没有两个，三个……更多的芝加哥人、嬉皮士和罗宾呢？1970 年 1 月，芝加哥阴谋审判的前一天，戴维斯记录下了和罗宾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罗宾完整地介绍了他的媒介效果的理论：

芝加哥事件后的一年里，在大学校园和高中校园出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示威游行。可以说，这直接或在心理上同芝加哥事件有关。人们高唱：“我想念芝加哥。”在芝加哥事件后的一个星期内，柏克莱发生了一次暴动。通过大众媒体，芝加哥事件传播给了每一个。在这些人脑海里，这是一个神话，这一事件被极大地夸大了。

罗宾继续说：“言论自由运动创造了哥伦比亚，多亏了媒体。”戴维斯反驳说：“但哥伦比亚运动在言论自由运动多年以后才得以实现。”罗宾回应道：

这样考虑一下：经历言论自由运动的孩子大约只有十多岁那么大，五年后，整个国家的校园都会在发生运动。这并不是通过传统的政治，比如读书或者参加讨论等方式来组织的，而是由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东西所引起的。^②

① 1976 年 11 月 13 日对 Stanhope Gould 的采访。

② 由 R. G. Davis 记录的讨论，芝加哥，1970 年 1 月 8 日。

罗宾说，通过媒介来动员，并没有“否认当地组织低劣的水平”；或者认为“我们的水平很高”。但是，他对书面文字的轻视却叫得更响。和罗宾一样，他的青年观众都具有一种对形象和现实的迷惑，这在电视上曾被如实地报道过。罗宾的才能在于，他能够将这种迷惑转换成一种革命动员的理论。在他看来，革命大众只是一些媒介一按按钮就会出现的人。这样，革命的任务就降低为动员消极的大众去参加一项具体的行动——这种假设和传统的市场假设相似——动员者的问题仅仅是工具性的，不是是否或为什么要动员人们去参加一次有新闻价值的行动，而是如何去动员。

当然，如果媒体报道罗宾的话，他只能作为公众人物发展。他是鲜明和典型的，甚至当他确实违反了运动中一些较合法理论的时候，他仍是如此，而这正是他作为公众人物得以成功的基础。严格地说，这些孤立的领导公众人物，只是通过媒体和无组织的成员间接地进行联系，他们对工作群体也不承担什么责任，而正是这些仁慈被吸引到无节制、“偶然的”、富有含义的行动中去——这些行动之所以会成为“真实的拷贝”，是因为他们描绘了能引起富有象征意义的画面。他们被运动所抵制，但同时又被媒体所吸引。对于1973年的“共生解放军”（*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共生的逻辑达到了顶峰：这是一个没有实际政治基础的小团体，他们没有受到过报纸的注意，也没有能够以一种值得纪念、难以根除的标准而成为焦点，比如说一些夸张的言辞（“消灭法西斯蛀虫！”）。同时，它也缺乏一种政治纲领。因此，几年以后就没有人记得它了。

公众人物作为陷阱：放弃

除了在运动中增加名望之外，另外一种不同的选择就是对领导权的完全抵制。如果一名领导不能够忍受，也不想忍受来自媒体和运动基地组织互相冲突的要求，或是不想再生存在由于出入于变幻无常的公众人物世界而产生的紧张状态中，他会选择放弃领导权。既然运动本身都不清楚合法的领导权和权威到底有什么区别，那领导们领导起来就更犹豫。这些人本来就已经对他们的权威感到非常不确定，因此放弃就成了一个极其简单而又普遍的方法。斯图登·里德就是一个选择这种道路的人，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的玛丽欧·赛文（*Mario Savio*）也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的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

摩西或许是早期 *SNCC* 中最具号召力的领导，也是最先在密西西比河开展组织的领导之一，他的勇气和境界在运动中都是出了名的。但是鲍勃·摩西无法确

信他的权威，尤其是在 SNCC 阐释其结构的时候。1965 年 2 月，在 SNCC 的成员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摩西放弃了他的领导权，就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一位 SNCC 的工作人员记下了当时的情况：

在星期一晚上的选举结束之后，鲍勃·摩西醉醺醺的走了回来。整个周末他都在为沉默的人们奔走呼号——公正的、不公正的；对的，还是错的。这些人是密西西比的黑人，一群迷失了方向的人。他曾经说过：“如果你想要奴隶的话，你最好给他们选择权，并称他们为自由人，因为这是世界允许你这么做的惟一方式。”不过他现在喝醉了。他吃了很多奶酪、面包，喝了一瓶酒，然后开始讲话。首先他说他已经改了名字了——不再叫罗伯特·帕瑞斯·摩西，而是叫罗伯特·帕瑞斯（他妈妈的名字）。他不想成为，而且也不是我们所创造的神话人物，他想重新成为一个普通的人。在过去几天里，没有人阻止他说话，因为原来他是罗伯特·摩西。现在他将变成罗伯特·帕瑞斯了。^①

鲍勃·摩西很快就离开了 SNCC，然后去非洲呆了十多年。

玛丽欧·塞文是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领导，他在批评运动的“极端不民主”的过程中也放弃了自己的领导权。他离开时说的话，和鲍勃·摩西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965 年 4 月 26 日中午，他对集会的人说，“如果行动并不是你组织的”，“那么该行动就不值得被组织”，“免得让我觉得我应该得到独裁的权力，而连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反对。祝你们好运，再见！”^② 媒体赋予了塞文一种权利，而这种权利，就连他自己的政治组织也未曾赋予过他。^③ 不过，媒体也会同样毫不留情地对他进行批判。对塞文来说，媒体赋予的这种地位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礼物；而对一个敏感的人来说，却是一个折磨人的礼物。

实际上，所有知名的运动领导人都经受着一种痛苦：一方面拥有媒体赋予的地位，另一方面却无法得到同事和成员的支持。这两种关系的中断，很容易就会使两方面的关系变得紧张，而这种紧张状态可能是毁灭性的。放弃者们拒绝成为强加到他们身上相互冲突的牺牲品；为了把他们自己从支离破碎之中解放出来，他们彻底地离开了领导层。

① Nancy Stoller, "The Ins and Outs of SNCC," *Studies in Brandeis Sociology*, Brandeis University, 第 18 页, 摘自 1965 年其本人的书信。

② "Mario Resigns FSM Leadership," *Daily Californian (Berkeley)*, April 47, 1965, p. 1.

③ 1976 年 12 月 7 日对 Michael P. Lerner 的采访。

领导权的转变

在放弃名誉和使名誉得到提升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微不足道的选择：直接利用媒体去传播观点，而不被公众人物常规所束缚。许多人认为这是理想的选择；许多成为焦点人物的领导认为，这实际上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经常会选择如此尝试。但是，抵制住这种从公众人物变成明星的诱惑，需要具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因为这需要在校园巡回演出，或是在电视访谈节目中扮演小丑，并需要针对种族优越论或是广告和好莱坞说上那么几句话，光有经验是不够的。白色激进运动不协调的反权威主义，给伯利·布兹、雷纳·戴维斯、玛丽欧·塞文和其他许多人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然后，问题就出现了：在什么情况下，运动能够成功地使它的领导们担负起责任来，使他们避免进入公众人物世界，但同时又鼓励他们利用媒体为政治目的服务、减少对领导们和运动造成的破坏呢？有一点，文化领域内一种颂扬年轻的青年运动，尤其可能受到来自公众人物的压力和影响。其领导人因为缺乏来自事业和家庭的回报，而更依赖于媒体来寻求尊重；置身于大众文化市场的青年人觉得他们有权成为公众人物，不管是作为摇滚明星、运动员还是行为主义者。不管是何种方法，进入媒体的个人重要性都会得到膨胀。但是还有一点，一个目标和地位达成一致的运动会，将更少允许它的领导们在镜头前自由地制定政策。最后，运动组织能够同意采取一些正式的程序，去评论领导的观点。运动将竭力运用它的政策，使领导们一起合作，然而领导和选举将同意拥有各自角色的特征和义务。归根结底，问题在于运动能否建立一个明确的标准，以检验它想从领导那儿得到的东西，这种标准不会使领导们陷入双重束缚之中；这种标准也可以检验领导们能否避开成为公众人物的圈套，而同时又不必放弃领导权。

新左派运动从未碰见过任何一种情况，因此它更容易受到公众的关注。来自政治事件的压力更加增强了它在机构上的软弱性。因此对任何一个领导来说，对媒体保持一种朴素一致、功利主义的观点是非常困难的：利用媒体而不会引火烧身。还有更多这样的情况，因为在六十年代末期看似革命的浪潮中，确保成为公众注意中心的方法，无论看起来还是听起来，好像都更为夸张。

6 | 浮华的报道与越战

在运动中，不可避免的战事使战争和公众人物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越南每天都在发生流血事件；根据可靠的信息（实际上，几乎都是国家解放前线的利己宣言），对国家外交政策的讨论、文质彬彬的纠察队伍、抵制征兵运动与选举运动都无法阻止美军的屠杀。无论是林登·约翰逊将反战者看成是“神经质的懦夫，”还是后来尼克松和阿格纽的“爱唠叨的地方长官”，无不过于简单。然而，反战运动在何种程度上阻止了战争的升级，这一直是个严守的秘密，至今仍是一个难题。海伯斯坦姆在《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海伯斯坦姆曾因对越战的出色报道而荣获普利策奖，这本书是他分析越战政策及决策者的一部著作——译者注）一书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1966年年底，军方力劝约翰逊总统轰炸河内和海防，阻塞港口，引用海伯斯坦姆的话，就是“摧毁两座城市的工业能力。”他们编写了计算机程序，然后告诉约翰逊总统，让他来看看1945年对广岛、长崎的轰炸会因为避免了和日本的直接交战，而挽救了多少美国人的生命。约翰逊总统接见了程序员，并且告诉他：“对你们的计算机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真的干了这些事情，你们是不是能计算一下，5000,000名愤怒的美国人民需要多长时间可以闯进白宫，来讨伐他们的总统呢？”于是，哈伯斯坦姆写道：“轰炸河内和海防的计划，就暂时放到了一边。”^①

然而，这场运动通常被认为是徒劳的，尼克松公开宣称，他宁愿坐在房间里观看橄榄球比赛的转播。1969年11月15日，当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声势浩大的反战动员中参加示威游行的时候，这场运动印证了他的论断。丹尼尔·艾尔斯伯格论证说^②，反战运动实际上延迟了政府将战争升级的计划——入侵柬埔寨与老挝，

① 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p. 641.

② 1976年7月，在 Institute for Socio-cultural Studies 发表的演说。

在海防与其他港口埋设地雷，用 B-52 型轰炸机轰炸北越的城市（实际上，后来美国都发动了这些进攻，只不过不是同时进行而已），轰炸红河的堤坝和连接中国的铁路线，并且舰队有可能在北越的南部地区登陆，在越南北部投放核武器（以空中轰炸的方式来增加进攻）。但是，这场运动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无法阻止的战争和明显的错误战略，是推动反战运动演变成激烈的交战最为强大的力量。或者更确切地说：反战运动起初发展成为了激烈的交战，后来却缺乏一致的行动。绝望与消极接踵而来，这就是运动产生的真正效果。

在 1965 年到 1970 年期间，运动变得更为激进。战争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越来越不像一起偶然事件，而更像一种症状。自从卡尔·奥格斯比首次在华盛顿针对 1965 年 11 月游行的演讲发表言论，提出了战争是美国扩张主义的一个后果之后，反战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赞同。同时，这场运动中的许多人断定，反战需要与南越的国家解放前线以及北越团结一致。所以，越南人民不再被描述成为燃烧弹中的牺牲品，而是英勇的战士、荷枪实弹的巾帼英雄和富有耐心的胡志明。而地下报纸与大众媒体，也不断宣传这些新的形象。国家解放前线的旗帜经常出现在各种集会上；一些运动领袖也参观了河内市，越南人民的照片与切·格瓦拉的海报也被挂在了墙上；同时，还有赞同第三世界武力抵抗帝国主义的海报。到了 1969 年，在运动中广为传播着荷枪实弹的形象，尽管这种形象要比实际情况更为普遍。

但是，战斗精神未必是夸大的，未必是对大多数人情感的严重损害。烧毁旗帜之类的过激行为只是强硬派发泄心中怒火的方式，此举也使运动脱离了可能会支持他们的同盟。媒体（包括地下出版社）和运动中的一些人，知道怎样将好战精神与夸大的姿态联系起来，从而为新左派运动建立新的标准。那些在运动中言行肆无忌惮的人，深谙媒体的运作并为己所用，然而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扩大新闻报道的范围势在必行。很明显，大众媒体给予运动中最为野蛮、最为疯狂的浮夸、最为显著的关注，报道野蛮、古怪、不和谐的行为和每次行动中最暴力的部分。《纽约时报》的总编，克林顿·丹尼尔曾对记者说，《纽约时报》对 1968 年 1 月 15 日爆发的第一次妇女反战运动作了轻描淡写式的报道，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运动的规模，其次它不希望成为暴力事件。^① 在 1965 年，

^① Public Broadcast Laboratory, "Journalism - Mirror, Mirror, Mirror on the World?" (1968) 当时我正进入媒体工作，一个研究新闻运作的社会学家研究了相同的选择性：“当报道地方大学的示威活动时，我询问一位摄像记者，什么才是最具新闻价值的东西。他回答说，你是指所有的东西？正在降落的旗帜，还有其他东西，我不愿……” (David L. Altheide, *Creating Reality: How TV News Distorts Event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76], p. 75.

一小撮纠察员就有可能成为新闻事件；而1968年，催泪弹和流血这种事情方可见报。如果有100,000人参加上次的游行，下次游行的人数就必须达到200,000人；否则这次游行将无法得到重视，或者被看作是运动衰落的迹象。最残暴、最不和谐、最“精彩”的象征一定会被报道——从“越共”的旗帜，燃烧着的征兵卡到后来的旗帜。结果，新闻媒体的力量落到了喜欢浮华的领导者与军事行动主义者、挑唆者和警察的手中。因为媒体已经将领导者变成了公众人物，所以媒体也会诱惑他们走向浮华。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帮助那个年代形成了一个中心政治矛盾：60年代后期，当反战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当民意测验显示越来越多的人民反对战争时，^① 新左派运动的中央组织却孤立了自己，并最终瓦解。

新左派运动转向暴力情绪

渐渐地，这场运动被各种缺乏信任的负面形象所包围。在一定程度上，仅是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形象是由自身塑造的。在暴力得到这场运动的青睐之前，它的鬼影已经盘旋在媒介的描述之中。然而，媒体设置议程的能力，不仅仅是预言性的；他们塑造出来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变成现实。在第一部分，我们看到了左派运动中早期的暴力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模式发展得更加引人注目。下面的事实将告诉我们，《纽约时报》是怎样利用自身的影响来含沙射影地进行遏制的。1967年5月7日，星期天。《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保罗·霍夫曼的文章，标题是：“新左派转向情绪暴力以取代抗议。”文章开头写道：

“我们为在都市环境中建立一支游击力量而工作。”一位左翼学生民主社团的秘书，乔治·卡尔弗特（George Calvert），最近声明。

“我们正在积极地组织叛乱。”他说。

29岁的卡尔弗特先生曾是名历史教师，他在位于芝加哥街道的昏暗的办公室里，愉快地对革命发表着演说。他话语中的暴力，描述着新左派运动的激进。

接着，这篇文章继续写道：

“今天的新左派，遭受了挫折和派系分裂，转向了激进主义和直接行动。”其中有一张卡尔弗特的照片，旁边的说明写到他“旨在建立游击力量”。卡尔弗特的话被进一步引用：“只要游击行动的精神存在，格瓦拉的理论就适用于美国

^① Jerome Skolnick的The Politics of Protest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69), p. 44 记载了从1965年8月到1968年10月对人们反战情绪的盖洛普民意测验。

……格瓦拉确实活在我们心中。”前四个副标题分别是“格瓦拉活在我们心中”、“‘我不是非抵抗主义者’”（引自“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另一组织者）、“‘暴力是必要的’”（同上）和“行动高于空谈”，文章草草提及“一个被模糊定义的‘积极参与的民主整体’”。文章把激进主义、直接行为与暴力混为一谈；文章还谈到了斯图登·里德，一个坚定不移的非暴力倡导者，“他好像区分了积极暴力和文明的抵抗”（暗含了文明的抵抗在一定程度上是消极的暴力）。如果这还不够醒目的话，《纽约时报》又在霍夫曼文章的旁边刊登了一条新闻，标题是：“来福枪俱乐部认为枪炮是遏制暴动的工具：对付暴民的行动，公民的武装极端重要”。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是编辑重组的结果，两篇报道都涉及了相同的主题，好像是在说：暴力正在引起两极分化，左派和右派。不管怎样，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又刊登了一篇报道：“新左派的倾向使会议上的‘老左派’知识分子感到恐慌。”毫无疑问，这是大众媒体对运动重新架构的具体体现。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主席尼克·埃格尔森在《新左派报道》中通过一封辩驳信作出回应，但是《纽约时报》对这封信的内容却没有提及。卡尔弗特在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的报告中指出，他的话被断章取义。“很显然”，卡尔弗特在《新左派报道》中写道，《纽约时报》的意图是“凸显‘激进’运动的暴力阴影，来发展‘自由主义’的事业”。下文就是卡尔弗特对他与保罗·霍夫曼的短暂会面作出的说明：

关于“游击”力量的问题，是在我的办公室提出来的。那天下午我来到办公室，发现保罗·霍夫曼正在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副国家秘书迪伊·雅各布森交谈。霍夫曼说道，他正周游全国，为关于新左派的一篇重要文章搜集素材。谈话很快转移到了与美国无关的话题上。最后，霍夫曼谈到了他作为《纽约时报》哈瓦纳的战地记者在古巴的经历。我问了一些关于切·格瓦拉的问题，他谈了几分钟，说到了格瓦拉在哈瓦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时的情形。格瓦拉看起来非常疲惫，而且非常沮丧。霍夫曼表示，他确信格瓦拉已经辞世。基于他认为的“详尽的证据”……我用那句常被引用的话回答他：“即使格瓦拉已经死了，他仍然活在人们的心中。”

霍夫曼问我是否可以被称作“格瓦拉主义者”（Guevarite），我回答说“不能”——因为我不认为这样一个术语对人们来说有什么意义。我补充道，然而我感觉，为这个社会的根本改革而努力的美国年轻人，在许多方面与第三世界的游击力量组织者相似。他们都以极其有限的资源为消灭不平等而工作；他们的战斗

力依赖于赢得选民的尊敬和支持；他们拥有共同的敌人，无论这些敌人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大学里，还是在一个令人愉快的社会中——侵略、扩张的美帝国主义为了剥削而不是创造的目的，使用地球上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我们还谈到了新左派的分权与极端民主信仰，以及它的“分享民主”口号。霍夫曼说，“你们应该像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一直坚持工人的控制力量，”然后他继续谈起了他所了解的西班牙的自由运动。^①

霍夫曼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几位富有的自主者感到希望渺茫。正像保罗·布思在1965年10月指出的那样，无论“自由的”还是“极端的”，国家秘书们公开的政治演说都是对组织内部的一种破坏。在1967年的会议上，卡尔弗特不得不对惊慌的非暴力代表们承认，接受霍夫曼的采访是件非常不明智的事情，是个陷阱。卡尔弗特努力让他的对话者们相信，问题是结构的，一个政治组织的国家官员不可避免成为政治发言人。^②然而，大部分运动的成员要比运动的领导者温和而稳健，媒体的夸大分裂了运动的这两个部分，使领导者背负暴力的罪名。“用镜子来组织”的理论看起来好像是不错的策略，因为选择的过程和歪曲的报道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为什么不试着去利用它呢？

因此，暴力愈演愈烈的过程，部分源于媒体对于这场运动特征的展现，或者说源于一系列标有“这场运动”标签的事件，就像社会问题需要解决的办法一样。转过来，这种行为又是媒介霸权的一个结果之一：描述一件异常的事件，而不是从正常的社会生活中解释其根源。应对事件负责任的机构也演变成为一个问题，特别是当遭到抗议的事情——战争、投资——正在其他地方发生的时候，发生在媒体的视域之外或者“报道”之外的事情。媒体将这场运动界定为一个问题，这本身也是与运动中的革命论者地位崛起的一种巧合：一种寄生于大众媒体，而且仿佛又在自己的形象中证明自己正确的地位。当谈到1968年的芝加哥游行时，艾比·霍夫曼说，“我们是革命的广告”，^③他清楚地指出了运动中更为广

① Greg Calvert, "Response to the Sensationalist Press: Divide and Rule," *New Left Notes*, May 22, 1967, p. 2.

② Kirkpatrick Sale, *SD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pp. 359-360, 摘自集会的会议记录。

③ Abbie Hoffman [Free], *Revolution for the Hell of It* (New York: Dial Press, 1968), p. 134. 有趣的是，嬉皮士的两位先驱，一个是第三国际的领袖 Zinoviev，还有一个是匈牙利革命的失败者 Bela Kun。1921年，在西欧革命浪潮衰落期间，他们在德国的中部发动了一场注定会失败的共产主义暴动。他们相信，这次绝望的冒险可能会唤醒处于睡眠状态的德国工人阶级（他们自己的话）。参见 Isaac Deutscher, *The Prophet Unarmed: Trotsky 1921-192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3-4.

泛的基调：一种包缚绝望的轻率。追求革命但是缺乏真正的力量，这场运动最终将把自己封锁起来。“用镜子来组织”意味着对自我的欺骗和放弃事实，尽管这将花费多年的时间来发觉，或者接受某人悬浮在社会中无处可去的事实。拒绝面对本质——和局限——运动的社会身份是一个有用的策略。列宁主义不同的小党派竭力想成为古典无产阶级的领导人或者代理人（“新工人阶级”，或第三世界，或年轻人）；他们都忽视了这场运动的实际范围。受上层政治之风的影响——战争、麦卡锡的运动、约翰逊的退位，然后马丁·路德·金和博比·肯尼迪的遇刺事件——运动变得混乱了。

毕竟，这场运动始于一所精英学校对于社会上层建筑的孤立。多年来，这场运动间歇地、不协调地、并且顽固地探求一条走向社会的道路。“用镜子来组织”需要更少的耐心，更少的牺牲，更少的沉闷和更少的时间；运动看起来是有效的。但是，由于缺乏连贯的策略和对于运动本身的错误理解，这场运动最终走向孤立。“学生”、“激进分子”、“革命者们”成为一部冗长乏味的戏剧中可以预见的角色。越来越残暴的行为，导致了媒体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夸大其词的报道以及警察的镇压，这反过来又助长了运动的愤怒与偏执，从而引起了与警察更多的对抗以及媒体的报道。

1968年，高潮挺进芝加哥，运动组织者宣布了他们强迫民主议会面对越战的意图。尽职尽责的戴利市长和联邦官员们，把一座城市变成了武装的营地。一些行动的计划仍然一如既往地~~对~~警察进行攻击：例如，一群示威者主动让记者们拍摄他们在林肯公园表演日本蛇舞的照片，作为蔑视警察攻击的方式。作为一种符合逻辑推理的行为，这次表演完全是虚张声势；日本学生想出了这招，以便能堵住狭窄的街道，将警察拒之门外；而在芝加哥闹市区宽阔的林荫大道上，蛇舞竟然失去了用武之地。不过，作为一个新闻事件，与戴利市长反常的行为形成对应，媒体制造了奇迹。媒体夸大了两极分化与虚张声势；戴利市长利用这些报道作为托辞，来证明警察的过度伤害是正当的；而且重要的是，媒体向世界转载了这些结果。在周二晚上的集会上，当国家防卫军将铁丝网扯到密歇根大街上时，示威者感到他们的行动是有价值的；他们深信，该州强大的力量存在于乏味的政治系统之中，集会只有在枪口下才能成为可能。从康拉德·希尔顿（Conrad Hilton）旅馆穿过密歇根大街，当探照灯照耀下的示威者齐声共唱那激励人心的圣歌“整个世界都在看！整个世界都在看！”的时候，警察们涌动起来。流血冲突，摔碎的照相机，媒体宣传的形象变成了事实，事实又变成了照片，被控告的罪名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尼克松政府正是利用了这种循环，并进一步镇压辩护——

包括控制媒体不断报道的坏消息——还有其自身的偏执。

美国总统和副总统非常清楚这一过程，而且试图利用公众的注意。1970年中期大选的前五天，尼克松总统在圣荷塞（San Jose）市政演讲厅发表了演讲。示威者聚集起来，然而警察特意设置的路障却允许他们接近总统的车队。然后，尼克松站在他的豪华轿车上向人群挥舞，举起手作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反对者中有人向总统投掷了东西，总统的随行人员“满心欢喜”，^①媒体报道了总统被袭击的消息，尽管没有人因此而被捕。CBS采访了乔治·默菲（George Murphy）议员（“美国总统和加州州长……外加一名美国议员，让生命受到一群超过一千人的极端恐怖分子的威胁，简直难以置信，而且令人难以接受”）和尼克松的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Ron Ziegler）（“这不是一个人的行为；而是一群目无法纪，代表美国最差公民的乌合之众……尼克松总统认为，与这种行为直接面对面的时候到了。当参加和平集会的人们受到飞来石块袭击的时候，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该报道没有包括任何示威者的声明；一丝不苟地应用在对立面上的平衡原则，并没有在官方那里表现出来，至少在阿格纽—尼克松（Agnene-Nixon）猛烈抨击电视网一年之后。^②

那天晚上，曾在现场的一个学生告诉我，那一小撮扔石头的人是一群陌生人，不是圣荷塞反战圈里的人。不过关系不大，总统也知道如何该处理这些事情。他掌握了权力，像所有总统必须做的那样，作为形象的创作者；通过利用运动和运动自身的形象，他能有效地去孤立它，包括运动的范围和影响。尼克松政府破坏运动的兴趣与媒体对离谱报道的热衷相互关联；政府破坏运动的策略，很可能包括利用暴力来诋毁运动的名声。毫无疑问，当尼克松入主白宫的时候，这种策略并不是从零开始的。我们对约翰逊与尼克松麾下挑唆者的行为知之甚少；但是，如果我们从最近几年的调查得出的证据来推断，我们会看到一些令人震惊的事实。事件发生的十年后，CBS公布了来自于军方的声明，在1968年的芝加哥的集会期间，“六个示威者中就有一个是密探”。星期三，在密歇根大街上游行的人群，因阻塞交通和警察发生了冲突。根据报道，这些游行的人群中，至少有两

① Jonathan Schell 的 *The Time of Illus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6), p. 130. 非常清楚地报道了这宗事件。

② 1970年10月30日的CBS晚间新闻，Hal Walker来自San Jose的报道，保存在CBS的新闻节目档案处。《纽约时报》的报道也并非有条不紊的；参照Leon V. Sigal,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of Newsmaking*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73), pp. 93-95.

百名密探。^① 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即使这些数字有所夸大，被夸大了五倍或者十倍。究竟是谁要浴血芝加哥，原因是什么？我们现在知道，杰瑞·鲁宾的芝加哥保镖，曾打扮成一个长头发的人，扯倒了格兰特公园的美国国旗。我们也知道，在纽约州北部地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暴力倾向的校园旅行者曾是政府的工作人员。他们还挑拨了什么，这对于60年代后期运动的整个进程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期待着消息能够公开，但情报局对此却不想公开，而且有可能已经销毁。

但是，挑唆者自己无法解释一切；他们必须参加一场能够容忍他们野蛮言行的运动。^② 从1968年4月至5月轰动一时的哥伦比亚罢工报道开始，^③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作为象征校园反抗与骚动的组织就成为了国家新闻的头条——从整个秋天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④ 组织的新一代领导人握有了权力，显示了他们乘风破浪的能力：他们相信自己对新闻的敏感。春天的暴力示威仍然体现着以往的暴力形象与野心，正如柯克帕特里克·塞尔写道的那样：

媒体歇斯底里地垂涎那些暴力示威，无视运动和平的一面，甚至莫名其妙地将遭到殴打的学生描绘成进攻者，把武装的黑人看作无拘无束的持枪杀人者。学生的武装是为了自卫，他们在谈判后离开了现场。实际上，学生的枪支并没有子弹，而媒体对这些却一点也没有报道。^⑤

那张有关枪支被大肆刊登的照片，以及那年春天媒体刻意选择并夸大的形象，很难说服务了谁的利益。运动中的一些人感到十分愉悦；他们早已经开始炫耀荷枪实弹的形象了。这就是遭到自由、甚至是激进的评论家责骂的“革命即戏剧”。但是，批评家通常忽略了那些有选择性的夸张和讽刺：革命者因为自己的挑拨而陷入困境。

在所有这些歇斯底里中 [塞尔写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作为一个组织于1969年6月瓦解了，部分原因与媒体的报道有关，或者说与学生和组织成员

① 1978年8月25日播出的CBS News Special：保存资料，pp. 28, 31. (c) 1978 CB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② Todd Gitlin, “Casting the First Stone,” San Francisco Express Times, Vol. 1, No. 36 (1968年9月25日第2页)。

③ 关于媒体对哥伦比亚暴动的歪曲报道，大肆渲染了游行者的狂暴并贬低了哥伦比亚在战争调查中的作用，参阅Jerry L. Avorn等人的Up Against the Ivy Wall: A History of the Columbia Crisis (New York: Atheneum, 1968)；Sale, SDS, pp. 441-443；以及Jack Newfield, The Dutton Review, No. 1 (1970)。

④ Sale, SDS, pp. 479-480.

⑤ Kirkpatrick Sale, “Myths as Eternal Truths,” More 3 (June 1973): 4

对这些报道的反应有关。一方面，许多学生退出了被媒体炒作为越来越暴力、鲁莽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这导致1968年至1969年学生组织成员和运动的骤减；另一方面，组织的领导阶层大多接受了被媒体夸大的形象，开始认为自己是一支非常重要的革命力量。其重要性，就像媒体宣传的那样，只能通过运动制造的暴力事件数量来衡量，这就抛弃了许多的学生支持者，最终分离出了“气象员派”。^①

或者如弗莱克斯的总结：

报道中浮华、憎恨、挑战与暴行的基调带来的后果，使运动脱离了那些至少持中立态度的人们；这种报道也为事件奠定了容许被歪曲的基调，为警察的干预奠定了基础，也为运动设定了错误的政治基础，以至于吸收了错误的人们加入了错误的队伍。当我走出这里，我发现学生一般都认为激进等于暴力。如果你停止暴力或者反对暴力，你就不再表现为激进。如果你曾经参加过而现在却不再参加，那你就是背叛了运动。^②

正如塞尔所言，“气象员派”的确是浮夸膨胀过程的终结；但是，除了他所表述的之外，他说得还不够充分，他们内在化了自己设计的形象，还设计了浮夸的野蛮行径。他们的目的在于打破习俗，一反传统；相反，他们进入了一个更为陈旧的习俗中，利用平庸毫无创意的国家神话，以秩序的力量抵抗混乱的力量。1969年10月的“狂暴日（Days of Rage）”，当“气象员派”在芝加哥街头上狂奔、在镜头前捣毁汽车的时候，他们演完了尼克松政府反革命组织设计的恶魔般角色，同时也证明了其合理性。

如果尼克松更擅长劝诱东方媒介精英，他就可能从同革命者的敌对中创建一个长久的政治基地。但是，尼克松自己抱有对于新闻媒体的偏执。而且在政治方向上，他对新金融家们和南部边陲的精英们还有所承诺。同时，大量的记者转而对芝加哥的新左派表示同情，而且在1968年1月的“新年攻势”（Tet）之后，媒介精英和东部权威（East Establishment）的大部分成员对战争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态度：如果他们继续和左派学生发生敌对，到1969年秋，他们对反战中间分子就更为友好，将他们夸大为合法的替代者。政府的策略，换句话说，就是尊敬不作如此区分的报道。至少，“延期偿付”行动给尼克松带来的痛苦不亚于“气象员

^① Kirkpatrick Sale, "Myths as Eternal Truths," More 3 (June 1973): 4

^② 1977年1月9日对Richard Flacks的采访。

派”，因为“延期偿付”行动的中间分子大多数是潜在的反战力量，因而不能单独划分出来进行镇压。这样，正像伦尼·戴维斯（Remnie Davis）一样，丹尼尔·肖尔（Daniel Schorr）也冒犯了他，因为媒体拒绝对其关于战争的意见表示出足够的热心。甚至在“新年攻势”之后，媒体对于战争的批评更加严厉和现实：战争是一次失败或者是一个错误，而不是内在世界政策的结果。媒体揭示了美国政策蕴含的无用和自我惩罚，举例来说，对柬埔寨地毯式轰炸的秘密几乎全部被披露。在“新年攻势”之后，他们对反战运动的报道，对合法的抵抗更加同情，同时小心谨慎避免冒犯政府；因此，电视网决定不对1969年11月的动员行动和“延期偿付”行动进行现场报道。早在1967年10月，电视网就已经考虑不对五角大楼前的示威进行现场报道。据CBS的一个消息提供者说，1971年初，CBS拒绝播出关于冬季士兵调查早已录制好的节目，节目中反战的越南老兵讲述了他们实施的暴行，以及他们看到其他美军实施暴行的情况。^①最后，媒体的领导者们还是保持了镇定。只有当政府远离阿格纽的铁丝网、敌人的名单，对报纸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的重要限制以及水门事件时，媒体才会结束对于尼克松违法的合法政治系统反抗的同情。运动和总统融化在聚光灯耀眼的灯光里。最终，媒体让全国确信了自己发挥的作用。

革命意愿与行动报道

在60年代末，伴随着与众不同的政治风格，浮华的运动越来越明显：间歇性的暴动，赋予了反传统文化的“革命”青年人身份的流动性。“青年人将创造革命”——海报如此宣传。一些观点则认为，青年人会独自完成革命；其他观点也认为，青年人将成为盟友、代理人、或者更具力量的领导人。无论如何，他们将“在路上”完成革命。1968年，许多参加运动的人开始羡慕“飞车党（bikers）”与“贿赂者（greasers）”，并且学习空手道，因为他们对恶劣警察的憎恨和恐惧与日俱增。1969年10月，当“气象员派”为“温比（Wimpy）”公然抨击“使革命卑躬屈膝”的早期同谋者的时候，他们坚定了“向人民开火（Fight the people）”的行为——美国人民，毕竟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

① 该事件发生于1971年1月31日到2月2日。据一个匿名的消息提供者说，电视网没有播放老兵们的控诉，因为他们“并未得到证实”。也许这一切无法在原则上加以证实（因为所有其他的见证人已经不在人世了）；更可能的情况是，电视网播放的“新闻”可能对独立的调查不太感兴趣。而且，反战老兵并非新闻的合法来源。

1968年4月到5月，哥伦比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无不具有启发与参照意义。马克·鲁德是哥伦比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行为派别”的成员之一，他为人更加理智，更为注重从“实践轴（praxis axis）”中攫取控制分会的权力。正如我们看到的，随着媒体的宣传，鲁德身上逐渐展露出“行动狂热分子”的风格（甚至在这一点上，媒体夸大了鲁德的暴行，好像“疯狂的学生好战分子”的角色一样，置事实不顾）。^①迈克尔·科莱尔（Michael Klare）曾协调国防分析院（Defense Analysis, IDA）的调查，揭露了哥伦比亚与五角大楼极不寻常的牵连，他讨厌媒体对鲁德的关注：

企图引人注目的人们是极端的行为主义者和浮夸者，是呼吁行动者，主张“推倒城墙”和“占领大楼”者，这是记者们喜欢看到的。举例来说，他们对我所说的哥伦比亚与国防分析院的关系毫无兴趣。^②

当然不是：行动是被界定为新闻的事件。然而，哥伦比亚体育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的其他主要问题至少能被拍成照片，而IDA在校园的设施却没有报道。所以，科莱尔也没有想起，自己曾经告诉过电视机前的观众关于IDA在武器调查方面的工作。在媒体的市场规则和商业性的驱使下，占领大楼和警察遭到殴打等事件被断章取义了。

该过程对哥伦比亚的组织分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呢？科莱尔辩论道，我认为事情是合理的，媒体对断章取义的关注，引诱分会进入了行为主义自欺欺人的恶性循环中：

直到那时，哥伦比亚才真正像运动本身应当表现出的那样强大。因为工作也变成了教育、演讲会以及房间会议——他们非常擅长的形式。而且，我认为在春天暴动之后，它失败了。

媒体并不是惟一的原因：相信组织房间会议的“实践轴”，对鲁德来说已经失去了主动权。正如科莱尔所说的，“所有这些后果都是慢慢堆积起来的”。不过，作为鲁德和“行动派别”在分会内部进行操纵的资源，媒体毕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在科莱尔看来：

在媒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看法是，对1968年暴动最具杀伤力的因素是分会拥有的救世主般的力量感：它能够越过中间的环节；由于它的名声、威望以及领导

^① 参照 Avorn 等人编写的 *Up Against the Ivy Wall*, pp. 46, 50, 61, 63, 69.

^② 1977年1月2日对 Michael Klare 的采访。

气质，它可以颠覆大学。这个错误的判断，导致了随后发生的几起灾难性的事件，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也土崩瓦解，一些成员则发展成为极端的“气象员派”，马克·鲁德也毫无保留地卷了进来。当他加入“气象员”组织的时候，媒体设计的形象成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而其他入也不断卷入进来。

在“哥伦比亚”之后——现在只是一个事件的名称，而不是一种形势和一个过程——形象广为传播；广为流传的口号，“两个，三个，更多的哥伦比亚”肯定了断章取义行为的价值。对于该口号，运动内部的媒体持积极的态度。其他分会逐渐认识到，哥伦比亚事件是一系列神秘的媒介形象：在它的指引下，他们会试着重复这种形象，就像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年半会试着重复“芝加哥”、“旧金山”、“哈佛”等等一样（我们认为这也是杰瑞·鲁宾的策略；鲁德不是嬉皮士，然而诱惑的结构是一样的）。通过巴黎暴动，哥伦比亚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甚至看到，它们的形象被折射了回来。因为在哥伦比亚，发生占领大楼事件的几个星期后，梭尔邦（Sorbonne）大学也迎来了伟大而又振奋人心的暴动。科莱尔回忆到：

我们能从电视上看到梭尔邦被占领，一般的地方都有电视，人们的公寓里也有电视。在梭尔邦事件中，不同于哥伦比亚事件，并且给人以视觉冲击的便是画面上的铁丝网和催泪弹。法国警察使用了大量的催泪弹，电视画面上也出现了学生戴着面罩的镜头，他们捡起地上的催泪弹，又把他们投向警察。人们封锁了大楼，然而，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并没有对警察进行回击。许多人都受了伤，但是并不存在“我们在和一群猪战斗的感觉”。在两次哥伦比亚事件之间，梭尔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为第二次的哥伦比亚事件迥然不同。首先，人们设置了障碍物，将学校和警察隔开……很明显，这些障碍物并不打算将警察拒之门外，但它比其他事物更具象征意义。而且你看到了人们戴着头盔和面罩，还在向警察投掷东西。^①

在那一段时期，进行街头巷战和设置障碍物的浪潮越来越汹涌。革命时机不成熟的时候，革命意志喷涌而出，填补了空白。里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gy）

^① Avorn等人编写的 *Up Against the Ivy Wall* 一书，证实了 Klare 的描述。实际上，在第一次占领 Hamilton Hall 期间，黑人学生投票明确反对用建筑物来对道路进行封锁。Klare 补充说，电视将自己暴露在行动中，就像 Kerner 委员会和右翼断言的那样：电视自己本身到成了一个事件。然而，如果 Mark Rudd 出现在镜头前，会吸引更多的人，所以他会提前作好准备。不管 Mark Rudd 什么时候露面，都会有摄像机疯狂地对准他，人们也变得疯狂起来。（1977年1月2日的采访）

的话被广为引用：“革命的义务是创造革命。”德布雷关于拉丁美洲游击队员的小册子，被认为也同样适用于美国。马克·鲁德写道，1871年的巴黎公社“一直以来就是革命意志、奉献与斗争的象征”。^①不过，鲁德并没有指出，它首先是被动员起来的革命阶级象征。激进主义的目标变得模糊了，但是却弥补了社会、政治孤立的事实。政治语境中充斥着选举自由主义（肯尼迪）的失败和积极非暴力主义（小马丁·路德·金）的暗杀。大部分运动的行动主义者丧失了对自由主义权威的信任，他们在自己的文明规范下，“借助于体系”来完成政治变革。革命主义是一个磁场，塑造着新的符号与象征。^②

媒体改变了宣传的形象，开始将目光着眼于革命主义：警察愈演愈烈的暴行。这些解释了街头斗殴的合法性，同时也解释了对于运动之外观众的厌恶。通过散布基于不同社会兴趣和经历的评价和象征符号，媒体无意之中在革命主义和战斗行为之间将社会加以两极化。在这段时期，右翼电视新闻批评家对事实有所忽视。例如，CBS 播出了一个节目，是关于1968年8月警察对全国的示威者和黑人使用粗暴行径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约翰·劳伦斯（John Laurence）曾报道过当年许多的示威活动，他也对示威者们遭到的不公平待遇表示出同情，同时指出许多警察配备了不合法但却得到政府允许的武器。于是，十天之后便上演了对芝加哥警察暴动的现场报道。

观众从芝加哥报道中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反战者和运动的同情者被警察的暴行吓得毛骨悚然；右翼势力则站在警察一边，批评电视网的偏见，而右翼国会议员则呼吁调查电视网“让人讨厌的事情”。CBS 的新闻主席里查德·萨兰德（Richard Salant）很快承诺，不再播出该节目，他说：“如果发生在芝加哥的一幕再次出现，我想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的。”^③电视网发现自己占据着的位置正在不断缩小：沃尔特·克朗凯特起初强烈抨击警察的策略，然后经过重新的考虑，决定不再破坏中立，并向戴利市长道歉。CBS 的新闻制片人罗恩·邦尼回忆道，那个星期“从新闻报道和电视上知道了很多可怕的事情”。邦尼有点儿激动，然后到大街上吸了口气，回到公司的总部说道，“我没有预料到的是”，“看到一

① Mark Rudd, "Symbols of the Revolution," Avoin 等人编著的 *Up Against the Ivy Wall*, p. 294.

② 当希望与期望破灭的时候，还有一种活跃的愤怒存在于原始的经历与需要中。但是，Christopher Lasch 对于自恋个性结构的分析过于概括，很难解释新左派历史的特殊性。

③ 摘自 Public Broadcasting Laboratory 的采访，"After Chicago, What" TV Guide, 1969年3月1日。实际上，1972年关于共和党在迈阿密海滨聚会的现场报道并不是很多，尽管这些示威活动从数字上来看要超过芝加哥事件。

堆来自千里之外的电报……告诉我芝加哥街头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你倾向将你的观众看作是客观中立的，”邦尼以一种迷茫而又无辜的语气告诉我：“相反，他们确实带有偏见。”^①的确，两极化的观众正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理解他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東西。

暴力在电影中的美化

美国在 frontline 失败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任何给人以力量的神话。现在，我们在寂寞的戏院包厢里，看着《邦尼与克莱德》(Bonnie and Clyde)。

——艾比·霍夫曼^②

首先，这是对新闻媒体力量的研究，不过谈到媒体对于暴力的宣传，则需要关心一下 60 年代末的一些电影。尽管电视媒介做得非常成功，但电影对那个时代依然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青年人而言：批评家，至少受到赞誉的影片《邦尼与克莱德》——以及更为温和一些的《毕业生》(The Graduate)——把已经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重新带回了校园。从 1967 年的《邦尼和克莱德》开始，好莱坞为越来越疏远电影的年轻观众制作了一系列反映年轻人文化和思想的电影；许多电影都将有关暴力的内容进行了浪漫而又粗卑的处理——断章取义的暴力、美化的暴力、令镜头耽溺的暴力和无须理由的暴力。这些电影既是这种新情绪的象征，又是它的催化剂。

阿瑟·佩恩 (Arthur Penn) 导演的《邦尼与克莱德》是技巧最为娴熟的影片，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影片，可能也是最受欢迎的影片；它不仅领导了新的时尚，而且还搞起了英雄崇拜；它赋予了暴力鲜活的色彩。尽管佩恩的英雄生活在大萧条时期，以抢劫银行来帮助被剥夺财产的农民（或者说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但是他们并不是破坏者。这一点，和 1937 年根据邦尼·帕克 (Bonnie Parker) 和克莱德·巴罗 (Clyde Barrow) 的真实生活改编的电影中的主人公截然不同。佩恩的主人公是独立自由的天使，六十年代的孩子让历史倒退了三十年。^③他们注定的犯罪生涯开始得像一场游戏，是一次反对乏味与无能的大胆行为。尽管邦尼和克莱德经历了短暂的“为人民服务”的阶段，但是，他们在影片中的大多数犯罪

① 1976 年 12 月 19 日对 Ron Bonn 的采访。

② Revolution for the Hell of It, p. 85.

③ 有关这些电影的详细的比较，可以参阅 Pauline Kael 的 Kiss Kiss Bang Bang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9)。

是精心选择的行动，与其说是强迫，不如说是自愿的。佩恩淡化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电影中提到了那个贫穷的年代，但是却非常遥远。佩恩通过柔和的光线和慢镜头，拍摄了邦尼的家庭，暗示家庭的含义是美好的，也是不真实的，它只是一个短暂的怀旧场所。在佩恩的影片中，另外一个主题便是渴望，渴望年轻、自由和强大：渴望就像一种兴奋的激情，驱使我们战胜平凡世界中的无能。当邦尼摆弄着克莱德的手枪，她正在为这场游戏定制规则：在第一次抢劫之前，在任何社会基本原则形成之前，这一笨拙的动作如此触动人心，以至于流露出他们俩的天真无邪。尽管影片中存在着一些对于不正当性关系的暗示，但是佩恩的天才使这些内容不仅仅只是作为暗示存在，更是将有关性的问题作为极好的动机，牢牢地隐含在背景里。^①

最后，当残忍的警察弗兰克·哈默（Frank Hamer）和他的将军，用枪分开邦尼和克莱德尸体的时候，这对不被法律承认的情侣可谓饱受折磨；他们是年轻无辜的，是为了我们而被安排离开这个世界的。他们的死亡就像他们的受害者一样，是被加以美化的；镜头使他们的离去显得颇有趣味。对于警匪片而言，影片中的人物死亡方式的风格已经形成了几十年了，经常表现为一种远景场面；佩恩对由于尸体毁坏而形成的近距离的冲击效果感到满意。他使用了四部摄像机，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拍摄了这一场面，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影片的剪辑来实现惊人的效果，同时表现死亡的芭蕾式风格。当身体不再工作，当它变成了超越了丑陋的躯体的时候，死亡中存在着一个关键的时刻，这正是我力求捕捉的。我们力求改变死亡的特征，使他们的死亡看起来具有传奇色彩，但又不是真实的。”^② 在影片中，佩恩始终运用了轻快的情感，努力让观众参与到这这对情侣的行为中。当佩恩重新转换其中的基调时，他的主人公是“相对肤浅，相当空洞的人”，没有帮助我们理解主人公内心精神世界道德层面的矛盾。结果，我们不得不对外部的东西进行较多的处理，就像卡通片……我用卡通片的方式进行思考——每一个画面都在变化。我们笑，我们哭，我们又笑，因此我们就是这样来剪辑影片的，画面也是这样制成的，而不是长长的、流动的画面。”有记者问道，如果“随心所欲地操纵观众的反应，而且对你来说并不存在着冒险，这是否就是惟一的回答呢？”“是的，”佩恩承认：“这对我来说是有点儿冒

① John Cawelti 将已经完成的电影跟 David Newman 和 Robert Benton 的剧本进行了比较，发现 Penn 有意识地淡化了 Bonnie、Clyde 和他们伙伴的性特征。见 John Cawelti 等人编写的 *Focus on Bonnie and Clyde*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73), pp. 139-140.

② “Bonnie and Clyde: An Interview with Arthur Penn,” 作者是 Jean-Louis Comolli 和 Andre S. Labarthe.

险，不过似乎这是讲述这个故事最好的方式。”^①

在好莱坞的首映式上，从后排的观众传来了让警察滚蛋的喊声。从1967年夏天一直到1968年，无论是在运动中，还是在青年人的文化世界里，到处可见邦尼和克莱德的精神。波林·凯尔（Pauline Kael）在《纽约时报》撰文称，电影“从死亡中寻找刺痛感”。^②彼得·科利尔（Peter Collier）引用了他的一位朋友的话说：“在某种程度上，《邦尼与克莱德》是甲壳虫乐队之后惟一属于年青人的东西。这部影片在与年青人们交谈，谈论他们的生活。”^③漫画家大卫·莱文（David Levine）在关于犯罪问题上，得到了与众不同的启发：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中，他把林登·约翰逊画作克莱德，把国务卿迪恩·拉斯克画作邦尼。就像科利尔在1968年初写的那样：“如果《邦尼与克莱德》真的属于‘我们’，也许我们应该对它所说的更加小心”。

《邦尼与克莱德》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其他电影继续经营着因袭时尚的暴力精神。与其将这种暴力看成结果，其实更是一种过程和行为。在一个运动领导人的推荐下，我在1968年春天，观看了《狂想街道》（Wild in the Streets）。该影片对革命策略有着自己的解释——家长意志，警察暴力——但是他们相对比较脆弱，好像电影人知道他们不得不做出无咎的姿态，然而这是不会发生的。“革命”再次被断章取义了：“为了革命而革命。”在1968年血腥的春天，真实感很容易丧失。正如运动本身，文化产品越来越多被想当然地纳入了政治语境。

接着，在1969年春天，林塞·安德森（Lindsay Anderson）一部较受欢迎的影片——《如果……》（If……），开始探索愤怒爆发的原因，直到势不可挡的嬉皮化。米克是一个愤愤不平的学生，他喜欢将报纸和杂志上的图片剪下来贴在墙上，他对暴力的想像并不是来自于现实，与那些顺从的校友相比，他具有吸引力。所以，从一开始，这部电影就是属于他的电影。迷恋死亡，对人类缺少爱，米克是蔑视一切的复仇者。琐碎而又接连不断的校园暴力与荒诞，证实了米克为什么会如此疏远；校园就是一个僵死的世界。在毕业的那天，他朝一群家长和学校领导开枪射击；第一个倒下的是一位平时十分体面的教师。在旧金山，《如果……》被大肆宣扬：“革命！你站在哪一边？”——当然，影片本身一点儿也没有谈到观众是如何反映的。但是我认为，对于旧金山两种不同的观众而言，他们会认为这是对现实政

① “Bonnie and Clyde: An Interview with Arthur Penn,” 作者是 Jean-Louis Comolli 和 Andre S. Labarthe.

② Kael, Kiss Kiss Bang Bang, p. 79

③ Peter Collier 对 Bonnie 和 Clyde 的评论，见 Cawelti 的 Focus on Bonnie and Clyde, pp. 29-30.

治形势的讽喻。所谓的革命，仅仅是在某种环境下一种先前存在的愤怒的爆发。不需要借口的暴力是傲慢的暴力，正像安德鲁·布雷顿（Andre Breton）推崇的那样，在街道上公然开火的行径是“超越现实至高无上的行为”。^①一些激进分子攻击《如果……》的“反革命的冒险主义的结局”，但是这种有失全面的批评并没有抓住事情的要点，而安德森却将整部影片倾向于这个结局，而并非其他。该影片的逻辑证明，米克和他朋友的攻击是有道理的。旧金山的观众抓住了电影的本质：1969年5月，在国民警卫队（the National Guard）占领伯克利期间，当电影中出现了向那些家长和吹毛求疵的校长开火的场景时，他们欢呼雀跃起来。

本着这一精神，1969年秋天，嬉皮士的创建人之一——斯图·艾伯特（Stew Albert），在《柏克莱部落》（Berkeley Tribe）一书中写道：萨姆·佩金帕（Sam Peckinpah）的《野帮伙》（The Wild Branch）是一部“革命电影”，因为“它让你不得不拿起枪”。不管佩金帕的意图是什么，他对暴力的美化更加迎合了这种坚固的情绪。影片中血肉模糊的尸体并没有掩饰什么，只是按照它们的本来面目存在。他们坚信暴力是生与死的自我斗争，是对血的贪婪。但是，《野帮伙》并没有《邦尼与克莱德》流露出的那种天真无邪。当然，并不仅仅是左派才沉溺于对暴力的美化。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佩金帕的看法和越南战争的视角十分相似，对流血事件毫无意义、无目的、不合理的展示。这是起居室内的越南形象，把战争表现得既讨厌、正常又不可理解，这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引起了一定的厌战情绪。^②没有道理、没有背景、被美化了的暴力形象，开始控制美国的流行文化。

在一系列的流血事件中，1969年秋天的影片《逍遥骑士》（Easy Rider）带来了高潮。在象征无限意义的边境，彼得·方达（Peter Fonda）与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歌颂了两个酷爱摩托车的瘾君子冒险的自由。在边境的田园生活重新找回了自我，反传统的角色同时也向东推进：一条通向妄想症的通道。妇女是支持者，证明不安与无法言表的辉煌（所有这些电影都是男性至上主义者，事实上，所有的电影都安排在一个开放的空间，暴力是对自然与安宁的女性令人震惊的攻击。同一时期的另一部影片，《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逍遥骑士》沉溺于天启的凶兆；它是代表妄想狂利益的一段歌词，向反传统文化诉说：是的，你最好对那些南部法西斯主义

① Andre Breton, *Second Manifeste du Surréalisme* (Paris: Editions Kra, 1930), p. 69.

② Todd Gitlin, "Sixteen Notes on Television and Movement," George Abbott 和 Charles Newman 等人编写的 *Literature in Revolu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2), pp. 358 - 359.

无知的保守派有所恐惧。在加利福尼亚的黑人聚居区，或者在媒体报道中的加利福尼亚的黑人聚居区，存在着永恒的反传统文化形象。长期以来，媒体传播了一系列“加利福尼亚文化”的旧习，永远摆脱不了陈词滥调。从纳撒内尔·韦斯特(Nathanael West)无目的流浪者，到彼得·方达的瘾君子；从霍雷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激进的年青人，到1967年那个被称作“爱之夏”(Summer of Love)的嬉皮士。现在，在《逍遥骑士》里，边境终于在两个世纪后被确定了；加利福尼亚是路的尽头，辉煌的道路只是通向错误的一端。《逍遥骑士》不是对暴力的赞美，只是警告从贫民窟流放出行为不轨的人会带来后果。当反传统文化的观众看到这个训诫的故事时，他们被恶魔般的形象震惊了。在没有背景，道路远没有尽头的洛杉矶，电影的寓意仍旧是不可思议的，否则暴力会突然变得没落。

越战与运动

对于焦虑不安的流行文化来说，这些电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流行音乐方面，鲍勃·迪伦(Bob Dylan)恶梦般的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有节奏的震动，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The Doors》的“Break on through to the Other Side”，杰斐逊·艾尔普雷恩(Jefferson Airplane)的“革命(got a revolution)”；在欧洲电影方面，吉罗·庞坦克沃(Gillo Pontecorvo)的《阿尔及尔的战斗》(The Battle of Algiers)1967年在美国发行；后来，带有自由意志论注释和权威主义者寓意的好莱坞电影，比如人们欢迎的《比利·杰克》(Billy Jack, 1971)；和地下媒体夸张的一些形象——所有这些和流行文化的其他许多方面，成功再生并繁荣了两极化的政治情绪。其中，任何一部分都没有虚构催泪弹或者警棍，燃烧弹或者胡志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嬉皮士或者芝加哥警察，以及对阻塞街道的对抗或者占领建筑物的非暴力军事行动；然而，他们从整体上设计了一个象征性的环境，有益于脱离背景的革命主义和言辞浮夸的军事行动。

当然，对抗的政治不仅仅是脱离背景、夸张策略的一种表达方式，也不仅仅是超现实主义的一次迸发。同时，它在意图方面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它的目标是组织一场战争。在下一章中，我会继续讨论它的确阻止了战争，或者说延迟了战争，强迫制定对外政策的精英，在越南进一步升级战争与恢复国内政治稳定二者之间作出选择。然而，如果日益高涨的战争的确使那些精英相信，战争继续下

去将会使国家分裂，那么运动夸张的措辞与虚张声势，破坏了运动的生存、成长、成熟，以及适应压抑的政治气候的能力。再次，运动既要扮演演员的角色，又要在一个复杂的政治形势中表演。媒体夸大了仿佛存在着极端分子运动的感觉；基于策略和表现的原因，部分运动继续追寻对质，而美国则加强了镇压。让我暂时总结一下整个运动过程产生的结果：

首先，当反战情绪高涨的时候，运动在政治上被孤立了。假如当初实现统一的话，政治力量或许会更加强大。

第二，面对面的组织干涸了。到1967年纽瓦克（Newark）和底特律少数民族聚居地发生暴动的时候，ERAP的大部分计划已如强弩之末；一些社区的人们阻止起来走向自治，想要摆脱学生组织者。^① 全体成员多多少少被反战运动吸引；现在，他们不只拥有一个理由走向反战工作。“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号召在工人阶级社区组织反征兵运动，以此使社区组织的风格密切结合反战内容；然而，其中的大部分并没有得到实施。^② 由于媒体的关注、名人的诱惑以及战争的紧急形势，领导者很难投身于没有报酬、冗长乏味的基层政治工作。正如1968年在芝加哥示威游行之后的一次会议上，马克·鲁德告诉我的那样：“组织是乏味的另一种表达。”

第三，在没有媒体的协助下，运动开始向中间派转变。

① 见 Todd Gitlin 和 Nanci Hollander 的 *Uptown: Poor Whites in Chicago*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pp. 375 - 397. 当 Maria Varela 告诉我 (1976 年 7 月 1 日对她的采访)，当地的组织活动也因为 SNCC 越来越少。也可参考 Richard Flacks 的 *Youth and Social Change* (Chicago: Markham, 1971), p. 134.

② 六十年代后期一个真正的组织活动便是 Boston Draft Resistance Group，这个组织旨在媒体之外谋求发展。Barrie Thorne 写过有关 BDRG 区别于其对手 the New England Resistance 的独特风格和策略方法。参照 Barrie Thorne, "Resisting the Draft: An Ethnography of the Draft Resistance Movement," 以及她的 "Protest and the Problem of Credibility: Uses of Knowledge and Risk - Taking in the Draft Resistance Movement of the 1960's," *Social Problems* 23 (December 1975): 111 - 123.

7 | 温和派浮出水面：改革的时代

“新年攻势”危机与美国精英

我们是变化的一部分。随着抗议活动由左派、反战派转由福布莱特·格里宁（Fulbright Gruening）以及另外一些人组成的议会，并成为一种主流意见，从而自然而然地扩大了其新闻报道的范围。接着，报道的基调也随之发生变化。由于我们是一个上层建筑制度，当你所在的社区改变意见的时候，你也应当随之发生改变。

——马克斯·弗兰克尔《纽约时报》社论专栏编辑^①

在华盛顿，1968年1月至2月的抵制“新年攻势”运动超出了人们预期的想像。然而，无论战争是明智的还是愚蠢的，终归要取得胜利。步调一致的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对美国政界、媒体以及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了直接、决定性的回击。回顾过去，“新年攻势”成为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确立形象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一系列战争以及对战事的定位，在惊动了华盛顿和华尔街的同时，也惊动了媒体；“新年攻势”活跃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新闻报道对抵制“新年攻势”运动作了描述，而且，必须把抵制“新年攻势”运动描述成对美国传统的战争假设、目标及宣言的彻底打击。媒体多年来也一直关注那些同样的假设，偶尔也对其提出质疑。现在电视上出现的是共产党的游击队袭击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画面，以及遍及越南南部城市的血腥战争。政府以含混的口吻，始终保持着“谨慎乐观

^① 1979年3月23日对Max Frankel的采访。实际上，Alaska的议员Ernest Gruening是最早反对战争的人，同时他也是当时投票反对1964年Tokin Revolution的两名议员之一（另一位是俄勒冈的Wayne Morse）。总统约翰逊将1964年的Tokin Revolution作为其逐步升级战略的全权委托。1965年，Fulbright议员开始对战争进行谴责，尽管后来他并不主张休战。1968年，Frankel是《纽约时报》当时最著名的记者。

(*guardedly optimistic*)”的态度。刹那间，敌军赫然出现在眼前。正如以前争论的那样，不管新闻报道是否夸大了游击队在军事上的胜利，或者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在政治上的胜利——特别是和西贡政权的软弱无能，以及和解的中断来加以比较时——这一切是显而易见的。^①

抵制“新年攻势”运动不仅是重大的新闻，而且还引发了媒体内不同寻常的反思。2月7日，《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莱斯顿（James Reston）率先发难：“什么时候才是这场杀戮的终结？我们如何拯救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的越南？”^② 沃尔特·克朗凯特则两次飞抵越南，2月27日，他在一次为时三十分钟的特别报道中阐述了他的新观点：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如果说我们今天离胜利更进一步，是对过去乐观主义者的肯定，它们曾一直被认为是错误的；如果说我们正处于失败的边缘，也将屈从于不合情理的悲观情绪之中。我正陷入僵局，这才是惟一现实的结论，或许这也许不能令人满意。对于记者来说，更为清晰的是：惟一理性的出路是和谈，不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而是以一个能履行誓言、保卫民主，并且尽其所能的光荣民族的身份。^③

就克朗凯特个人而言，他一直对这场战争的作用心存疑虑，并没有附和其保卫民主的目的。但是，自从约翰逊政府明确地将防御作为战争的目的时，克朗凯特的言论（同样的内容也可见于有线电视网、《时代》《新闻周刊》以及《华尔街日报》）^④ 就成为对约翰逊战争策略有力的支持。总统的发言人乔治·克里斯丁（George Christian）后来告诉CBS华盛顿分署的主要负责人威廉姆·斯莫尔

① 关于华盛顿、纽约对运动的反应以及 Tet 运动，我参考了 Herbert Y. Schandler 的 *The Unmaking of a President: Lyndon Johnson and Vietna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以及 Godfrey Hodgson 的 *America in Our Time*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76)。也可以看一下 Schandler 的长篇节目摘要。在 *Big Story: How the American Press and Television Reported and Interpreted the Crisis of Tet 1968 in Vietnam and Washingt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7; a-bridged edition, Garden city, N. Y.: Anchor Books, 1978) 一书中，记者 Peter Braestrup 认为，美国媒体过分夸大了越南共产党游击队所取得的胜利。但是，Peter Arnett 也撰写了一些评论，见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January - February 1978, pp. 44 - 47. 另外，还有 Noam Chomsky 的“10 Years After Tet: The Big Story That Got Away; Widely Hailed Book on Vietnam Reporting Asks Wrong Questions, Gets Wrong Answers”。

② Reston, “Washington: The Flies That Captured the Flypaper,” 引自 Schandler 的 *Unmaking of a President*, p. 198.

③ 引自 CBS 的新闻特别节目《1968》，1978年8月25日 (c) 1968 CBS Inc.

④ 根据 Schandler 的 *Unmaking of a President*, pp. 198 - 199 的总结。

(William Small), 当克朗凯特发表了其言论之后, “冲击遍及了整个政府”。^①

为了理解随后在媒介框架内发生的转变, 我必须从整体上, 至少也应简略地考虑一下政治—经济危机。既然现行的战争策略注定难逃失败的厄运, 政府内部的意见也开始分化, 战争的进程必须大大加快, 要么以和谈结束, 没有中间派别存在的余地。现在, 正如克朗凯特本人一样, 中间分子以及支持者开始感到, 这场他们仍然认可的战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尽管他们始终赞同战争的目的, 但是一群新的外交政策精英正在浮出水面。克拉克·克利福德 (Klark Clifford), 颇有影响的华盛顿社区律师, 总统亨利·杜鲁门的前高级顾问, 现为约翰逊政府的新任国防秘书, 是具有决定作用的代表人物。他不赞同为战争所做的努力, 并开始动员华盛顿和纽约政治经济领域中的高层, 以及具有影响的反对派人员。正当克利福德及其同盟者在随后的“新年攻势”运动中将其主张变成现实之际, 参谋长联席会议 (Joint Chiefs of Staff) 的主席厄尔·G. 惠勒 (Earle G. Wheeler) 请求向越南增援 206, 000 人的军队。于是, 内部产生了争执, 与克利福德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政府官员反对这项请求。《纽约时报》的记者亨德里克·史密斯 (Hedrick Smith) 和尼尔·希汉 (Neil Sheehan) 得知了政府内部围绕政策产生了争论的消息; 3月10日星期五, 《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以三大标题对此进行了报道——“威斯特摩兰再征 206, 000 人”; “政府内部发生激烈争论, 军队数达到了 510, 000 人”; “国防及政府的部分官员强烈反对此次征兵”。另一支主力军队请求增援的消息也充斥了整个媒体, 并在议会及政府部门引发了激烈争论。克利福德让人们知道, 如果约翰逊政府继续将战争升级的话, 灾难即将来临。他说服总统与非正式的顾问团体进行磋商, 这个后来被称作“智囊团 (Wise Men)”的顾问团体由《名人录》(Who's Who) 中的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及约翰逊时期的财政及外交方面的精英组成: 迪安·艾奇逊 (Dean Acheson), 乔治·鲍尔 (George Ball)、麦乔治·邦迪 (McGeorge Bundy)、C. 道格拉斯·狄龙 (C. Douglas Dillon)、赛勒斯·万斯 (Cyrus Vance)、阿瑟·迪安 (Arthur Dean)、约翰·麦克洛伊 (John McCloy)、奥马尔·布拉德利 (Omar Bradley), 吉·马修·里奇伟将军 (Gen. Matthew Ridgeway)、吉·马克斯韦尔·泰勒 (Gen. Maxwell Taylor)、罗伯特·默菲 (Robert Murphy)、亨利·卡伯特·洛奇 (Henry Cabot Lodge)、阿贝·福特斯 (Abe Fortas) 和阿瑟·戈德伯格 (Arthur Goldberg)。

^① 引自 William Small 的 *To Kill a Messenger: Television News and the Real World* (New York: Hastings House, 1974), p. 123.

就在去年十月，“精英”们对约翰逊表示，他们对战争及军事方面的胜利感到满意。但就在此期间，议员尤金·麦卡锡决定争取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国家陷入政治经济危机之中，而且危机的范围每周都在不断扩大。在三月份的上半月，战争债务到了最后的期限。由于政府不敢增加税收或削减国内开支，最终引发了通货膨胀，并引发了1967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在“新年攻势”运动及一系列关于增加军事开支的报道之后，美元在国防市场上的稳定地位大大丧失，投机商们耗尽了美国的黄金储备。3月12日，议员麦卡锡以数百张选票赢得了胜利。3月16日，为了切断黄金市场的外流，伦敦黄金市场关闭。同日，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宣布，正式参加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角逐。

就是在这个紧要关头，1968年3月25日，克利福德于五角大楼总部召见了“智囊团”。克利福德凭借其与最高财政部门的密切关系，可以做到对约翰逊坚决的反对，并动员强有力的集团对其进行指责。在与关键人物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后，正如赫伯特·尚德勒所写的那样：“在总统的顾问中，只有克利福德与约翰逊是平起平坐的。克利福德通过告诉总统自己的见解，来表达他对总统的忠诚；而不是告诉总统他所希望听到的，借此保住其在政府中的位置。另外，他能冲破官僚政治的束缚，与他在国会、商界和经济界的朋友进行磋商。”^①尚德勒还写道：“克利福德已多次同他在商界的朋友交谈过，并觉察到他们对战争的疑虑与日俱增。”1972年，克利福德告诉尚德勒：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正处在作出决定的一个关键时刻。我将采取极其重要的措施以改变总统的观点。我需要带给总统一些有效的“处方”，诊治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②那有效的“处方”将是“智囊团”们的一致意见。在这十四个人组成的智囊团中，有社区律师、前内阁官员、前驻外使节和前任将军，他们是由现任对外政策制定者和主要的军事负责人的精心挑选组成的。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与总统一同坐下来商谈，并告诉总统在政治、经济方面战争消耗巨大，至少，增派军队是不可思议的。^③后来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说：“我们的负担正在加重，不仅由于在越南所发生的一切，而且还因为国内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国内的分裂日益加剧，这将使美国面临瓦解的威胁。”^④克利福德后来欣喜地说：“我希望

① 引自 Schandler, *Unmaking of a President*, p. 342 (emphasis added).

② 同上, pp. 254 - 255

③ 同上, p. 264, 有关“Wise Men”的内容也主要来源于此。

④ 引自 Townsend Hoopes, *The Limits to Intervention* (New York: David McKay, 1969), pp. 215 - 216.

与‘智囊’们的谈话能实现这个目的。”“这次会谈确实使总统感到震惊。”^①三天后，约翰逊在一次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了四项决定：(1)在越南南部美军的人数仅作象征性的增加，而不是惠勒将军提出的206,000人；(2)扩充越南南部的武装部队；(3)停止轰炸北纬20度以北的越南地区；(4)放弃下一轮美国总统竞选。

随着战争失去了合法性和大众性，反战运动变得令人尊敬。在政治力量的主要转变中，通过向激进对抗的左派直截了当的转变，媒体确立了值得尊敬的反对派地位。口号是“为吉恩（尤金的昵称）装点自己”，学生们刮过脸，从衣柜中胡乱取些衣物，坚定地向前罕布什尔雪地挺进。衣衫褴褛、胡须邋邋，焚烧征兵等一系列形象活脱脱的转变，使他们成为越共大旗的“扛旗者”。把后者定位为运动的原型之后，现在媒体把“为吉恩装点自己”运动作为一种真正新颖奇特的东西介绍给公众。特别是在抵制“新年攻势”运动之后，他们把“为吉恩装点自己”运动作为一种报道倾向，不仅源自传统的新闻准则，而且还源于记者和编辑们自身对战争的反对态度，他们的这种倾向越发要求一种合法地位。同时，麦卡锡和肯尼迪的竞选者，也正在寻求一种安全的庇护。简言之，这是一种自由运动和媒体之间心照不宣的利益同盟。这种含蓄的同盟关系在1968-1969年间得到进一步的巩固。约翰逊和政治—经济界的“精英们”认识到，战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无助的。和约翰逊一样，许多记者和一些（尽管不是全部）媒介的精英们也认识到，战争将对社会秩序造成更大的威胁。1968年的事件，使得媒体对以温和的方式反战的转变更感兴趣。特别是在芝加哥示威游行之后，作为1969年休战运动的主要成员之一，我认识到：“一些媒体人士，想找到一些能通过巧妙的方式进行反战的精明强干的家伙。”^②1969年10月和11月间，著名的休战运动试图利用这种兴趣。媒体所要揭露的“鸽派”和“鹰派”之间的冲突，就如同一系列化学反应一样，揭示出一些细胞的特征而忽略了另一些。毋庸置疑，“鸽派”占了上风；他们拥有一个巨大的、广泛的基础，并在国会中获得高层政治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是媒体作了大量的工作，把他们作为一种转变介绍给以后的反战运动。

谨言慎行：媒体确保报道框架的特殊举措

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军事上开始向温和派转变。在区分受到尊敬的以及

^① Townsend Hoopes, *The Limits to Intervention.*, p. 264.

^② 1976年11月15日对 Susan Werbe 的采访。

不受尊敬的运动思想过程中，所有的标准化原则获得了成功，就像我在第二部分指出的一样，新闻的采集及运作的流程决定了新闻的内容。但是有时候，一些普通规则必须由特殊的措施来保证或改变。在运动的进行过程中，常规的程序在一定意义上运转得较好；通过增加晦涩、蛊惑人心的新闻，他们激起了上层政治的反对，威胁到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出于政治目的，媒体的头头们开始加以干涉，确切地说，他们要改变报道的框架。对媒体来说，如果改变不能自发进行的话，他们就要进行干涉，强制实施。在动荡不安的1968年，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抵制“新年攻势”运动、马丁·路德·金遇刺后的暴动、芝加哥事件及尼克松的当选。媒体的头头们从上到下加以干涉，强加新的规则，甚至会针对一些不服从的记者。

总的来说，对新闻视角进行明目张胆的干预是极少见的。1961-1969年间，布莱尔·克拉克任CBS新闻总经理和副总裁。公司委员会主席佩利和总裁斯坦顿曾直接干预过公司，企图改变一条新闻报道。布莱尔·克莱德对此一无所知。^①其他的记者、经理和制片人基本上同意（更不用说政策指令的分量，以及主要的舆论和自我审查）。另一方面，据爱德华·杰伊·艾伯斯坦报道，至少在有线电视网内部，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新闻更易受到上层的干预。60年代前期，NBC总裁罗伯特·金特纳（Robert Kintner）宣称，“用两天的时间向新闻主管部门的头头们写了35页的备忘录，问他们为什么只报道具体的新闻，而不对其加以注解。”^② CBS也宣称要与电视网（也可以说是政治）的压力保持距离（CBS在城市中拥有电视网总部以外的办公地点，NBC则被安置在洛克菲勒中心的RCA内）。或许，CBS的新闻报道实实在在的分离远不止是象征意义上的。它们的许多员工谈到，总裁里查得·萨伦特让他们与电视网、外部压力保持距离。当然，这种距离的另一方面是，指示只下达到萨伦特处，而不为普通的员工所了解。当然，在CBS中这是千真万确的。在经过对1968-1969年间电视新闻运作的全面调查后，艾伯斯坦指出：“尽管新闻执行者要求对新闻的决定有一定的自主权，但他们仍应对所有节目的执行者负责。”^③至少在CBS中，任何行政干预都是不易被发现的。但是，在发现一两件此类事情之前，我必须事先指出，对新闻运作直接干预的案例是很有意思的。这种例子并不是阴谋经营的佐证，而是作为常规框架的重要性，以及公共机构对其进行支持的标志。作为报道独立性的准则，这种

① 1976年11月12日对Blair Clard的采访。

② Edward Jay Epstein, *News from Nowhere: Television and the New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p. 74, 引自Robert E. Kintner, "Broadcasting and the News," *Harper's Magazine* (April 1965), p. 52.

③ Epstein, *News from Nowhere*, p. 74.

力量非常强大，以至偶尔反被特殊的命运所违背。很明显，如果这种框架足够重要的话，很明显，不正常的秩序将加强它的“正常状态”。

1968年的温和派看起来已经受到了这种影响。在我的印象里，尽管温和派措施首先被强加在黑色运动上，但仍需要做更多的调查研究，以确认或否认温和派与好战派的分歧是否成为关于黑色运动报道的标准组成部分，特别是在马丁·路德·金遇刺和四月暴动之后。无论如何，电视网的执行者们意识到，电视网的主管人员将他们的报道当作了军事暴力事件的放大镜。1967年，CBS的主席弗兰克·斯坦顿说：“有人正在举行游行示威，最大限度地公开和暴露电视网，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说，这将成为一种趋势。”^①据艾伯斯坦报道，在1967年盛夏之后，约翰逊政府的压力越来越明显了。在底特律暴动之后，司法部门在纽约召集新闻决策者举行会议，联邦通讯委员会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在掩盖种族骚乱时所需要采取的方针政策，以及电视要通过报道更好的消息，以求改善或缓和犹太地区的紧张局势。NBC新闻总裁鲁文·弗兰克（Reuven Frank）后来写信给罗杰·韦尔金（Roger Wilkins）——曾帮助召集会议的司法部官员，抗议道：“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让新闻媒体充当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在制订方针时，我们无须同政府保持一致。”但是在金遇刺和芝加哥事件之后的一年中，所有的三大广播公司都调整了他们掩盖暴乱的方针，只是或多或少地与政府的建议保持一致。^②CBS教导他们的工作人员：“最有效的掩盖并不需要最好的画面和最戏剧性的动作。”^③同时，黑人军官也将被予以审查。1968年末到1969年初，艾伯斯坦对此进行了报道：

NBC的制片人同意（遵照谁的要求？）不会播出黑人军官以暴力威胁社会的报道。先前两个黑人军官——斯托科列·卡迈克尔和H·拉普·布朗，被NBC从电视画面上“炒了鱿鱼”。^④

显然，至少在NBC中，温和派倾向谨慎地掩饰军事行动。

毋庸置疑，有线电视网震惊了，公众对它们关于芝加哥会议的报道表示不

① 引自 William S. Paley 的回忆录，As It Happened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79), p. 304.

② Epstein, News from Nowhere, p. 75. 有意思的是，Roger Wilkins 是《纽约时报》的编辑，根据 Daniel Schorr 所言，Wilkins 于 1975 年发表了一篇题为 Selling Secrets 的社论，强烈谴责 Schorr 在 The Village Voice 中泄漏了有关 House Select Intelligence Committee 秘密文件的内容。Daniel Schorr, Clearing the Ai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7), pp. 208 - 209.

③ Paley, As It Happened, p. 304.

④ Epstein, News from Nowhere, p. 192.

满。国会议员对媒体进行威胁，并在11月尼克松当选总统之际，封杀了电视网的报道。12月22日，NBC总裁斯坦顿在电视节目中说：

对于一种极为阴险的本性早已有所控制，一种氛围正在形成并不断吸引着我。新闻人依据他们最好的见解进行活动，他们感到大多数有条件的行为和决定，有待于重新考察。我对自我审查过程的发展表示担忧。^①

斯坦顿的话揭露了事实的真相。那些“最好的见解是日常（几乎有条件的）新闻秩序，是标准准则，现在注定要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审查。也就是说，要高于弗兰克所说的层次，在整体上高于新闻过程的运作。但是，对于减少军事报道来说，自我审查是不够的。根据艾伯斯坦的观点，1969年1月，也就是尼克松宣誓就职之时，在NBC中进行的完全充分的审查是行之有效的。艾伯斯坦写道，运动的“反就职（counterinauguration）”部分被完全忽略了：

NBC下达了严厉的命令，不允许报道或录制反对抗战的人举行的“反就职”活动。NBC又一次对其制片人、编辑、新闻记者和摄制人员下达了命令。如果他们不想妨碍官方仪式的话，就不要去拍摄任何抗议活动。已经发生的示威游行和少数几起暴力事件，也没有在NBC上播出。^②

我知道，在CBS的新闻中并没有如此明确的规定。但是这种事情不管怎样被决定，在何种程度上进行自我审查，由于CBS没有对破坏活动作充分报道，而且为观众带来了坏消息，不得不承认错误。^③

实际上，在那个冬天，大量的证据表明，CBS电视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这表明了媒体的报道模式必须要迎合政治口味。后来，在1968年，CBS决定制作一个专题节目，是关于在旧金山州立大学中，黑人学生和来自第三世界的学生举行罢工的内容。据制片人称：

正好CBS的新总裁迪克·萨伦特（Dick Salant）问到过这个问题。最后，萨伦特问：“到底错在什么地方？”我被指派出去，负责对记者们每日收集的那些令人头疼的新闻进行分类，看看究竟出了什么错。^④

① Epstein, *News from Nowhere*, p. 76, 引自 Public Broadcast Laboratory 的手稿 “The Whole World’s Watching”, 1968年12月22日, p. 68.

② Epstein, *News from Nowhere*.

③ Hodgson, *America in Our Time*, p. 376.

④ 1976年11月19日 Ron Bonn 的采访。

记者和制片人工作了两个星期，采访了所有的负责人，又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他们一致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中高等教育的不公平待遇，罢工领导们也是这样认为的。于是，他们录制了一个详细解释高等教育的节目。学院拒绝承认罢工能解决问题，同时告诉摄像记者，“骚乱的背后是种族隔离”。这个节目总共播出了十五分钟，分两部分连续两晚上播出。1969年1月23日，在克朗凯特的新闻报道中播放了该节目的第一部分。

政治宣传是紧迫而又活跃的。随后，在给作者的一封信中，CBS一位知情的员工反映说：

该组织对于批评是极其敏感的，特别是当它被置于一项具体的批评之中时。评议员杜姆克（Dumke）和勒克曼（Luckman）会大发雷霆，里根则会无话可说。^①

节目的第二部分没有按照原计划于1月24日播出。相反，记者们被派回旧金山继续报道“革命左派”和“愤怒保守的评议员”反对议案的通过。他更改过的新观点，是为了维护大学生独立的利益，他们被称作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渴望一个和平的校园环境和正常的校园生活。^②“对于想要对旧金山事件做出自己见解的大多数全美学生来说，这是重要的一课。”

温和派，大多数沉默的学生们，在冲突中默默无闻。因此，除非其他学校沉默的温和派们提出自己的主张，发展自己的领袖，找到推动改革的新措施，他们才会得到关注。否则，美国的高等教育将在旧金山的左派和右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面临毁灭性的打击。

一位摄像人员记得：“我们突然要拍摄一个从未拍摄过的新节目。很显然，（记者）要把它们播放出去……我记得他有意淡化这件事，删改并添加了许多内容，试图将一切昭示于天下。”^③五天之后，CBS播出了修改过的第二部分节目。随后，前面提到的那位雇员很快又写道：“或许所有的外部力量会图谋改编报道，但它们不应扭曲事实的真相。”^④

在有线电视网领导人的指导下，电视新闻精英们决定不再像在芝加哥时那样

① 1969年2月10日给作者的一封信。

② 该引述以及后面的两个，均来自于1969年1月2日CBS晚间新闻报道的稿件（c）1969 CB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③ 1977年6月16日Stephen Lighthill的采访。

④ 1969年2月10日给作者的一封信。

脆弱保守。同时，在抵制“新年攻势”运动之后，他们处于重新思考美国对越政策的关键时刻。通过对合法运动和不法运动的明确区分，通过抬高前者或贬低、忽略后者，他们希望在一项新的温和反战舆论中重新稳定美国的政治，同时保持政府在对越南和内部局势定位上的敏感态度。在副总统阿格纽被释放的数月前，电视网就开始非正式地、潜意识地根据动态调整自己。和其他地方一样，CBS的记者们也认识到，对报道内容的限制正在重新放宽。如果不是通过小道消息，也可以通过新闻节目简单了解。^①他们不会再犯类似于在节目的第一部分中关于七月份旧金山事件中的错误。同年11月，副总统阿格纽反问道：“如果游行示威者们不知道摄像机正对着他们，会有多少游行示威发生呢？”在有关电视新闻的教科书中，CBS的副总裁和新闻执行官威廉姆·斯莫尔并没有问到，如果没有摄像机的话，我们会多少副总统发言。相反，斯莫尔向他的读者们保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其他人一样，电视记者们在对运动的报道中将采取谨慎的措施，甚至会拼命地寻求平衡。”^②拼命干的一条途径就是限制军事力量，有所克制，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一个真正能寻求平衡的行为，一方面是让有权势的人感到满意，另一方面是让尼克松政府的监察官们感到满意。某种程度上，这些监察官们并没有很好地同“敌人”的概念区分开来。

休战与动员运动

从支持沉默的多数派转到支持温和派，对受人尊敬的“负责任的”少数派的支持并不是一件难事。在尼克松的领导下，温和的反战运动不断升级，很快便对媒体增加了一系列新的选择。例如1969年春天，大卫·霍克（David Hawk）参与组织了一次由学生行政机构领导的抵制草案抗议活动。大卫·霍克本人曾参加过麦卡锡运动，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个草案的抵制者。据霍克回忆，新闻报道和麦卡锡分子一样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同时他也表示，“令许多学生吃惊的是，媒体在他們和颓废派、嬉皮士之间，作了十分明显的划分”。^③

整个夏天，霍克和萨姆·布朗构想了休战的计划，十月有一天，十一月会有两天，尽可能长时间地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一切非同寻常的反战运动。霍克·布朗

① Jeremy Tunstall 认为，报纸可以实现和电视一样的功能：“将政策传达给新闻工作者的作用是在报纸中实现的”（Tunstall, *Journalists at Work* [London: Constable, 1971], p. 46）。

② 出自 Small 的 *To Kill a Messenger*, p. 132. Small 是 CBS 的官员，他辞掉了 Daniel Schorr，因为 Daniel Schorr 报道了 the Pike Committee 的有关情况。

③ 该引述以及后面的引述都来自 1976 年 11 月 12 日我对 David Hawk 的采访。

和抵制草案的学生行政机构成员一起开始进行这项运动。这样，他们就有了一个校园基础。然而，像霍克所介绍的一样，他们开始召开新闻发布会，召集那些在麦卡锡运动中表现出支持态度的记者。由于参与了麦卡锡运动，他们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通过告诉记者们“这就是学生们秋天要做的事情”，他们写了大量的报道。霍克和布朗拍摄了照片，并附上说明寄到了附近的学校，霍克说：“瞧，这就是秋天要发生的事，它使我看起来很真实。”霍克模仿伦尼·戴维斯的口吻，对他的策略描写道，“就像镜子里的建筑一样”，“仿佛经过了精确计算，丝毫不差”。

另一个休战的组织者也记得，媒体认为他们非常聪明，而且可以接受，特别是与激进派相比较而言。^①自由的民主党人士和共和党人士，包括一些议员和当选的官员，支持反战的标准，这就使十月休战运动的准备工作得到了支持，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帮助。布朗和另外一些休战运动的组织者定期向记者提供大量的消息。例如，令人尊敬的约翰·V·林塞（John V. Lindsay），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和查尔斯·古德韦尔（Charles Goodell）议员也宣布他们支持这一运动。那年秋天，一位CBS的新闻记者报道了许多华盛顿会议，他证实了这些名字的重要性：

我将告诉你什么是新闻。如果说：“我们有75位协会领导人签署了请愿书，其中包括自治工人领袖杰里·沃夫（Jerry Wurf）”，毫无疑问，这是一条绝对的新闻。但是如果有六个人召开新闻发布会，原因仅仅是因为马上就要发动游行示威了，这是不可想象的。^②

休战运动的新闻发布会与更加激进的动员联盟新闻发布会迥然不同：动员运动没有公众人物参加，记者们对他们许多发言人的话不屑一顾：

在社会工人党过去曾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起立发言，讨论他们曾使用过什么措施，讨论工会运动等等。他们总是如此开头：“工人阶级如何如何……”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一个劳动者。

在休战运动的萨姆·布朗和戴维·霍克身上，记者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新闻线索”。毫无疑问，记者们倾向于休战运动，或看起来倾向于具有同情心的霍克。那时，媒体更多地倾向于‘鸽派’，霍克说，一

① 引自1976年11月15日Susan Werbe的采访。

② 我对CBS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的采访。

方面是因为抵制“新年攻势”运动的震动，一方面是因为和曾经发动过战争的民主党政权相比，共和党政权不能有效地关心自己的利益，还有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同情。1970年，即使是在传统上最为保守的美国广播公司（ABC），大多数新闻记者和新闻执行人员都反对战争。^① 1970年春天，柬埔寨入侵的时候，三大广播网让公众听到了全部八位“鸽派”成员的主张，而没有“鹰派”的看法^②（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所说的都是侵略已成事实）。一项关于战争范围的分析指出，1972年广播网的新闻报道被认为是明确反战的。^③ 1969年，CBS就已经开始用图式标识、形象生动的符号来标志连续的新闻报道了。他们用于反战“事件”的标志与休战运动的标志极为相像，是一只鸽子。在1969年10月15日，休战运动的第一天，报纸通过列出各种事件的时间表和日程表，公开宣扬即将到来的示威游行活动（像我们在第一部分看到的，他们没有为1965年4月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反抗游行做过此类事情）。不管怎么说，媒体正在把温和派的选择扩大到军事领域。

当然，在此过程中，媒体远没有虚设“鸽派”与“鹰派”之间的区别。对于分化，反战运动的两个组成部分都有自己的想法。休战运动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战争的克制上面。“我们被学生的战斗精神吓坏了，”戴维·霍克说，“我想告诉他们，那不是休战运动的特征”，休战运动是“有建设性和温和的”。^④ 在休战运动之前和休战运动的过程中，新闻报道都强调运动的范围、群众的数量和支持者的发展动态，尽管它也努力再现尼克松总统温柔的政治蔑视（丹·拉瑟称之为“黑暗中的哨声”）；尽管共和党坚持认为总统也渴望和平，好心的示威游行正在被河内和其他共产党政权所利用。10月13日，NBC晚间新闻用了两分钟半的时间，宣称休战运动已经发展到“几乎所有的美国社会阶层”。它们宣读了总统的信件，在信中总统坚持说他不会受到影响。但是他们指出，事实上总统以信件中的形式作出反应。他们称之为“其他公共方式”。^⑤ 休战运动被合法化了。

① 1976年10月27日对前ABC新闻记者Carolyn Craven的采访。

② 引自Robert Cirino的Power to Persuad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4), p. 195.

③ 在Douglass Cater以及Richard Adler等人编写的Television as a Social Force: New Approaches to TV Criticism (New York: Praeger, 1975), p. 138中，Michael J. Robinson的“American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an Era of Electronic Journalism: Reflections on the Evening News”一文引用了Ernest Lefever, TV and National Defense: Analysis of CBS News 1972-1973 (Boston, Va.: Institute for American Strategy, 1974)中的观点。对于越战的电视报道虽然不乏一些评论，但是并没有深入系统的研究。

④ 1976年11月12日对David Hawk的采访。

⑤ 1969年10月13日NBC晚间新闻Dan Hallin的记录。

CBS 的报道显得异常重要：10月14日和15日的晚间报道大部分是关于休战运动以及休战运动对媒体的反映。^①其中，重新出现的一个主题便是口头上的反对：右派发言人公开表示，目的明确的游行者们正在被共产党人利用，但是抗议者们否认区别的中肯性，并指责他们在扯一些不相干的东西。例如，10月14日在克朗凯特晚间新闻中，阿格纽与白宫的分裂行为很快就被罗杰·马德（Roger Mudd）的总结性发言运用。阿格纽指出，“未来休战运动的领导者和倡议者们，公共官员与其他抗议活动的领导者们，你们应该公开拒绝一个集权主义政府的支持。这个政府的手上淌着400,000美国人的鲜血。”罗杰·马德总结说：“今晚，休战运动的领导谴责尼克松政府，对其怀疑数百万美国人民的爱国心表示不满。这些美国人是真诚地渴望和平的。”在芝加哥，美国律师托马斯·福伦（Thomas Foran）控告芝加哥的七个被告，说“他们试图把休战运动引向暴力冲突”：

情况是这样的，上周这些被告中的部分人员参加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气象员”派的反越战活动。这些曾支持“气象员”的人现在却主张收买大多数美国人的反战热情。

后来，被告人汤姆·海登（Tom Hayden）这样回答福伦：

他所说的是这些人……参与到“气象员”中的这些人，他们想摆脱约束，以便能破坏休战运动。这就是他去年说的。我认为这就是约翰逊政府露骨的政治，现在又被尼克松政府继承，被他们的傀儡福伦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作为回避美国将停止越战的手段。

10月15日，沃尔特·克朗凯特把休战运动说是“戏剧性的”和“历史性的”。他指出，休战运动旨在从越南马上撤军，他强调其巨大的数量，但是支持者的总数却不得而知。“虽有分散的例外，”克朗凯特说，“休战运动是一场高贵的、负责任的抗议活动，它唤起了美国人民的良知。”他还引用了一些极端反战分子不负责任的例子。在以后的一个片子中，福特·本宁（Fort Benning）的总部被连夜用漆刷上了象征和平的标志，那位士兵接受采访时说：“我个人认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如果抗议和所持的异议是建设性的和肯定的，那是件好事情。另一方面，我一点都不同情鼓动者和暴利商人。”在另一个节目中，记者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起源于这个校园，但是，今天密执安的抗议活动是和平

^① 以下的引述都来自1969年10月14、15和16日的CBS晚间新闻。(c) 1969 CB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我参考了 Dan Hallin 本人的观点。

的，并且遵守法纪，没有被限制成为激进的少数派。”（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确实发源于安·阿伯，但其最初并没有多少和平的味道）

与此同时，ABC 的报道首先则把休战运动看作是含糊的，其次才是巨大的。主持人霍华德·K. 史密斯（Howard k. Smith）是这样开始的：

“休战”这个词在一战后用于战争债务，在大革命时期用于银行存款，是同意延期支付的意思。把它应用于越战是不明确的。然而，今天它包括了关于厌战的许多说法，它的含糊性看起来是正确的。

史密斯指出，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反战抗议类似于尼克松的政策。他还指出：“如果他们不谨慎，可能会匆忙地达成一致。”稍候，史密斯才来到了具有代表性的主题上：通常“抗议者”这个词会唤起对长头发和喜爱念珠的人的一种想像。但是，兴高采烈哼着歌的人们，看起来更像是由普查局挑选出来的代表。^① ABC 报道了尼克松以前和战前在全国各地的游行活动和演讲（尽管 CBS 和 NBC 也没有忽略这一点），不乏对休战运动进行吹捧的内容。即使在对新闻不足以阿谀奉迎的地方，巴南效应也在发挥着作用。

但是，在一定意义上，霍华德·K. 史密斯是正确的：10月15日以后，休战运动处在危险之中，有可能会丧失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它受到了两方面的攻击：左派和白宫。“动员派（mobilization）”——曾组织了1967年的五角大楼和1968年的芝加哥行动——自从那年夏天以来一直在发挥作用，并于11月15日组织了规模巨大的华盛顿示威游行。特别是11月3日尼克松关于越南问题的讲话，结束战争的“秘密计划”变得明朗以后，公众仍然保持着平静。休战运动的组织者认识到，他们的基层支持者将赶往华盛顿参加游行。于是休战运动也加入进来，暂时放弃了它的局部战略，在游行中担负起主要责任。

现在“鸽派”和“鹰派”的分界线开始发生改变。在后来的一个月中，主流媒体逐渐发现，他们对动员运动和休战运动之间界限的兴趣，不如他们同第三种力量的关系：这便是分别由阿比·霍夫曼和芝加哥的一些人，组织的一场司法部门游行示威活动。现在一个突出的主题是：11月15日是否会发生暴力行动。而后，10月26日，CBS 布鲁斯·莫顿的报道解释了休战和动员运动二者的区别。他的报道摘录如下：

休战运动不再是唯一的示威游行活动，一个旨在结束战争且有着更加强硬思

^① 来自1969年10月15日ABC晚间新闻。

想的动员运动，正于11月15日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同时，一个学生动员委员会也计划在校内举行游行，以响应这次示威活动。所有的这些团体，都在一座楼房内拥有自己的办公场所，而且他们已经达成一致，相互协作，并将这种协作关系继续保持下去。但是在抗议运动中，分裂的可能性即在于此。对休战运动和领导们来说，有两件事让他们非常高兴——运动的影响和现有的和平局面。但是，有更为激进的组织预言，如果战争继续进行，他们将会采取更加极端的方式。

与此同时，白宫正以“更为暴力（more violent）”等言辞诬蔑所有的示威游行。11月15日之前一个星期的《纽约时报》，继续保留了对示威游行的言论。例如，上周日那一期的头版发表了如下的陈述：

司法部门在上周宣布，有情况表明，在示威活动中有许多激进主义者试图与政府进行对抗。尽管还没有确定这些人属于哪些组织。然而，动员运动的领导者坚持主张，他们将尽一切努力使运动和平进行。^①

但是，根据动员运动策划指导委员会的一个成员透露的消息：“事实上，大量参与休战运动的人们相信报纸上所說的，即我们将采取暴力行动。”^②

对他们来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的许多反战人士和其他的一些组织，对把他们自己与“鸽派”区分开来抱有很大的兴趣，就像“鸽派”一直把自己跟“鹰派”区别开来一样。从1968年到休战运动以及随后的时间里，激进派普遍感到，温和派在反战运动中正在“挫败激进派的利刃”。在芝加哥会议周期间，新左派向“麦卡锡分子”的转变明显地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早期与晚期的分化混在一起。“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前任主席卡尔·奥格斯比写了一篇宣言，这篇宣言使人们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这篇宣言中，奥格斯比个人对自由的反战情绪保持了谨慎的态度。就在殴打激进派的警察再次和麦卡锡的支持者发生冲突之后，国务卿麦克·克朗斯基（Mike Klonsky）作了一次反自由的演讲。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运动中心（SDS Moment Center）既是非官方、但又颇具影响力的组织，在其张贴的海报上写道：“在过去的五天中，我们中间坚持运动的那些人始终不知道麦卡锡是将要取得胜利还是将要失败，现在他终于被打败了”。^③“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自由主张也愈加强硬。马克·鲁德在《反叛》（The Rebellion）中写道，1968年的哥伦比亚叛乱

① 1969年11月9日《纽约时报》第一版。

② 1977年6月23日 Douglas Dowd 的采访。

③ 引自 Kirkpatrick Sale 的 SDS（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p. 475。

已经回答了“麦卡锡威胁 (McCarthy Threat)”。^①与此同时，在休战运动开始之际，动员运动指导委员会的大多数人把它看作是对反战运动的威胁，而不是反战运动的一个附属品。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顽强的成员一样，他们担心失去惟一的基础——已经兴起的校园反战运动。但是整个秋天，最终的形势还是不断走向衰落。据指导委员会的成员道格拉斯·多德 (Douglas Dowd) 所说，“反休战运动开始还有很多人，但最后却剩下了少数几个”。^②

在11月15日的动员运动中，持有不同政见好战分子们的策略，便是在主要事件之外通过制造事端，以便能够让公众参与其中。他们捣毁在西贡的大使馆，并朝法院投掷石块，宣泄自己的愤怒。他们试图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宣称肃清“革命”军事行动的意愿。另外，由于没有得到动员运动的信任，他们还要表达自己的愤怒。事实上，他们所做的一切极具戏剧性效果。马萨·米切尔 (Martha Mitchell) 说，在水门大厦附近，警察用催泪弹阻止游行示威活动，这使她想起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她赞扬了这一戏剧性事件而非政治策略的成功。在促成这些事件的过程中，好战者扮演了特定的角色，但他们并不清楚尼克松白宫的战略。

现在非常清楚，只有白宫坚持混淆“鸽派”和“鹰派”的界限。尼克松不仅倾向于模糊二者的分界，而且使反战的“鸽派”受制于最激进的“鹰派”的战略之中，这是个绝妙的策略。如果白宫不信任“鸽派”的话，它就不能赢得中间势力的支持。中间势力中的一些人，例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 (Jacob Javits) 曾支持10月15日的休战运动。尼克松11月13日关于“越南问题”的讲话是“游戏计划”中的政治欺骗；11月13日斯皮罗·阿格纽针对媒体的讲话是强硬的。好警察、坏警察：整个秋天，他们的角色都被明显地划分。白宫一直拒绝承认阿格纽的做法。感谢后来杰布·马格鲁德 (Jeb Magruder) 关于“水门事件”的专题报道，它使我们了解了一些秘密策略。在休战运动后的第一天，10月16日，白宫特派秘书德怀特·查平的备忘录中，记录了一篇写给霍尔德曼题为“和平运动和11月15日 (The Peace Movement and November 15)”的文章，其中写道：

根据今晚在汽车中的讨论，目标确定为隔离休战运动的激进领导人，以及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人；他们是一伙的，他们的目标很快就会暴露。同时，那些忠诚于国家和被战争误导的人将被召回国家集体中来。

① Mark Rudd, "Notes on Columbia," *The Movement*, March 1969, p. 7.

② 1977年6月23日我对 Douglas Dowd 的采访。

查平的备忘录中还提出了一份按周进行的“行动计划表”，“其中包括一份针对媒体的详细计划”，和一份高层对于11月15日动员运动的安排和计划，包括：

从10月17日到20日……1. 党内的“鸽派”人员向赞同10月15日行动的国会会议和议员们行贿，告诉他们不要理会11月15日的事情——不同的是……①

内阁及其他一些官员，应被告知关于11月15日动员运动团体的一些事实——他们应私下里对此进行谈论……

从10月20日到26日……10月20日星期一，司法部门的一位代表和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官员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他们将向媒体简要地透露了一些关于动员运动和休战运动领导人的秘密情报。②

这份备忘录还指出，11月15日，总统正忙着观看足球比赛，马格鲁德告诉我们：“总统主要关心谁是最后的冠军。”③

因此，尼克松政府开始模糊自由—激进之间的界限，以谴责整个反战运动，并动员“沉默的大多数”来加以反对。与此同时，众多媒体正试图保持界限，以此来抵制白宫的策略。两种体系之间的缺乏和谐是显而易见的，正如10月22日布鲁斯·莫顿和副总统阿格纽在CBS晚间新闻的谈话中表现的一样：

莫顿：我知道你的确把休战运动的领导人看作是持有不同政见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还是麦卡锡运动之外的，这就是您对该国国家政治派别的观点吗？

阿格纽：我想，一些领导人是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者。例如，新动员运动委员会的领导层中有一个共产党成员。是的，年轻的学生们持有不同的意见，但我不会把他们称作无政府主义者。我想他们是被误导了，尽管他们的初衷是好的。④

在华盛顿反战事件的头两天，也就是11月13日和14日两天，CBS的报道继续把休战运动和动员运动看作是中规中矩和非暴力的。11月13日，在一篇关于

① 可能一些“区别”与暴力有关，也就是说，与向法院扔石头这样的暴力事件有关。

② 引自 Jeb Stuart Magruder, *An American Life: One Man's Road to Watergate* (New York: Atheneum, 1974), p. 81.

③ 但是，Chapin 的意思只是总统忙于个人的事情，而人们却觉得总统在观看体育比赛的电视转播。毫无疑问，尼克松只是象征性地认为，电视转播的比赛和“现场”的比赛一样“好”。

④ 1969年10月22日的CBS晚间新闻 (c) 1969 CB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白宫记者 Robert Pierpoint 说到：“阿格纽是作为尼克松政府帮凶的身份出现的，”尼克松热衷于从阿格纽和“软弱派”那里获得政治利益。正当阿格纽组建一支左派队伍的时候，Pierpoint 也在组建一个团结紧密的白宫队伍。

纪念战争伤亡者的报告之后，CBS 的报道转到了最高指挥官培训学校的游行身上。记者的开场白十分清楚：“今日主题：我们在此祈求和平，我们不会使用暴力，我们也不需要它。但是，如果暴力真的发生了，我将尽力让它平息。”紧接着的是一次少有的课程，由教官讲授非暴力的内容。^① 14 日，哈里·里森纳（Harry Reasoner）在沃尔特·克朗凯特的节目中说：“全国范围的反战抗议活动现在已经进入第二天，它以非暴力被人所知”。由此，反伤亡的游行活动成为时间最长、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然后，布鲁斯·莫顿报道：三百名伞兵已进入法院大楼，因为“在法院出了麻烦，嬉皮分子组织了示威，并不是直接针对反战，而是反对在芝加哥对七个激进领导人的审判”。在纽约，罗伯特·沙克尼（Robert Schakne）在一次中央公园集会上表示：

这确实是一种不同的反战抗议活动，其主要的象征便是黑色的气球，代表今年在越南牺牲的美国士兵。美国的国旗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变得引人注目；它表明反战的人和支持战争的人都是一样爱国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年轻人，但并不包括所有的人。很多倡导者都参加过麦卡锡运动和肯尼迪运动。^②

但是，媒体运作的常规——对冲突施加压力——模糊了原本清晰的界限。11 月 15 日，在 CBS 的晚间新闻中，吵吵闹闹的法院示威游行成为了报道的重点。在华盛顿，在所有 50 万的示威游行中，只有少数一部分前往法院，还有一部分人投掷石块、砸玻璃，对警察发射的催泪弹加以回击，这些都成为了当天的主打内容——尽管主持人罗格·马德（Roger Mudd）和许多 CBS 的许多人都持反对意见。那天晚上，根据一位 CBS 的一位工作人员所言，“恐怖的照片有时——有时并不是常常——确实代表着发生了什么”。^③ 报道究竟来源于何处，“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一伙肮脏的人围攻司法部，还是许多人（有大约 500,000 人参加了示威）在同一地方齐声高唱？”媒体报道的框架陷入了冲突之中，混乱的暴力场面压制了轮廓鲜明的形象。对大卫·霍克（David Hawk）来说，这些报道是“混杂（mixed）”和“模糊（muddied）”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团乱麻”。^④

这种模糊不清的局面正好符合白宫的口味；对于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

① 1969 年 11 月 13 日 (c) 1969 CB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② 1969 年 11 月 14 日 (c) 1969 CB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③ 我对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 CBS 工作人员的采访。遗憾的是，CBS 并未保存下来 11 月 15 日（星期六）的节目资料。

④ 1976 年 11 月 12 日对 David Hawk 的采访。

游行，报道是以纪录片的形式出现的，而不是直播。就休战运动的领导者们来说，曾经希望过运动可以直播，CBS 的高层也是这么考虑的。七年后，当我为了本书的写作而前往纽约时，我打电话给一位 CBS 工作人员，告诉他我正在关注六年前 CBS 是如何处理反战活动的。还没等我来得及说下一句话，他就大声说道：“如果你想从我嘴里知道，为什么 1969 年 CBS 没有对休战运动进行直播的话，抱歉，恕我无可奉告。”前 CBS 记者丹尼尔·肖尔（Daniel Schorr）告诉我，在 CBS 华盛顿分部，曾经有一种休战运动可能会直播的“常规的猜想（normal assumption）”，“很明显，每个人都清楚，没有直播休战运动是上面规定的”。^① CBS 中的另外一些人也对这种猜想予以了确认。

按照记者们对于现场的判断，如果休战运动确有直播的保证，那么为什么 CBS 会做出有悖于正常新闻判断的决定呢？一方面，直播节目中无法插播广告的代价是非常大的，这会失去很多的商业利润。但是，有线电视网不仅没有直播，而且报道的力度和范围也是大为减少。10 月 15 日，CBS 的晚间新闻报道曾播出了一条关于休战运动长达半个小时的报道；而 11 月 15 日的晚上，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十月份之后究竟有什么变化呢？一方面，正如斯坦霍普·古尔德所说的那样，电视新闻患上了病症，“我们已经干完了（we've done it）”。新闻工作人员不愿意再重复他们自己。^② 但是，对 10 月 15 日之后“报道”是否发生改变还应做出解释。尽管“我们已经干完了”，有关战争的新闻仍然接连不断地被报道。休战和动员运动正携手共进，努力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行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期望对政府来说并不是多么愿意见到的事情。另外一件发生变化的事情是，政府已经改变了对待媒体的策略（或者用查平备忘录中的话来说就是“防御”）。11 月 4 日，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新任主席迪安·伯奇（Dean Burch）召集三大电视网的高层，向他们索要前天尼克松讲话之后“即时分析（instant ana-

① 1977 年 5 月 3 日 Daniel Schorr 的采访。——在 CBS，或许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制造如此的“指挥决议”了。娱乐杂志“Variety”的 Bill Greeley 报道说，1967 年 10 月，CBS 一些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命令其他的电视网停止有关在五角大楼举行的和平游行活动的的所有转播”。（“Progress in Viet War Coverage [Airing Once - Nixed Film A Sign of the 'Times']”，Variety, June 28, 1972, pp. 1, 61）。同时，Greeley 还指出了约翰逊执政期间对媒体报道的其他一些管制。Greeley 指出，这些“流产的计划”挡在了电视网的大门之外，并同约翰逊总统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些联系是切实存在的，并且表现为约翰逊本人的风格。虽然，尼克松时期反战报道并没有停止，但尼克松与媒体高层之间的关系并不怎么密切，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常规、霸权的规则没有发挥作用的时候，白宫拉拢媒体的惟一方法便是建立私人关系，威胁的手段也同样适用。详细的情况请参阅第三部分。

② 1976 年 11 月 13 日对 Stanhope Gould 的采访。

lyses) ”的节目副本。联邦通讯委员会对三大电视网如此直接的干预是史无前例的。然后，11月13日，斯皮罗·阿格纽发表言论，反对亚洲媒体的报道。它使人们更加容易相信，此事与11月15日CBS没有对运动进行直播并没有太多的联系。尼克松政府对媒体的讨伐，可能也有其他不为寻常的原因。新闻广播人员的抗议，在法院进行的示威游行，成为了当晚CBS新闻的主要内容。

11月16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报道，对温和的军事界限表示支持：“250,000名抗议者在华盛顿和平集会，随后激进运动者引发了冲突。”另外还有一篇马克斯·弗兰克尔(Max Frankel)的深度报道，“游行警备官使形势得到了缓和”。同时，他还将参加了白天动员运动游行的人(“大家的脸上都带着微笑”)与夜间的好战分子(“少数激进分子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进行了对比，强调二者之间的区别。弗兰克尔写道：“这个周末，无论在越南还是在华盛顿，这些头脑简单、低俗粗鲁的人拒绝支持暴力，就像大海上的漂流者一样。”同时刊登的还有一张通过特技制作的照片：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两面“民族解放阵线”大旗，这两面大旗比华盛顿纪念碑前的要大得多，下面的文字说明是：“游行者聚集在华盛顿纪念碑旁。部分人举着南越的‘民族解放阵线’旗帜。”《纽约时报》的大部分版面对此仍保留着根本的区别，从另外两篇报道可见一斑，一篇是“催泪弹击退了激进者的进攻”，另外一篇则是“100,000多人在海岸举行和平示威活动”。^①

有趣的是，对于和平的游行者与暴动的好战分子之间的分化，同样出现在1968年10月伦敦的媒体报道中。和1969年美国媒体一样，英国人几乎也对有关情况进行了报道，并预测暴力事件以后会不会发生，然后大力渲染游行活动对一些建筑的围攻(比如美国大使馆)，最后将其置于和平或者规模更大的示威活动背景下。^②这种报道模式经常出现在ITV和BBC的新闻中，这也表明直接的商业利益考虑并不足以解释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对媒介的政治功能，以及它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对反对派观点的限制有更长远的认识。

① 《纽约时报》1969年关于动员运动的报道和1965年3月关于SANE反战运动的报道之间具有相似之处。

② 参见James D. Halloran, Philip Elliott以及Graham Murdock的Demonstr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0)。

媒介惯例与陈词滥调

通过直接周密的政治新闻运作获得特殊的政治效果是非常重要的；我并没有赘述具体的操作细节，这并非是忽视它们具有的意义。在第三部分，对于新闻的操作，我将会对特别的干涉和常过程进行更加详细和全面的分析。但是，我想结束这段讨论，重新强调新闻报道的模式以及它们对新左派带来的影响。由于媒体的报道，人们对“鸽派”和“鹰派”形成了不同的印象，这似乎是在情理之中。当然还有技术、结构和政治上的原因。从技术层面来看，一方面，从数量而言，媒体的报道是有限的。通常的晚间新闻只有几分钟的报道时间；虽然对于《纽约时报》及其他一些报纸而言，可以通过增加版面对后续新闻或重要事件加以报道，毕竟头版内容却只有很少的版面。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鸽派”获得的公众关注多一点，“鹰派”就会少一点。这种损失会激励失去关注的一方加强自己的军事行动：保持或夺回公众的注意。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力量中间，存在着—场争夺媒体有限资源的竞争。

短暂必然无法避免陈词滥调。为了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报道的内容，媒体过于强调现实。作个比较的话，克朗凯特的新闻节目也就是相当于《纽约时报》一个版面的容量，而且其中还不乏制片人和记者们普遍存在的认识，即观众是令人厌烦的，不耐烦的，而且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所有的这一切造成了对新闻事件报道的简化。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如此一种现象（“和平”的示威游行，“鼓舞人心”的统计，“有用的”谈判），而不是（“暴力”“令人丧气”的或者“失败的”）；如果是好的，便会是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不是好的，又是另外一种说法。总之，不是这样便是那样；所有的这一切，必须在90秒种左右的时间内完成。单独考虑这种结构和设想，电视节目仅仅是以卡通般的固定形象出现，情节和过程的微妙性却流产了。^① 记者们常常要面对新的事件和不同的情况，而记者和摄制人员又是如此匮乏，常常会感到力不从心。另外，记者们更多地是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来选取新闻素材，而不是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才干。另外，记者们也会根据他们的知名度来组织报道。对于一位匆忙的记者来说，“鸽派”和“鹰派”便成了一个便利的借口。

此外，我们已经详细地讨论过，正常或者超越常规的政治干预使示威活动中

^① 关于电视新闻中的常规模式问题，请参见 Todd Gitlin 的“Spotlights and Shadows: Television and Culture of Politics,” *College English* 38 (April 1977): 789-801.

的暴力成为媒体报道的主要着眼点；或许，这也增加了“鸽派”和“鹰派”之间更为显著的区别，尤其是对于并没有太多信息来源的大众而言，他们对于新左派内部真正的分歧并没有多少认识。由于这些方方面面的原因，特别是在不了解左派实际区别的观众眼中更是如此。综合这些原因，“鸽派”和“鹰派”之间单纯的对立——似乎是两个并没有多少内容和历史的范畴——成为最为传统的包装。这种过于简单的区分，更加分化了一个存在着分歧和对立的运动。

我们不妨再次回到运动自身的失败上来。运动受到了双重牵制：一方面是媒体约定俗成的报道和陈词滥调，以及对受众的划分；另一方面是它对于革命主义的坚决主张。当战争的反对呼声日益高涨并变得合法时，以及温和派主张美军单方面撤军时，许多曾抱有同样主张的反对运动发现，它们奇怪地陷入了困境并被孤立，他们歇斯底里地想唤起政治界密切关注一场即将到来的革命，以此来证实他们对于自身的感觉。由于缺乏坚实的政治基础，浮夸的派别诉诸于革命意志的力量——没有政治基础，没有政治响应，但是却有一条进入媒体不相称的道路。其他派别更加迟钝地等待革命的需要，以组织劳动阶级，他们并不热衷于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他们正在以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quasi - Bolshevik）的想象寻求美国革命劳动阶级的庇护。当媒体过分简化左派身份的复杂性和其影响时，其他运动也努力摆脱自己的复杂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持续高涨的反战情绪中，在军队、高校、妇女及少数人（经常是没有组织的）对社会的不满中，新左派运动的核心被限制了，这使得新左派运动自始至终地抗议。

S | 缩减时间与淡化语境

体验的间断与消除语境

电视媒介并没有制造激进的运动与示威游行，报纸也没有这样。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现代通讯设施和宣传条件；在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时期，广播媒介也尚未问世。但是，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大众媒介制度在塑造反对运动的特定环境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媒介属于社会，也塑造社会，同时也被一个创造新秩序的现代社会所塑造。马克思和波德莱尔（Baudelaire）都曾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认识到，现代性是一种新的时间观念，一种新的体验和一种新的迷茫。^①艾略特（Eliot）写道：“我们拥有了体验却丧失了意义。”其中的含义便是我们丧失了对于时间的部分传统观念，相应地，出现了大量人为的意义。现代社会制造的议程和形象，向我们对于现实的真正认识提出了质疑。大众媒介使这种“意义的丧失”成为习惯性的行为，不但为现实制造意义，而且还不断编织现实。整个媒介系统对于现代生活最为显著的影响，便是重新建构人们对于时间的体验。

当然，对于新左派而言，紧随着战事的推进和对于战争的镇压，以及运动经验的隔绝，出现了一种时间上怪异的收缩。在运动内部，你会有一种猛然被扔进了时间隧道的感觉，被扔进了一个一个的事件中，没有时间去体验。即便是在运动之外，在单一的政治领域竭尽全力之后，人们能够抵御汹涌的时间带来的混乱，以及一些不可思议的事件的轰炸；“《启示录》（Apocalypse）中充满了欢声笑语”，《君子》（Esquire）杂志为一些文章的合集制作了如此的题目。在运动内部，一个人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不同的阶段，有时近乎同时，有时首尾相连。媒体也认

^① 参见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Marxism, Modernism, Modernization,” *Dissent* 25 (Winter 1978): 54-73.

为，渐进的改变与历史的总体节奏是毫不相关的。

运动事件制约着对于时间的体验：一个人用“芝加哥”来记录他这样的生活；用“人民公园”来记录那样的生活。人的生命看起来仿佛是一串连接在一起微妙的感叹号。但是，其中的语句又是什么呢？用巴里·索恩（Barrie Thorne）的话来说，这种所谓的“事件时间（event time）”，需要体验非连续的事情，以及对政治现实和语境意义的丧失。在这次发生在60年代后期突如其来的事件中，我所提到的虚构和真实的暴力会十分活跃；几乎运动中的每个人，都丧失了对于政治现实以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认知。对于直接行动，不但有战争的鼓动，而且媒体也总是对新鲜的事情充满了好奇；对新的事件、新的动向和新的行动的渴望。在寻求新事物的过程中，运动和媒体结合在一起。斯坦诺普·古尔德在提到电视网制作人员“我们已经干完了”的同时，回忆起了CBS新闻工作人员在六十年代早期时候的抱怨：“哦，我们又得和那些公民的权利打交道了。”^①在有些时候和有些地方，媒体对于连续性事件有限的忍耐，会导致一个运动事件半途中止，或减少对其相关的报道。如果一项运动要昭示给公众——反战运动怎能没有公众呢？这个问题就不能被忽略。六十年代，媒体所宣称的“我们已经做完了”同战争的背景以及运动试图结束战争相比，能够迫使运动冲到一件又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前面。简言之，运动的“事件时间”是与媒体一起出现的。

这种异常的共生现象对运动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借助于媒体，像“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或反征兵组织这样的团体，得到了推进，并最终由于不断寻找新的东西而宣告结束。而媒体对于“陈腐”低限度的忍耐，加快了运动的步伐，正如巴里·索恩对有关新英格兰抵抗运动的主张一样：

保持新闻价值的努力也使得抵抗事件变得紧凑。在提出最初几个草案以后，无论对于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将危机逐渐常规化并规划出希望的东西）还是对于政府（也曾做出反应）以及媒体，形式都失去了其新奇性。避难所，如同新草案一样，逐渐失去了号召力。1969年3月，就媒体对抗议草案运动丧失了兴趣，一个反对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即使抗议活动没有对草案产生影响，一些人仍然认为抗议运动会影响其他人，这是值得关注的。当1967年10月16日我提出征兵卡草案的时候，当第一次审判抗议运动成员的时候，我们的行动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我们的行动基本

① 1976年11月8日和13日对 Stanhope Gould 的采访。

上得到了媒体的认同)。但是现在,征兵卡引发了抵制运动;并且审判也失去了动力和新奇之处。他们被安排在晚间新闻报道的第39页第5行,天气预报和体育新闻的中间。这样,关注我们的人仍然是那些我们经常提到的同情者。^①

同这位抗议者的看法一样,“我们已经干完了”症状的一个后果便是一种自我限制,这也是和运动对媒体的依赖同时出现的。参加运动的人们像发起人和专家一样绞尽脑汁,这个计划能否成功?是不是会失败?如何才算真实?这些问题无法确切地回答。在越南,运动为了能够取得切实的效果而不顾一切,但是它反对一个靠不住的政府。它希望“革命”,但是它没有明确的理论来支撑,也不知道从何处寻找这些理论,认识具体的方法或从中退却。事件的进度,大众位居其中的涌动,疏远的、被歪曲的经验使运动迷失了方向,剥夺了它的政治关联感,直至最后,山穷水尽。虽然不知道究竟怎样才是最正确的,但运动仍然不断向前推进。在1968、1969和1970年,新左派运动就像卡通片里的鸵鸟一样,到了悬崖边上仍然继续往前迈进,然后在空中悬浮了几秒钟之后坠向地面。

通过这些所有的方式,新左派运动进入了一种强烈的非连续体验的形式,与现实的脱节正是现代西方生活的特征。的确,非连续体验的存在远远早于电视媒介;但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媒介,更加深化了这一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其他事情之中,实际上是一种非连续的时空的发展。作为社会和政治统一体的城市,也是一种间断、不协调的体验。行走在19世纪一个城市的主街道上早已成为一种对于社会非连续性或者生动的体验。就像乔治·齐美尔(George Simmel)写的那样:“个体建立的主要心理基础,是感情生活内部或外部的刺激,快速而又连续转移的强化。”^②与工作和仪式固定的节奏相比,体验却开始变得生硬:缺乏连贯,充满悖论。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与自然密切相关的固定和循环的节奏,几乎被驱赶出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且被虚假的时间和乱象所取代。

在这个过程中,媒介位居中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读报和看电视的体验同漫步于繁忙的街道上的体验是极其相似的。城市的快速发展正在不断延伸到个人空间。19世纪30年代,电报的发展促成了商业日报的出现。19世纪90年代,新

① Barrie Thorne, “Resisting the Draft: An Ethnography of the Draft Resistance Movement” (未公开出版的博士论文, Brandeis University, 1971), pp341-342.

② Simmel,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译者 Edward Shils. 见 Donald N. Levinie 等人编著的 George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p. 325. (1903年首次出版)

闻摄影也被广泛应用在当时的媒体领域。随后，占据了人们视野的是电影和令人炫目的广告。接着，又出现了广播和电视。现在的电视，由追求报道和节目的数量转向了对节目质量的提升。就像城市建设，一开始追求数量后来也是注重质量一样。如城市变革一样，也发生了商品、时尚、生活方式以及新闻领域的“革命”。或许，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从未有过现在这样的变化；也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这样飞速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在思想领域的扩展，使得迅速变化着的体验不断发生。在经济上，时尚和商品的消费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基础。在个人心灵方面，不断适应（或模仿）成为享受舒适生活和获得地位的必要条件。直至现在，商品和广告的迅速发展始终与新的科技联系在一起，这些新的科技助长了资本的积累。不仅对于大众文化如此，而且艺术的形式都如同艺评家哈曼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所言，受到了“时新的传统”的影响，这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内部新闻模式的讽刺：体制的稳定性是以变化和速度的制度化为依据的。技术的变化、时尚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体验的节奏再现了生产的节奏。标准化生产的节奏加快了生活的速度——提高了装配线、办公室和学校的生产能力。同时，将交替性的时间单位化（以小时为标准的课程，滚石唱片3分钟长度的歌曲，60分钟的电视节目）。商业化的电视，随着其快速的画面转换和惯用的蒙太奇手法，从节目到广告，再到频道和节目的不断转换，表现出对于非连续事物体验的社会化倾向，以及对变化的寻求。为了使近乎实时的信息传播成为可能，广播也加速了对事件的反应，同时也加快了行为和对立行为的盘旋上升。^①

6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运动，被媒体纳入了一个其自身经验的去情境化之中，而这对运动的政治平衡和连续性是致命的。在越战巨大的压迫下，运动开始习惯于快速发展的形势，在其最初的情境之外制造事件。报道的即时性（instantaneity）能够跟现场保持同步，运动的绵延不断怂恿尚未成熟、阶段孤立的运动去曲解政治形势，使其行动脱离历史背景。在匆忙并永久地失去平衡的过程中，运动特别容易失去对实际政治形势的把握。运动扮演并制造居中调停的形象，并不断迅速对这些形象引起的无法预知的后果作出反应，因此陷入了一种循环的怪圈，无法纠正自身的错误。建立在媒体形象的政治策略正是媒介符号所强调的，

① 关于在现代新闻系统中社会变化日益加快的情况，见 Ben H. Bagdikian, *The Information Machines* (New York: Haper and Row, 1971), p. 14. 关于电视娱乐节目的问题，可以参考 Todd Gitlin 的 “Prime Time Ideology: The Hegemonic Process in Television Entertainment,” *Social Problems* 26 (February 1979): 251 - 266.

就如同哥伦比亚运动对1968年巴黎运动的效仿一样（见前面的第6章）。而运动消除象征革命意义的事物，比如海报、纽扣、旗帜、标语，甚至过于简单的理论，更是深化了这一过程。从对沙龙（Salem）牌香烟蓝天碧水田园风光的联想，到对19世纪的军事战略与20世纪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的联想，行动与情境的分离成为现代资本社会主要的、连续的特征。对于一个试图改变社会的运动来说，如果没有进入一种固定的机制，那么这种分离对于运动本身来说将是致命的。总的来说，新左派运动与大众文化复杂而又紧密的关系使它更加远离了航线——在传统上、先前的一代、目前的政党还有与政治选民的联系。一个大众的市场文化，即便是鲍勃·迪伦的歌和《阿尔及尔之战》（The Battle of Algiers），都不仅仅只是一个对抗的政治文化基础。新闻、时尚、适当的组织程序以及对于社会状况、结构、利益的正常认识，在商品化的过程中，一个具有战略头脑的政治运动是无法替代的。^①

学生运动的脆弱

为了更加具体地了解六十年代大众媒介对事件发展速度的特定影响，我们需要另外一个背景：那就是我们应当简单地关注一下学生运动的紧张局势。从本质上来说，激进的学生运动是不稳定的。由于它缺乏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当它面对和自己的意愿有所抵触的世界时，难免会滋生傲慢的情绪。1950-1960年和1960-1966年两个时期，美国大学生的数量成倍增长。所以，美国也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生的人数超过工人和农民总和的国家。但是，从大学生的整体结构来看，四年学制大学生的数量仍占少数。对于激进的学生运动来说，变动直接源于企图从头到脚彻底改变社会的勃勃野心与狭窄的社会文化基础之间的矛盾。反过来说，这种矛盾又是因为缺少一种成熟文化的基本传统，以及左派持续运动的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运动有时会同伟大的空想家卢梭、马克思和巴枯宁的感觉一样，本无所有却又想实现一切。然后，在疯狂的运动过程中，才知道其潜在的力量是不可限量的。首先，它需要一个无产阶级，或在功能上完全可以替代无产阶级的阶级，去将激进的野心变成现实。但是，由于激进的知识阶层内部构成了一个社会群体，它们形成了对于自身利益的看法；此外，加

① 在美国的政治运动中，左派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是绝无仅有的吗？或者人民党与人民阵线运动之间是否存在共生现象，以对两场重要的运动及其所处时代的主流文化加以说明呢？这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思考。

之其多种形式的统治，为了在既有权利和特权之间进行合作，它想要维护它所能控制的一切。对于学生运动而言，服务于真正的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代理人的行为，是其发展历程中的一件重要的任务。另外一个就是寻求其自我的政治身份，或自我的政治属性。这种寻求会导致运动夸大实际或潜在的重要性。例如，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就曾流行过“青年的阶级”的思想。最具创造力和最有说服力的是，学生运动能够将这两个不同的任务结合在一起，同时为自己和他人服务。例如，他们在大学里组织活动反对军事调查，不仅会对越南产生破坏，而且会削弱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批判中心的影响。

把为他人和为自己这两个主题结合在同一事业中，是在没有失去身份认同的情况下，学生运动克服孤立最为有效的方法。这既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也是激进主义的基础。但是，这些主题相反的结合往往是短暂而又脆弱的。由于不愿意容忍其社会地位，或许这好像限制了它们的共同愿望，不断涌现的革命知识分子壮大了无产阶级队伍。另一种对于解决方法的探索便是接受某一方的身份，并对其进行示威和泛化。即所谓的“新兴阶级”理论，学生群体是一种全世界自发阶级的先锋队，一个不曾拥有先进生产方式不断扩大的无产阶级，灌输着社会主义的需求。这里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场合，我在这里关心的是它们解决社会困境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学生运动内部困境最好的办法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它可以帮助学生运动转变成一个政党，从而保持对工人阶级的支配。正如列宁所提出的，工人阶级光靠自身的力量，充其量也只能实现一种“工会意识 (trade union consciousness)”；而知识分子才是将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 (class in itself)”转变成“自为阶级 (class for itself)”进行革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为政党是革命的必要条件，这也是列宁理论所说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①

对于孤立、激进的学生运动，列宁主义成为一种强烈的倾向，尽管具有可抵抗性。整套的理论需要在另一种场合来详尽阐述；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大众媒体是如何影响先于存在的重复呢？例如，在19世纪的俄国，一场小规模的学生运动脱离了老一代的领导，在和“为自己”、“为他人”相似的政治道路之间走了一条弯路。它尝试了不同的阶段，从主张“到人民中去！(V Narod!)”的民粹主义到

^① 见 Todd Gitlin 对这次争论的早期观点，“The Dynamics of the New Left,” Motive 31 (November 1970): 45-48, 以及 Alvin W. Gouldner,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9)。

改革主义和恐怖主义，这些又恰好是其以农村为基地的革命遭到失败的回应。随着民粹主义社会基础的小农阶级不断受到侵蚀，民粹主义者“为他人”的政治形式开始成为过时的思想。而且，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成长，一些民粹主义的残余势力及其理论的追随者联合起来，成立了“社会革命党”。^①不管这件事情在沙皇专制俄国之后产生了何种影响，1969年的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对列宁主义的青睐，代表了一种“消除语境（decontextualization）”的胜利。如果布尔什维主义在民粹主义的成功与失败方面具有一定的根源，那么美国化了的布尔什维主义就是一种怪诞的嫁接，他只服务于运动的内部需要，与美国历史及工人阶级的实际认识之间并没有具体的联系。但是，在一个新闻饱和的社会里，对于以学生为主体的运动而言，时间的收缩点燃了它的希望。深思熟虑是十分重要的。切实可行的信息需要很大的时间投入来发掘。正如1966年SNCC的组织者玛丽亚·瓦莉拉所说的（见前面第五章），“我们已经进入了国家版图……我们还没有为此作好准备”。从1965年开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强行推进，而且他把自己也推进到了观念和产生观念的狂热之中，这使得它不再能够支配由社会制约、无法避免的困境。于是他快刀斩乱麻，自从他变成了一个积极进取的政治组织，成了公众注意的中心。从《休伦宣言》和ERAP民粹主义的政治文化启蒙变成布尔什维主义和恐怖主义，60年代的学生运动跨越了四个年头，这个历程同19世纪的俄国有些相似。吸纳新成员，寻求支持；试图颠覆政治舆论，运动已经成为焦点：它引火烧身，并且化为灰烬。

① 关于俄国民粹主义历史的详细叙述，见 Aileen Kelly 的“Good for the Populist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4 (June 23, 1977): 10-15. 以及 Franco Venturi 的 *Roots of Revolution*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ap, 1966). 在民粹派的知识分子中，Alexander Herzen 对生活于其中的一个被限制的时代保持着高度警觉，尽管他也关注革命自身的急促发展。他写信给 Bakunin 说：“历史的缓慢发展让我们感到很烦恼，能不能让它的发展再快一些呢？”答案是否定的。引自 Kelly, “Good for the Populists,” p. 14.

9 | 传播与遏制

对于运动—媒介历史中最为重要的因果关系，我已予以保留。运动想要传播一些对于世界及其本质的观点，这些都成为了现实。

反对运动基于理性的目的进入了媒体的视线。他们试图寻求支持者及同情心，也想要挑战统治制度的权威。他们想吸引，或至少去中立第三种力量。^①当面对威胁到其价值的自由的道德心时，或许他们会公开寻求保护。他们想把争端引入地方或国家的政治议事日程上。他们可能想通过传播反主流文化思想，来宣布新的社会可能性。他们或许想纠正某些不满的事情。然而，很难理解反对运动在其运动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如何避免与媒体接触。

所以，把60年代的激进运动引入到一个更宽广的领域，不仅仅是其组织或个人意志薄弱的结果。为了引起公众注意，不仅有许多合理的理由，而且宣传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他传播了运动的一些主张、关注的问题和计划。可以说，媒体使用的是过度简化、常常是歪曲和贬低的形式——一种散乱的形式，但确实对运动进行了报道。宣传使得反战情绪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很正常的事情。在南部地区，对于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电视为他们带来了关于国内权利运动令人震惊的消息，^②而且还向北部自由居住区播出了有关镇压的报道，动员他们成为政治运动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60年代早期，在美国最南部的危险地区，对为争取民权利而独立作战的工人来说，国家媒体的关注是一种保护地方执政的形式。^③就连不相信记者，甚至根本不和记者打交道的SNCC，也发现自己无法回避

① 参见 Michael Lipsky, "Protest as a Political Resour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 (1968): 1151-1153.

② Ben H. Bagdikian, *The Information Machin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pp. 16-18.

③ 1976年7月1日对 Maria Varela 的采访。1965年以后，黑人抗议活动向西北部发展，媒体的报道也不再显得那么友好。根据 Varela 所言，一种观点认为 SNCC 是“勇敢的年轻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SNCC 是“想要搞破坏的激进分子”（出处同上）。

媒体。

对于宣传，参加运动的工作者处于深深的矛盾之中。确实，几乎运动所有的参加者都通过媒体的报道来寻求“心理上的满足”，在报纸和电视上得到的短暂的兴奋，可以帮助弥补他们在运动中的艰辛以及无法避免的失败所造成的心理压力。^①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参加运动的人们并不是自恋的男男女女；实际上，在他们放弃眼前的满足而投身于长远的事业时，他们恰恰比一般人更为现实。更简要地说，对于毫无报酬的政治工作而言，宣传是对他们所怀热情的一种补偿。哈维·莫罗茨（Harvey Molotch）认为，运动对于媒体的关心，不仅是因为媒体是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种方式，而且通过媒体，运动可以昭示自我的存在。^②甚至于被歪曲了的商业广告和其他一些散乱的“信息”，在晚间新闻中重复播出的数量也比一个人在一次社区会议上的发言要多。同时，它被直接传达到当权者手里。然而，这种媒体和受众之间的联系也是具有欺骗性的。在某种程度上，媒体的名誉是和大量超出公众意志之上的社会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60年代，有关运动连珠炮式的宣传，或许已经提高了老百姓迅速变化的期望。一些新左派运动较为老练的领袖开始意识到，公众的注意是必要的，尽管公众的注意也曾暴露出运动的脆弱，使运动的发展失去控制。虽然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从保罗·布思和丹·西格尔所给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参阅前面的第三章和第五章），一旦得到了公众的注意，不管领导者是否与记者保持配合或协作，都不会十分明显地影响新闻报道的本质。在成为媒体的焦点之前，谨慎老练的领袖西泽·查维斯（Cesar Chavez）为了组织一个协会，曾默默无闻地工作了很多年。

准确地说，媒体成为反对运动的有力工具——他们对事件进行曝光的能力，使其自身处于危险的境地。尽管对事情的本质我们还不能十分确定，但对于相同的媒介讯息，似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当少数倾向于好战的人更加强化这种倾向的同时，多数人却用相同的注脚来诠释对于“暴力策略（violent tactics）”的谴责。一份关于1968年芝加哥和1970年肯特州立大学示威游行之后的民意调查表明，在相同的信息基础上，支持示威游行、反对警察和反对示威游行、支持警察的意见基本相同。我了解的惟一相关经验性研究，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媒介定义产生了有限但却真实的影响。例如，一项关于英国工会的员工对非

① Harvey Molotch 1977年未发表的文章“Media and Movements”。

② 同上，p3。

官方罢工态度的调查显示，尽管电子媒介（并非传统的报纸）并没有对其他社会问题形成多少意见，但对老百姓的贡献却是“微小而有意义”的。但是，媒体在抵制非官方罢工时，还没有影响支持使用合法处罚的程度。^① 在伦敦，收看 1968 年反战示威游行报道的警察和学生，开始倾向于接受媒体的报道；但示威者并非如此。^② 换句话说，那些对于不确定的形势缺乏直接体验的人，更容易相信媒体的说法。^③ 1967 年，《纽约时报》刊登的卡尔弗特的采访（见前面的第六章），明确地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的经济赞助者区分开来。在美国，尤其是新左派，已经受到了运动本身及媒体报道的影响；而且由于媒体的宗派主义，或许媒体通过自己所宣称的那些东西，哄骗它们从运动政治中分离出来。

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表明，媒体在传播运动观念时参与了操纵运动。不幸的是，多数“民意变化”的研究，只是考察了人们对于媒体杂乱无章的信息的简单反应。但是，就报纸和电视而言，尤其是电视，它们对常规事件的重复报道取得了成功。关心运动的观众可以有选择性地收看媒体的报道，而对运动不太关心的观众则大部分停留在媒体报道表层的框架上。1968 年，一项调查表明，59% 的电视观众认为他们对于世界的主要认识来源于电视，^④ 甚至对于那些平日喜爱读报的人来说，报纸的报道与电视的报道并不有所抵触。至于媒体的重复报道对受众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只能作如下猜测：例如，对反战运动的重复报道，助长了政府的论断。政府认为这些运动纯属浪费时间，即使不是浪费时间，也有碍和平。而对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分歧的重复报道，则更有可能加深了二者的界限。在对英国青年文化的研究中，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认为，媒体通过强调摩登族（Mods）和摇滚乐迷（Rockers）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捅了漏子：

媒体不断重复敌对的报道……这实际上为这些松散的群体提供了一个从未存在的结构，以及证实这种结构的确存在的神话（mythology）……即使参与者没有形成对于这些报道的直接认识，他们也会将报道作为检验策略是否得当的反馈……于是，这种结构框架下的群体界限更加分明，二者之间的界限也不断加剧。

① Jay G. Blumler 和 Alison J. Ewbank, "Trade Unionists, the Mass Media and Unofficial Strikes,"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8 (March 1970): 52.

② 参见 James D. Halloran, Philip Elliott 和 Graham Murdock 的 *Demonstr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0), p. 307.

③ Joseph T. Klapper, *The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0), pp. 53 - 60.

④ The Roper Organization, Inc., "Changing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Television and Other Mass Media, 1959 - 1976" (New York: Television Information Office, 1977), p. 3.

大众媒介——对于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挖掘——也加剧了另一种分化：其一是摩登族和摇滚乐迷，再就是整个成人社会的分化。^①

新左派运动也是如此。媒体的关注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接着又将其具体化，供人们评判。媒体实际上是一面放大镜，政府用这面放大镜来指明并证实其强有力的镇压手段，并为其提供法律依据。而孤立缺乏经验的运动则从寂静处悄然浮出水面，照亮了周围的风景。辩证地看，这就如同政府过于追究一、两起偷窃事件一样。所有即将到来的反对运动都将继续沿袭这种历史：模糊与冷嘲热讽。

^① Stanley Cohen,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London: MacGibbon and Kee, 1972), p. 166.

IIIMedia

霸权、危机和反对派

- 10. 媒介惯例与政治危机 / 186
- 11. 七十年代向八十年代的过渡 / 213

10 | 媒介惯例与政治危机

媒介的理论

媒体报道的框架从何而来？它是如何确定下来并理所当然地被人们所接受的呢？这种主体性的报道框架是如何受到质疑并加以改变的呢？对于媒体对新左派运动的蓄意贬低，我们应当怎样理解呢？

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最近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解释了如何选取新闻素材作为最终的新闻报道。我将以此作为一个起点，予以详述。^①甘斯首先提出的是新闻工作者中心论（journalist-centered theory），用来解释新闻是专业新闻判断的产物。不过，这种观点不乏极端。这种极端之处在于，新闻业在人员的培训、吸收和提拔上具有自己独立的标准，通过遵循一些明确的或不甚明确的客观性规则服务于大众利益。同其他职业一样，新闻业是——或者应该是（总体上说，职业这个概念都有这种弹性）——孤立于外在因素的，不管这种因素来自政治压力，还是报刊出版者、新闻决策人员或广告商的压力，亦或来自外部利益集团以及新闻工作者自身有意或无意的影响。较为平和一点来说，新闻工作者自己常常坚持这种理论。而一些政界人士，比如尼克松和阿格纽等，虽然他们认为记者怀有对意识形态的偏见，但他们也认同这种理论。

第二种理论强调惯性（inertia），这是新闻机构最通常的习惯。一些组织理论（organizational theories）强调新闻的商业需要，另一些则强调新闻自身运作的组织

① 以下内容来自 Herbert Gans 的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Pantheon, 1979), pp. 78 - 80. 只保留了理论框架，部分内容有所改编。

结构。^① 可以同这些理论相提并论的，是最近通过现象学（phenomenological）的方法将新闻看成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强调人在新闻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它还强调新闻工作者在对大量的信息进行处理并加以筛选、以“新闻”的形式传达给受众所遵循的原则。^②

第三种是事件中心论（event-centered），该理论认为新闻是反映世界本质的一面镜子。基于这种观点，如果媒体对1965年到1969年之间新左派运动的态度发生了改变，那么一定是运动和事件本身发生了变化。正如爱德华·杰伊·艾伯斯坦（Edward Jay Epstein）指出的那样，镜子的隐喻在六十年代后期的新闻决策人员中十分盛行。^③ 由于前两种理论对新闻运作有规则的选择性进行了批评，镜子理论似乎显得已不太那么令人信服，但它在许多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决策人员中还是具有一定影响的，即便是从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节目的那句结束语中——“事情就是这样”，多少也能看到一些影子。^④

还有其他一些理论，将新闻选择纳入新闻组织以外的制度或社会环境中考虑，比如科技、民族文化、经济、受众、新闻来源以及主流社会力量的意识形态。正如甘斯指出的那样，每种理论都有其可取之处，却又都或多或少有失完整。从对世界上发生的众多事件的描述中可以发现，专业的、组织的、直接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的合力共同构成了新闻事件，而新闻报道总是囿于固定的模式，

① 主要的相关研究可以参考 Warren Breed 的“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Social Forces* 33 (May 1955): 467-477; Edward Jay Epstein, *News from Nowhere: Television and the New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Leon V. Sigal,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of Newsmaking*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73); Bernard Roshco, *Newsma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以及 Robert Darnton 的 *Writing News and Telling Stories*, *Daedalus* 104 (Spring 1975): 175-194. 同时也可见 Philip Elliott 在 *Media Organizations and Occupations: An Overview* 中的调查，以及 James Curran、Michael Gurevitch 和 Janet Woollacott 等人编写的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7), pp. 142-173.

② 对于该研究方法，可以参阅 Gaye Tuchman 的“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 (1972): 660-679; Tuchman, “Making News by Doing Work: Routinizing the Unexpect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 (July 1974): 110-131; Tuchman, *Making New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8); Harvey L. Molotch and Marilyn J. Lester, “News as Purposive Behavior: On the Strategic Use of Routine Events, Accidents, and Scand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 (February 1974): 101-112; 以及 Molotch and Lester, “Accidental News: The Great Oil Spill as Local Occurrence and National Ev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 (September 1974): 235-260.

③ Epstein, *News from Nowhere*, pp. 13-18.

④ Gans, *Deciding What's News*, p. 80 对 Philip Schlesinger 的“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引述，该文曾递交给1972年英国社会学协会会员会议。

局限于一般的框架。甘斯综合了所有这些理论，认为“新闻作为信息，由新闻工作者——它们既是官僚商业组织的雇员，同时也是专业人员——将他们手头上的资料经过概括、加工和修改，使之符合大众的口味，并传递给受众。然而由于新闻具有社会影响力，新闻工作者经常会面临来自团体和个人（包括受众）的压力，唯恐这些力量会影响到他们、他们的组织以及他们的公司和所在的群体组织……新闻来源、新闻工作者和受众共同组成了一个体系。不过，与其说他们是功能上相互联系的有机体，不如说他们是在进行一场拔河比赛”。至于这场拔河比赛的胜负，最终将取决于力量这个决定性的因素。因此，用菲利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的话来说，新闻的意义在于“解释现实过程中的权力行使”。

甘斯正是着眼于新闻组织的内部和外部，对新闻加以解释并得出结论的，新闻的生产是一个权力系统（system of power）。这些结论为大家所接受，它们有助于理解我在本书第一和第二部分说明的框架模式。我在这里所要寻求的，与其说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倒不如说是一个更为充分的理论分支，我们可以从中理解媒体报道框架的变化过程和媒体—运动之间的关系。本着这个目的，我旨在寻求一种理论，既能与新闻运作的特殊程序保持一致，又能敏锐地感觉到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新闻业与其他一些意识形态的机构和制度共同存在，互相关联；这种理论既是结构的，又是历史的——也就是说，它既可以解释新闻的操作和生产的规律性，同时又能解释二者的历史变化。这样一种理论，不仅应包括新闻报道及其框架，还应包括运动及其特征、目标和策略：它应当理解，对于世界是怎样的以及世界应当怎样，新闻报道和运动本身具有不同的观点。我在序言中提到，在最近的葛兰西霸权理论中可以找到最全面的理论方法。经过对葛兰西霸权理论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简单的讨论之后，我们可以得出本书的几个主题，并且通过对新左派和反战运动的报道，来认识新闻报道框架形成根源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作为过程的意识形态霸权

关于霸权，并不存在一个充分而又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从根源、力量以及缺陷等方面，对社会结构和历史环境予以详细阐释。^①不过在七十年代，当新左派

^① 下面这段的内容参考了我的另外一本书，“Prime Time Ideology: The Hegemonic Process in Television Entertainment,” *Social Problems* 26 (February 1979): 251-266.

瓦解之时，以及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狱中所写的手稿问世之后，^① 某些理论确实得到了发展，并立足于利害关系、感受和结论，确定了媒体和运动二者关系的发展历史。遗憾的是，作为第一个在一篇现代马克思主义文章中对这个概念加以详述的人，^② 葛兰西却表达得含糊不清，支离破碎。因为他被关押在一个法西斯监狱中，他要经受严格的检查，有时还要忍受病痛的煎熬。从1926年被判入狱一直到1937年秋去世，葛兰西完成了一本又一本的札记，试图去探寻导致一战后意大利北部工人起义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是革命者？为什么他们会被法西斯打败？在关注军队维护国家权力的同时，葛兰西着重强调工人阶级意识的局限性，讨论了他们是否可以以及什么时候才可以成功地推翻主体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

对于葛兰西的理论，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霸权即指统治阶级（或联盟）通过加强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来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支配。这是一个对大众的操纵，使他们对既有秩序形成认可（但并不是必要或蓄意的）的过程。霸权和高压政治二者互为依存，统治阶级通过实行高压政治来实现霸权。也就是说，对被统治者采取高压政治，既为霸权的存在提供了前提，又使霸权得到了巩固。^③ 在任何社会中，霸权与高压政治向来都是相互依存、交织共生的。最近，雷蒙德^④和斯图加特·霍尔（Stuart Hall）^⑤ 详细解释了霸权的含义，并在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时加以借用。霍尔说道：

-
- ① Antonio Gramsci的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由 Quintin Hoare 和 Geoffrey Nowell Smith 翻译。在 Gramsci 的著作中，无处不渗透着对霸权思想的阐释，这也是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著作中的主要基调。
- ② 在国家政治运作中，Gramsci 对于霸权和高压政治的区分和 Machiavelli 对于权力和欺诈的区分似乎有着相似之处。见 Sheldon S. Wolin 对 *Politics and Vision: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Boston: Little, Brown, 1960) 的评论，以及 Wolin 对 Machiavelli 的著作第 470 页的注释。就 Machiavelli 的 *The Prince*, Gramsci 写了长达 80 页的评论。
- ③ 在一篇狡黠的文章中，Perry Anderson 流露出了和 Gramsci 的 “Prison Notebooks” 近似的风格，其中不少内容皆是建立在 Gramsci 的一些术语上的，尤其是在描绘现代社会时对于文化和霸权的界定，见 Perry Anderson 的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No. 100 [November 1976 - January 1977], pp. 5 - 78. 这些问题虽然不是我要集中讨论的，但是研究意识形态霸权的问题，Perry Anderson 的文章是不可或缺的。
- ④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New Left Review*, No. 82 (1973), pp. 3 - 16; 之后又得到了修订和补充，见 *Marx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08 - 114.
- ⑤ Stuart Hall, “Culture, the Media and the ‘Ideological Effect,’” 收录在 Curran、Gurevitch 和 Woollcott 编著的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中，第 315 - 348 页。

当统治阶级（或者说小部分统治阶级的联合，一个历史的“集团”）不仅为实现其阶级利益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压制，而且还在全社会范围内对被统治阶级和社会结构行使“所有的社会权力”时，霸权便产生了。当小部分统治阶级不仅进行支配，并且直接领导——当他们不仅拥有权力去压制，同时还积极组织起来，以获得摇摆不定的被统治者的承认时，霸权便开始运行了。因此，霸权来自政府的武力和大众的允诺。但葛兰西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大众的认可通常运行在高压政治背后，处于主导地位。^①

进一步说，霸权是一个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共同作用的结果。^② 在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不断得到确立的过程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获得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回报。世界霸权已经渗透到大众的“日常意义”中，并被再创造，甚至仿佛就是由这种“日常意义”而产生的。

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任何机构都无法完全摆脱霸权的存在。整体意义上的文化工业，同教育体制一起致力于对霸权意识形态的调整和包装。作为文化工业的媒介，通常由大公司的成员或政界精英，以及他们想极力纳入自己社交圈子和思想范畴的个人所控制。同时，这一小部分人所组成的统治阶级联盟，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塑造意识形态的机构来表达他们共同的话语，并确保对现实的所有争论不会超越他们所容许的界限。他们构建了意识形态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正如霍尔所说的，“被统治阶级得以生存，且通过承认统治阶级对他们的支配来为他们的依附地位找到合理解释”。^③ 任何时候，单一功能的“统治阶级”都是不存在的，只有为合法的权威谋求长久基础的大集团的联合，而霸权也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主体意识形态的内容反映了统治阶级复杂的内部结构。”^④

从更深层的结构上来看，霸权思想也是相当复杂的。总地说来，经济上占据支配地位的阶级并不能直接生产和传播霸权思想。这个任务留给了作家、新闻工

① Stuart Hall, "Culture, the Media and the 'Ideological Effect,'" 收录在 Curran、Gurevitch 和 Woollacott 编著的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中, p. 332.

② 可对照 George Simmel 的观点。George Simmel 认为统治是“一种交互的形式 (a form of interaction)”，统治者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得满足……他人便是统治者自己意愿的一种产品。见 Simmel 的著作 *Domination*, Kurt H. Woff 译, 收录在 Donald N. Levine 等人编著的 *George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p. 96.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霸权”是有别于“统治”的：在霸权形态下，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接受统治是合理存在的。感谢 Mark Osiel 提醒我注意有关 Simmel 的内容。

③ Hall, "Culture, the Media and the 'Ideological Effect,'" p. 333.

④ 同上。

作者、教师、官员和艺术家，这些人在整个文化机制内，即在政府、大企业所拥有的学校、大众传媒机构、广告业、娱乐界以及个别官僚机构内被集中起来进行生产。因此，正像艾尔文·W. 古德（Alvin W. Gouldner）所指出的那样，同以前的统治阶级相比，大公司的董事具有明显的特征：“与先前的奴隶主和封建贵族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统治阶级主动承担着对日常经济事务的管理。”^① 它本身并不能直接对政治、行政或文化制度进行控制，或者获得被统治者的认可，甚至它根本不想这样做。更确切地说，不同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形成了一个团结的整体，肩负着管理整个社会的责任。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为政治与经济两个层面，二者在许多方面互相渗透，但在组织上却保持独立；同时，文化机器的拥有者和执行者——出版界、娱乐界、体育界、艺术界——在很大程度上与行政部门和大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些机构的运行都是依据不同的原则。或许古德所提出的政治部门与经济部门之间的差别，已经延伸亦应准用于（*mutatis mutandis*）文化秩序。

受这些发展的影响，资本主义制度下各阶层的形成大大不同于以往社会……随着政治、经济和官僚制度之间差异的扩大，以及各种不同人事部门的日益专门化，新分化出的部门都形成了一套有异于其他部门的自治标准，或者说是来自其他部门的一个“滑移”（slippage）。这些运行之中的人事部门，在处理问题时都有自己特殊的标准和策略，因此当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对文化秩序进行直接管理时，便多少显得有些不可理解。^②

在现代社会体系中，政权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分裂和专业化，使得意识形态显得尤为重要：意识形态作为潜在的粘合力（*cohesive force*）而位居中心——特别是对于这样一个无论是在生活阅历、伦理道德以及地缘政治各个领域都处于分裂的社会而言。同时，不同部门的相对独立也使得整个体系趋于合理化。就像古德指出的那样，重要的是，商界精英开始依赖于其他部门来确保整个社会秩序：

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机制，意识形态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通过这个机制，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得到有机的结合，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阶层能够对不断变化的

① Alvin W. Gouldner, *The Dialectic of Ideology and Technology: The Origin, Grammar, and Future of Ideology*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6), p. 229. 对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之间关系的同样研究还可见于 Anthony Giddens 的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3)。

② Gouldner, *Dialectic of Ideology and Technology*, p. 230.

社会情况做出和谐一致的答复。^①

但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统一还存在着缺陷：

毋庸置疑，霸权的精英人物同文化的方式，包括意识形态的生产，是互相分离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经常使这些精英人物感到不安，他们需要一个对他们来说更为完整、更易于接受的统治机构。^②

事实上，资产阶级文化中的霸权思想兼收并蓄、异常复杂。只有吸收一些相互冲突的价值观、现实观，并加以“驯化”（domesticate），才能保持其霸权特性。^③ 由此看来，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霸权思想，大大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意识形态，也不同于集权制的社会主义和独裁的法西斯政体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之所以能够吸收不同的批评，并不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偶然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其核心思想决定的。这种自由的霸权意识形态，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多种形式的斗争。政府权威的保证与个人价值和自决权的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中心问题。从最初开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存在着矛盾，它坚信“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或“自由、平等和博爱”等一贯的革命思想，仿佛这些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协调一致、互为依存的。最近，主体意识形态得以延伸，并包含了新的对立价值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阶级，公共权与所有权，追求真理与掠夺权力。资产阶级社会所有的反对运动，不管是为了自由还是政权，都以自由、平等、博爱（有的甚至以大学女学生联谊会）的名义来进行他们的斗争——站在这一套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上来反对那一套，他们要在主流意识形态上刻上自己的名字。

经济制度促进了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而意识形态却改变了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对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来说，生产资料 and 消费信用的无限扩大，使得与传统的“节俭、自己动手”的价值观截然不同的享乐主义得到了推崇和散播。工人们在一天中的前八小时必须服从于工作制度而从事生产；后八小时便可以完全放松和享受：工人们在工作日把自己完全投入到公司的利润产出中，在周末则表现出了一个真实、挥霍、放纵的自我。这种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势必会从消费领域蔓延到生产领域，导致工作效率的下降，引发管理上的危机：整个过程便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① Gouldner, *Dialectic of Ideology and Technology*, pp. 230 - 231.

② 同上, p. 232.

③ 摘自我的“Prime Time Ideology”一书第264至265页的内容。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①

这种霸权主义框架内的对立，束缚并限制着对于世界观真实的和潜在的斗争范围。霸权是一个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某一观点战胜其他观点获得认可，通常是借助于常规的方式，有时也会通过特殊的方式来实现。其内部结构，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写的那样：“……不断被更新、创造，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不断地受到质疑并加以调整。”^②通常，主体性的报道框架能够得到新闻从业者的承认，并以各种缘由，通过实践——这种实践并不被认为带有霸权性质——对其进行再生产并给予支持。霸权在新闻机构中有效地运行着，它也的确传递着新闻，并且是无意识的；它被一些具有想象力的专业人员加以操作，这些专业人员在所谓的为公众提供信息的中立立场上拥有很大的自主权。^③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可以看到，媒体对于新左派的报道并非完全中立的，而是存在着一个非常明确的界限。更为一般地来说，霸权是如何作为方法、假设和选择的整体，在新闻机构内部得以运行的呢？

霸权在新闻体制中的运作

本·巴格迪坎 (Ben Bagdikian) 指出，新闻报道在对信息进行选择时，通常包括三个步骤：(1)编辑决定整个事件中什么是最具有新闻价值的；(2)记者决定有哪些东西值得关注；(3)编辑决定如何处理以及如何安排最后的报道。^④对于这个程序的运行产生影响的是媒介的体制和一些管理人员，尽管他们没有绝对的自由，但还是制定了一些全局性的共同政策（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围绕商业电视进行讨论，印刷媒介与之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通过社会化，通过经历和关系的结合——换句话说，通过直接的全体和阶级利益，主流媒介的所有者和

①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文化将大众娱乐作为媒介产品的主要消费形式，并让大众形成自己是真正的消费者的认识，见 Stuart Ewen 的 *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Advertising and the Roots of the Consumer Culture* (New York: McGraw-Hill, 1976)。

② William,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p. 8.

③ 1971年，在对全国大约4000名新闻记者（包括编辑）的调查中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人认为他们具有“决定应该强调新闻报道哪些方面的完全自由”；60%的人可以“选择什么加以报道”；46%的人拥有指派采访任务的权力（在比较大的新闻机构，这个数字通常是36%，该调查也重新更正了这一数字），见 John W. C. Johnstone, Edward J. Slawski 和 William W. Bowman 等人的 *The News People: A Sociological Portrait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and Their Work*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6), p. 222.

④ 1979年5月2日对 Ben H. Bagdikian 的采访。

经营者确保现行制度得以在其主要框架内运行。也就是说，确保维护资产特权的财产私有，确保国家安全，确保政府机构对部分妨碍道德规范的行为进行改革，确保经济组织和官僚机构内部的个人成功。

媒介精英们企图将这种政治经济体体制奉为一个整体，因为他们现有的权力和名望正是来自于此。同其他任何一个团体一样，他们也想维护自身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首先是在有线电视网上——其名声远远高于《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下了很大的赌注。特定集团的利益与电视网所担负的整个系统的共同利益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导致整个社会制度趋于紧张的不容忽视的因素。尽管新闻组织也采取了一些手段使整个系统合法化，但是媒介的客观性与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的原则，使它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有时倾向于政治机构和经济权力，有时则会倾向于官方，有时甚至会倾向于反对派运动，所有的这些都取决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电视网呈现出一种权力的金字塔结构，采取中立的策略，通过与竞争力量的合作来扩大受众，并增加利润，谋求其合法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电视网通过坚持客观性的原则奠定了其合法地位（哈里斯·波斯指出，虽然电视也处于普遍的不景气当中，但它还是美国最值得信赖的公共媒介），这种客观性有时会允许——有时则是坚持——具有挑战性的社会运动进入到公共意识形态领域。电视网对于合法性的宣称，体现在其对于客观性的恪守上，换句话说，它会冒着可能破坏整个社会系统合法性的危险。电视网处理这种冲突的策略便是使用一些技巧，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讨论过的，去驯服和容忍它不敢小视的反对派。

新闻运作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雇员所拥有的自主权。要让观众深信他们看到的东西不仅是有趣的，而且还得是真实的，同时还要让记者们深信，他们拥有职业上的特权。为了避免背上个人的罪名，媒体内的高层管理人士允许他们的新闻操作以自主的形式出现，暗地里却对它进行间接的、难以让人察觉的社会控制。这种控制体现在成员的吸收和提拔上，体现在所制定的政策、薪金标准以及向下的社会渗透中。他们所雇用的编辑和记者一般来自中上阶层，虽然他们的个人价值观（用美国政治中常规的术语来说）是自由的，但他们明显地倾向属于他们所在阶层的核心霸权，也就是说，他们与他们的上司，以及主要的新闻提供机构同属一个阶层。^① 他们的薪水颇为丰厚（1976年，CBS每年付给它的记者35,000美元到80,000美元，还不包括额外的福利和补贴），他们与其新闻提供者有着共同的品味，在同一度假村度假，穿梭于各种宴会之中。在不受个人情

^① Gans, *Deciding What's News*, p. 209; Johnstone et al., *The News People*, pp. 25 - 28.

感因素支配的新闻编辑部里，他们共同的观点，通常会压过他们潜藏在心中的个人意见，至少在围绕一个报道选取必要的主题时会有如此表现。他们对待世界的共同方式为他们带来了一致的节奏和语调：新闻传递给我们的声音似乎表现出，世界是难以驾驭的，因为它偏离了正常的社会秩序。^①

电视网希望扩大观众的数量，希望观众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消费能力：因为观众的规模决定了他们从广告商那里拿到的广告费用。对观众社会地位的热衷，不仅是出于电视网自身的面子问题，而且它还可以向广告主大肆吹嘘，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在扩大观众规模并对新闻如实报道的进程中，电视网必须在联邦通讯委员会、国会以及其他部门的管理下运行。联邦通讯委员会在1934年的通信法中规定，地方电视台必须保证服务于公众的“利益、便利和需要”。不过在实际行动中，这个口号只不过是让地方频道更多地播出了一些新闻和公众事件的报道罢了。对地方电视台说，播放电视网提供的新闻（同时还有地方新闻）是一件经济实惠的事，投资少，收益高。但实际上，联邦通讯委员会不仅控制了地方电视台机构，还控制了整个电视网。根据所谓的“公正准则”（Fairness Doctrine），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求电视网为利益集团提供回应的机会——当然并非所有的利益集团，而是那些电视网的报道得罪了的利益集团。^②但是，电视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联邦通讯委员会，这种受制又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新闻部门为每篇报道寻求“平衡”的习惯呢？或许并没有多少。至少，CBS想废止这个“公正准则”，减少对电视的管制，它们认为平衡性的要求违反了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力，而且管制会给媒体带来更大的侵略性和随意性。^③相反，自从1979年以来，美国广播公司则一直很支持“公正准则”。电视网究竟要如何使它们的报道不受制约，这是值得怀疑的。当联邦通讯委员会对节目几乎不予干涉，对电视网获得的巨大商业利润不予限制时，疑问便产生了。尽管所有的电视公司都曾提出过抗议，但联邦通讯委员会却从未废弃过“公正准则”，不断地违反公平原则只

① 对于电视新闻的类型和形式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并没有很多的讨论。见我的“Spotlights and Shadows: Television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ollege English* 38 (April 1977): 789-801; 以及 Tuchman 的 *Making News* 中的第六章和 Gans 的 *Deciding What's News* 中的第一部分。

② FCC, “Application of the Fairness Doctrine in the Handling of Controversial Issues of Public Importance,” *Federal Register* 29, Part 2 (July 25, 1964) .

③ 见 William Small 的 *To Kill a Messenger: Television News and the Real World* (New York: Hastings House, 1970), pp. 267-270. Small 是 CBS 华盛顿分部新闻部的主任，后来继任 CBS 的副总裁以及新闻部主管。

能使联邦通讯委员会加强管制。^① 电视网的高层领导似乎更关心国会对他们的监督，关心法律对他们的限制，关心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获得的利润，关心那些遭到触犯的政治力量的抗议，关心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一切事情。（1976年11月，CBS的一位高级制片人对我说：“我们的力量不堪一击，第一修正案像芦苇一般脆弱易碎。看看印度的甘地夫人是怎么做的——她就那样查封了媒体。”）在任何情况下，诸如客观性、平衡性和消息的准确来源等传统的新闻准则，这些都起源于报纸，“公正准则”并不适用于电视媒介。

出于来自白宫、联邦通讯委员会、国会和其分支机构的管制和政治压力之下，电视网在许可的范围内，开辟了一个可以如己所愿自由活动的思想空间。拿纪录片节目来说，从一开始，整个播出的时间和预算开支都存在着很多局限，主题的选择和观点的确定不得不听从于一些大的利益集团。同时，这些利益集团还要考虑到当前社会中的主流思想意识倾向，然后才据此做出决定。根据大众市场的原则，电视网决不会轻易播出“引起争论”的节目，也就是说，不轻易发表与政治有关的报道。例如，1971年，CBS的“拍卖五角大楼”（The Selling of the Pentagon），就是利用了当时盛行的反军国主义思潮，表明CBS不再愿意继续充当从属于军事宣传的工具，希望取得独立的愿望，从而将矛头直指壁垒森严的五角大楼。由于各种原因，“拍卖”一词的使用招来了一些非议，而国会也要求召见CBS的最高主管人。在第一修正案的庇护下，CBS同国会展开了激烈的对抗。不过，制造“拍卖”一词的皮特·戴维斯（Peter Davis）将不再被委以任何任务，而CBS也不准再播出任何其他有关军事题材的纪录片。直到1976年越战结束，尼克松下台，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1977年初，同样的一幕又发生了。CBS播出了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两小时的节目，揭露了中情局（CIA-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对古巴发动的军事行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此举并非是为了缓与古巴的国际关系。不久以后，莫耶斯离开了CBS并说到，那儿并没有给严肃的纪录片留下任何空间。CBS晚间新闻的制片人罗恩·波恩（Ron Bonn）辩护说，“阿格纽先生为我们自由媒介带来的最严重的灾害‘就是’使原来不可想象的事变成可能——或许电视并没有提供大量的消息和公众事件的义务——或许它应该闭上那张喋喋不休的嘴巴，让大家看点娱乐节目。就在这个时候，严肃的纪录片开始走向衰落。”^② 当人们发现电视节目正在黯然失色时，并没有必要去为失去的

① Nicholas Johnson, "Audience Right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18 (May - June 1979): 63.

② Ron Bonn 与作者的信件，1979年5月1日。

“尖锐、具有争论的电视”的黄金时代而感到沮丧：从六十年代起，这种衰落便有所迹象。那时候，电视网的新闻报道是时新流动的，还没有被纳入官僚阶级的模式框架中。

但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政治和团体带来的压力却没有改变多少：它们继续为媒体的惯例运作设置应当恪守的外部界限。一旦被委以重任或指派给任务，记者们习惯与那些消息提供者结成联盟（特别是在华盛顿）。他们吸收了权力阶级的世界观，同时又不是完全附和，特别是当一个公共机构与另一个公共机构产生争端的时候（比如说，账目清算总局与白宫或者环境保护机构与能源部），^①或者当他们认为当权者违背了现行的行为准则，以及当他们有意无意发展了个人的兴趣时（如当他们的家人或孩子积极反对越战时）。

但是，即便是在记者与消息提供者、记者与编辑，以及编辑和出版商之间存在政策上的冲突，这些冲突也只是限于一些条款（terms）和前提假设（premise）之类的领域，而不会超越霸权主义的界限。在很大程度上，关于新闻价值的几种假说正是为了确保这种界限：新闻应当包括一些新颖的事件，而不是一些一成不变的事情；新闻应当立足于看得见的争端，而不是深不可测的舆论；新闻应当选择可以推动报道发展的事实，而不只是单纯解释并夸大报道的事实。^②只有处于这些规则限制内的新闻报道触犯了一些机构的利益，或者被认为是与该规则不符，进入了未被明确界定的中间地段时，新闻记者和媒介精英才会在新闻运作完整性的问题上存在着斗争。当外部政治力量有所抱怨时，高层决策人员就会出面进行调解。例如，他们会要求记者为所做的报道提供证据。在编辑部里，编辑会在监督他们的上司和为他们工作的下属之间展开斡旋。^③CBS的工作人员普遍认为，他们的新闻决策人员利用娴熟的技巧和信赖将他们和直接的政治压力间隔开——当然，这并非是对间接压力的否定。

最后，还有一些组织因素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着新闻。例如，预算的上限难免会使办公设备、通讯记者和工作人员发生短缺，所有这些都增加了电视新闻对

① Gans, *Deciding What's News*, p. 60.

② 对于近150年商业报纸的发展历史可以参阅Helen M. Hughes的*News and the Human Interest 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0)以及Darnton的“Writing News and Telling Stories.” Cindy Samuels是CBS纽约分部新闻部的经理助理，他提出了“推进报道(advancing the story)”的概念。

③ Sigal,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p. 19.

重大报道的依赖，特别是对一些极富戏剧性、引人注目的事件的关注。^① 同样，许多报纸已经关闭了他们在市区外一些费用昂贵的办公地点，特别是国外的办公地点，并且加大了与通讯社以及《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大报的合作。

总的来说，霸权的作用就在于，为通常的新闻规定必须要报道的事件制定标准的假定。特别是对电视而言，这更是一种常规的工作。但是，这种惯例减少了新闻工作者各个环节上的负担，其中一条便是新闻报道的固定模式。记者首先要明确问题所在，然后建立大致的框架，然后确定主角，并使他们彼此针锋相对。不管出现了什么紧急情况，记者也要想办法解决，尽可能整洁地将这一切都打好包。同时，电视上陈腔滥调的画面也掩饰不住这种伪装。尽管公司和企业为电视画面的花言巧语投入了很大的广告费用，实际却正如一位颇有洞察力的摄像记者所言，这种固定的形式实际上好似“带图画的演讲”（illustrated lecture）。^② 在制作电视节目时，通常在拍摄一个镜头或一个现场时，要重复拍摄很多次，最后再挑选出能够很好地配合报道的画面。记者惯用的叙述手法便是先确定报道主题，然后再确定其各个组成部分，最后再确定要报道的事情。一些另类的画面和电视作为视觉媒介的美名极不相称（如肯尼迪总统的遇刺），其中包括一些日常灾难的报道以及一些战争中鲜血淋漓的画面。但大多数报道的大多数画面，都进行了加工和编辑——当记者报道能源危机时，镜头上总是会出现工人用煤铲子挖凿的画面，而且还会伴随着铿锵的声音，诸如此类。即便有时文字与画面有所出入，节奏和速度没能形成一致，这种轻微的差异也会体现出霸权的存在。画面所呈现出的形象，或许会以一种不完美、怠慢的、软弱的形式说明，在记者极力想纳入到的传统报道框架中，的确存在着一种不和谐的现实。例如，越南战场上拍摄的浴血奋战的画面，或许是为了反对政府“在隧道的尽头我们可以看到曙光”这种立场，尽管踌躇满志，但还是随着记者的画外音传播了出去。但大多数的时候，这种脱节被在纽约（或另外的主要办公处）的生产者和编辑们一小块一小块地连在了一起。一般地说来，节目的这种制作模式允许生产者能在一个一两分钟的

① 见 Epstein, *News from Nowhere*, pp. 105-112, 以及 Gould 的 “The Trials of Network News,” (*May* 1973): 8-11. 例如, 1976 年 11 月, CBS 东北地区的分部负责从马里兰 (Maryland) 到 Maine (缅因州) 地区的新闻报道, 然后总共却只有五个摄像工作人员。

② 1977 年 6 月 16 日对 Stephen Lighthill 的采访。在对英国电视新闻的一个系统研究中, 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 (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 得出同样的结论: “对于大多数的电视画面而言, 它们的镜头和我们看到的电影是截然不同的。电视画面演示的是声音和同步的画面, 更多的则是电视的评论和解说……” (*Bad New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6], p. 29)。

胶片上选出一个特定的镜头。当然，这个镜头一定也是从所有拍摄的纷繁芜杂的镜头中精选出来的。

正如电视网的工作人员承认和抱怨的那样，这种惯例部分是出于缺乏充裕的时间。电视网的新闻节目每晚只有半小时的时间，其中大约二十二分钟半播出节目，剩下的留给广告。另外，新闻机构还希望找到一条简便易行的途径来控制信息量较少的报道——而且，这种报道应当具有灵活性，在最后关头可以被替换、编辑或重新组织，由那些没有接触新闻现场的生产者来处理。假如电视网要想“囊括全天的新闻”，它就不得不对新闻素材进行简化，使这些信息能在一分半钟或两分钟内处理完毕，甚至一个“长”的专题报道也只占用三到四分钟的时间（平均来说，70年代甚至比60年代还要短，尽管1977年NBC在每晚的新闻节目中设置了“第三板块”）。对“理想的画面”（即便是生动的图画）的迫切需要，往往会增加节目的额外费用。

虽然一天或者一小时的时间长度是固定的，但是在这样一个贫乏的世界中，时间带来的压力并非与生俱来、根深蒂固，也不是工业技术的发展所能决定的，它实际上是快速发展的经济以及迫切的商业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地方加盟台自己播出节目要比在电视网播出更能获得利润，因为地方加盟台的节目可以直接销售广告时间；因此，当1963年CBS提出将全国新闻的报道由15分钟增加到30分钟时，地方加盟台群起而攻之，坚决反对。而对CBS的新闻节目决策人员将报道时间由30分钟延长至45或60分钟的想法，更是深恶痛绝。^①对电视网来说，更为迫切的是将具有购买力的观众销售给广告商，而且必须确保这些具有购买力的观众每天都要拿出时间来收看电视节目。虽然1977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根》（Roots）大获成功，但电视网还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倾向于取消每日连续剧的播出，因为日常新闻仍然不乏商业需要。这种节目的编排和设置并非那些电视网的精英们凭空想象出来的：对于长期生活较有规律的观众而言，意义的确非同寻常。反过来，由于电视新闻和娱乐节目在不同时段的播出，使得观众相对规律的日常生活重新发生了改变。

这种整齐划一的模式促进了社会的稳固，这正是大多数观众所期待的：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权威机构（通常是官方）都可以使它恢复正常。即便是发

^① 从1963年9月开始，CBS和NBC晚间新闻节目的时间由15分钟延长至30分钟。根据Godfrey Hodgson的观点，晚间新闻节目之所以延长是因为受到了1959-1960年益智节目丑闻的影响，电视网想弥补自己的损失，见Godfrey Hodgson, *American in Our Time*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76), pp. 142-145.

生了骚乱，在官方的有意庇护下，或许也能扭转局面，使一切重回正轨。^① 看似能够威胁并动摇社会秩序的行为——如人民群众的示威游行、暴乱、政治挑衅——都可能会以证明核心霸权主义固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而告终。在政治丑闻与灾难报道的背后，也运行着同样的一套程序。水门事件和尼克松下台以后，新的媒介报道框架是：“制度操作”（The system works）。三哩岛事件之后，官方承认的英雄人物，如参议员萨姆·埃文（Sam Ewin）以及核能管制委员会（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的哈诺德·丹顿（Harold Denton）等，均作为具有优良和操守的权威人物被媒体所推崇，取代了日薄西山的英雄。

通常而言，新闻运作的常规为新闻事业解决了大量的实际问题。但是，为什么时间上的压力以及新闻工作者和观众，他们对完整的报道、节奏，还有主人公（*dramatis personae*）的期望会导致这种特定的模式产生呢？为了处理20世纪60年代的校园新闻，新闻记者不得不详细解释“学生积极分子”的种类；但是，为什么会是这种老生常谈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呢？就像哈里·蒙洛奇（Harrey Molotch）和玛利莲·莱斯特（Marilyn Lester）所指出的那样，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受众市场的需要，并不能用来对任何特定的媒介框架进行解释；用严谨的市场术语来说，决策人员如何才能预先确定，节目的收视率是受到这种处理方式的影响多一点呢，还是受到那一种处理方式的影响多一点呢？^② 记者们很少倾听观众的心声，对观众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知之甚少，因此形成的是一个抽象的观众群体概念，这种概念模糊了他们自身的认识。事实上，抽象概念的市场和观众并不能解释什么。这种陈旧的模式源于记者和编辑直接的工作和社会圈子，以及逐层渗透的组织结构：消息提供者、同事、上级，特别是《纽约时报》和通讯社等大的媒体机构。^③ 记者和决策人员会以观众的兴趣为借口，来为自己辩护（“美国人民厌倦了抗议”，泰晤士报的编辑是如此解释为什么没有报道科罗拉多反核游行示威的），而且他们对受众的感知也是源于此种框架。

同时，新闻的模式也并非是非呆板、一成不变的，像蒙洛奇说的那样，“新闻”是一个相当规模的范畴。^④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成为新闻，只要在新闻机构工作的

① Gitlin, "Spotlight and Shadows," p. 792; Gans, *Deciding What's News*, p. 54. 在 Gans 引用的一个研究中, Mark R. Levy 总结道, 无论是对于身边还是其他别的地方, 许多电视观众都认为是安全可靠的。见 Levy 的 "The Audience Experience with Television News," *Journalism Monographs*, No. 55 [April 1978], p. 13.

② Molotch and Lester, "Accidental News," p. 254.

③ 见 Gans, *Deciding What's News*, p. 201 以及第七章。

④ Molotch, "Media and Movements," 1977.

新闻采集者认为它是新闻。因此，它是历史的、值得讨论的概念：所有深层的社会冲突，部分而言都是关于“新闻是什么”的冲突。尽管新闻概念中普遍宣称的客观性确有存在，但任何试图找出新闻的整体概念（常规的、一般性的概念）的尝试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问一个记者什么是新闻，他可能会给出一些模糊的认识，如“重要的东西”或“有趣的东西”或“新颖的东西”之类的回答。假如有人对这些概念加以深究，提出实例或反证，这个普遍性的概念就不成立了。记者们最后认识到，“重要的东西”取决于对谁来说或取决于具体的“情形”（*situation*）和“判断”（*judgement*）。这些概念必须足够清晰、明确，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新闻是一个专业，继而证明他们得依靠某一特殊的采访区域（例如警方）来生产新闻。此外，还要充分考虑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也就是所谓的“新闻”。

只有客观的新闻才有可能具有客观的新闻价值，这是新闻业 19 世纪逐渐出现的职业信条。虽然断断续续，但也成为当时广泛的知识分子运动的一部分，反对科学和文化，事实 and 价值的分离。^① 时光荏苒，步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闻客观性的价值遭到了质疑。而对于这种质疑，相应的回答大多数却往往选择了沉默。“观点”放在评论的专栏，“新闻”放在新闻的专栏，不管这些客观性的空想家们脑袋里想的什么，几代的记者们曾向往并热切追求过那种价值，并始终铭记在心。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热情的确使新闻记者免遭来自广告商、政治家、利益集团和颇有声望的新闻机构的政治压力。^② 在新闻记者的培训中，要求对工人阶级和少数人的呼声及生活少做报道；^③ 在对新闻进行定位和处理时，要使“新闻”（用他们自己的眼光看）“可信”（*credible*）和“重要”（*important*）。“可信”“重要”和“客观性”（*objectivity*），——这些让人捉摸不透的范畴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十分灵活，可以根据新闻决策者和高层消息提供者的感受和愿望加以改变。同时，它们也十分明确，可以为记者们所宣称的职业地位和职业标准提供保证。一位电视高级制片人告诉赫伯特·甘斯：“他们可以让我做一些事情，不管大小，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公司，一种商业行为，但他们很

① Michael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

② 当然，出版商希望它们的直接经济利益能够受到保护。通常报纸不会报道针对自己的反托拉斯行为。例如，报纸会倾向于企业的利益，因为企业的广告是它们盈利的主要来源。越是影响到企业的直接经济利益，报纸越会受到责难。

③ Thelma McCormack, “Establishment Media and the Backlash,” 该文曾于 1970 年在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会议上宣读。

少那样做。我拥有我希望的独立和自主。”^① 我重点指出最后一句话。新闻记者们缺乏稳定的思想，这使它们很容易失去独立和自由。他们以职业的方式从事他们的商业行为，他们把新闻置于一个同整个社会制度相一致的框架之内。于是，记者们也通过日常的重复工作维持着这个主体框架。他们的自主，也是霸权体系约束下的自主。

霸权模式的局限所在

就一些对新闻感兴趣的公众而言，当他们的需求和期望有所发展和改变时，他们会倾向于寻求新闻中的“可信度”（credibility）和“可信赖性”（responsibility），传统的新闻采集方式常常有悖于此。当反对派的组织和运动向媒体宣布它们的要求时，记者们或许会改变他们对于受众以及世界的认识，当然，还有他们关于什么是“具有新闻价值的”“有趣的”和“重要的”的“直觉”（instinct）。这些变化很微妙，或多或少有些自觉：即便他们能抵抗住压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报道了某一个事件，他们还是会受到影响。造成他们薄弱之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个人的生活经历；特殊的组织安排；社会和编辑部中在意识形态内允许活动的界限。而且，这种薄弱之处还源于他们与读者和电视观众的极少接触，以及他们对观众了解的匮乏。由于新闻组织生产“新闻”产品的能力取决于记者同客户保持的良好关系，而新闻主管部门也担心这种特殊的关系会对报道有所影响。因此，一些比如《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机构，每年都会派一些记者轮流去往不同的国家，他们认为记者的这种特殊关系会影响他们的批判精神。^②

政治运动甫才开始的时候，由于不同的世界观，记者们或许会感觉到他们进入了一个充满了吸引力的领域。现在，新闻报道的常规客观性表现出一些适应性。通常说来，在采集新闻的过程中，记者们都倾向于深入到信息源的认知世界中，不管他们自己有什么特殊的看法。例如，五角大楼的记者在界定军事事件时，跟将军、舰队总司令和五角大楼里官员们一样：这只是一个报道这个导弹系统还是报道那个导弹系统的选择，而并非一个是军备竞赛还是放弃武装的选择。当运动变得具有新闻价值时，从事连续报道的记者们也表现出与消息的来源同样的倾向。实际上，他们可以通过巧妙的言辞和客观性来为报道中的同情倾向做辩

① Gans, *Deciding What's News*, p. 96

② Darnton, "Writing News and Telling Stories."

护，来避免使他们的报道遭到编辑的封杀。^① 或者更进一步：当反对运动发展壮大时，吸引了更多人注意的时候，记者们可能会走得更远。1970年，《纽约时报》的厄文·卡登威尔（Earl Caldwell）拒绝转交给陪审团关于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的笔录，同时还强调说，假如黑豹党的成员对他足够信任的话，他惟一能做的工作就是完成客观公正的报道。虽然新闻主要来源于官方，媒体同样也需要其他的消息来源：他们必需通盘审视整个社会，以发现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征兆。他们必须生产一些引人注目的新闻，这些都使他们无法满足一些非官方组织对新闻的需求。因为“客观性”的思想和“新闻价值”的标准并不是绝对严格的，新闻报道中的霸权不能满足一些反对派和一些偏离社会常规的集团的要求。通过媒体的日常工作，大量的社会冲突、斗争引入到新闻机构内部，并在此进行再加工：以主流意识形态的术语进行再加工。与现实存在着差异的陈述得到了承认同时，也被加以抑制、软化、玷污和驯服。

这也就是说，中立态度并不是媒介体制的弱点。媒介惯例被组织起来，用以描述需求、个体和框架，这些基本上与主导的霸权主义原则并不矛盾：日用品生产的私有控制合法化，国家安全部合法化，技术统治论合法化，权威机构处理冲突和实行必要的改革措施的权力和能力；由精英人物界定的社会秩序的合法化；作为社会存在方式的个人主义的价值。新闻惯例也并非十分轻松地就能描述需求、运动和框架，因为对于这些核心原则而言，它们是不完全的，也是深具破坏性的。政治新闻好像也被当成了犯罪新闻——今天做错的事并不是每天都会做错的事。而游行示威活动被认为是合法秩序潜在或实际的崩溃，而不是世界存在的一种状态。自然而然，这些设想使它们的报道免遭政府和大财团的苛刻对待（例如，1977年，《纽约时报》雇用了第一个对商业进行调查的记者）。其次，消息来源、选民和记者的需要和价值，作为一个整体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建构起来。记者和受众，都对媒介产品有所推崇，这就认可了商品生产和国家权力的既有秩序。这这些限制内，且只有在这些限制内，媒体才能通过表达政治和共同的团体组织的直接利益，并从中得到有限的自主权；他们甚至能够影响精英们理解自己选择的方式。

1971年，《纽约时报》冒着法律制裁的危险刊登了部分关于五角大楼的官方文件，并报道一些行政机构对越南的所作所为制造了谎言。不过它并没有报道，这些官方文件证实了一些反战积极分子多年来一直在谈论着战争。社论版编辑弗

^① Tuchman, *Making News*, pp. 100 ff.

兰克尔告诉我，他将五角大楼的官方文件与《泰晤士报》的战争报道进行了比较，发现我们做得并不算太坏。“假如你认真读了这篇文章，你会发现报社做得并不糟糕，我们已说出了我们知道的一切”。虽然这是事实，但对一般读者来说，还是很难“联系到一起”。^①对反战运动多年来的报道，打破传统研究和写作的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使得《泰晤士报》已经形成了比“联系到一起”更为成功的观点。它还收集了强有力的案例，说明美国的政策在制度上是针对国内人民的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但当时的《泰晤士报》并没有报道这些联系并加以剖析。1971年或在这之后，对《泰晤士报》来说，支持激进反对派的世界观是不明智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这些遗憾的事情最后不得不留给那些权力机构去解决，《泰晤士报》并没有批评自己的传统，或者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盲点（blind spot）。

一则新闻，比如丹·拉瑟对联邦调查局触犯法律的报道（在前言中已作讨论），就说明了被证实存在的社会问题是如何同合理的解决方式设置在一起的。报道指出，联邦调查局被指控犯有盗窃以及非法通过电话线路窃取情报的罪行，这种非法行为在“六十年代的国内动乱”时期仍然没有停止。因此，含蓄地说，民众运动——对“国内动乱”负有责任——不能看作是使联邦调查局保持一致的方式。由于同样的原因，一篇关于两架协和飞机在杜勒斯机场（Dulles Airport）降落的报道（1976年5月24日同时在CBS和ABC播出）变成了：（1）证明对于飞机的噪音是否合理的争论；（2）由联邦航空局安置的噪音测量设备将决定（客观地）噪音是否超标的证明；（3）示威者的反对，他们在广告传单和口号中声明自己才有权决定什么是过多的噪音。这一切表明：即使允许一些争论存在，这些争论也是由当权者来界定和处理的，而不是由一些边缘的破坏分子来决定的。^②同时，这些在镜头中只出现了几秒种的示威者们——他们的出现是为了让观众对所看的节目有所了解——又提出另一种不同的社会运动模式。虽然联邦调查局和法国航空公司（Air France）的世界观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全部，但他们对问题的界定（像“国内动乱”，只能由官方测量设备证实的噪音严重程度）得到了认可和转播。而不同观点之间的斗争也得以从性质上发生改变，以及受到操控与遏制。

因此，简而言之，信息的各种来源是分裂的，并存在于历史之中；新闻记者的观点暗隐在所遵循的新闻惯例之中，这种惯例使得他们的观点有时相当坚定，

① 1979年3月23日对Max Frankel的电话采访。

② 这是我从“Spotlights and Shadows”一书中的第792页选取的几个例子。

足以维持霸权主义的原则。同时，这种新闻惯例又极其灵活，可以吸收一些新鲜的事情；这些常规受到观众对一般意义感知的局限，但可以说明高层管理者和所有者的立场和观点。这些因素建构了新闻，甚至政府的集中管制也不得不考虑这些限制。日常的框架和程序足以说明政治、经济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的合理性。

霸权制度通过判断消息是否具有新闻价值来实现对各种冲突的调节，这需要政治上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当有政治危机产生时，他们便会怀疑他们所操纵的霸权是否能保持社会稳定。一些反对运动的声明或者要求，似乎可以在记者和编辑的大部分报道中得到印证。于是，霸权主义的框架开始发生了改变。因此，1968年，《纽约时报》和其他一些代表官方新闻组织的编辑们，对温和的反战运动体现出同情。而北越军队发起的“新年攻势”（Tet Offensive），粉碎了官方认为战争是正义和必胜并要坚持下去的论断。对“新年攻势”的报道推翻了约翰逊政府的主张——即建构媒介的主导框架。同时，经历了所谓的政治经济危机之后，制定对外政策的精英们（智囊团们）也开始转而反对约翰逊的战争政策。精英媒介夸大了它们对于战争的评论——似乎美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对革命加以干涉——就像经济行为和政治机构能够左右媒体对于战争的立场。但是政治危机并不听从于这些态度上左右摇摆的精英人物，他们都因为反对运动的不断高涨饱受政治危机的体验——既有激进派，也有温和派——遍及整个社会。同时，反对派的影响也渗透到了新闻机构内部。一些年轻的记者们也和他的同龄人一样，开始反对战争。更重要的是，对于编辑们和同一阶层的成员而言，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应召入伍，同时也担心自己会受到亲人的影响。巴格底肯曾任《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回忆到他们的总编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e）曾如此抱怨：“我们告诉记者们不要参加示威活动，可是连他们的老婆都加入游行队伍的时候，你又能怎么办呢？”^① 记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战争，自然使他们对反战运动形成了不同的看法。自从1968年8月芝加哥警察发生骚乱之后，他们对于警察是社会秩序合法维护者的观点开始持保守态度。

假如编辑们依然受到政府战争政策的影响——假如当权者没有反对战争——很难知道记者们还会将他们的报道框架置于反战行动中多远。这种报道的框架是和消息来源、编辑以及记者本身协商的结果，能否付诸实践尚不得而知。但当反战报道的框架发生改变时，仍然还存在着对新左派运动大量诋毁的程式；现在它陷入了非法运动的沼泽。我们已经在第七章中看到，媒介正陷入如何从无法接受

^① 1979年5月2日对 Ben Bagdikian 的采访。

的事情中分辨出可以接受的事情的痛苦之中。对温和反战积极分子稳妥的处理，包括“延期偿付”（Moratorium），都陷入了新调整的霸权主义框架中：战争是失败的，或许是错误的；但结束战争是当权者的任务，而不是激进运动的任务。

媒体报道框架的调整给媒体、政府和运动都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霸权一直在夸大，并歪曲反对运动。权威机构无法自如地应付政治和经济危机；不管怎样，他们总是招来不断的反对并被认为玩忽职守。就这一点考虑，构建新闻和巩固霸权对大多数精英们来说更加力不从心。乍看起来，似乎是反对派对新闻起了主导作用，他们努力争取对战争和反战新闻报道的控制，媒体的高层管理者对此怨声载道。因此，从1968年到1973年，特别是（并非仅仅）在尼克松政府的压制下，他们以更为直接和露骨的方式对新闻报道进行干预，这种方式不便公之于众。它们是异常（也就是说它们并非常规的）和异质的，关于它们的一些新闻则令人发窘：毕竟，它们有悖于霸权对记者职业上自主性的要求。但是，却出现了几起行政干涉的事件。例如，1968年春天的哥伦比亚大学暴动期间，《纽约时报》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其主编A. M. 罗森托（A. M. Rosenthal）在报纸的头版发表了一篇冗长的报道，指出激进分子是如何蛮横地闯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格林逊·科克（Guayson Kirk）的办公室里制造狼藉。^① 那年春天，《泰晤士报》就哥伦比亚骚乱也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哈佛的新保守派詹姆斯·Q. 威尔逊（James Q. Wilson）的警世良言，另一篇则是由最高法院法官约翰逊的顾问亚伯·福特斯（Abe Fortas）对非暴力行为撰写的批评。赫伯特·甘斯写道，《新闻周刊》的主编看了《泰晤士报》的报道后，删掉了他们自己记者的报道，因为该报道对激进分子流露出了同情。^② 在这种危急时刻，正常的霸权常规对霸权思想产生了威胁，处于一种忠于阶级利益与恪守职业道德的两难境地。执行人员为了维护深层的原则，更加频繁地干涉新闻报道的运作。

由于媒体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政府之外，虽然表面上顺从于政府，但二者之间的异议不断扩大。由于政府深感腹背受敌，于是便开始对媒体进行直接的控制。政府通过一些巧妙、狡猾的手段对媒体的运作进行干涉，如拒绝采访，把消息透露给媒体的竞争对手，或者是把错误消息传达给一些颇有威信的记者，总统对那些顺从的编辑委以声望很高的政治工作（如约翰逊委任支持战争的《华盛顿

① 见 Gay Talese 的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New York: World, 1969), pp. 513-515; 以及 Richard Pollak 的 "Abe Rosenthal Presents the New York Times," *Penthouse*, 1977年9月第50页。《纽约时报》的出版商 Sulzberger 是 CBS 的理事。

② Gans, *Deciding What's News*, p. 347, n. 32.

邮报》记者拉塞尔·威金斯为联合国大使)。^① 亦或, 总统和其他一些官员对那些难以驯服的媒体不时地进行斥责和引诱, 甚至直接进行威胁。1963年10月, 约翰·肯尼迪试图说服《泰晤士报》的发行人亚瑟·奥茨·舒尔兹伯格 (Arthur Ochs Sulzberger) (“一个矮胖子”), 将记者大卫·海伯斯坦姆调离越南。^② 约翰逊总统则喜欢打电话向记者发牢骚, 还喜欢询问头衔低的官员。他打电话给他的朋友弗兰克·斯坦顿和罗伯特·肯特纳 (Robert Kintner) ——CBS 总裁和 NBC 总裁, 以老朋友和爱国的名义向他们发出恳求。

1938年, 约翰逊总统曾向 CBS 表示, 希望他夫人的奥斯丁电台能成为 CBS 的加盟台。从那时候起, CBS 的总裁斯坦顿就成为了总统约翰逊的朋友, 同时还担任他的顾问。CBS 前任总监兼副总裁布莱尔·克拉克 (Blair Clark) 曾对我说, 1956年报道总统大选时, 他曾与约翰逊搭乘同一航班, 约翰逊总统问他: “你觉得斯坦顿怎么样?” 然后又说: “你一定很了解他。他是美国最好的一个人, 上个星期还和鲁德在牧场打猎呢。”^③ 20世纪60年代中期, 约翰逊常常会为 CBS 的报道恼火。至于斯坦顿, 作为 RAND 公司理事会 (一个高层军事调查智囊机构) 的主席, 对一些关于冷战和干涉政策的攻击, 他并没有做出什么批评。因此, 每次在 CBS 公司例行的午餐上, 斯坦顿总会当着 CBS 的主席佩利 (Paley) 的面, 唠叨一些约翰逊的不满。据海伯斯坦姆所言, 1964年的一天, 约翰逊向斯坦顿抱怨丹·拉瑟的节目——其实并没有什么激进的——而斯坦顿将总统的抱怨告诉了新闻部的制片人弗莱德·弗莱德利 (Fred Friendly), 弗莱德不顾规定 (新闻决策人员不应当把上级的干涉加在记者身上), 对拉瑟进行了严厉的指责。^④

大多数的时候, 约翰逊的风格都是私人谈话式的, 他一贯善于使用压制和强迫的手段, 如果有压力存在时, 他会做得更绝: 1965年8月, CBS 的记者莫利·萨弗 (Morley Safer, 加拿大人), 报道了美国海军部向肯纳 (Can Ne) 村的越南民居开火的事件。萨弗的报道锋芒毕露, 令人感到震惊, 正如海伯斯坦姆所言, 编辑“不得不使用这篇稿件”。于是, 他们刊登了这篇文章。据海伯斯坦姆采访过的 CBS 官员说, 第二天一大早, 约翰逊便给斯坦顿打电话, 将其从梦中叫醒, 大吼到:

“弗兰克, 你是不是耍我?”

① David Halberstam, *The Powers That B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pp. 545-546.

② 同上。

③ 1976年11月10日对 Blair Clark 的采访。

④ 同上。

还在睡梦中的斯坦顿问道：“你是谁啊？”

“弗兰克，我是你的总统，昨天，你的手下玷污了美国国旗！”

在约翰逊总统看来，萨弗一定是名共产主义者，并命令加拿大皇家警察（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对其进行审讯。后来，当约翰逊总统得知萨弗并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者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加拿大人时，他又说道：“我就知道他不是个美国人。”^①

所有的这一切，令约翰逊私下里一直对 CBS 耿耿于怀。相比之下，从 1969 年底开始，尼克松政府却发动了一场民众运动，一场不但改造媒体，而且还有华尔街的运动，它们都是尼克松外交战略的一部分。约翰逊碍于颜面不能与弗兰克·斯坦顿翻脸，尼克松可不管这些。无论是言辞还是行动上，尼克松总统都显得更为直率，不留情面。而他的副总统也擅长威胁和恫吓的伎俩，几年来一直不断地攻击和威胁有线电视网，以便能更有力地对其实施控制。只有在回忆起这些事时，我们才敢说，尼克松为这种越权行为付出了代价；其实，他本来是可以连任的。

在尼克松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媒体在尼克松政府和刚刚予以合法化的反战运动之间，试图极力占领一块中间地带。1968 年，尼克松作为一名“和平”候选人参加了竞选，电视也对这一盛况进行了转播。在竞选中，尼克松曾表示，要“让我们站到一起”，媒体也对此作了报道。实际上，在尼克松第一任之初，媒体在处理反战报道时，都认为尼克松政府能够结束战争。另外，就副总统阿格纽和白宫方面关于电视网“即时分析（instant analysis）”的批评来说，NBC 和 ABC 都在关于越南的报道中宣称，美国正在磋商之中而不是在讨论如何开战，这恰恰迎合了总统的心愿。1969 年 3 月，据爱德华·艾伯斯坦的报道，美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总监艾夫·威斯丁（Av Westin），给在越南西贡的分部发了一条电报：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报道的重心从战场，或者更具体地说，从美国对敌人的打击上转移到这样一个主题：我们正在从越南战场撤退……

艾伯斯坦写道：“我们可以预测，在 ABC 对越南战争的报道中，文章都会体现出‘我们正在从越南战场撤退’的观点。”^② NBC 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然而，媒体却对柬埔寨和老挝的空袭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这种行为正好迎合了尼克松政府，他们实际上并不想完全脱离战争，只是想给公众制造一种脱离战争的假

① 1976 年 11 月 10 日对 Blair Clard 的采访。

② Epstein, News from Nowhere, pp. 17-18; Hodgson, America in Our Time, p. 378.

象，使战争“越南化（Vietnamization）”。

不过，尼克松总统并不十分满意，他发现媒体对战争的报道不够连贯，流于偏狭，缺乏深思熟虑，对反战运动的报道过于夸大，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他。因此，他开始采取高压手段。1969年11月3日，尼克松发表关于战争“越南化”的演讲后，联邦通讯委员会新任主席迪安·伯德（Dean Burd）一大早就打电话给三大电视网的总裁，询问电视网有关“即时分析”的副本。11月13日和20日，副总统阿格纽发表了反对媒体的演讲后，白宫也开始动员地方机构反对电视网。在11月15日的动员和暂禁活动中，尼克松及其工作人员特地安排了一场运动来对新闻报道加以控制。1971年，尼克松要求法庭禁止《纽约时报》及其他一些报纸刊登有关五角大楼的一些报道。1972年，白宫工作人员查尔斯·科尔逊（Charles Colson）打电话给CBS的佩利和斯坦顿，批评了斯坦霍普·古尔德对水门事件的报道。结果，CBS新闻总裁沙朗特（Salant）下令，将节目的第二部分由十五分钟缩减到七分钟。^① 不过，沙朗特本人否认节目的调整是出于科尔逊的压力，^② 但不能否认，尼克松发起的反媒体活动对他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CBS一位高级制片人也承认，阿格纽的讨伐“使我们更加谨慎”；接着他很快又补充说：“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原来我们检查两遍的地方，现在都要检查三遍。”^③ CBS的一位摄像记者清楚地记得：“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紧张，每个人看起来也都十分谨慎。记者们常拿这个跟我们开玩笑，比如‘我们不能惹火了阿格纽先生’，或者是‘我们得小心点，阿格纽先生正盯着我们呢’”。^④ 几个月之后，

① 有关 Colson 的干涉以及 CBS 的反应，见 Timothy Crouse 的 *The Boys on the Bu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pp. 174 - 175; Robert Cirino, *Power to Persuad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4), p. 35; William S. Paley, *As It Happened*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79), pp. 318 - 327; Daniel Schorr, *Clearing the Ai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7), pp. 52 - 58; 以及 Hallberstam 的 *Powers That Be*, pp. 651 - 661. 有关尼克松政府对有线电视网的干预，见 Jeb Stuart Magruder 的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theneum, 1974), pp. 81 ff. 和 105 ff., 以及我在前面的讨论。William J. Porter 的 *Assault on the Media: The Nixon Year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6), Thomas Whiteside 的 *Shaking the Tree* (*The New Yorker*, 1977年3月17日第41至91页) 以及 Schorr 的 *Clearing the Air* 第14至120页有着更详细的叙述。

② Salant 曾经两度拒绝就六十年代 CBS 对新左派的报道接受我的采访，一次是1976年秋天，还有一次是1977年春天。Salant 说到，“我记性非常差，连昨天的事都想不起来，别说什么六十年代了。”不过，他并没有否认，“在 CBS 工作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决定权”。

③ 1976年11月19日对 Ron Bonn 的采访。

④ 1977年6月16日对 Stephen Lighthill 的采访。

沃尔特·克朗凯特说：“我觉得我们从上到下都受到了压制。”^① 当时，和我谈过话的每一个与 CBS 有关的人，都极力否认 1969 年 11 月发生的事情对记者有任何直接的影响，但一些记录片、新闻专题以及“即时分析”却深受其害。人人都感受到了尼克松总统带来的寒意并且极力反抗。^②

然而，直接的政治干预仍然很容易被言过其实。既然如此，《电视指南 (TV Guide)》杂志于 1969 年 9 月 27 日——宣布距离阿格纽在得梅因 (Des Moines) 发表演讲整整六个星期的时候——电视网正在减少对新左派的报道，他们将视线转移到“探索美国中产阶级或中下阶级的生活”。^③ “美国中产阶级 (Middle America)”和“沉默的大多数 (silent majority)”是新左派的行话。因此，电视网正努力维持一种政治上的平衡，以确保他们合作的位置。它们并没有必要遭到公开的指责，总会有来自政府潜在的威胁，政治危机可能会打破一贯的平衡。然而，在危机时刻和正常情况之间，即在要求政府或团体对新闻进行干预的情况和媒体的常规运作的情况之间，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界限。实际上，六十年代末是一个政治危机频繁的时期——新年攻势，民主党内部的反战运动，智囊团的干涉，收支差额和黄金危机，约翰逊的退位，马丁·路德·金的和肯尼迪的暗杀，黑人暴动，学生抗议，1969 年 11 月芝加哥运动等等，对新闻政策的干预已随处可见。

媒体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不仅仅只是电视媒体，其他的机构也直接或间接受到政府的规制（无论如何，报纸和新闻杂志有些不同，但它们的操作与整体框架同电视媒体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简单地说，电视网出售的是观众的注意力，它最根本的市场是广告商。同样，报纸大部分的收入也来自广告。为了吸引更多、更具购买力的观众和读者，从广告商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媒体会不惜触犯特殊团体的利益，它们掌握着整个政治经济的航向。正如斯坦顿于 1960 年所说的那样，“既然我们的支持来自广告商，我们就得考虑到他们的目的和想法”。^④ 但总体而言，电视网的利益又与记者追求客观实在的常规相一致。传统意义上，“好的文章”就是指能够吸引大量观众的文章：通常的意义认可了霸权的

① 这是 Cronkite 在 1970 年 3 月 3 日说过的，引自 James Aronson 的 *Deadline for the Media*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2), p. 9.

② 根据 1977 年 5 月 10 日对 Daniel Schorr 的采访，当时华盛顿分部的记者们“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包括 Schorr 在内一些人对 Salant 表示抗议。见 Schorr 的 *Clearing the Air*, pp. 61-64.

③ 出自 Hodgson 的 *America in Our Time* 第 382 至 383 页。

④ *Television Network Program Procurement;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Interstate and Foreign Commerc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88th Cong., 1st sess.*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 p. 335.

框架。因此，有两方面的原因使新闻机构对那些好的报道给予奖赏。对电视网来说，运行良好的新闻业就是运行良好的企业。但更为重要的是，在稳定自由资本主义秩序方面，媒体有着共同的利益，正是这种利益，一直在霸权的惯例中发挥着作用。霸权在新闻业中的运作始终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它揭露了个别企业和政府违反核心霸权的原则。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媒体、企业和政府一直处于争斗之中。^①

因此，当听到商人们经常抱怨电视网对他们抱有偏见时，这一点也不会让人感到吃惊。^② 例如，在一本已经停刊的杂志《经理人》的第一期中，沃尔特·克朗凯特力劝商人们能和记者更好地打交道，以便更好地发展他们的共同利益。克朗凯特认为，商业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媒体伙伴，这样可以满足它们获取信息的需要。同时，克朗凯特还极力争取他们在媒介自由和第一修正案问题上对电视网的支持。他认为，商业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正如生物科学中所说的共生现象 (symbiosis)：

或许在你的印象中，这个词受到了那些自称为“共生解放军 (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共生解放军”是美国七十年代的一个暴力组织——译者注] 的年轻狂热分子的影响。这个词在你的脑海中可能已被玷污，甚至带上了贬义色彩，但它仍然是一个真实的概念。

共生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关系。它指两种有机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对双方而言是互利互惠的。在我看来，媒体与企业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报纸、广播和电视都依靠广告获得经营收入，媒体能长期维持这种发展，主要也是因为商业社会能提供足够的资金。另一方面，企业也有赖于媒体促进自己的成长——通过广告来宣传产品。^③

① 见 Gans 的 *Deciding What's News* 第 68 至 69 页以及第 203 至 206 页有关美国新闻“揭丑运动”。

② 商人对于媒体报道的批评和指责不绝于耳。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 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 of America 公司的主席 Donald S. MacNaughton 的一篇演讲，题目是“Business and the Press - Independent or Interdependent?”，1976 年 3 月 7 日的《纽约时报》的经济版曾摘录报道过。1976 年 4 月 7 日，the Chase Manhattan Bank 的主席 David Rockefeller 也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题目“*The Values That Can Serve Mankind*”。至于媒体的回应，CBS 的总裁 Arthur R. Taylor 于 1975 年 10 月 21 日在 Financial Executives Institute 做出了题为“*Business and the Press: Who's Doing What to Whom and Why?*”的评论。另外还有 ABC 的财经节目的编辑 Dan Cordtz 在 1976 年 7 月 18 日的《纽约时报》经济版上的文章，“*Businessmen Can Look Better If They Try*”。后两篇文章的语调和 Cronkite 几乎完全相同，大家各有分工。媒体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商业也是如此，商人们应该学会如何通过媒体来获得更多的利润。

③ 有意思的是，在影片 *Network* 中，女恐怖分子的角色是由 Cronkite 的女儿 Kathy 扮演的。

谋求两者之间的共生，正是一些媒介高层人士一直致力其中的事情。克朗凯特含蓄地承认，仅仅这些还远远不够。另一方面，他又不辞劳苦地说清楚这个事实，这也反映了媒介精英具有防卫心理。完善与商业的共生关系，引导这种共生，在具体过程中引导整个社会朝稳定的方向发展，并使自身繁荣昌盛，这都是媒体的策略。电视网不能触犯政府的核心利益，同时还要小心，不能违反整个商业体系的中心前提。他们必须支持对投资和生产的私人控制权，正如他们控制公众传播的空间一样。一些商业行为在新闻中很少被披露，如贿赂、对大众健康的危害以及对环境的破坏等等。对此类的报道所产生的影响，通常不会直接将责任归咎于制造事端的企业，而是将责任推到“公众”的身上，或者换一个角度，从消费者而不是工人的角度来解释，甚至根本就不予以解释或者提供根本的解决办法。然而，即便是这样，商业机构也会认为媒介触犯了双方合作的共同制度。媒介正是通过新闻业“客观性”的惯例寻求同合作系统的共生。这种驱动是乌托邦的，永远也不会停止，即使不会变成现实。

七十年代向八十年代的过渡

运动的启示

当反战运动竭力利用媒体对重大事件热衷之时，它却一步步地陷入了那些互相矛盾、但又互相依存的集团和政府力量的圈套之中。对于运动而言，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影响人们认识现实的普遍方式和主导模式。这些运动必须“矫正视听”，必须改变人们诠释世界的方式，必须透析并昭示其所见所思、却被强权们所神秘化了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反叛性运动必须对客观事实的传统解释采用实证性的方法。他们必须在实践中通过调查发现，新闻的客观性原则究竟同维护并界定这种原则的各个集团与政府的利益背离多远。

60年代以来，反文化运动越来越多地关注媒体对其革命理念和自身地位施加的影响。“共生解放军”却走向了极端的一面，它学会了完全控制媒体，并为其编造一种稍纵即逝的假象，以达到某种目的。而另一方面，妇女解放运动却从新左派运动中汲取了教训，认识到了备受媒体关注的毁灭性或自毁的后果，并且成功地使其领导人或发言人部分地（并非全部）避免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心。^①这是从许多尝试和谬误中总结出来的答案。然而，答案却可以是多样化的。

霸权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被赋予了新义？霸权主义存在于具体的历史时期之中，正如媒介会为新的社会现实进行调整一样，它的边界也是可以调整的。某一运动的价值取向与政治或媒体的精英们的价值取向越吻合，那么它们在既定的新

^① 有关女权运动和媒体的关系问题，详见 Monica B. Morris, “Newspapers and the New Feminists: Blackout as Social Control,” *Journalism Quarterly* 50 (1973): 37-42, Kate Millett, *Flying*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4); Jo Freeman, *The Politics of Women's Liberation* (New York: David McKay, 1975), pp. 111-116, 147-150, 228; and Gaye Tuchman, *Making New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8), chap. 7.

闻体系中分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比如，60年代以来，消费者组织在媒体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成为新闻报道中的常客。媒体往往对该组织及其“声音”给予充分而又同情的报道，以激发企业的不满情绪，从而在以反对该事件为中心的宣传报道中，收取广告费用。拉尔夫·纳达尔（Ralph Nader）及其他的公众律师已成了人们敬仰的人物，他们常常是西装革履，打着领带，笔挺挺地坐在办公桌或书架前，就某一事件接受采访并发表意见，显出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和主流思想的可靠性。当记者们赋予他们思想的特权时，他们却在利用媒体为自己谋取利益。有时，诸如“西拉俱乐部（Sierra Club）”等环境保护者们，也能熟练地利用媒体的报道，以吸引众人对某一事件的关注或达到反对某一项改革的目的。70年代，在政治价值观中，资深的媒体决策者们对阶级和文化的生态观体现出的姿态得到了大众的认可。为了能让公众关注环保事业，政府也成立了诸如“环境保护署（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和“环境质量监控委员会（the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等专门机构。同时，这些机构也成为新闻来源的主要渠道。至于那些环保运动中的激进派们，却因为挑战主流媒体的报道以及接受劳工环境主义者们的观点而遭到了忽略。

诚然，运动的概念已经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只要是运动的积极分子，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是经常在媒体上出现的老面孔，他们可以公开阐明自己的见解。在这些人中，有消费者权益保护者、环境保护者、同性恋、女权主义者、赞成或反对公交车运的人以及反对人工流产的人，还有那些愤怒的伐木工人、农民和卡车司机等等。许多支持或反对某些具体改革的运动，已成为了报纸或广播电视中具有标志性的固定节目，甚至是保留的特色节目。

媒体对某一事件的报道往往会存在着两种独立的观点。它们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我们的社会充满了政治活力，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可以自由阐发。简而言之，我们的社会是多元化的。在报道过程中，媒体的确夸大了（尤其是它们所认同的）那些运动带来的影响。至少是出于工作目的而接受了与运动相同的前提，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人们很难预知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很难总结出运动对于公众的反应和其内部影响的敏感程度。就其内部因素而言，有两个方面肯定会增强运动对媒体的依赖性：首先是运动狭窄的社会基础；其次是运动力求实现社会环境下某一具体的政治目标。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当具备了这两个因素后，运动对于媒体的依赖就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这两个因素是：在非革命的环境下，运动却倾向于提出革命性的要求和不切实际的政治理想。另外，拒绝承认其政治观的非确定性，

尤其是领导权的分裂。于是，对于新左派，它有着特定的政治要求（结束越战）。虽然要求本身并不会带来什么破坏性后果，但这必然会使运动依附于媒体。要实现这种由狭小的社会层面所提出的社会政治改革，只能寄希望于广泛的社会动员，以寻求大众的支持。新左派运动试图影响政府的决策，而匆匆忙忙之中，却被迫依附于大众媒体，以便借助其报道来证明革命存在的简单事实。新左派认为，运动是处于革命环境之下的。这一心态源自于反战时期的改革主义者（虽然这种想法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在这种影响下，新左派决定强行开拓一条通往政治变革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比预期要远的多，以至于最终将新左派推入一种膨胀了的虚假政治理想之中。于是，人们把媒体中新左派的形象，以及从以往革命历史中借用来的比喻加以提炼，就使新左派运动变成了具有列宁主义者先锋队作用的组织。同时，新左派领导的摇摆不定，尤其是无法形成连贯的政治意识同组织的弊端交织在一起时，就会使所有的党派组织受到损害。领导人在名利的诱惑下，显得脆弱不堪，而普通的群众却因为无法使其领导尽职尽责而变得无所依靠。面对同样问题时，60、70年代的黑人运动也显露出同样脆弱，其实也是出于相同原因。因为黑人运动的基础也是狭小的社会阶层（即黑人军民和学生）；结束不平等的种族隔离是它的具体斗争目标；它也没有赋予领导人明确的定位，而运动最终也是在非革命的环境中推行革命的设想中结束的。

但是，就单个因素而言，都是在强化前一个或几个因素的基础上扩大自身的作用与范围的。如果连接几个因素的链条被切断了，那么就可以把前几个因素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如果某一运动为了谋求实现某个具体的政治目标，而拒绝接受革命性的政治理念，那么它就可以避免过分依赖媒体，而且控制公共宣传内容的可能性就会越大。比如，“美国农场工人联盟（The United Farm Workers, UFW）”也是建立在一个狭小的阶层基础之上、并谋求一定的政治目的，他们有一个无可争议的领导人。我听说，当他出现在媒体上的时候，成员们都会为他感到自豪而不是妒忌。并且通过避免革命性的路线，他们已经能够吸引媒体的注意，却不会让自己由于受到关注而招来灭顶之灾。

与革命性的运动相比，媒体对于改革性运动的报道框架要显得稳固的多。改革主义者通过确立其专家们的合法地位，来获得媒体的支持。媒体确立了标准化的新闻模式，并以相对于改革主义者有利的方式来报道该阶层的人物。相反，革命主义者，却只能得到离经叛道的形象。当被那些蓄意贬损、恶意指谤的新闻报道发现时，他们就成了很好的新闻素材。于是，通过某一方面，确切地说，就是使他们成为“好素材”的那一方面，就足以使其对国家或其他对象构成

威胁。最终，直接或间接地使其遭到压制或打击。但是，说改革主义者的运动更不惧怕谣言，并不是说他们就刀枪不入。他们同样也会受到媒体的关注；使其领导权旁落他人；以及强调嘘哗的革命理想（如果没有付诸行动的话），或引发暂时性的危机。类似而言，正规的新闻报道模式，总是会冷落某一运动的激进一翼，而与温和的一翼相对抗。他们报道某一主题的运动，但却以一种与其他运动相对的方式加以描述：女权主义者反对黑人运动，黑人运动反对美籍墨西哥人的运动。我在第一部分所查证的新闻报道模式，同样也适用于改革主义者的运动，也适用于那些深具反叛性的运动。即便是改革主义者的运动，也要尽量努力地宣传他们的革命理想，而不要使其报道显得支离破碎，前后不畅。了解媒体的常规运作及其新闻报道的模式，并不能保证起到宣传运动的效果。因为这些分析以及所制定的计划，都只是通过自己的方法完成的。媒体对事物的定位是很强的，它能把反对的声音纳入到霸权主义的秩序中。所以，忽略媒体的信号，肯定会使运动遭到冷落。

媒体近期的报道模式：针对反对核电站与核武器运动

我研究了一下近期的运动趋势。在媒体报道模式中变化了的东西，比没有改变的那些更引人注目。70年代末期的反对核电站及核武器运动，首先要面对的难题是跨过媒体报道的“高门槛”。1976年8月，新英格兰地区的“蛤壳联盟（Clamshell Alliance）”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塞布鲁克区（Seabrook）举行了示威活动，177名试图阻止建设核反应堆的示威者遭到了当局的逮捕。《纽约时报》在第32版用短短的两小段篇幅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相比之下，《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则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报道。但是，媒体对1976年通用电器公司3名设计核反应堆的工程师辞职一事却大肆渲染：围绕着专家的背信、个人勇气及专业程度等潜在问题进行了讨论，所有这些成了美国核工业史上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1977年5月，“蛤壳联盟”又回到了塞布鲁克，占领了反应堆的所在地。这一次，有1,414人被逮捕。“蛤联（the Clams）”（他们的自称），已经通过了彻底的非暴力行动的训练，并且努力向公众展现出他们友好温和的形象。这次运动的确成为美国70年代最大的一次非暴力示威行动，同时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之一。虽然新罕布什尔州的州长汤姆森（Thomson）事先曾警告说，这次示威活动可能会成为恐怖主义运动的“导火索”，然而却没有任何伤亡的报道。《纽约时报》对此进行了“充满敬意和详尽”的报道，其他的报纸和电

视网也强调了“蛤联”与警察友好的关系。在随后的几天，媒体报道了政府由于缺乏安置场所而被迫将被逮捕的人关押在军械库的事，却没有提及“蛤联”反对核反应堆的事。一个月之后，《华盛顿邮报》在对随后的示威活动进行描述时如此说到：“比起数年前反战的示威者来说，这次示威游行的人们显得更为理智成熟，而且组织得更为严密。”在媒体的报道中，这种将不同运动所具有的特点加以比较的方式，还是较为普遍的。1977年7月26日，在NBC的晚间新闻报道中，大卫·布林克利用他一贯的权威口吻，这样评论道：“塞布鲁克核电站已经成了引发骚乱的中心。”

然而，正如事先预料的那样，1979年发生的三哩岛灾难改变了媒体报道的一贯模式。这场灾难震动了整个朝野，就好比是核工业的“新年攻势”。于是，记者们开始打电话给反核能的组织，要求他们提供一些关于核反应堆安全的资料。与该运动相关的学术界的专家们，诸如加州大学的约翰·古夫曼（John Gofman）博士，以及原通用电器公司的几位工程师，便成了“半合法化（quasi-legitimate）”的资料来源，他们的话常常被报刊引用。同时还有爱迪森（Edison，三哩岛核电站的负责人），加拿大的巴布科克—威尔科克斯公司（Babcock & Wilcox，电站的承建商），甚至还有鲜为人知的“核能管理委员会”（the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NRC）等。记者们觉得，他们被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机构骗了，而且还一直不停地做出这样或那样的暗示。

沃尔特·克朗凯特把晚间报道称为“哈里斯堡综合症（the Harrisburg syndrome）”。电视新闻则报道说，NRC内部透露的消息表明，官方的监控机构对发生在宾西法尼亚州的事件知之甚少。与此同时，电视网赞赏了NRC的现任负责人希罗德·邓顿（Harold Denton）针对该事件发表的官方讲话。于是，邓顿便得到了媒体的认可——而且，不仅仅是媒体。他被认为是可以揭露内幕、值得信赖的权威人物，并且能够提出必要的改革建议。就像水门事件中的议员萨姆·埃文和随后的杰拉德·弗德（Gerald Ford）一样，邓顿也成為了民族英雄式的政府官员。

但是，正当众多媒体忙于确证核电站的危险性时（其实，数年前的那场运动已经告诫过人们了），他们却仍旧使用惯用的伎俩对运动抱以不屑一顾、甚至是轻蔑的态度。1979年4月7日，大约2,000人在旧金山的市政中心集合，反对在核电站以南200英里的地方开工。当地的报道只说了这一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而《纽约时报》则把一条关于5,000人示威（在随后的城市版中，人数上升至7,000人）的简讯，放在了第28版的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更有甚者，该篇报道和事情本身风马牛不相及。《纽约时报》提及了一个发言人，叫做拉尔夫·纳

达尔；还有另外两个艺人，分别是杰克逊·布朗（Jackson Brown）和邦尼·瑞特（Bonnie Raitt）；而对抨击利弗莫尔（Livermore）附近核武器实验的知名或不太知名的人士（包括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则只字未提。另外，在美国西南部，《纽约时报》也没有刊登在当地铀矿工人死亡率的调查报告，也没有提到美国核工业机构将反应堆出口给菲律宾的事情。有大约超过三分之一的文章，援引了太平洋电力及天然气公司发言人对核电站安全性的辩解言论。而权威媒体（如美国的《地理调查》杂志），对此却只做出了软弱的回应，该杂志根本没有引用任何一位从事运动的人士的观点。在次年的春夏之交，当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站出来反对修建核电站时，加州的媒体们却把该运动报道成为布朗政治野心的表现，认为布朗企图行使个人意图。但是7月1日，CBS却详尽而中肯地报道了全国性的反核能电站运动，这可以和1965年波利奇对新左派的调查报告相提并论。在三哩岛事件家喻户晓之后，反核能电站运动就跃入了合法的版图。

与此同时，关于反对核武器运动的全国性报道却寥若晨星。或许这是一场规模不大的运动，但也不像人们印象中的那么渺小。自从1978年4月以来，示威者集会并静坐在通往洛基平原的道路上，这条道路可以通往一家生产引爆氢弹的钚元素工厂。成百上千的示威者被逮捕、审判，投入监狱（其中有丹尼尔·艾尔斯伯格）。杰费逊城（包括洛基平原）负责公共健康的官员，调查了卡尔·约翰逊博士对附近地区核电站的研究，并指出：1957年和1969年的两次火灾引起了严重的放射性元素泄露，致使当地的居民身患绝症，并且还会给更多人的健康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克罗拉多州的州长及一名区女议员，对该事件给当地居民的健康造成的危害表示了急切的关注，科州的报纸也对示威行动和健康研究进行了零星的报道。但是，在1978年的整整一年中，仅有极少量的电视新闻涉及了这件事情，而且还是在收视率平平的时候。对于发生在1978年4月底5月初的几次最大的示威游行，《纽约时报》只是在第14版的位置刊登了一条消息，而《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对此就根本没有理睬。正如我早已指出的，当示威活动爆发时，《纽约时报》的一名华盛顿编辑是这么写的：“美国已经厌倦了抗议，美国已经厌倦了丹尼尔·艾尔斯伯格。”

卡尔·约翰逊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认可，政府对国家安全的讨论设置了相当高的“门槛”。但是，与此同时，早在1979年的时候，《纽约时报》就曾在其周末版的头版位置，刊登了美国教会内部对裁军再次涌现出的狂热情绪；另一篇可以和波利奇的报道相媲美的文章。几个星期后，CBS的晚间新闻播出了一个包括五部分内容的专题，对军备竞赛进行了有条不紊的报道，并且揭露了比利·

格拉汉姆 (Billy Graham) 由于害怕核武器对人类构成毁灭性的威胁, 而改变了其支持越南战争的好战立场。尤其是当《削减战略武器第二阶段条约》(SALT II) 即将签署时,《纽约时报》和 CBS 对卡特政府以及教会对缓和局势令人称道的立场, 给予了详尽的报道。此后不久, ABC 的新闻节目也推出了一个系列报道, 以美国的军备已经落后于苏联为借口, 来支持美国五角大楼的强硬立场。CBS 和 ABC 围绕高层 (主要是重要的党派人物) 矛盾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连续的报道。在“新年攻势”之后, 媒体又像以往一样, 调整了新闻报道的模式。不过这一次, 却发生了更加彻底的分化: 温和派的支持者和更加强硬的主战派支持者; 阻止进一步行动的策略和赞成打“有限核战 (limited nuclear war)”予以反击的策略。而且, 媒体也相应地分成了两派。但是, 在这场小范围的辩论中, 反对使用核武器的运动却仍旧受到冷落。当运动的某一观点对支持温和派的决策者们产生意义时, 媒体就报道他们的观点; 但是作为运动基于反对现行体制及意识形态更深层次的观点, 却仍旧在媒体的关注之外。

因此,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 反文化运动处于不可避免的两难境地。如果它处于统治言论以外的区域, 它在政治上就会受到排挤和冷落; 其激进的政治言论就会被驯服, 对社会的普遍规则构成的威胁就会变小、减弱甚至完全丧失。另外, 如果它用传统的政治规律来约束运动, 以此获取一个可信赖的公众形象; ——如果运动的领导人是具有教养的, 所采取的行为是有秩序的; 如果口号是具体、合理的, 那么它就有可能被霸权主义的世界观同化。人们将用那些小范围内的改革事件对其进行解释, 其反叛的棱角也就渐渐磨平。这就是所有自由资本主义自由制度下运动的处境。事实上, 对于运动本身而言, 主要的困难之处还在于大众媒体。媒体用排挤、驯化等我提到过的所有方法, 来制订报道的模式, 这就强化了美国政治历史的主旋律。反文化运动得到凸现, 而激进的因素却不断弱化。由此可见, 这种政治体制擅长以大量的改革来回应革命运动, 以便吸收、转移运动的能量。一些运动激进的特征保留了下来, 但是却变了样, 比如支离破碎的口号和模糊的革命态度。已死的革命, 不死的灵魂, 激励着下一代的改革者们, 而其最为激进的本质却陷入了孤立, 甚至一种偏执的境地。运动的普遍精神和具体单一的革命纲领分裂开来, 结果是两败俱伤。

但是, 认为既存的社会规则还和从前一样, 仅仅是抵挡、化解激进革命的挑战, 这种观点绝对是错误的。^① 文化商品的生产过程允许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发

^① 以下的内容来自于同 Paul E. Willis, Jon D. Curz 和 David Wellman 的讨论。

生变化，甚至这种变化是必须的。自我矛盾的霸权主义给予其意识形态一定的灵活性，以使它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甚至由于对己有利而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种意识系统，一旦受到侵扰，就不可能简单地回复原貌，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继续存在下去。反叛的精神被转化，并进入到了其他领域中。比如它从政治转到了文化，转到了愤世嫉俗的政治观及嬉皮的生活方式。新左派的政治精神以及寻求个人分享民主的社会理想，被分化成文化和政治中有失和谐的因素：变成了分散的地方性反对机构，^① 以及无能的列宁主义党派；变成了工人阶级的车间斗争，以及中产阶级为了自我保护而提出的个人主义以及他们所宣扬的关于人类潜能的心理学和神秘主义；变成了社会主义者关心的女权主义，以及利益集团提出的有利于改革和个人发展的女权主义；变成了专制的宗教崇拜和实现自我管理的意识；变成了被压迫民族为争取日益稀少的公共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在寻找精神的完整和理想的政治家园中，诞生了集权的诱惑，它能一定程度上令人企及人类殿堂的高度；^② 在寻找真正的个人自由中，开启了旧资产阶级反抗人类桎梏的要求。为此，人民建造了堡垒：这里的每一种文化，政治设想的产生，都经历了一个固定、自我限制甚至危险的过程，并且排除了其他的批评因素。八十年代，激进派们的设想是：重拾文化反叛的因素，并且努力克服七十年代的离心趋势，而这些趋势代表的是六十年代所未完成的自相矛盾的反叛性。

由于社会生活充斥着媒体的报道，所以他们已经成了阐释社会价值的重要领域——在一些有争议的地方，霸权主义遭到了部分的挑战，然后进行适当的调整。文化产业（包括新闻机构）生产出自相矛盾的产品，通过种种手段，平衡、吸收、排斥、蔑视，来驯服或孤立那些顽固的运动及其理念。有一点是肯定的：社会将不断创造并改变反叛运动的形式，这是无法避免的。然而，只要是这种政治经济体系生产出来的东西，而且仍旧是大多数人认为必要的，那么该系统的统治危机就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之所以应当抵制霸权主义，是因为它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但是我们仍处于霸权主义过程中，所以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脱离这种现实。

① 有关反抗机构与地方暴动等内容，请参阅 John Case 和 Rosemary C. R. Taylor 编著的一本具有鼓动性但又不失偏颇的 *Co-ops, Communes & Collectives: Experiments in Social Change in the 1960s and 1970s* (New York: Pantheon, 1979)，以及我 1979 年 6 月在 *The Progressive* 发表的评论。

② 关于新管理理念，可参阅 Richard Sennett, "The Boss's New Clothe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6 (February 22, 1979): 42-46.

附录：关于材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关于运动

我们之所以强调“运动”，其实是为了躲避准确的定义。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运动具体指的是共产党及其组织、目标、机构或者多少与之相关的运动。但是，到了60年代，“运动”这个概念就变得更加令人费解了，它转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充满了主观、怀疑和古怪的评论。谁卷入其中，谁又从中退出，这取决于你问到的人，以及所问的具体时间。然而我们还是要从头说起。1963年到1964年，数千名年轻人开始临时把他们自己称为“运动”并将自己认识成“运动”，以便他们在其内部谈论革命的要求和义务。当他们提出诸如“对于越南战争运动该做些什么”的问题时，针对的对象就是他们自己，或者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以及与之相类似的人。对于“运动”，有时特指民权运动，但是这个术语通常说的却是黑人和白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肩负着实现民权、和平以及进行某种激进、民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任务。并且，他们相信能够采取某种直接的行动来实现这些目标。“新左派”是另一个自我定义的术语，首先源于1963年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该组织有意沿用了50年代末期英国新左派的名称。新左派意味着“新”（即“非旧的”，就是说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和“左”（其任务是实现社会公正，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松散的社会主义）。

该运动的界限既清晰又模糊，其两大全国性组织分别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我主要关注的是前者——整个60年代全国最大、也最具活力的学生激进组织。而SNCC只是一个职能组织，一个组织者的组织，它有许多的支持者，但却没有“成员”。如果在新左派的范围内有一个（精神或理性的）组织中心，那么它就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从1960年成立，到1969年解体成为敌对的列宁主义者党派，“学生争取民

主社会组织”一直是新左派的中心，它一直是讨论新左派运动主要分析和讨论的对象。

所以，我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作为研究运动的主角。它的界限十分清晰：有明确的领导人、成员和运动的一代，以及明确的组织程序，这使得研究相对方便一些。而且，我个人也曾是该组织的成员。至于我在其中的经历，最初时有助于我研究，随后则适得其反，最后我还是相信那些一般性的资料来源以及我写作的动力和我的修改。1963年6月到1964年6月，我曾担任“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主席。1964—1965年，我当选为全国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并且成为该组织在安阿伯“和平研究与教育计划（Peac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Project）”两名协调员中的一员。我参与组织了“曼哈顿游行计划”（1965年3月）和华盛顿反战大游行（1965年4月），这些在本书的第一部分都有详述。这些经历使我成为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的一员“老兵”。虽然，我并非该组织最初的创始成员（因为1963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安阿伯成立时，我正在马萨诸塞州东部的剑桥市）。1965年6月到1966年6月，我成为芝加哥的全国管理委员会六名委员中的一员，并参与处理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全国办公室的事务（包括1965年10月的议案危机）。我也是17位全国委员中的一员，这些人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制定组织的政策。在随后几年的时间里，我并没有与组织保持直接的联系——尽管1967年6月，我还是参加了全国委员会会议及其代表会议，并且还和一些官员保持着私人的联系。1968年和1969年，我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更加疏远了。但是，我对该组织全国办公室及其他分会的一言一行还是了如指掌。在那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是《旧金山快报》（San Francisco Express Times）的一名编辑和自由撰稿人。我所接触的部分领域，还是关于新左派和反战运动。

除了对现存文档的补充和调整，我个人的回忆是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在研究过程中，我整理调查、有时甚至还要引用当时的一些个人信件。我还参阅了手头几乎全部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工作目录》（该组织在1963年到1966年间，每隔一两个星期寄送给积极分子的文件），还有成员公告、宣传小册子和宣传报刊，以及1966年到1969年间每周出版一期的《新左派报道》。我还采访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委员会中的几位关键性的成员。并且，“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年鉴也是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它对事实描述得非常准确，并且其对整个60年代组织的精神本质及运动策略都进行了多方面的解释。整理并浏览完了所有的这些材料，我发现回溯往事是在冒险，因为它是一种诱惑，使你在有意

识和无意识中择取了记忆中的某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回忆。但是，对于回溯往事惟一的选择，便是什么也不要写，也就是说纯粹依靠当时的书面材料，这里不是评论所有材料的地方。只要知道，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还很匮乏就足够了。塞尔的书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应当在缺乏有力的史实证据下，就得出某一历史结论。许多我涉及到的事件，只有在发生以后，才了解得更为透彻，这就是历史发生的方式。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历史学家，而不仅仅只是档案员。当我重新勾勒这段历史时，工作的乐趣就油然而生，许多我没有想到会发生的事情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剖析也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想象的快乐。

所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我叙述的中心。出于比较的目的，我也偶尔“绕道而行”，这样可以获取一些地方性或区域性运动的事实材料。比如，1964年的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1965年的“越南日委员会（the Vietnam Day Committee）”，以及1969年的“人民公园”。我没有对反战运动进行整体的分析研究，但是我在第七章中研究了全国总动员运动的发起，以及与“反越战动员委员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以上组织，连同五月二号运动、“全国结束越战协调委员会”（the 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to End the War in Vietnam）以及“地下抵抗组织（The Resistance）”一起成为了组织者重要的网络，而这些组织并没有自己长期的会员。尽管如此，我仍坚信“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与媒体间的某种切实关系使新左派成为一个整体：媒体报道的模式如出一辙，所以对运动积极分子施加的影响也大同小异。

对于其他运动的概括，我在第二和第三部分偶尔有所涉及。当这项研究才开始时，我先是踌躇满志，希望对所有运动（包括黑人运动、妇女运动、环保运动以及新左派运动等）和媒体报道的运作进行透彻的研究，而到后来就变得斗志全无了。因为，早期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资料的研究使我很快认识到，如果没有他人的合作，单枪匹马或者就算再多给我几辈子的时间，也是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的。我希望其他作者在叙述 SNCC（第二部分已经讨论过）、南部基督教领袖委员会（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uncil）、^①黑豹党和其他黑人团体的历史中，也来讨论一下这些类似的问题。同样，在少数民族的起义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环保主义者和消费主义者运动，赞成或反对人工流产的运动，以及

^① 这方面的研究始于 David J. Garrow 的 *Protest at Selm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其他一些反文化的运动的历史中，也来关注一下这些与媒体相关的类似问题。

关于媒体

我想要对媒体进行研究，那么它的具体形式和组织究竟是什么呢？虽然不乏庞大的理论和前美国副总统的极力主张，其报道并不是独特的，其意义也不是惟一的。

首先，我计划至少要将目光着眼于两家有线电视网；它们必须是成长于60年代，独树一帜，并且覆盖全国的电视网。当然，我至少要研究一下CBS，因为CBS的观众规模和影响都是数一数二的。自从电视新闻诞生以来，平均每天晚上有两千五百万名观众坐在电视机前收看CBS的节目。1976年，有205家地方台转播CBS的晚间新闻，而播放NBC和ABC的则是195家和154家（后来有所增加）。1963年，CBS和NBC晚间新闻的时间从15分钟延长到了30分钟。可直到1976年，ABC才有所举动。由于我想考察一下电视网在60年代的发展状况，但是ABC却无法提供足够数量的材料，因此我不得不一开始就将目光从它身上挪开，至少它不是我的首选。在CBS和NBC之间，管理部门的特殊规定替我做了决定。CBS允许外来研究人员有限观看其电视新闻节目资料，这些资料是1968年8月以前制作的新闻报道（当泛德堡大学开始录制所有三大电视网的晚间新闻节目时）。NBC却不对外开放，ABC也是如此，这样我就无法对他们的新闻节目进行参考，哪怕是第二选择。

在电视网中，我只选择了CBS作为研究的对象，这并非是我的初衷——能帮上大忙，或者说如我所愿。当我来到了位于纽约城的CBS新闻节目资料室时，我发现要找到并观看大量关于运动的新闻片段简直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研究了。许多节目都是用录像带录下来的，而不是最初原始素材的胶片，更何况有些是地方台通过其他方式传送到电视网的。当时，报道一经播出之后，带子就会重新使用，因此原来拍摄的东西也就无法逃脱被洗掉的命运。就算还有节目保留下来，也是CBS需要保存的版本，CBS也不愿意对外开放。一度我曾被告知，如果想要观看节目片段就必须购买拷贝，价格高得令人不敢问津。更糟糕的是，许多节目已经丢失。一些文件的出借卡上写道，某个节目已被CBS新闻制作人员或者是像《60分钟》这样的栏目借走，然后就找不到了，并不在原处。以上任何一种情况出现，节目资料就再也看不到了。有时候，某一天的报道还在，而第二天的报道却不知去向，甚至就根本没有保存下来。当我在核对节目资料档案，要求看一看

几个新闻片段时，我得到的答复却是：“空间有限，我们就录了这么多。有的人确实还回来了，但却没有最后保存下来。”

而且，就算节目保存下来，要全部看懂也并非易事。1966年之前，大多数的节目胶片都是黑白的，而且也没有声音。更为糟糕的是，大多数的胶片，无论是黑白还是彩色的，都要送到纽约，编在几个标有序列号的卷轴上（2到3个，有时3个）。只有把这几个卷轴擦在一起同时播放，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画面。有时候（不总是如此），这边播出声，那边播出图，必须同时进行才能获得比较完整的画面，然后再互相交换位置。看着首尾相连的画面，我当然不能将图像和声音合成完整的意义。而且，我看的仅仅是片段，并没有任何的新闻背景和字幕，在泛德国堡大学1968年开始录制电视网的新闻节目之前，没人保存这些开始和结束。最终，我还是没有得到观看那些节目片断的许可，尽管我已经找到了它们。而且，由于分配给我的管理人员只是临时帮忙，所以每一个新闻片段我只看了一两遍。我做了详细的记录，但是如果还能回过头重新看看那些节目，效果肯定会更好。CBS的新闻片段档案主要是供内部使用，其次才是出售给别的节目制作公司或其他机构。CBS仅有一间放映厅，而且对放映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也有规定。出于这些原因，我最终还是决定将目光放在CBS和《纽约时报》上，尽可能地展现其中的一些新闻内幕。

但是，CBS杂乱无序的节目资料并没有影响我要讨论的问题。当一个问题既重要又吸引人时，人们总是尽可能地借助最理想的材料，缺乏系统而又完整的资料是不可能做到系统分析的。但是，研究者的历史命题也不能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得出结论。因此，如果我没有办法看到我想要观看的所有影片，那么还有一种补救的措施——1965年以及随后几年的“编辑日志（Editor's Logs）”，它可以为我提供每一条新闻报道事件的主题、发生地点、报道人员，以及播出时间等方面的内容。我设法拿到了CBS周日新闻节目的文字副本（1967年3月开始有计划地保存），不过只有文字，没有任何的图片。更为重要的是，我不止一次地与一些CBS的新闻记者以及相关人员进行交流，其中包括记者、研究人员、新闻制作人员，以及克朗凯特新闻节目中的高级制作人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参与了60年代那场运动的报道。多亏了CBS工作人员的合作，我才可能从编辑部到演播室，全程参观了CBS晚间新闻的制作；很快我便对新闻制作的流程有了较深的了解。当然，我观看了数不清的电视新闻节目，并对其报道模式进行了仔细的思考，我也阅读了近期出版的社会学以及新闻学中关于CBS新闻和其他新闻制作的文章。在接受了某些材料已经无法挽回的事实之后，我相信得出尽可能确定的结论并不

是没有可能的。

要研究新闻报道对于社会运动的影响,《纽约时报》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它是最有资格被人们称为“全国性”或者“纪实性”的报纸。《纽约时报》已经被政府机构当作发表言论的常规渠道,因此该报在政府决策时扮演着多种角色。^①美国学者利昂·西格尔写道:由于在读者中的重要政治影响,《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具有类似于议院的决策性功能。^②《纽约时报》为遍布全国的商业、政界、知识界、学术界和专业圈的事件设置议事日程,并制造与讨论各种话题。^③作为一家特色的新闻媒介机构,《纽约时报》为全国的日报提供着新闻报道的参照模式。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全国的新闻记者都对《纽约时报》及其报道予以认可。一项研究表明,1962年在华盛顿所有的记者中,有大约90%的人阅读《纽约时报》,并认为它是“公正(fair)”和“值得信赖的(reliable)”。^④因此,对于通讯社、广播电视新闻以及新闻杂志而言,《纽约时报》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实际上,《纽约时报》也是电视网的新闻工作者们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世界整体画面认识的主要渠道之一:他们可以知道哪些地方正在发生什么事,什么事值得进一步探究。在CBS的新闻中,编辑们常常把《纽约时报》的报道摘引下来作为参考。1976年11月,在纽约调查期间,我注意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晚上,CBS和NBC都播出了一条关于南部工会组织动乱的消息。就这一巧合,我询问了一位CBS的新闻制作人员,他回答道,因为《纽约时报》上周刚刚对南部的工会运动作了报道,而CBS常常会追随《纽约时报》的方向。另一个业内人士指

① 详见 Thomas Bethell 的 “The Myth of an Adversary Press,” *Haper's Magazine*, January 1977, pp. 33 - 40.

② 出自 Leon V. Sigal 的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of Newsmaking*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73), p. 47.

③ 《纽约时报》星期天的经济专栏定期地用整版的篇幅来做广告,大公司的经营者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表明《纽约时报》是不可替代的。举个例子,《纽约时报》就曾引用西屋电气公司主席 Robert E. Kirby 的话,“当我无法与《纽约时报》保持一致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了它几乎寸步难行。要处理好经济事务,尤其是那些复杂的业务,就需要信息。我个人认为《纽约时报》是不可多得的信息来源”。在版面的最下面,每条广告都以这句话结尾——The New York Times: Makes things happen where affluence and influence meet.

对于知识界的精英们, Charles Kadushin 在 *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 Elit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pp. 140 - 141) 中指出,“在我们所作的抽样调查中,有 98% 的人仔细阅读《纽约时报》”。对于越战,他说,“报纸的社论并不与新闻本身同等重要……《纽约时报》在凝聚知识界反对越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④ William L. Rivers, “The Correspondents after 25 Year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1 (Spring 1962): 8, cited in Sigal,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p. 40.

出，当不同的新闻节目对某一事件的报道有所出入时，看看《纽约时报》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六十年代中期，CBS的一位新闻调查人员与新奥尔良的区检察官吉姆·加里森（Jim Garrison）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加里森参与调查了肯尼迪遇刺事件，因此知道一些内幕消息，但他本人却对此守口如瓶。后来，新奥尔良的《时代花絮报》（Times - Picayune）的一篇报道将加里森捅了出去。当时，CBS的华莱士（Mike Wallace）正在新奥尔良报道一次美国军团会议。由于他们已经得到了这方面的消息，并且当地的报纸也做了有关的报道。于是，他们就地取材，制作了一条新闻报道。按说，CBS可以抢在其他电视网之前播出该报道，但克朗凯特对此却不怎么感兴趣。第二天早晨，《纽约时报》却抢先刊登了这条报道。所以说，CBS缺乏一种对自己的自信，也许是由于害怕触犯官方的缘故。^①由于缺乏对事件的原始报道，又没有提到任何的调查人员，CBS、美联社，还有合众社，只好让《纽约时报》为他们当了一回把关人和新闻真实性的证明人。

当然，《纽约时报》并不仅仅是从电视网那里赢得自己的声誉。《纽约时报》一直在为更伟大的目标而努力，并且拥有全国最多的报道人员，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因此，这也为它赢得了“纪实性报纸”的美名。“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领导层对《纽约时报》相当重视，不仅仅只局限在纽约地区。60年代，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以及1963 - 1965年间密歇根的安阿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领导人们都大量阅读了该报，并据此来研究政治走向。1965年底，旧金山海湾地区的两名组织者，曾如此抱怨道：为什么西海岸的人们必须要看《纽约时报》才能了解组织的情况呢？^②可见，他们讥讽抱怨的语言包含着一个不争的事实。

于是，我在格莱恩·希尔斯（Glenn Hirsch）的大力帮助下，查阅了1965 - 1970年间《纽约时报》的缩拍档案，尤其是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相关报道，同时也包括其他的激进运动和反战运动的报道。出于对比的目的，我也浏览了其他的报纸，看看它们对《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如何评论的。然而，在对媒体—运动的历史关系的描述中，特别是二者在1965年的关系，我还是主要对《纽约时报》集中进行了研究。一方面是因为它在制定国家议事议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还为其他媒体的报道制定着日程；再就是《纽

① 1976年12月28日我对Michael Nolan的采访。Nolan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的责任编辑。

② 引自Roy Dahlberg和Carolyn Craven在SDS 1965年12月集会上的报告；作者保存的资料。

约时报》的资料也比较容易找到，至少能够看到缩拍的报道。

我的确想过，如果能够观看一下同时期其他大城市的报纸或者电视新闻、杂志等，也将会受益匪浅。不过，如果没有更深入地研究，无论资料如何丰富，也无法从《纽约时报》中得出多少结论来。1977年，《洛杉矶时报》的一名记者发现，大约有5个月的时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洛杉矶时报》等几份报纸，很少对当天重要的新闻事件形成一致。其中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没有一条新闻是同时出现在三份报纸的头版上。^①

通过比较 CBS 电视网和《纽约时报》得到的一些东西，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最初的想法是：报纸的报道模式和电视肯定不会相同，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这样的。通常，电视会将新闻编辑成适合播出长度的报道，而牺牲详细的叙述，将报道“移交”给那些较为出色的画面，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却惊奇地发现，《纽约时报》和 CBS 对新左派运动的报道模式并非完全不同。你可以在电视和报纸中发现大致相同的分析模式，至少在报道新左派运动上，CBS 没有什么特别感到惭愧的地方。新闻记者、媒体制作人员以及学者们通常认为，印刷媒介和电视新闻在风格、手法、内容和影响上有着本质的不同；报纸和电视的从业人员都为此而理直气壮（干报纸的人说，我们能干的事电视干不了，所以少了我们不行；干电视的说，报纸能干的事我们干不了，所以别对我们期望太高）。^② 一方面，报纸可以提供深度报道，包括他们细致的调查和其更为有力的连续性报道；另一方面，电视的报道具有即时性，具有冲击力和亲和力。只有当报纸的发行量减少而不得不去和电视争夺二十年来流失的受众时，二者的融合或许才有可能出现。^③ 但是研究媒体之间，（不仅报纸和电视，还有广播、通讯社和地方电视台等）以及单一媒体中不同制度之间的区别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曾打算对各媒体的报道模式，及其具体程序中的异同点加以准确地描述。但是，我不禁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对于不同的新闻机构来说，确定报道模式

① David Shaw, "Page 1 News: Press Rarely in Agreement," Los Angeles Times, 1977年6月24日。

② 详见 Paul Weaver 的 "Newspaper News and Television News," 该书对它们的异同点做了透彻的分析。另外，还可参阅 Douglass Cater 和 Richard Adler 等人编写的 Television as a Social Force: New Approaches to TV Criticism (New York: Praeger, 1975), p. 81-94. 或许 Weaver 无意之中透露我们，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比差异更为吸引人。二者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包括(1)电视节目主持人或记者常常自诩为博学多识，因为他们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2)电视倾向于“精彩的影像”的效果。但是，由于报纸也大量运用图片并制造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使得第二个差异不再那么明显。

③ 面向郊区的都市报纸开始注重人们的“生活方式”、人物个性以及新闻摘要，Fergus M. Bordewich 的 "Supermarketing the Newspaper,"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16 (September - October 1977) 对此做了早期的调查。由于该现象刚出现不久，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较多的相关评论。

的机制多少会有些不同，但是媒体的报道模式整体上还是比较规范的，各种报纸之间（或报纸和电视网之间）不同的报道模式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在我的印象中，新闻杂志和通讯社的报道，大体上都来源于同一“曲目”。^① 如果确实存在差异，或许 CBS 和《纽约时报》与其他媒体机构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对新闻事件的报道模式往往是自相矛盾和错综复杂的。它们对运动时而肃然起敬，时而嗤之以鼻，时而又威逼恐吓。从 CBS 电视网到地方加盟台，从《纽约时报》到《圣地亚哥联合报》（San Diego Union），从《纽约每日新闻》到《芝加哥每日新闻》，或许对于新闻的处理手法也存在着差异。但是从整体上看，所有这些区别都是同一霸权内的相同主题。

关于对新闻报道的分析

对于本书第一部分选取的新闻报道，我曾做了些笔记。那么，我是如何看待这些笔记的呢？

我对 1965 年有关新左派运动的报道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因为媒体正是在那个时候形成了对于新左派运动的报道模式；也正是那一年，“新左派”进入了媒体的报道日程。仔细阅读这些报道，我们能发现原有的报道模式，并且发现它深深陷入了传统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以及霸权主义界定事件的方式之中。

尽管《纽约时报》和 CBS 很少能有值得深入研究和分析的报道，但我还是决定充分利用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以便能进行细致的可读性的分析。因此，在叙述中可能会出现重复的现象。但是我个人认为，应该给读者一个机会，以便让他们认识到那一年媒体报道模式展开的全景过程，这是最为重要的。至少我知道，研究中的不确定性已经在文化的注解中不可避免，但却不会存在于我选材的过程中。

我也是出于某些理论上的原因，才会偏向于对新闻历史进行彻底的定性研究。我需要的是对文化成品（无论是报纸中的文章、电视节目、书籍或者是博物馆的东西）进行灵活的、定性的“文学的（literary）”研究。我要归纳出那些具有决定性的潜在假设，这些假设由于独特的规律，在定量的内容分析中仍旧是模糊的。定性研究比定量研究更为灵活，它渴望达到一种与现实媒介产品的错综性

^① 但是，研究人员们也做了记录：根据 Harvey Molotch 和 Marilyn Lester 的“Accidental New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 [September 1975]: 240n.) 中的观点，通讯社的资料一般只保存三年，而且没有索引。

与矛盾性相一致的复杂层次。

就像斯图加特·霍尔（Stuart Hall）所指出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方法都始于一种对材料“长期的基本潜心钻研”。^①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要对材料的类型加以统计，并对重复出现的模式进行分析，或者“通过先前的阅读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以便能作进一步的分析”。^②其实，这两种方法我都使用过，以便分辨出内容的主要种类，同时也可以分析新闻出于政治因素对不同事件的处理。

我没有计算重复报道出现的次数，部分的原因是由于我无法找到某些电视网的新闻节目片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定量的筛选很可能会丢失许多我发现的很有趣的微妙现象。最后，我特别想研究那些关键政治时刻的报道，这些时刻的选择标准必须放到新闻报道中，一个更为宽广的政治意义。这并非仅仅只是一个关于媒体对新左派报道内容的简单研究，而是对媒体报道政治意义的研究，它既影响到媒介制度，又对运动本身产生影响。

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选择了语言的方法进行分析，并不等于选择了与客观性相对的直觉。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都要依赖于对材料的初步审核。这些审核，至少是含蓄地以“什么最重要，什么需要分析或予以重视”等直观的假设形式进行的，很难对这两种研究方法进行纯粹形式上的区分。正如霍尔所讲的：

人们常常会做出这种错误的假定：“由于内容分析法使用了精确的标准，对语言使用的依据进行‘编码’，所以其措辞在语义上是客观的；而语言分析尽量避免‘建立代码’，所以它是直观和不可靠的。”语言类型的分析也要借助依据：如果某种隐藏意义的解释是基于某段正文，那么这种分析法就可以指出这段原文；它还会简要地指出更为充分的语境依据。他也考虑对想要得出的推论有修正或反证作用的材料；他还应该（并不总是）具体地说明，对分析者来说，为什么是这种，而不是其他的材料读取方式是最为可行的。内容分析把重复（即同一类型材料的堆积）当作是确定重要性最有用的表征。

文学的/语义的还有风格分析也把重要性视为意义的一个关键性维度。但是，它却不用定量的术语来表达重复的形式。这些重复的形式是隐含意义的标志，可

① 在 *Paper Voices: The Popular Press and Social Change*（作者是 A. C. H. Smith、Elizabeth Immirzi 以及 Trevor Blackwell）的序言中，Stuart Hall 提到的对待这类问题的态度，使我对定量分析法的探究受益匪浅。

② 同上。

以从这些隐含意义中引申出某一材料的推论。但是，语言分析者们还有另一途径：那就是，对重点因素的关注和斟酌的策略。位置、态度、语调、风格、意象等，所有这些都是书面强调的方式。真正重要的东西可能不是那些给定的，而是那些被普遍模式排除在外的，在独特环境中最具分量的东西。^①

对于媒体报道内容的研究，认为定量的技巧是毫无用处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定量的方法能与定性的方法结合起来，并且手头掌握了充分材料的话，使用定量的方法就可以使新闻内容的事实显得更加清楚。在报道反战示威活动时，《纽约时报》的记者曾提到过“春天温暖的阳光”这样的话，而定量的方法就不会提醒学生注意这句话的含义。但是，它却可以告诉我们，这种报道模式在不同的新闻报道中发生的频率。不管怎么说，我要做到方法上的独一无二大概是不可能的了。在对某一现象进行批评和解释时，别忘了“布丁好不好吃，吃了才会知道”。

① 同上。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致谢??

一次运动的媒介形象

1. 前言??

序言??

导言??

2. 1965年春媒体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的报道??

3. 1965年秋，媒体聚焦下的SDS??

4. 1965年的组织危机??

媒体对运动的建构和消解

5. 领导人的确认和公众人物的打造??

6. 浮华的报道与越战??

7. 温和派浮出水面：改革的时代??

8. 缩减时间与淡化语境??

9. 传播与遏制??

霸权、危机和反对派

10. 媒介惯例与政治危机??

11. 七十年代向八十年代的过渡??

附录：关于材料来源与研究方法??